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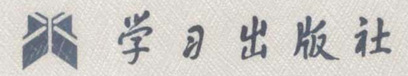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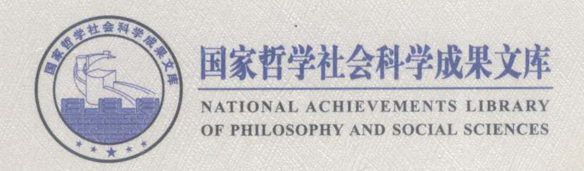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

(1918—1922)

田子渝　等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
(1918—1922)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1918-1922)



ISBN 978-7-5147-0162-3

定价：75.00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
(1918—1922)

田子渝　蔡丽　徐方平 李良明　著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 田子渝等著．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5147-0162-3

Ⅰ．①马…　Ⅱ．①田…　Ⅲ．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中国-1918—1922　Ⅳ．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813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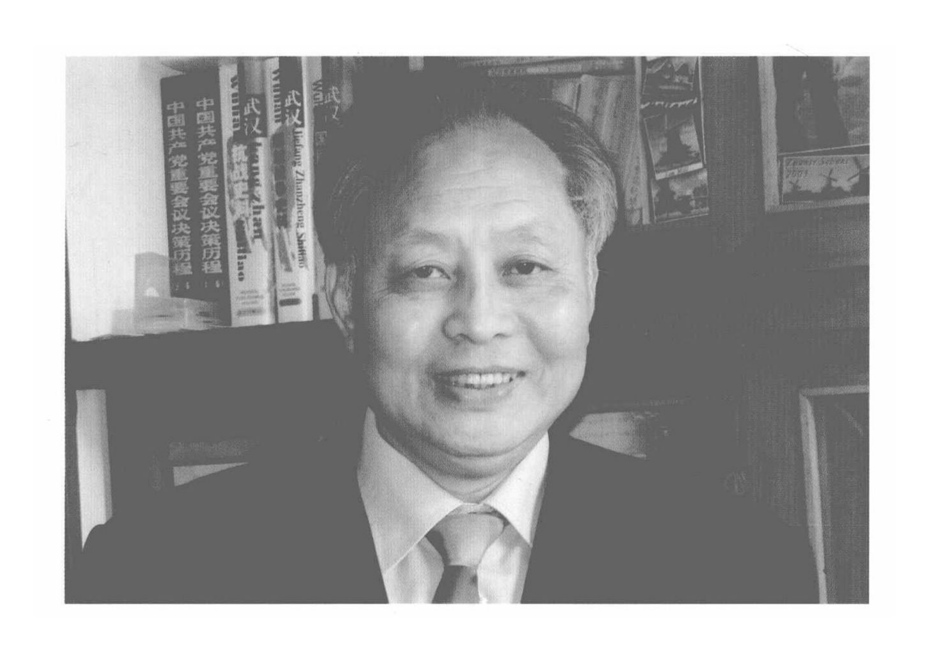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
MAKESI ZHUYI ZAI ZHONGGUO CHUQI CHUANBOSHI（1918—1922）
田子渝　蔡　丽　徐方平　李良明 著

责任编辑：边　极
技术编辑：吴深明
封面设计：肖　辉　杨　洪

出版发行：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彩　　插：2
印　　张：34.25
字　　数：543 千字
版次印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7-0162-3
定　　价：7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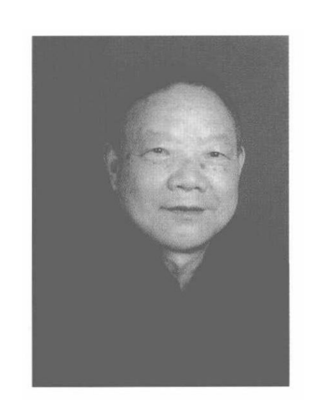
田子渝　男，1946年3月生，四川泸州人。现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主要学术成果：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与中共创建史研究，其中《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获得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二届优秀论文二等奖（2002）。二是武汉地区民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湖北通史·民国卷》（与人合作）、《武汉五四运动史》（独著）、《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解放战争时期卷》（独著）、《五卅运动在武汉》（主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主编）、《武汉抗战史料》（主编）、《武汉解放战争史料》（策划/编辑）、《武汉民国初期史料》（策划）。其学术成果两次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三次获得武汉市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三等奖；多项获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优秀成果奖。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子课题“李汉俊”项目。



蔡丽 女，1959年12月生，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史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发表过《共产国际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巨变》、《马林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共产国际为什么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浅论共产国际代表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关系论析》等论文；主编《祖国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合著《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认识史》等。

徐方平 男，1964年3月生，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出版《蔡和森与〈向导〉周报》等著作5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论文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被评为湖北省高校十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李良明 男，1947年4月生，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4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与田子渝教授、曾成贵研究员主持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解放战争时期卷》荣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恽代英思想研究”结项被评为优秀，已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目　录

绪　论……………………………………………………（ 1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大幕的开启……………………（ 27 ）

第一节　初期传播的主力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 28 ）

第二节　初期传播主要大众媒介……………………………（ 61 ）

第三节　初期传播主要渠道…………………………………（ 84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传播……………（105）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05）

第二节　传播机构、杂志、重要著作………………………（120）

第三节　传播主要内容………………………………………（141）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最初结合………………（17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交锋…………（191）

第一节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2）

第二节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204）

第三节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222）

第四节　新村、工读运动失败后的觉醒……………………（243）

第四章　在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与影响……（257）
第一节　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之一……（258）
第二节　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初期传播的媒介与渠道……（267）
第三节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初期传播的内容与影响……（290）

第五章　国民党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325）
第一节　主要传播者与传播媒体……（326）
第二节　主要内容介绍……（349）
第三节　对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评价……（383）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历史性跨越……（403）
第一节　中共二大前夕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规律的探索……（404）
第二节　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制定……（427）
第三节　中共二大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444）

结束语……（485）
主要参考文献……（487）
附件：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499）
人物简历……（505）
后　　记……（537）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Chapter 1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 (27)

1. The Main For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d the Rudiments of Communist Ideology .... (28)
2. The Major Mass Media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 (61)
3.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 (84)

Chapter 2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 (105)

1.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105)
2. Media Organizations, Magazines, and Important Works ...... (120)
3. The Main Contents .... (141)
4. The Initial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179)

Chapter 3 Th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 (191)

1. The Controversy over "Problems and -isms" …… (192)
2. The Controversy with Guild Socialism …… (204)
3. The Controversy with anarchism …… (222)
4. The Awakening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New Village" and the "Work- Study Movement" …… (243)

Chapter 4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mintern and its Influence …… (257)

1.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s One of the Basic Tasks of the Comintern …… (258)
2. Th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Used by the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mintern …… (267)
3. The Content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intern and its Influence …… (290)

Chapter 5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 (325)

1. The Main Disseminators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 (326)
2. The Main Contents …… (349)
3.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by the Members of the Kuomintang …… (383)

Chapter 6 The Historic Leap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t the Early Stage ······ (403)

1. The Probe into the Laws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by the Communists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CPC National Congress ······ (404)
2.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gram by the Second CPC National Congress ······ (427)
3. The Major Publications Disseminating Marxism around the Time of Second CPC National Congress ······ (444)

Conclusion ······ (485)

Selected Bibliography ······ (487)

Appendix: The List of the Books Disseminating Marxism in China during 1919–1922 ······ (499)

List of Names ······ (505)

Postscript ······ (537)

绪　论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是近代中国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在中国有一个极其复杂的由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的转场过程，迄今已有 130 多年了。它经历了若干阶段，不同阶段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不同的。笔者将其分为四大阶段。

传播的初始阶段长期被我国学界称之为“介绍”阶段。从传播学的角度，则是自然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究竟什么时候被中国人知道，至今还无法定论，其原因是浩瀚的史料没有完全挖掘出来，因此，每当一个新史料被发现，就成了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尽管史料非常繁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传播的主渠道是媒介，传播的主体是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了解可能要追溯到 18 世纪 70 年代的巴黎公社时代。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就有所报道。维新人士王韬将其报道汇编成《普法战纪》(14 卷)。不久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译成“康米尼党”，将社会主义者译成“康米尼人”，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译成“民党”，报道了德国、俄国、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斗争。

中国人是从 1898 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那里最先知道马克思名字的说法一度被媒体炒作，但有学人指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的《泰西民法志》是 1910 年印刷的。[①] 大多数有关著述记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中文名字

① 唐宝林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 页。

的杂志是 1899 年 2、4 月出版的，由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称赞马克思为著名的“百工领袖”，其资本学说“语言翔实”，“政学家至今终无以难之”。

1902 年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里的“麦喀士”，就是马克思，文章称赞他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当今德国最占优势的两大思想，一个是麦喀士的社会主义，一个是居志埃（今译尼采）的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多压服”。梁氏对马克思充满好感，在其著述中，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不可行”[①]则是他的一贯思想。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对社会主义有浓厚的兴趣，以致中国同盟会元老，曾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冯自由说中国政治团体首先拿社会主义做它的党纲，“同盟会就是嚆矢”。[②]冯氏所指社会主义党纲是中国同盟会四大纲领中的“平均地权”。革命党人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垄断造成“富者日富，贫者日贫”，贫富悬隔，积重难返。他们治疗资本主义的病源之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其核心是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也，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其学说虽繁而皆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言其大别，则分共产主义与国产主义，而土地国有，又国产主义之一部也。”[③]“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核心。在孙中山那里，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外文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此词来自日文，对应的英语是“socialism”。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社会主义史大纲》等近 30 篇文章，其社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民国伊始，孙氏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四处作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说。他称赞马克思的“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④]“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

①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②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1920 年 8 月，第 4 页。

③ 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1906 第 3 号，1906 年 4 月。

④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18 页。

之神圣”。[①] 他指出社会主义有许多派别，如共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等等，综合起来就是两个派别，即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②] 在孙氏那里，这两派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集产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下乘。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国民素质均与上乘之社会主义相抵触，因此集产社会主义更适合我国国情，为“今日唯一之要图”。[③] 孙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本质区别是在改造社会的手段上，他主张改良，不赞成剧烈的暴力革命；在政治制度上，他践行的是民主共和，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主要集中在海外。1907 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等人主编的《天义报》于日本东京创刊。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他们均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时也宣传马克思主义。民国成立后，他们纷纷回国，其宣传声势更高。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亮点主要在翻译方面，多次翻译《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翻译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1912 年《新世界》刊登恩格斯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该文的第一个中文本。《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比较详细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如果将它与 7 年后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比较，则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宣传立场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水平上的差异。

1912 年 11 月，中国社会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的政党。该党也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其核心理念是“专征地税”说，表明它与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论均来源于美国乔治·亨利的单税社会主义。

纵观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介绍者虽然立场、价值取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等方面不同，但如下特点则是共同的：首先，它们的宣

①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18 页。
② 同上书，第 508 页。
③ 同上书，第 509 页。

传都是肤浅、片面的，不成系统。在理解上也是五花八门，有限的宣传中错解、误解比比皆是。其次，它们确实仅仅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并非信仰，更不打算付诸实践。再次，它们的介绍影响极其有限，几乎均在国外，国内影响微乎其微。最后，它们思想体系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思潮与封建主义的混合体，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占主流地位。

传播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国学界称之的“早期传播”阶段。学界对此有明确的时间划定，即五四时期，具体来说是十月革命之后。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说成为经典，尽管有学人提出些看法，但那是如何理解这句话所指的时间问题，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有学人将此阶段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①]，笔者持同一立场。从传播学的角度，此阶段是文化传播（即自觉传播）阶段的发端。

为何此阶段是“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呢？这只要与自然传播阶段稍做比较，其本质差异就一目了然。首先，时代不同。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新纪元。俄国革命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从此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三国际的成立，为我国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费支持。五四运动使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两者相结合为深入传播提供了必备的社会条件。其次，传播的深度、规模与前阶段大异。此阶段比较全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唯物史观（历史论）、剩余价值（经济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政策论）等三部分组成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②] 此外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开始）、《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向导》、《先驱》等媒体，有组织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面世。再次，传播的主体：具有初步共

① 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10月。

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坚定地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奋斗。他们在“修正派”、“正统派”，“布尔什维克”等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中，立场鲜明地认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共产主义”；[①] 坚定主张“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②] 最后，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播不仅引领着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辉煌时代的大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开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鉴于学界对“早期传播”阶段下限时间的界定尚有歧义，本书设置了“初期传播”的概念，以示区别。“初期传播”的上限与“早期传播”的上限相同，即以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为标志。其下限定在 1922 年，主要理由就是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标志着传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越年（1923 年）后中国革命进入新时代：京汉铁路大罢工、国共首次合作、国民革命运动随即兴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航船驶向了更加辽阔的海域。

传播的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阶段。对此政治理论界已经有成熟的论述，故不赘述。现在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本书不把这个阶段的起始时间定在五四时期，而定在 1922—1923 年？这里首先需要确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来明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初步掌握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与规律。因此其标准至少要具备这两条：一是要有比较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理论形态”。如果这样的表述大致成立的话，那么“初期传播”阶段则明显不足。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鲜明特点，在传播之始就不是学理上的研究，而是救亡运动的客观需要。要救国，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中国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就是在救亡运动中，在西方各种现代政治思潮之思想武器中，经过反复推敲比较，最终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立即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 9 卷第 3 号，1921 年 7 月 1 日。

② 蔡和森：《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 年 12 月 1 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7 页。

行动起来，其第一个实际成果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力以赴地从事工人运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始。但最初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中国革命战略上却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提出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这表明最初的结合是不成功的。

一年后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共二大上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民主革命规律的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

中国革命进入国民革命阶段后，大革命的巨浪汹涌于神州大地，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呈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矛盾，随之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样在实践与革命理论方面都呈现出具有“中国形态”的初步成果，所以才是真正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本书将第三阶段的上限定在1922—1923年，而不是传统的1924年？笔者认为1924年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但作为实践则在1922—1923年就开始了。这一年发生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斗争高潮，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中国共产党将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付诸实践，国共合作的实际活动在这一年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传播的第四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个理论成果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进程，目前还在继续中，其理论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成熟。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初期传播史阶段在整个传播中具有开拓性。我们再现这段辉煌壮丽的历史时，感到异常兴奋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这一阶段便已确立，主要有：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武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

条，必须与国情相结合，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探索与奋斗，形成一个适合中国革命的思想体系。以上基本原则至今还在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之航船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中国共产党之诞生与发展而起航的。在党的创建时期，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十分重视对传播史的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马克思学说概要》、《唯物史观解说》、《共产主义ABC》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书籍相继问世，其译文、序跋、附记、附录、注解等，凝聚着传播者的智慧；报刊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介绍与研究的广告、书讯、书评等，刻印下传播者追求真理的足迹。

张太雷的《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6月）、瞿秋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等文献亦可视为初期传播研究的最初成果，记载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的努力与贡献。他们不是坐而论道的学究，而是起而践行的革命者，在传播之初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科学、实践的价值，对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发生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向纵深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历史、社会的新发展，推动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著述的面世，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专业队伍逐渐形成。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版）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版）、列德莱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明显不同，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所著的第一部描述科学社会主义史的专著。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书店1937年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有益尝试，曾影响一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在延安整风中，学以致用、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中共党内蔚然成风，并影响了我国进步的社会科学界，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传播史研

究进入了高潮。这一时期除了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文本面世外，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有选择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方法、原则、思想范式、结构模式、价值取向等至今还在发挥关键作用。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的著述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入了成熟期。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及其选集相继问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强势文化，其消极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前，传播史研究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辈学者就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是其中耀眼的成果之一。这套书不仅辑录了五四时期160余种主要期刊的目录、发刊词、宣言，而且对期刊的编辑出版者、出版期数、版式、创刊与终刊年月等作了一些考订，特别是对期刊的详细介绍，说明他们力求全面扫描那个时代的大众传媒。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方面，他们的目光没有仅仅停留在《新青年》、《共产党》、《向导》等主要传播刊物上，《晨报》、《星期评论》、《国民》等也受到重视。尽管有些评介无疑烙有时代的印记，但在资讯处在封闭状态的时代，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就显得格外珍贵与超前了，对于那些整理史料的学界前辈，我们充满敬意而不应苛求。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的开山之作，是那个时代该领域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专著。我们这些后进者正是从这个学术港湾开始探索的远航。这一时期，出版界有计划地影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共产党》、《向导》等刊物。改革开放新时期，又影印了《晨报》、《申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五四时期的报刊。这些珍贵报刊的影印发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与五四运动史、中国现代史，以及相关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传媒史的研究。

改革开放不仅迎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春天，也迎来了史学百花齐放的春天。特别是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前后，我国党史界、现代史界与革命博物馆、档案馆同仁，掀起搜集、整理革命史料的高潮，北京、天津、

上海、武汉、重庆、陕西等地五四运动资料性图书陆续出版。中央档案馆与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地档案馆合作内部发行的“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披露了大量建党时期的党团档案资料，为创建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威资料。在传播史方面，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有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林代昭、潘国华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姜义华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等，以及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邵力子、杨匏安、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张太雷、赵世炎、张闻天等初期传播者的全集、文集、早年文稿、文选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海外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传回国内，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改写了党史、传播史中的一些传统提法与结论。首先，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 1997 年开始出版发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和第 2 卷与本课题有密切关系。其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6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被挖掘与出版。这份资料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 1924 年在美国攻读硕士的毕业论文，鉴于中共一大没有留下任何中文资料，故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再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玉贞、旅英学者李丹阳与刘建一利用有关西方国家档案研究中共创建史的成果。李玉贞多年来在俄罗斯、荷兰国家档案馆搜集了大批档案资料，特别是对斯内夫利特（马林）的研究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李丹阳、刘建一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埋首英国公共档案馆（现改称国家档案馆），挖掘出许多关于苏俄来华人员和若干中共发起人员的活动情报及早期共运和工运的史料，其研究成果，梳理出魏金斯基来华前后一批苏俄来华、在华人员与苏俄在华机构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开辟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窗口。

国内一批研究五四与建党史的专著也相继面世。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与李新等主编的《伟大的开端》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 2 卷，从新闻出版史的角度，扫描了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对杂志、出版记载翔实，遗憾的是缺乏总体评述。

西方学界将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奉为海外研究五四时期的经典，因“参考了近千种‘五四’时期出版的书报杂志”的严谨态度而备受赞誉。[①]其实一些中国学者用力更勤，只是鲜见宣传而已。黄修荣的《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是创建史的优秀作品。作者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最先利用共产国际解密档案的中国学者之一，该书还广泛采用了五四时期的期刊、图书，是同类书中着力最强者。由于作者没有对引用资料作统计，无法知道究竟参考了多少材料，笔者用了一个笨办法，就是统计注释，约1370余条（有重复），可见其用功之勤。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力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版）是国外第一部论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其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着力最大，其成功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用大量不可撼动的史料，基本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日本这条线传到中国来的。书中《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等基础性的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二是利用日本档案和其他史料，较清楚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旅日早期组织的情况。以往国内研究主要是根据施存统、周佛海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三是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范式。石川的成果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报刊、学术研讨会上均有评论与争议，据笔者统计，已发表文章20余篇，这在新世纪10年来的中外交流史上是罕见的。[②]《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 迈斯纳：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中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译者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页。

② 主要有汪文庆采访萧超然的《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百年潮》2006年第6期）、朱文通的《也谈关于“渊泉”不是李大钊笔名问题的考证》、吴二虎的《关于“渊泉”的考证问题之我见》、许全兴的《有关“渊泉”的考证及其他》（以上三文见《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11版“理论周刊”）、田子渝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是非的三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1期）、许全兴的《学风与方法——对田子渝先生迟到的回应》（《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3期）、田子渝的《也谈学风与方法——对许全兴先生迟到的回应》（《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Yueleng的《“他者”的解读——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札记》（http/www. fyjs. cn）、朱成甲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等。

国共产主义的起源》(Arif Dirlik :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M. 路克: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Hong Kong, 1990)、《从朋友到同志》(From Friend to Comrade, Los Angeles, Oxford, 1991)、《普罗米修斯的天火——革命俄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17—1923)》(徐相文,韩国白山书堂2003年版)、《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Arif Dirlik,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是海外研究我国传播史、近代思想史中有较大影响的专著。

台湾方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创立史》(沈云龙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中共党史》(第一册,蔡国裕著,"国史馆"印行,1988年版)、《革命之再起》(吕芳上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陈永发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等均对中共创建史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有所研究,尽管因强烈的意识形态缘故,其观点、立场与大陆学者大相径庭,但并不排除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初期传播史研究方面,我国哲学界的同行成绩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庄福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其驹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王守常等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专著中的相关章节,均有相当理论深度。

所有中共创建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著作中对初期传播史都辟有章节专门描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论文集,其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对初期传播有较详细的评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年表(修订稿)》、《列宁著作中译本年表(修订稿)》(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是传播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唐宝林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获得学界的好评,初期传播方面的内容约占全书的1/5。

长期以来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不仅致力于中共创建时期的文物征集、保管、展览,而且成为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中心,从1991年至今出版了具有馆

刊性质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已出 11 辑)、《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图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 10—2004. 1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全的工具书。

初期传播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论文方面，其数量以万计，前所未有，硕果累累，几乎涵盖了初期传播的所有方面，是新时期党史界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成为我国学术民主、繁荣的一个缩影。

1984 年出版的《“天火”在中国燃烧》(王观泉著，简称《天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本涉及初期传播史内容的专著。经过十年文化禁锢的中国，出现了赞扬《新青年》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赞扬了陈独秀在新文学运动中不可磨灭功绩，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同时，《天火》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时，李大钊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国革命要非劳动阶级的知识分子来指导，以及道德在社会革命中的反作用等问题，至今还鲜见有影响的论文。但由于诸多原因，这部著作还不能称之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天火”初期传播的专著，它主要笔墨在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期传播，即便如此还缺失了五四时期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重要史料，一些结论也下得过于仓促。[①]《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 年）》(彭继红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是一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专著。该书导入新的研究方法，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历史，为传播史研究在新世纪开了一个好头，但要成为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还要攀登一段艰难的路。

整个传播史研究中，初期传播史研究是海内外歧义纷出、争议颇多的领

---

① 马克思主义文艺传播的内容包括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创作方面而言，《天火》对《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歌颂十月革命、苏俄社会与劳动运动的新诗、小说、美术等几乎没有涉及。就理论方面而言，《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1920 年 5 月《星期评论》，该文提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概念）、《民众底艺术底理论和实践》(1921 年 11 月《小说月报》，被称颂为“当时以唯物史观建设文学理论的划时代论文”)，以及《今日》上刊登的《革命的文学》(1922 年 2 月)、《无产阶级与文学》(1922 年 4 月)、《艺术与民众的精神》(1922 年 8 月)、《无产阶级的文化训练》(1923 年 2 月）等重要文章《天火》均没有涉及。《民众底艺术底理论和实践》指出文学是有阶级性，比《天火》称我国最早说明文学阶级性的瞿秋白发表的《新青年之新青年》(1923 年 9 月，《天火》第 45 页）要早 2 年 6 个月。

域。有些重要问题直接影响本书的写作，笔者借此对其中一些问题，也是本书的写作原则谈谈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专家与读者。

一、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海外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是外来政治势力切入的结果的论调。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有学者提出所谓五四时期救亡运动压倒了启蒙。这种论调将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对立起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这两种论调都是假设议题，与历史不符。近代中国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思想领域的必然结果。

1848年2月，当《共产党宣言》诞生的时候，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已从顶峰开始滑落，共产主义“幽灵”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游荡。此时一度执世界封建社会牛耳之中国[①]却迅速衰落，被现代工业化的英国用大炮和鸦片强行打开了大门。面对西方血与火的严峻挑战，中国统治者仍沿袭惯有的政治价值与谋略来对付西方新文明。统治者和传统的士绅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基本是盲点，更不要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国运逆转，但统治者还在迷恋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美梦，用剿抚“蛮”、“夷”的古老策略对付西方现代化的挑战。

但是世界毕竟进入了后封建时代，中国的封建大门被迫打开，融入近代文明的世界。19世纪60年代，中国少数先进精英，开眼看世界。他们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倡西学，行西法，提出了“中体西用”，即在保证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技”与“器”来救国。以往人们过多批判“中体”，而忽视了“西用”。这个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所能提出来的最佳国家发展战略，不经意地将中国引入了后发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行列。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90年代振兴中华的工业运动，其规模在亚洲屈指可数，GNP超过了所有的国家，居世界第一，影响深远，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帷幕。洋务运动不可谓不大，涌现出来的大型钢铁、煤炭、舰船、金融等企业在亚洲也名列前茅，在当时的世界也是先进

①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2008年8月1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的迅速衰落，与缓慢恢复的荣耀》称：“从14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的500年里，中国强有力地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0%。这一比例超过了美国经济在二战后领导全球经济的极盛时期的比例而且中国保持了500年！”

的。洋务运动的意义不可谓不深远，现代教育、出版等文化事业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最初巨人、精英几乎全是从这场运动中获得的思想启蒙；在运动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来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角。然而这场晚清的自救运动却以惨败而告终。

问题出在何处？出在封建专制体制必然阻碍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封建王朝企图用自身改革不可能挽救国家日益衰落的命运，需要体制外的先进力量才能使中国赶上世界的潮流，振兴中华。历史是何等的无情与有情。无情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有情的是先进的阶级必然诞生，必然担负起救亡的重任。于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寻求社会制度的“旧桃换新符”。

1894 年是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分水岭。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偌大的中国惨败于弹丸小国日本，举国震惊。越年屈辱的马关条约引发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说明中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改良道路走不通。1894 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告别了改良，揭起革命的大旗，经过前仆后继的斗争，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本来是中国洗刷半个多世纪民族耻辱，启动现代化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袁世凯登上政治权力的宝座，封建专制死灰复燃，“无数头颅无数血，可怜换来假共和”。辛亥革命参加者吴玉章的认识颇有代表性，他说：“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①

救国之路何在？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中反思，开始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于是他们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的“道统”方面，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了一代政治文化精英。然而脱离经济、政治制度的单纯“文化救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

---

① 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2 页。

为了救国，先进的中国人急切地向西方学习，将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法几乎都实验过，结果屡遭失败，更激起先进中国人另辟蹊径，探求救国新路的热情。此时世界发生的两件大事使他们将探索的目光移向了社会主义，移向了马克思主义。一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另一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前者使西方资本主义的“破罅一齐暴露”，[1]先进中国人对西方的理想破灭，寻求既能避开资本主义弊端又能使中国独立与富强的救国新路。巴黎和会上列强将中国山东割给日本，唤起了中国人的新觉醒，引爆了五四运动，加速促进了寻求救国新思想武器的历史进程。后者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民族复兴典范。顿时“社会主义”成为报刊最时髦的词，正如当时一篇文章里激情描述的那样：“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2]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践“俄罗斯新文明”，成为中国最激进知识分子追求的救国新路。因此爱国主义是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推动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命运紧紧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二、与初期传播相关的三个文化跨度

任何思想的传播除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外，还有其自身的文化规律，即思想（理论）上的历史渊源与求索。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初期传播与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思潮也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通观中国近代思想演变过程，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从思想启蒙（解放）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与以下关联的三个文化跨度有密切关系。

第一个跨度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所谓的“弃”，就是批判，我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者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新文化的中坚。施存统是其中典型

① 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创刊号，1919年9月1日。
②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代表，他是以反对封建礼教，发表《非孝》而名扬天下的。批评封建思想成为他们思想转变的起点。表面看他们批判中有绝对化倾向，但从思想深处，这批反孔的英雄们，并不都是绝对的反孔者，他们在践行民主、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青年恽代英的话颇具代表性："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圣，没有一句错的。一个人必定要争孔子是大愚，没有一句不错的，若不是为孔子，是为世界人，我看这都错了。"①他还说，"利用旧思想以推行新思想最妙"。②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也并不全然排斥。李大钊将文明分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人类进步两大机轴。毛泽东也认为在世界文明内，东西文明各占了半壁的地位。

所谓"扬"，就是批判地继承。从文化的深层次上观照，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传统文化虽然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但其精华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特别是爱国主义成为中国最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思想基础。初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刊名"觉悟"就是佛教术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成为先进青年不断寻求救国之路的思想武器，是他们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思想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最后才能解放自己"是相通的；与天地人奋斗的"自强不息"精神，彰显其蕴涵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特质；在初期传播者那里，中国"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区别，对大同理想的追求，缩短了先进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他们几乎都继承了传统的"力行"，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一致的，等等。

第二个跨度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的民主、科学、自由，使人们的思想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获得空前未有的大解放，几乎所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经过这个文化启蒙才步入共产主义行列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③这些经典的句式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宗旨，其精神鼓舞着一大批先进青年，勇敢地不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30页。
② 同上。
③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

停顿地探索救国的真理。新文化运动的最先进勇士们，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终抉择了共产主义。

第三个跨度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憧憬与超越。长期以来，在初期传播史研究中，人们在非此即彼（all or nothing）的思维下，视空想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之旅中，空想社会主义确实曾阻碍他们向共产主义转变，但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又是他们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桥梁。首先，空想社会主义是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被引进到中国，这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现实目标是一致的。其次，空想社会主义憧憬的“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是相同的。以上两个方面在客观上成为中国部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最后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超越，成为他们世界观实行彻底转变的起点。

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因此在本质上它们排斥马克思主义，这些在五四时期最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中发生过消极影响。但正如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鞭笞与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又唤醒了一批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削弱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思想动员。

三、在研究方法上，必须遵照列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的原则，力求全面、客观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本来面目

毋庸讳言，在创建史研究中存在着将繁复多变的历史现象归纳为几条不容置疑公式的现象；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当代意识出发的研究模式，直接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必然会忽视一些重要史实，无法还原历史，更遑论资政育人。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高度重视 1920 年 2 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这个说法来自高一涵。高氏虽然是李大钊的朋友，但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时，他远在日本，并不是亲历者。所以海外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 版，第 375 页。

不能说这种质疑没有道理，问题是质疑者把中共创建这样大事的关注点只放在这一件事上，显得学术视阈狭窄。既然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救亡运动的客观需要，那么建党思想就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事实正是如此。1919年9月7日，李汉俊与大悲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后，写了“译后短语”，明确表示面对十月革命的世界潮流，“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为了赶上世界的思想潮流，他确实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打算。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见之于报端有关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言论。这个史料确凿地说明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前5个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前6个月就有中国人公开提出建党的思想。很遗憾，因李汉俊被扣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帽子，他的建党言论也就没有进入权威党史著作的视野。

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小册子，代表了中国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作舆论造势，成为初期传播的一道亮丽风景（详细内容请见本书第二章）。遗憾的是迄今没有一本有影响的党史专著记载这份重要史料，原因可能与作者田诚的身世不详有关。[①] 田诚的身世固然需要认真考察，但关键是这个小册子的内容，如此重要的内容不能因作者一时没搞清楚，就不去研究它在传播史上的历史功绩。如果它的作者是李大钊、毛泽东，那肯定就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了。

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均是俄共（布）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列宁的战友，他们还曾是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著作《俄国革命记实》（1922年中文本）、《列宁传》（1922年中文本）、《共产主义ABC》（1921年中文本）在我国初期传播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曾发挥过较大的传播作用。《俄国革命记实》的作者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之一，苏联红军的创始人，《记实》不仅真实地记录了十月革命的历史，而且还在理论上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国胜利”的必然性，成为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列宁传》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演讲编成的，是我国第一部列宁传记图书，使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人士进一步了解了

① 关于田诚，任武雄初考证为陈独秀，后改为陈潭秋（《关于〈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作者问题的再商榷》，《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冯铁金认为《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出自李大钊手笔，《〈中国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出自李大钊手笔》（未刊稿）。

列宁的战斗生平与理论。这两本书第一版就印了3000册。《共产主义ABC》在初期传播中与《共产党宣言》齐名，是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影响最深的两本书之一。这三本书是我国通过苏俄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载体，然而，由于作者后被打成反对斯大林的反革命而在初期传播史上的影响也就被封杀了。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语境问题。研究历史应该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还是在现代语境中审视呢？按照列宁的观点，显然应该是前者。陈寅恪对此发表过高见："凡著中国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①] 陈先生虽然议论的是治古代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则，但就方法论来讲与列宁的思想是相通的。我们在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时，就应该用五四新文化语境，尽量去理解那个时代的环境与话语。我国初期传播者最初主要是通过日文（还有英文、德文），后来通过俄文转译。日文式、俄文式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语言与现代有所不同，有的甚至有很大区别。加上翻译话语也有时代性，那时的词汇与现代的词汇有些翻译不一样。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及其主要内容，初期传播者们主要是"以恩解马"，具体说是根据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发展从空想到科学》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唯物史观"，它是"彻底的唯物论"与"自觉的辩证法"（笔者注："自觉的辩证法"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称谓）的"综合"。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迄今这个提法仍然是我国的权威提法。按照这个提法，唯物史观指代历史唯物主义，"自觉的辩证法"指代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提法与斯大林的有何不同？如果用公式表示，则一目了然。恩格斯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 唯物论（彻底的唯物论）+ 辩证法（自觉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 = 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显而易见，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属种关系，到斯大林那里就成了并列关系。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哲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1930年版。

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便将自然观和历史观割裂开来，也抹去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显然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没有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我国初期传播者在传播时，斯大林的提法并不存在，因此在描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初期传播史时，如果使用斯大林的概念与话语（事实上迄今读者、作者、编辑在阅读、撰写、审定这段思想史时，基本上还是以这个为标准的）就会出现概念混乱。这点本书论述马克思辩证法传播时读者将会看到实例。

不是从历史中寻觅踪迹，而是从固有的概念出发利用历史；不是对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而是用当代意识有选择性地利用史料，不是在历史的语境中审视，而是用现代语境去解读，这是迄今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历史画面还没有完全复原的基本原因。

四、恩格斯的合力论对初期传播史研究具有特别的价值

晚年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创造历史时，指出其中原因很复杂，经济条件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有时上层建筑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历史事件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个人的作用，更多的是群体的力量。“历史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历史事件是有无数相互交错力量形成的合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成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中再次得到印证。这幅绚丽壮阔的思想画面，正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士与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合力绘就的。因此，如果只研究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杨匏安，不研究李汉俊、施存统、沈雁冰、周佛海等，不研究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沈玄庐等，不研究即便是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者都不熟悉的李季、陈溥贤、袁振英（震寰）、衡石、晋青等，那么这幅历史画面就无法真实地呈现。传播队伍的复杂又造成传播目的、动机和程度上的差别，如无政府主义批判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赞扬苏俄革命与建设、劳工运动、憧憬共产主义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同的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话语，但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民党人士之所以赞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因是将马克思主义比附三民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说明目前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等。而具体的人物思想演变又多姿多彩而富有个性，变化、反复是常态。因此研究者既要全面扫描传播队伍，更要分清传播的主流与支流，分清本质与现象，这样才能使缺损的初期传播史画面复原。

五、在剖析近代人物思想变化过程和评价传播主体在传播中所起作用大小时，避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近代中国代表性人物历史轨迹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变。风云突变、波谲云诡的近代中国，造成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所以对历史人物一锤定音、非白即黑的思维不仅不可取，而且有害。有的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很明确宣布自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如张东荪等，这个好办。但多数人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先信仰，后来反对，如张国焘、周佛海等。有的起初不信仰，后来信仰，如蓝公武在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中，是张东荪的支持者，明确认定中国并不具备实行苏俄社会主义的条件，如果硬要实行只能是“伪劳农主义”。但他很快放弃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立场，皈依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当时信仰，但后来公开加以否定，如施存统在1927年写的《悲痛中的自白》表示他当时“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底共产主义，只是相信克鲁泡特金底无政府共产主义。”[①] 这种自虐史观，并没有反映建党时期他的真实思想，而烙上了大革命失败后自己思想变化的痕迹。要正确把握他思想变化的轨迹，不取决于他后来怎么变，而要看他当时如何说，如何做。施存统早期思想确实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五四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发表了《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百余篇文章，成为初期传播中的佼佼者，当时他明确宣布：“我相信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合用于现在中国，所以不敢附和无政府主义。”“我所信的马克斯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②] 多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思想还夹杂着无政府主义、民

① 存统:《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 1927年9月5日。
② 亮（施存统）:《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1年7月31日。

主主义，思想转变之路十分艰难与复杂。

今人往往还将一个人的最后政治归宿作为判断其在初期传播时历史作用大小的标准，如对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早期思想不仅得到了充分肯定，有时还有拔高之嫌，而对有历史问题人物的早期思想，评价往往过于苛刻、粗糙，很难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对陈独秀一锤定音，称五四与建党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急进的民主派”、“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将他在建党与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给抹杀了。这个结论来自党内最高权威，因此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有所改变。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四部权威党史著作对陈独秀在建党到大革命时期的评价进行统计比较，肯定的次数分别是 1、7、6、50，否定的次数分别是 12、21、29、20。统计比较者指出：“对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从《三十年》的基本否定到《第一卷》的基本肯定，从将陈独秀作为负面人物来写到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改变对一个党史人物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用了长达 50 年的时间，其认识转变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党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唯上’理念，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①] 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对陈独秀评价的过程彰显出中共党史研究的巨大进步，但评价还没有完全到位。是史料不充分吗？不是，迄今收集陈独秀著述最详尽的《陈独秀著作选编》（6 卷本）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吗？不是，有些正确的评论早就摆在那里，但就是不能写进权威著作。

对后来成为反面人物的一些人物在传播中作用的评价，就更加简单，不是否定，就是批判，甚至将正确的东西当做错误来进行批判。如戴季陶。戴

---

① 春波、姚金果：《从统计数据看新中国成立后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之进展——以四部党史权威著作作为样本》，《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7 期。

季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中是不可忽略的人物，戴季陶现象很值得研究，可惜我国学界对他用固有的概念来作结论的多，科学的研究鲜见。①人们往往用他在1919年6月22日在《星期评论》第3号上发表的《访孙先生的谈话》和《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作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力证据”。殊不知，戴氏何止这两篇文章？仅以此两文为据来给他的政治主张下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和武断，更何况这两篇文章的原意并非如指责者所言的那样。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只看文章的标题就说他反对十月革命。《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所要表达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是要反对十月革命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要人们防范“布尔色维克”，而是要用“布尔色维克”改造社会的办法。他说得很清楚，是要“除去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是［的］压力、不合理的组织”，这是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军阀统治，建立一个新社会，当然他不同意使用暴力也是很明确的。其次，这是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观点，后来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看法。历史研究，特别是微观研究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要非常小心地将细微变化加以分析。1919年9月14日，在得知苏俄政府第一次宣布取消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时，他立即表明了肯定态度。同日，他在《介绍两位新朋友》的短文中，特别向广大读者介绍列宁的《布尔色维克之排斥与要求》，②“李宁的名字，大家都晓得，‘布尔色维克’这一个名词，大家都听见过，要把李宁和布尔色维克和在一道来研究，不可不读这一篇文章。”9月28日，他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③一文里，鲜明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11月30日，他在《星期评论》第26号上撰文：“我们的国民要看清楚俄国和中国是关系很密切的。从前我们对于俄国为甚么那样恨他呢？是因为他的侵略政策和帝国主义。劳农政府的政策从

---

① 戴季陶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了进步。章开沅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出版的《戴季陶集》，收录了戴季陶1909—1920年的文章。该文集虽然是将戴氏放在辛亥革命人物研究中，但在前言中对他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作了初步的探索。张彦伟：《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5期，信洪林：《戴季陶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郭圣福：《论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体现了戴季陶研究的最新成果。

② 《星期评论》第15号，1919年9月14日。

③ 《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俄国国内的政治上讲，故无论好不好，他已经宣言抛弃从前罗马诺夫王朝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密约，我们应该认识他在这一点已经是可以和中国相容的。”[①]1920年5月1日，他在《星期评论》的“劳动纪念号”上发表的《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前一阶段思想变化的小结。他说：“所以，我对于社会主义，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斯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至于俄国波尔色维克的建设，在政治组织上和经济组织上是很切实的模范，我们尤其不能不切实底研究。”“我的这一个态度，是决定的。倘若有人说我的思想‘历史臭’、‘物质臭’太过厉害，说我‘保守性’太过厉害，我都是承认的。”

戴季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显著的，他不仅与人合作翻译了《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还组织翻译了第一本中文本《共产党宣言》。该书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只是因为陈望道翻译好后，《星期评论》被迫停刊，戴离开了上海，才由陈独秀、李汉俊接手，以“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应该承认戴氏是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队伍中的明星，至于他如何从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成国民党中反对马克思主义最力者，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解剖的问题。

2009年8月22日李忠杰教授在《加强和改进对党史近现代人物的研究》的讲话里指出：“在历史这幅画卷中，你得承认：有大故事，也有小故事，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或者说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件、不大不小的故事。有主流，有主要的历史，也有很多的花絮。有大人物，有小人物，还有那些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人物，不大不小的人物。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还有一些说不上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很难界定的人物。如果历史研究都用单一的色彩、单一的标准来描绘的话，历史就很难是真实的、客观的。因此，为了完整地再现历史，我们就要尊重历史本身的事实。无论是作为伟大贡献的人物，还有没有作过太大贡献的人物，甚至没有贡献的人物，曾经作过贡献、后来不一定又做过什么贡献的人物，对他们都是可以进行研究、思考的。”[②]本书的撰写正体现了这些精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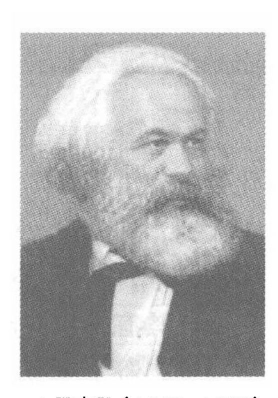
①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② 李忠杰：《加强和改进对党史近现代人物的研究——在“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究会”上的讲话》，《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我们比前辈学者幸运，因为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国家、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研究环境。档案进一步开放，五四时期的主要报刊有了影印本，海外庋藏的档案与研究成果陆续传回祖国大陆，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获得空前解放，撰写者在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下，力求用多元史观复原历史；审查者也以包容、开阔的视野审查著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初期传播史”国家社科项目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获得审查通过并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画面复原，只有走进历史才能真实地发挥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效。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强调必须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就引领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抚今思昔，继往开来。我们深信只有科学地总结历史，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高潮必将到来。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大幕的开启


▲马克思（1818—1883）


▲恩格斯（1820—1895）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大幕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开启，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救亡运动呼唤着先进济世思想，而思想一旦发生革命，并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出现改天换地的大变局。时代呼唤思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随着西洋文明"打"（李大钊语）进中国，是由20世纪初世界大趋势造成的，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两大事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十月革命则展示了新天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已经超出了俄国一国的范围，揭示了世界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正如李大钊所言："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①] 于是中国进步思想界发生了伟大的否定之否定，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否定，产生了对苏俄革命的憧憬。这种由"师资"向"师俄"范式的转换，使半殖

① 李大钊：《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3月21日。

民地半封建落后之中国一下子跃进到先进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使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迈进到世界之中国。

在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传播的主体，在他们强有力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扎下了根。《新青年》、《晨报》、《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等大众媒体一马当先，成为传播的主要中介。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苏俄、欧洲、美国等多个渠道，在中国开始了真正有意义上的传播，并在五四时期后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从此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一节 初期传播的主力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

五四时期是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是新文化洪波巨澜的时代，是政治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一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思想相继发生质的飞跃，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近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从西方“盗”来马克思主义圣火，点燃了堆满干柴的神州大地，顿时燃起了冲天火焰。在火焰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演绎成了惊天动地的共产主义运动。

常言道，万紫千红才是春。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以下简称初期传播）的春天，主要是由这一批中国最先进知识分子绽放的鲜花装点起来的。

初期传播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群体组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士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第一群体是传播的主力军。但确定这批人的名单非常困难，因为有些人生平不清楚，加上意识形态的原因，有些人如戴季陶是否可以列入这支队伍，则会出现完全对立的观点。笔者选择1919—1922年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共产党》、《劳动界》5家报刊中具有中共党员（1922年以前入党）身份的作者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1。这些人是传播的骨干，选择他们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他们的扫描，基本上可以窥探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中的一般情况。

表1—1　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发表政论文统计表（1919—1922）

姓名	出生年	著述署名	文化程度	职业	文章篇数	备注
邵力子	1882	力子	大学	编辑、教授	601	留学日本
沈玄庐	1883	玄庐、沈定一	大学	编辑	185	留学日本
施存统	1899	存统、CT、光亮	大学	编辑	103	留学日本
陈独秀	1879	独秀、仲甫、只眼、顽石、T·S	大学	教授、编辑	89	留学日本
李汉俊	1890	汉俊、先进、李人杰、汗、均	大学	编辑	87	留学日本
陈望道	1891	望道	大学	编辑	52	留学日本
袁振英	1894	震寰、震瀛	大学	中学校长、编辑	43	留学法国
沈雁冰	1896	雁冰、P生	大学预科	编辑	32	另署名“冰”的有8篇
李达	1890	鹤、江春、胡炎	大学	编辑	29	留学日本
周佛海	1897	佛海、无懈	大学	撰稿人	26	留学日本
张申府	1893	张崧年、赤	大学	助教、编辑	22	留学法国
李大钊	1889	李守常、守常、常	大学	教授、编辑	16	留学日本
马哲民	1899	念一	大学		13	留学德国
沈泽民	1900	泽民、成则人、则人、朗生	大学	编辑	9	留学日本
柯庆施	1902	怪君	专科	学生	9	曾访问苏俄
郑太朴	1901	太朴	大学	翻译	8	留学德国
董锄平	1894	锄平	专科	编辑	7	
杨贤江	1895		专科	编辑	6	
于树德	1894	树德	大学	教师	6	留学日本
李季	1894		大学	翻译、编辑	4	留学德国
董亦湘	1896	亦湘		编辑、翻译	4	通英、俄文
刘仁静	1902	仁静、任、剑、意人	大学	学生	3	曾访问苏俄
陈公博	1890		大学	编辑	3	留学美国
黄负生	1891	负生	中专	教师、编辑	2	1922年4月7日病故
杨明斋	1882			翻译、编辑、教师	2	由联共（布）党员转中共党员

（续表）

姓名	出生年	著述署名	文化程度	职业	文章篇数	备注
金家凤	1903		中学	学生	2	
恽代英	1895	代英	大学	中学校长、编辑	2	精通英文
陈潭秋	1896	潭秋	大学	编辑、教师	2	精通英语
瞿秋白	1899		中专	记者、编辑	1	驻苏俄记者
张太雷	1898	张椿年	大学	翻译	1	曾访问苏俄
蔡和森	1895		大学	学生、编辑	1	留学法国
包惠僧	1895			记者	1	
高君宇	1896	君宇	大学	学生	1	曾访问苏俄
何孟雄	1898	孟雄	大学	学生、编辑	1	
彭璜	1896		专科	编辑	1	
张国焘	1897	特立	大学	编辑	1	曾访问苏俄
秦抱朴	生年不详	涤青	专科	学生	1	曾访问苏俄
范鸿钧	1897		大学	学生	1	通英文

资料来源：《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下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说明：1．统计《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共产党》、《劳动界》5份报刊。

2．这些篇数只能是一个约数，统计范围：论文、时评、随感录、通信、译文等，其中有非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文章。

3．未署名的短评与“记者”没有统计在内。

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

第一，这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先进的群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从年龄结构来看（以1920年为准），这批人除陈独秀一人进入中年外，均为青年人。其中20岁以下的有4人，20—30岁有30人，31岁以上的4人，所占总人数的比例（笔者注：秦抱朴生年不详除外，以37人为计算数）分别为10%、80%、10%。最年长的陈独秀41岁，最年轻的金家凤17岁，平均年龄26岁。这说明五四运动之后，我国产生了一批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传播队伍。五四时期是思想飞扬的时代，许多进步

青年尖锐地批判资本—帝国主义，揭露军阀专制的黑暗统治，提出了种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尽管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但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因此其救国方案往往陷于空想。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掌握了唯物史观，探知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找到了救国的正确途径，因此他们成为五四时期进步青年中首先觉悟的群体。他们关心国家命运，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概，自觉地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他们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勇于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唤起了中华民族一次无与伦比的大觉醒。他们点燃的马克思主义灯盏，照亮了黑暗的中国，照亮了祖国的未来。这个历史现象说明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革命的先锋，没有他们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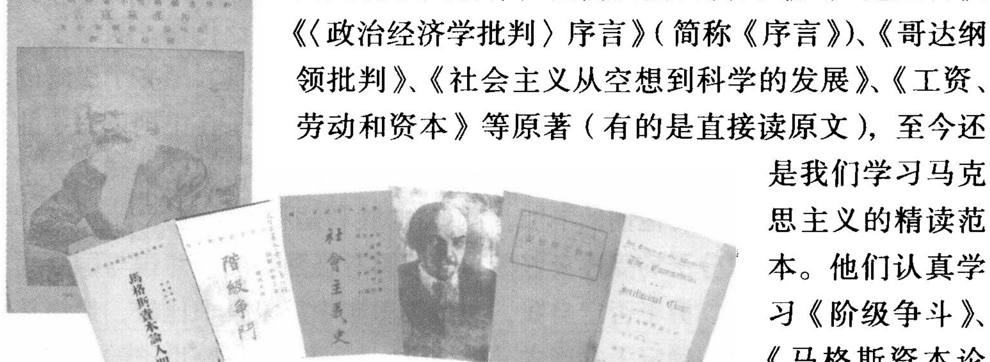
第二，这批知识分子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与国际大视野，不断求新求变，勇于否定自我，在各种思潮中反复推求比较，最终从西方纷繁的政治思想中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是我国跨世纪的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19世纪的“80后”、“90后”。他们在少年时代均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又都就读于新式学校，绝大多数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与留学经历。[②]他们会同中西，有深厚的旧学根底，绝大多数又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如李大钊通日、英文，陈独秀通日、英、法三国文字，李汉俊通日、英、德、法语，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等既熟悉日语，又能翻译英文。他们有能够“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语言优势。他们最初的思想画面是绚丽的，曾用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作为救国思想武器，通过革命实践，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同样他们用批判的精神审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但不神化、迷信之。正是这种文化自觉，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就坚定不移。这批知识分子中

①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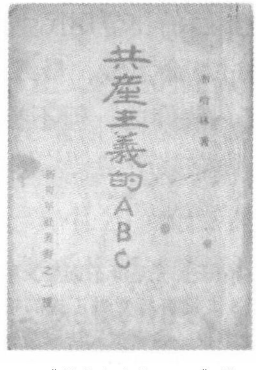
② 这38人中，瞿秋白等6人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但他们通过自学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准。黄负生最高学历是武昌甲种工业学校，因家贫无法深造，进入社会以教书与投稿为生，曾应聘在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汉中学任教，并主编《武汉星期评论》。瞿秋白虽是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但创办了《新社会》，作为《晨报》首批派往苏俄采访的记者而名满天下。

产生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人人高学历、通晓外文，个个写文章，做翻译，积极传播，这种学贯中西的思想结构在历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是罕见的。

这里顺便澄清一个问题，对初期传播者的历史局限，学界一直盛行一种说法，即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看得不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大都还是节译或摘录”，从“星散零碎”的资料中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草率。笔者研究后的结论是：初期传播者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他们反复研读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简称《序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工资、劳动和资本》等原著（有的是直接读原文），至今还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读范本。他们认真学习《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本。在他们的论述中反复引用《序言》里的社会存在（主要是指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与“两个决不会”（笔者注：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等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反复阐释《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期那段著名的话。他们将《资本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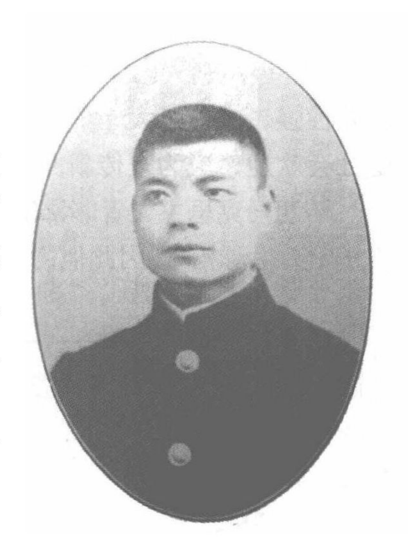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的ABC》的封面，1926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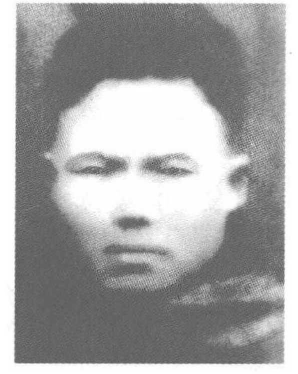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封面，1922年出版

论》1867年第一版的序言介绍给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人民赶快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否则终免不了要遭到“天谴”！


▲陈潭秋（1896—1943）

他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的序言，传播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言明现代经济落后的中国可以跨越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读过《资本论》第1卷的第1版、第2版的序言、跋，初步掌握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代、民族、国情相结合。笔者认为初期传播者的历史局限与不足主要有二：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宏富的理论体系平面化、简单化。历史、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但传播者往往简单地用经济中心观、阶级斗争观单线思维来解析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二是传播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缺乏实践而无法正确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主义的倾向，常套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与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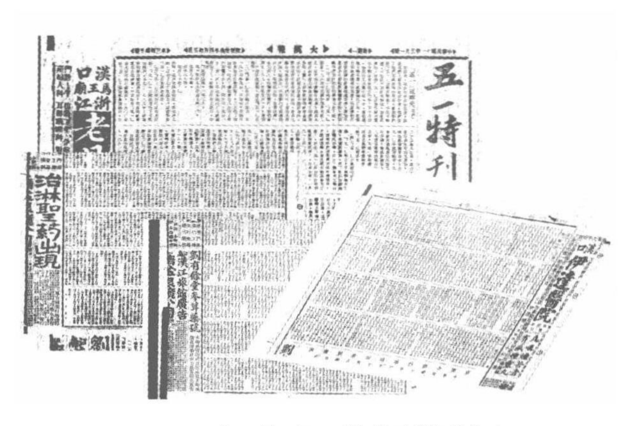
第三，这批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传媒中人。李大钊、陈独秀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主要负责人。李汉俊是《星期评论》、《新青年》的编辑，又与陈独秀创办了《劳动界》。李达是《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邵力子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创办者。瞿秋白主编了《新社会》。陈望道参加《星期评论》、《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蔡和森、陈潭秋、黄负生、周佛海、李季、袁振英、沈泽民、包惠僧等或是报刊的记者、编辑，或是特邀撰稿人。


▲包惠僧（1895—1979）

这与现代传媒是传播的重要工具有密切关联。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快在神州大地迅速传播，并且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成为主流文化，固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与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我国

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与之相适应的是新闻、出版事业的突飞猛进。1919—1920年一年内，全国涌现出宣传新思潮的报刊便达400多种。大众传媒因时效性强，发行量大，信息传播快，读者面广，宜于阅读与保存等优势，颇受社会欢迎，成为宣传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传媒在传播中的特殊作用，所谓“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枪”，因此他们高度重视宣传，指出：“社会革命，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事，全靠无产阶级自己觉悟，革命运动才有进展的希望。”① “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② 宣传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大众传媒。李大钊在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要将统治权全收到民众之手，需要包括“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③ 李达提出利用资产阶级大众媒体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宣传主义最好莫如利用资本阶级的报纸。资本阶级的报纸销路很广，许多都市和僻地的工人和农民，大概都看这类报纸。而且这类报纸说的话，比较上易使人民信用，共产党若能利用这类报纸作宣传，效力必大。”④ 他们是集媒体人、学者、革命者于一身的先进知识分子。


五一特刊

▲ 1922年5月1日，武汉地区党组织发动7家主流媒体同时出版的“五一特刊”

1920年6月中共第一个组织——上海党组织成立，第一件工作就是加强媒体作用。首先将《新青年》由北京大学同人刊物改组为党的公开刊物，接着创办了第一份劳动大众的刊物《劳动界》，继而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同时组织出版了新青年丛书，成立又新印刷厂，印刷《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读本。中共一大后成立人民出版社。此外党还利用其他出版传

①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
② 芥川龙：《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77年版。
③ 《李大钊在北京各界纪念十月革命会上的演说》，《晨报》1922年11月8日。
④ 李达：《评第四国际》，《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

媒进行革命宣传，通过群益书店、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等民营文化机构，印刷无产阶级刊物，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通过《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 年 5 月 1 日中共武汉区委利用武汉地区 7 家主要媒体同时发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专栏。在一个城市动员 7 家主流媒体采取一致行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运动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本权威中共党史著作中作过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 200 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①] 这批启蒙者、革命者通过新闻、出版等传媒，打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闸门，使马克思主义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遏制地汹涌九州大地。他们中的佼佼者如下：

李大钊（1889—1927）学名李耆年，原字寿昌，后改守常，笔名孤松、常、明明、冥冥、S. C 等。河北乐亭人。自幼读四书五经，1905 年入永平府中学接触新学。两年后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科学校，1913 年毕业。其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文中洋溢着爱国主义。同年冬赴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新思潮影响，曾参加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 年春写了著名的《青春》，疾呼：“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②]



▲ 1914 年 2 月李大钊摄于日本东京

1916 年 8 月 15 日，李大钊担任《晨钟》（后易名《晨报》）编辑部主任，9 月 5 日因与掌控报纸的研究系办报理念不一而辞职。1917 年 1 月应聘担任《甲寅日刊》编辑。次年 1 月，由章士钊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宣传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圣火“盗”到我国的“普罗米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 1 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7 页。

②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1916 年 9 月 1 日。



▲ 1919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修斯”。1918 年他连续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公开歌颂十月革命是人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 文章虽然将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的“人道”、“自由”连在一起，但新的世界观已经萌芽。1919 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无论是对作者的思想转变，还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来讲都是一个转折点。文章前所未有地向读者较为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思想上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1919 年胡适在《每周评论》第 31 号上发表文章，鼓吹“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李大钊马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主张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论争中，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1920 年年初，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② 然而思想转变的道路并非平坦，就在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同时，他还留恋无政府共产主义，写了《阶级竞争与互助》，企图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互助论协调起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③ 不过他在革命的实践中，敢于否定自我，最终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①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1918 年 11 月 15 日。

② 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称与建立时间，由于历史资料的多元，需要深入研究。李大钊曾称在 1920 年冬季（1920 年 12 月 2 日）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李大钊全集》第 3 卷，第 256 页）。张西曼先生称 1919 年 7 月他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 年发展成为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张西曼：《历史回忆》，东方书社 1949 年发行，第 1 页、第 142 页）。李丹阳称 1918 年年底李大钊在北京就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 年第 6 期）。张申府生前指出社会主义研究会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两个团体（周子信：《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探》，《团结报》2010 年 3 月 18 日）。目前国内普遍的看法是李大钊于 1920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③ 守常：《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 29 号，1919 年 7 月 6 日。

首先，他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斗争相结合，将传播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与陈独秀等筹备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其次，他不仅在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课堂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讲解科学社会主义，还哺育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先进青年，引领他们先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再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环绕着我国的“实境”。[①]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他反对空谈主义，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作出了贡献。最后，他善于“调适”各种思想，从辩论对手中吸取有用的思想。如他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就检查自己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文章后发生的觉悟。”[②] 又如他曾企图将互助思想与阶级斗争作为改造社会的两个轮子。这固然可以看成他早期思想改造的不彻底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人类和谐社会发展（笔者注：李大钊的话是“人类历史的全体”）是否是互助和阶级斗争两个轮子的推动，抑或多个轮子推动呢？这实际涉及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如果说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话，那么人类改造社会手段的多样性的统一是不是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呢？



▲陈独秀（1879—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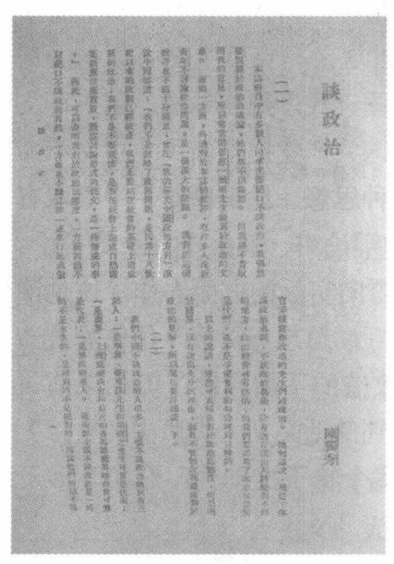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笔名只眼、顽石、寸铁等。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清末秀才。1901 年至 1914 年多次流亡日本。1915 年夏回国，9 月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易名《新青年》），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17 年 1 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院长）。第二年 12 月与李大钊等创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 35 号，1919 年 8 月 17 日。

② 同上。

办《每周评论》。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阵地，鼓吹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启蒙了一代先进青年的思想。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爆发，他参加并指导了这场爱国运动。

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由急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他在 1919 年 12 月为《新青年》撰写的《本志宣言》中已见端倪，他谴责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是造成世界无穷罪恶的祸源，应该抛弃；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主张社会彻底改造；他对政治有了新的认识，“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①]《谈政治》可视为他彻底告别旧世界观与新世界观萌芽的主要标志。文章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政治、法律、国家、强权而写的。它运用唯物史观，正确阐述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实际上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互相联系，都是工具。政治、国家、强权之所以可恶，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拿它来压迫弱者与正义，反之若拿它救护弱者与正义，“就不见得可恶了”。[②] 这些工具劳动阶级也可以利用“为善的”，利用这个工具进行直接行动，去铲除资产阶级产生的“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利用这个工具，使无产阶级站在国家的地位，“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③] 随着陈独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1920 年 9 月《新青年》杂志的方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鼓吹民主、科学、新文学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舰队中的旗舰。陈独秀主导了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辩论，1920 年 12 月在《新青年》第 8 卷第 4 号上，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并将 25 篇重要文章汇编成《社


談政治

▲ 1920 年 9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发表《谈政治》

①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②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

③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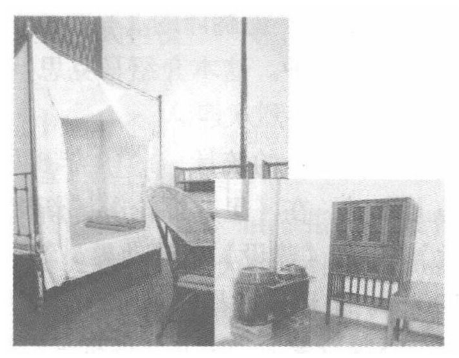
会主义讨论集》，影响巨大。他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有计划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

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中旬，他抵达上海，即与李汉俊等商讨建党事宜。4月上旬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①]抵达上海，即与陈氏等洽谈，加速了党的筹建。6月间，陈独秀与李汉俊等4位青年成立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担负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年底他到广州，创建了中共广州早期组织，并与李汉俊、李达及北京、武汉、湖南、山东、日本等地早期党组织联系，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被选为中共第一届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笔名汗、漱石、先进、均等。1918年年底从日本回国，寓上海。1919年夏加入《星期评论》编辑部工作。次年6月与陈独秀发起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年底出任该组织代理书记，与李达等负责筹备中共一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他的寓所召开。1922年春回武汉，从事教育与工运，参加了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正式将其除名。



▲李汉俊（1890—1927）



▲李汉俊在上海寓所的卧室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

① 魏金斯基（Gregori N. Voitinsky，1893—1953）原名札尔欣，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扎尔欣（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Зархин），中文名字吴廷康。俄国维切布斯克州人。早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加入俄国共产党，1920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同年3月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派遣，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联系，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此前，第三国际、俄共（布）均派人在旅俄华人和中国展开了活动，但学界公认正式代表为魏金斯基。共产国际与俄共对华工作分有不同的系统，错综复杂，即使一个单位名称亦有变化，为简便计，本书一概称为共产国际代表，需要说明者另作注释。

北伐军解放武汉后，出任国共合作的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1927 年 12 月 17 日被桂系军阀杀害。

李氏留学日本时，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缺乏史料，留学时期的思想转变轨迹不清楚，但他一登上舆论平台，就彰显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占据了我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位。1919 年 8 月，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怎么样进化？》(《星期评论》第 11 号）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他是中共第一代红色媒体人，担任的第一个社会职务是《星期评论》编辑，并很快成为编辑部的核心人物。1920 年 8 月与陈独秀创办《劳动界》，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驱。在代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书记时，负责《新青年》，领导《共产党》月刊。他“援助”《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历史中，李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目前已经挖掘出来的史料表明，他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第一个向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判，第一个将辩证法作为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介绍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1920 年 9 月，他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出版，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这本介绍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普及读物，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

据不完全的统计，1919 年 8 月至 1922 年春他离开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上海时，在《星期评论》、《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共产党》月刊、《建设》、《劳动界》等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与时评近 100 篇。他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所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誉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不为虚言。[①]

在李氏周围还聚集了一批激进青年，因直接受其影响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名贤琮、用威，号璧伍、必武。董氏早年受到传统儒家教育，是晚清秀才。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他毅然割掉发辫，投身革命。民国初年，为了民主共和，两次入狱，两度

① 《马林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 年 5 月 31 日，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 297/3060 号。

亡命日本。1918年参加鄂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1919年1月28日，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不幸被护法的川军所杀害。董氏与同乡张国恩受同事委托，东赴上海，请孙中山主持公道。但孙氏除了安慰的话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令董氏大失所望，觉悟到沿着孙中山的利用军阀打军阀的老路行不通，他开始苦苦思索新的道路。



▲董必武（1886—1975）

正在这时，董必武认识了李汉俊。这位比他小4岁的同乡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并推荐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这些杂志开启了改造社会的新天窗，董氏一心一意阅读，领略其中精义。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探索救国的道路。董氏与同乡张国恩决定回武汉，从办教育与办报入手来改造社会。1919年8月他回到桑梓，即着手实施救国计划，但严酷的现实，使办报流产；办教育也因湖北黑暗的教育现状无法施展抱负，董必武再次陷入苦闷之中。李汉俊了解董氏的苦闷后，立即写了一封1.5万字的信，用唯物史观说明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这封信后来以《改造要全部改造》的标题发表在《建设》月刊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上，信中指出，教育与社会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整个社会糟的缘故，“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



▲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员张国恩（1880—1940）（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岁月沧桑，52年后，董氏还深情缅怀这位马克思主义老师：“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引者注：应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资本主义，我们也弄不懂，这

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1]

李汉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主要是他在建党时期被指责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陈潭秋、张国焘均有详细的回忆。蔡和森在其名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责李汉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罪状”有9条之多，笔者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汉俊》（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中，根据史料对此一一加以澄清。

李达（1890—1966）又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江春、鹤、胡炎等。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8年5月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回国参加请愿活动。这次爱国活动成为他思想转变的拐点，后来他总结道：这次请愿活动失败，“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只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2] 不久他再赴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发表在1919年6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鲜明地表明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而此时六三工人运动才过去半个月。



▲李达（1890—1966）及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8月，李达回到上海，立即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担任《新青年》编辑，11月出任《共产党》月刊主编。次年2月接替李汉俊担任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肩负起筹备中共一大的重任，并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在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夏，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分歧而负气脱党。离开共

①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370页。

② 李达：《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期、第14期合刊。

产党后，长期从事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1935 年发表 40 万言的专著《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倍加赞赏，多次建议再版。1949 年 12 月经毛泽东等做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6 年 8 月 24 日蒙冤去世。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汹涌而至，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所产生的所谓修正派、正统派和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等派别，让正在寻求真理的青年迷目五色，难以辨认。李达撰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对各种社会主义一一辨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被正统派、修正派妄加修改，竟弄出非驴非马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来了，“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①] 在《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中，他积极投入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要革命，必须要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进行指导，为此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一书，1921 年 5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与他写的《马克思经济学》、《社会问题总览》一道为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1921 年 9 月，他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用了一年的时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 15 种马列著作。李达不愧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杨匏安（1896—1931）原名锦焘，笔名匏庵、匏厂、王纯一等。广东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早年入两广高等学堂附设中学（笔者注：辛亥革命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今为广雅中学），接受西方新文化。辛亥革命后赴日本游学。1916 年回国后不久移居广州，在时敏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在《广东中华新报》兼任记者。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



▲杨匏安（1896—1931）

① 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 8 卷第 5 号，1921 年 1 月 1 日。





▲ 1919 年 11—12 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的《马克斯主义》（珠海博物馆提供）

青年》第 6 卷第 6 号，1919 年 11 月 1 日）几乎同时，他在《广东中华新报》（19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4 日），发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斯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于此时大成。"[①] 此文的出现表明李大钊的传播不是偶然的，中国从南到北呼应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春潮，华南地区的传播亦由此揭开了序幕。在此前后，他还写了《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浅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成为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播火者。

杨匏安何时入党，目前还是一个谜。这是因为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复杂性和缺乏史料造成的。中共广州早期组织曾组建过两次：第一次是 1920 年年底由苏俄两位记者与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组建的；第二次是陈独秀于 1921 年在广州组建的，有案可查的有 9 人，但这 9 人名单中没有杨匏安。"那么杨匏安究竟何时入党呢？是第一批九名成员之一，还是略迟几个月才加入的？但不管怎样，杨是创建中国共产党五十多位早期成员之一，应是毋庸置疑的。"[②] 杨匏安曾担任 SY 粤区团委（笔者注：即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央监委等职。1931 年春不幸被捕，同年遇难。

① 匏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广东中华新报》1919 年 11 月 11 日。

② 黄永康等：《杨匏安研究述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 7 辑，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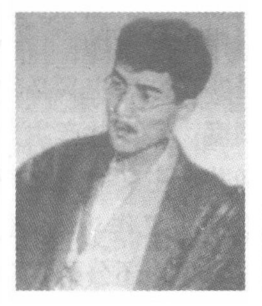
施存统（1899—1970）原名复亮，笔名光亮、亮、文亮、伏量、CT等，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人。1917年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曾立志做一个佛教徒，然而五四运动却将他铸造成了封建主义的叛逆者。1919年11月，《浙江新潮》第2号发表施氏的《非孝》，这篇痛詈孝道的文章顿时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孔道捍卫者群起而攻之，竟然酿成了名扬全国的“非孝”事件。1920年1月1日，无法在杭州存身的施存统与俞秀松等朋友北上。是时北京掀起工读互助运动，施氏深有同感，遂积极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活动。这场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企图通过半工半读、共同生活实现“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的理想社会”的运动，[①]很快因经济等方面原因而失败。

▲施存统（1899—1970）及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3月下旬，他和俞秀松等南下回到上海，栖身于星期评论社，戴季陶成了他的精神导师，受其影响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对一度热衷的工读互助团进行反思后，他认识到：“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能］工读互助团和新村。”[②]1920年6月由《新青年》编辑部和星


▲堺利彦
（1870—1933）
（石川祯浩提供）


▲高津正道
（1893—1974）
（石川祯浩提供）


▲山川均
（1880—1958）
（石川祯浩提供）


▲山崎今朝弥
（1877—1954）
（石川祯浩提供）

①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1年5月1日。
② 同上。

期评论社发起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施氏是最初5个成员中的一个，但他几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便搭上去日本的轮船，开始了留学生涯。在日期间，他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川均、山崎今朝弥等接触，阅读了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并接受陈独秀的命令，与周佛海担任“驻日代表”，[①] 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在留学期间，他积极撰写文章进行传播工作，有人统计，仅1921年一年他就发表各类文章50多篇，[②] 在舆论界崭露头角。

在传播方面，施存统的突出贡献有二：一是翻译。他先后翻译了北泽新次郎的《劳动［者］问题》、河上肇的《社会主义底进化》、《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考茨基劳农政府反对论（山川均解说及其批评）》等，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1922年1月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以《社会经济丛刊》的书名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同年他还翻译了派纳柯克著的《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是撰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剖析中国问题的文章。在如何根本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展开了论战，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施存统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中吸取理论营养，来回击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他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底社会主义是有科学的体系的。”[③] 马克思将他的理想建筑在科学基础上，主要就是两点，一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基础，一是完成共产主义必须改造经济、政治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有一定顺序的，他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过渡期的著名论断，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不仅详细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还公开表明了自己皈依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出

---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②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笔者亦粗略统计，1919—1922年，施氏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了103篇文章，成为初期传播最力者之一。

③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中国社会虽然还是一个产业十分幼稚的国家，并不具备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我们取其精髓，实行阶级斗争，彻底改变经济、政治组织，“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①] 这篇文章与他在此前后发表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文章，成为他思想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标志，表明他与一度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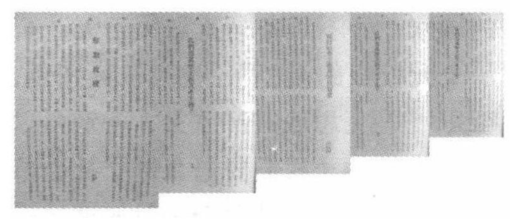


▲周佛海（1897—1948）

周佛海（1897—1948）原名明繁，字子美，笔名佛海、无懈等。湖南沅陵人。1917年留学日本，入日本第七高等学校学习，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宣传无产阶级革命。1919年9月在报刊上发表译文，第一篇译文是日本九留弘之的《劳工运动》。1920年暑假期间回到上海，通过《解放与改造》社与陈独秀接触。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接受其领导，回到日本与施存统成立中共日本早期组织。1921年7月，作为该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因新选出的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未到任，周氏一度代理过中共中央局书记约2个月。同年10月下旬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实际脱离了共产党。1922年3月从日本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深造。1924年回国，9月正式脱离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在首次国共合作中，成为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1938年追随汪精卫投敌叛国，沦为巨奸。抗战胜利后被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狱中。

建党初期，周佛海一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后来对此加以否定，但无法抹掉当年他写的文章。从1919—1922年，他发表的文章有案可查的有30余篇，产生过正面效应。留日期间，他十分关注国内的思想战线，积极参加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撰写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进化与革命》、《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等，观点十分鲜明。当张东荪等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周佛海就公开给予批判。从感情上讲，这对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他曾是张东荪的同道者，是通过张氏的《解放与改造》而走上革命

①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周佛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道路的。1919年9月，他在该刊第1卷第7号上发表处女作《中国的阶级斗争》，以后陆续在上面发表了6篇文章。第二年夏回国度假，也是通过该社与陈独秀取得联系，从此参加中共的筹建工作。他割舍个人恩怨而投入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表明他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他在一家杂志上有过自我反省："我以前确在《解放与改造》上做过文章，并一时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但是后来竟〔觉〕悟这种主义不彻底，且在中国最近的将来，不易实行，所以变转来信奉马克斯主义。我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变'，然而是向前的'变'，不是退后的'变'，是由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底人，'变'为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派，我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底福音，乃是小有产阶级底最后避难所。"①他公开宣布自己是"以社会主义为终身宗教的人"。②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在道路选择上存在改良与革命之争。周佛海针对张东荪的所谓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和谐互助发展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氏的主张实质是用改良（即进化）反对革命。什么是进化？进化就是"让旧组织——资本主义的组织自巳〔己〕去崩坏，新组织——社会主义的组织自己去发生"。③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用人力打破一切旧组织以创造一个新组织"。④周佛海指出马克思并不反对进化，但这种自然的进化说实质是主张中国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张氏认为"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有原则区别。张氏所谓"两个必"，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马克思的"两个必"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危机，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催命鬼"，社会主义的"送生神"。资产阶级的剥削必然造成劳资对立，不得不发

---

① 《周佛海致邝摩汉》，1922年7月8日，《今日》第2卷第2号，1922年8月15日。

② 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

③ 周佛海：《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

④ 同上。

生阶级斗争，斗争的最后一定是“无产阶级底胜利”、“资本主义底灭亡，社会主义底实现”，[①]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不可能和谐发展，鼓吹他们之间的互助和和谐实际是为资本主义效力。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解放道路，周氏明确地说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确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要实行的“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乃是现在在俄国实行着的共产主义”。[②] 在《夺取政权》一文中，他指出中国根本的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底信条，革命底标语。”[③] 在初期传播的舞台上，周佛海是虎虎有生气的健将，但他叛离共产党后，却有意识地企图抹掉这段历史；实在抹不掉时，就伪造历史，称自己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自虐历史是企图刮掉自己曾有过的“红色”印记。

蔡和森（1895—1931）原号和仙，名泽膺、字润寰，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人。早年当过学徒，从母亲葛健豪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1913 年随家迁居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与毛泽东同一年级，结为莫逆之交。1917 年 6 月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其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次年与毛泽东等在他家里成立新民学会，他们将梁启超的“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④] 造成“新民”的思想推向前进，赋予时代的新内容，要造成“改造中国与世界”[⑤] 的一代“新民”。这批志同道合的“新民”积极从事新思潮的学习、宣传、实践。他们曾受到新村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一度想在岳麓山等地建立新村，以改造社会。1920 年初春，蔡氏与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同年 5 月与向警予结成伉俪，因两人志同道合，思想激进，



▲蔡和森（1895—1931）

① 周佛海：《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新青年》第 9 卷第 2 号，1921 年 6 月 1 日。

② 无懈（周佛海）：《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第 4 号，1921 年 5 月 7 日。

③ 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④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第 3 册。

⑤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 年 12 月 1 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6 页。



▲ 1920年5月“向蔡同盟”，摄于法国

其结合有“向蔡联盟”之说。赴欧勤工俭学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蔡和森等赴法初衷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但到法国后，眼界大开，获得苏俄的大量信息，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促使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化。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猛看猛译”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6月，在新民学会旅法会员举行的蒙达尼会议上，他提出中国应该走俄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八九月，他给毛泽东两封信，郑重指出自己“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①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发明”了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了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了阶级斗争说，使之立于不败之地。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哲学基础。他详尽介绍了第三国际，认定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要获得根本改造，就要像俄国那样，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年初，他投书陈独秀，宣布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对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派的社会主义和“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②针对张东荪鼓吹中国先发展实业，即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调，他驳斥道：无产阶级的解放绝不是如张氏所言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③张氏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他实际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缺乏的不是劳动力、原料，而是资本，全国的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军阀、财阀所控制，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先发制人，只有坐以待毙，那就“真不值，真不经济了！”④

蔡和森对列宁建党思想的传播有特别贡献。他是在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详细阐释建立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建党原则的第一人。在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里，他非常明确地写道：“我现认

---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②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通信”，1921年8月1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

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①]他十分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负担偌大的改造事业。”[②]加入党的条件如下：“(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候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③]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下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难能可贵的是，他将俄国共产党的党纲与我国的情况作了最初的结合，提出了他的建议，“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④]他与毛泽东相约，对俄国与国内的“人口、地土、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⑤]以上的建党思想来自列宁主义，[⑥]只要与两个月后刊行的《共产党》

---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③ 同上书，第69—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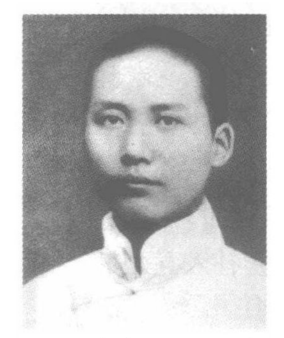
④ 同上书，第71页。

⑤ 同上。

⑥ 何时提出列宁主义需要研究，传统的说法是1924年2月，俄共（布）中央为列宁逝世《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中正式提出。然而我国1920年4月30日出版的《政法学报》第2卷第4期已经出现了列宁主义的称谓，谢濂：《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

月刊和 1922 年出版的中文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美共党纲等仔细比对，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二十八画生、泽东等。湖南湘潭人。1914 年 3 月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授业于杨昌济老师。杨氏是学贯中西的“名儒”，对毛泽东早年思想有重大的影响。毛氏通过杨昌济这个中介，传承了湖湘文化的精萃，又接受了西方的新文化。如果说《讲堂录》主要是毛氏受到恩师杨昌济继承王船山、谭嗣同精神做的课堂笔记的话，那么《〈伦理学原理〉批注》则留下了他将近代德国哲学新康德思想与传统伦理思想融合的思想轨迹。早年的激扬文字，彰显了青年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他的“心性”本体唯心观、实现“自我”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以理驭行的实践观和以圣贤豪杰为指向的历史观的心路历程。他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升华，主要体现在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里。这两篇文章表明毛泽东的历史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崇尚英雄史观到赞扬民众的力量，指出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918 年 8 月到 1920 年 4 月之间，他两上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和陈独秀，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促使新思想萌芽。《民众的大联合》正是体现了他思想变化的一个拐点，文章虽然提到了马克思，但主流还是民主主义，有肯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1893—1976）



湘江評論

▲ 1919 年的《湘江评论》



▲杨昌济（1871—1920）

时代在急剧的变化，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也随之嬗变。就在第二次上北京时，他的目光开始注意俄罗斯，“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①]1920

① 《毛泽东给周世钊》，192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早年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6 页。

年9月16日，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主要会务是“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①]由积极组织会友到法国勤工俭学，到计划去莫斯科勤工俭学，实际反映出他由“师资”向“师俄”的转化。与这转变相一致的就是明确宣布：对于蔡和森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新世界观的确立，必然是对唯心主义的清算，他对一度热衷的教育救国思想，进行了反思，指出教育要有钱，要有人，要有机关，但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资本家，或者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上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工具，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因此资本主义是不能用“教育之力推翻的”，[③]“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④]随即他投入到共产主义实践活动中，在湖南筹建党的组织，1921年7月，作为中共长沙早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新民学会内部讨论学会的方针时，公开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⑤]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并且投入到湖南建党的实际活动中。

恽代英（1895—1931）谱名遽轩，字子毅，笔名天逸、代英、英、子毅、但一、子怡、稚宜、FM等。江苏武进人，生于武昌。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次年开始投稿，先后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光华学报》、《青年进步》、《妇女杂志》上发表约80篇文章（含译文），[⑥]成为长江中游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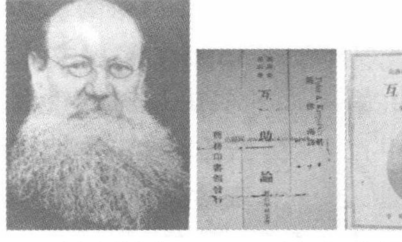
▲恽代英（1895—1931）

1918年从中华大学哲学门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学部教务主任。1919年参加并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

① 《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3日。
② 《毛泽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③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59页。
④ 同上书，第60页。
⑤ 《毛泽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同上书，第72页。
⑥ 田子渝等：《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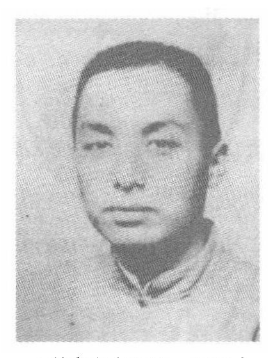
同年年底经过王光祈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2月1日，在武昌成立利群书社。利群书社是恽氏新村生活的基地与长江中下游传播新文化的场所。1921年7月，在湖北黄冈成立了共存社，其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①]共存社的诞生具有两个指标性的意义：一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武昌一部分激进知识青年，告别了新村改良道路，开始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一是湖北出现了一个具有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团体。

恽代英早期思想的转变之路，颇具典型性。早在1913年，他18岁时就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17年10月8日，在武昌建立第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小团体互助社，就是取他崇拜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先锋克鲁泡特金的名著《互助论》之名。围绕着互助的思想，他主张“人心革命”，即通过互助的途径，使整个社会养成善势力，去扑灭恶势力，从而破除私有制度，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黄金世界。1919年秋，日本的新村主义经过《新青年》的介绍传到中国，立即获得恽代英等激进青年的欢呼。他和林育南等同志在武昌、湖北黄冈进行试验，企图通过脱离社会，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给共产新生活达到根本改造社会的目的。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与《互助论》中文本



▲林育南（1898—1931）

来自三方面的因素促使恽代英进行反思：一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由于经济上的困难，难以维持。二是他所崇拜的陈独秀严厉批评自己所热衷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痴人说梦”。[②]三是他的互助社朋友刘仁静、林育南到北京后，接受了唯物史观，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写信给他，指出在中国黑暗的政治环境下，

① 《浚新大会纪略》，《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②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3），《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企图用教育、伦理等改良方法救国只是一种幻想，一个梦，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走苏俄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恽代英在导师与战友的帮助下，思想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个变化过程痛苦而反复，但最终皈依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传播方面，他的特殊贡献就是受陈独秀的委托，将英文版的《阶级争斗》译成中文。《阶级争斗》是考茨基对 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Erfut）大会宣言第一部分的解读，用唯物史观宣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本书的中文本于 1921 年 1 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 8 种出版，对恽代英、毛泽东等一批激进青年由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中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浙江绍兴人。1917 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 年 4 月回国。在此期间他对十月革命有所了解，阅读了著名的报告文学《震动环球的十天》（笔者注：今译《震撼世界的十天》，［美］约翰·里德（John Reed）著）。他通过阅读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的著作，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期间，便立即投身于运动之中，为天津学界主要领导人。同年 9 月 16 日，组织天津进步青年成立进步团体觉悟社，出版不定期的《觉悟》（只出版了一期），刊登社员改革社会的方案、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宣传世界新思潮。1920 年 2 月 6 日到 7 月 17 日，因领导天津学生举行抗日集会，被天津警察厅羁押。5 月 28 日、31 日，6 月 2 日、4 日、7 日，分 5 次在看守所向全体难友介绍马克思学说，所讲内容，“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价值说（引者注：即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和资本集中说。”[①] 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无法探索周恩来早期思想是如何从军国主义、“贤人政



▲周恩来（1898—1976）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 页。

治”[①]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但从周恩来当年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他演讲马克思主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时他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并开始作传播工作。第一次坐牢成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年后，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很清楚地表白，他认定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不变的，这个信念“是颤动于狱中”。[②]也就是说他在赴欧之前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这一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乘海轮前往欧洲，先到英国、继而落脚法国，在这里他读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眼界更加开阔。面对危难的国势，他深深感到积弊既深的吾国，“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③]在旅欧期间他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1922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1917年9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作为专修馆的总代表参加了北京五四运动。同年11月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该刊为北京实进会（笔者注：以中等学校知识分子为主）会刊，鼓吹将中国改造成德谟克拉西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其改造社会的手段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④]这表明了他的改良主义立场，但他关心苏俄，关心劳动阶级，为自己思想的根本转变提供了契机。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文学、劳动问题开始的，倍倍尔成为中介。1920年4月他翻译了倍倍尔的重要作品《社会之社会化》（笔者注：一


▲瞿秋白（1899—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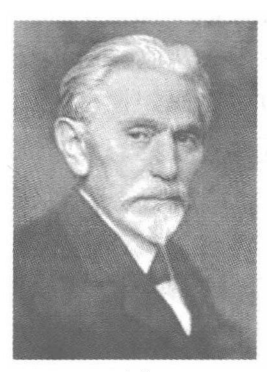
① 周恩来1918年2月19日日记记载：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叫谁打呢？军国主义在20世纪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② 《周恩来致李锡锦、郑季清》，1922年3月，《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③ 《周恩来致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同上书，第24页。

④ 《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名《未来社会》)，并用此文的观点写了《伯伯尔（今译倍倍尔）之泛劳动主义观》，对倍倍尔和托尔斯泰的劳动观点进行点评。托尔斯泰崇拜劳动，人在劳动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轻视精神劳动，反对现代社会的文明；他赞扬泛劳动主义，主张无抵抗主义。倍倍尔指出人类的一切罪恶，劳动者生活困难，一是资产阶级的掠夺，一是科学技术的不足，因此，创造新社会的根本之法，首先是用极激烈的革命，实行根本的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底垄断‘尊荣’和‘精神的财产’”。因此托尔斯泰是宗教哲学家，倍倍尔是科学家，是社会运动家。他们对于劳动根本上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个人理想上的新社会就不同”。[①] 瞿秋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起点是参加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他接受《晨报》的邀请，担任特派记者赴苏俄，发回五六十篇报道苏俄革命与建设的通信，传播了列宁主义。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23年1月回国，担任党的刊物《新青年》、《向导》的主编。



▲倍倍尔（1840—1913）



▲郑振铎（1898—1958）



▲1919年11月，瞿秋白与郑振铎创办的《新社会》

瞿氏在传播中起到了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他对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亲身的体会，直接到苏俄进行采访，撰写了大量真实反映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的报道。二是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1923年）、《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以上三份资料发表于1924年）等著述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科学、哲学之先河，特别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三个基本法则。三是宣传了列宁主义，主要集中在他改译的《列宁主义概说》（笔者注：即斯

① 瞿秋白:《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号，1920年4月21日。

大林于1924年4月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论列宁主义基础》)。从瞿氏与张西曼开始，我国传播资料由日文、英文转译转向从俄文翻译，先进的中国人对列宁主义的了解更加直接和准确。



▲李季（1894—1967）（李明吉提供）

李季（1894—1967）祖籍江西，生于湖南平江的一户殷实人家。1918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参加五四运动，是时各种西方进步思想激荡，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对托尔斯泰的思想有兴趣。这是“因为从儒教克己之说到他的‘不抵抗主义’，相隔不过一步”，稍一前进“即达到他的领域之中”。[①]1920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倾向科学社会主义。最初，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完全将中国旧有的意识附会在它的上面”。[②]以后在翻译过程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认识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不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历史的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它将来的出现不是人们主观上的空中楼阁，而是现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要投身无产阶级，为之服务，绝不是悲其贫穷，而是因为它系一种唯一的进步势力，负有创造新社会的使命，并具有这种能力。要看清这一点，才可与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否则凭一时感情的冲动，信仰不坚，必至朝秦暮楚，为世诟病。”[③]1920年秋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又参加了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活动。1921年夏赴德留学，1922年加入中共旅德支部第三组佛兰府小组。1925年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上海大学教授。李季对初期传播的贡献主要是从英文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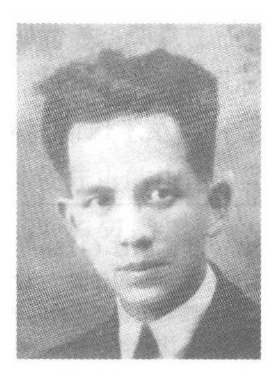


▲李季1923年在法兰克福（李明吉提供）

① 李季：《我的生平》，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223页。
③ 同上书，第234—235页。

中翻译了一些社会主义政治读物，如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单行本。这本书对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他们必读的理论读物。1923年他又翻译了美国“各校社会主义社”秘书列德莱所著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正好与《社会主义史》相衔接。他还撰写了《社会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传及其学说自序》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32年他的《我的生平》，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记录了他前半生的活动。建国后寓居上海，为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

袁振英（1894—1979）广东东莞人。袁氏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上是一个不能遗忘的人物。早年入北京大学，与陈独秀为师生关系。1920年8月参加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并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以后到广州，成为中共广州早期组织的成员，担任过《新青年》、《前锋》的编辑。他在传播中主要贡献是以“震瀛”、“震寰”的笔名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撰写、翻译了40余篇宣传列宁、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文章。1921年8月前往法国留学，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回国，曾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等学校执教。建国后，由周恩来提名，曾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袁振英（1894—1979）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中，除了以上主要人物起到重要作用外，还有


▲陈启修（1886—1960）


▲沈雁冰（1896—1981）


▲沈泽民（1900—1933）


▲张太雷（1898—1927）



▲张闻天（1900—1976）



▲刘太白（1880—1932）



▲成舍我（1898—1991）
（台北“国史馆”提供）



▲林修梅（1880—1921）

陈启修、[①]沈雁冰、[②]沈泽民、[③]田诚、张申府、徐凯新、张闻天、[④]张太雷[⑤]等，以及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等国民党人士与林修梅、[⑥]成舍

---

① 陈启修（1886—1960）又名豹隐，字惺农、莘农。四川中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受聘北京大学，担任商学院教授，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② 沈雁冰（1896—1981）原名德鸿，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早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1921年年初由李汉俊介绍入党，曾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左联行政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文化部部长、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③ 沈泽民（1900—1933）原名德济，笔名成则人、朗生等。沈雁冰之弟。浙江桐乡人。早年就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7月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4月加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讨论进行计划书》（列宁著）、《论策略书》（列宁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历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长、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11月病逝。

④ 张闻天（1900—1976）曾化名洛甫。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人。早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赴美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任中华书局编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遵义会议后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建国后，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⑤ 张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让，又名椿年、春木。江苏常州人。早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陪同魏金斯基到上海。曾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中国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政治局临时常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不幸牺牲。

⑥ 林修梅（1880—1921）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参加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后投入湘军，历任旅长、参谋长、护法军政府顾问、陆军中将等职。受十月革命影响，发表了《社会主义之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文章，1921年10月病逝，被追赠陆军上将。

我[①]（谢）晋青、衡石、食力、A. T、费觉天、[②]恶石、汉胄[③]等进步人士。[④]正是这样一批大无畏“盗取”科学社会主义的圣火者，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天穹上星光灿烂。

第二节 初期传播主要大众媒介

自从出版、新闻媒介的出现，人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就发生了革命性的突变，从而改变了世界。同样中国自从有了近代出版业，才融入世界文化现代化的潮流。其中新闻媒介不仅及时传递世界和中国的最新消息，而且在开启民智、思想启蒙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信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是通过大众传媒，才使先进的中国人了解、学习、宣传、皈依，继而掀起了惊天动地、改朝换代的运动。

---

① 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勋，笔名舍。湖南湘乡人。民国初年开始记者生涯，曾就读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新思潮，一度倾向社会主义，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共产党宣言》（摘译）、《无产阶级政治》（列宁著），撰写了《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等。1924年起先后在北京、南京、重庆等地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1952年从香港到台湾，担任大学教授，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与《台湾立报》。1991年4月1日在台北病逝。

② 费觉天 生卒年不详。又名费秉铎。湖北黄梅人。1920年10月在上海《国民》第2卷第3号上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资本论自叙》。12月与李大钊等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在《晨报》、《改造》等报刊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两大关键》、《关于社会主义运动问题致蓝志先生书》，在陈独秀等与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论战时，公开主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2月15日担任《评论之评论》的编辑，提出革命成功不是靠社会运动家而是靠革命文学家的思想。

③ 汉胄（1880—1932）原名金庆棪，字伯贞，辛亥革命后，改名刘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汉胄为其笔名。前清举人。浙江绍兴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新诗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反映劳动者的新诗《劳动节歌》、《八点钟歌》、《五一劳动歌》、《卖布谣》等，还在“随感录”栏目里发表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短文，如《防堵思想的结果》、《谈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的注意》、《张东荪与吴佩孚》等。以后担任过编辑、教师。1929年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1932年2月病逝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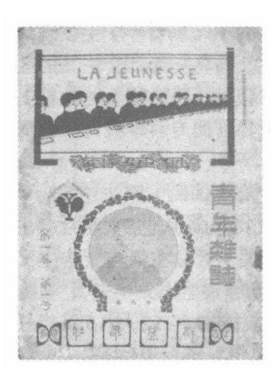
④ 以上名单一般是指1919—1922年左右出现在报刊上并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们或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或报导苏俄实况，或撰写学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国内局势、社会问题等，其中一些人显然是笔名，其真实姓名和身份有待考证。杨明斋、陈望道、邵力子以及戴季陶、朱执信、沈玄庐等在相关章节另作介绍。

根据现有的材料，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是1815年8月5日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纪传》。这份月刊产地在马六甲，其要务是“阐发基督教义”。[①]1833年8月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国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此前，即1822年《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出现在澳门，是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中国境内随意办报的特权，近代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到民国初年新闻报业达到500多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期刊更是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下增加400多家，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晨报》等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舆论主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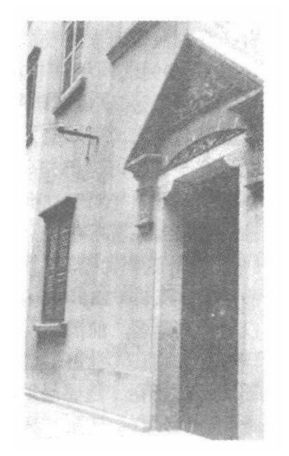
一、《新青年》月刊

为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媒舰队的旗舰。1915年9月15日创刊，初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撰。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改名《新青年》。办刊初期，高举起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的大旗，开辟了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新时代。该刊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宣布为同人刊物，形成了“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传媒，而是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



▲《新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1915年9月

十月革命后，刊物开始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肩负起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由传播民主与新文学，转变成传播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新文化。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寓居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此地。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8月成立了新青年社。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它是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启蒙的


▲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老渔阳里2号）

① 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最主要刊物，其杰出贡献：

第一，在全国报刊中率先发表歌颂十月革命的评论文章。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后来还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许多介绍苏俄革命基本经验和建设情况的文章，引导了一代正在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的正确前进方向。

第二，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 年发行的第 6 卷第 5 号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由中国人写的第一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后杂志不断刊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登载介绍苏俄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大量文章。

第三，高举起反对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大旗。在建党前后，《新青年》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辩论，发表了《谈政治》、《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一批质量较高的文章，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有关内容详见第三章。

第四，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从 1919 年 11 月到 1926 年 7 月，新青年社出版了政治书籍 46 种 57 册，详见表 1—2。其中马克思主义图书，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等对毛泽东、恽代英等一批先进青年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表1—2　新青年社出版图书目录

（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

新青年丛书	马克思全书	康民尼斯特丛书	列宁全书	中国青年丛书	其他
社会主义讨论集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底计划	劳农会之建设	将来之妇女	劳动运动史
哲学问题	资本论入门	俄国共产党党纲	讨论进行计划书	马克思主义浅说	俄国革命记实
俄罗斯研究	工钱劳动与资本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列宁传	唯物史观	两个工人谈话

（续表）

新青年丛书	马克思全书	康民尼斯特丛书	列宁全书	中国青年丛书	其他
到自由之路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共产党礼拜六	青年工人问题	京汉工人流血记
欧洲和议后之经济			劳农政府成功与困难	关税问题与特别关税会议	精神谈话一斑
工团主义				显微镜之下醒狮派一至三册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上下二册）
阶级争斗					社会科学讲义 一至五集
					中国青年汇刊一至五集
					各时代经济元素表
					共产主义 ABC
					新社会观
					少年共产国际
					唯物史观浅释
					社会科学概论
					中国关税问题
					不平等条约
					论北伐
					陈独秀先生演进录
					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
					青年平民读本一至三册
					孙中山先生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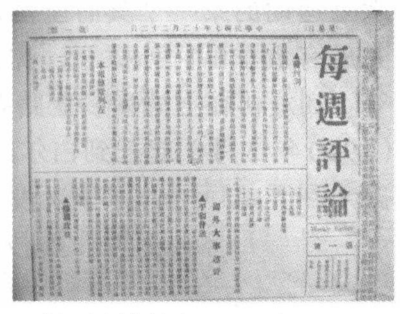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新青年》广告;《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 2 卷，华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3 页。

表内的书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书籍。

第五，承担起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任。《新青年》在舆论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新青年》编辑部与星期评论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单位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中共成立后的传播贡献见第二章第二节。

二、《每周评论》

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1918年12月22日创刊。政治周刊，最初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①] 周刊分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读者论坛等12类。周刊经历了五四运动，刊登大量报道与时评，记载五四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热情歌颂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猛烈鞭笞军阀政府引虎入室、卖国求荣的罪行，号召人们起来与之斗争。陈独秀的"除三害"——"除军阀、除官僚、除政客"[②] 与署名"赤"的"兴三利"——"培养进取、有为、肯牺牲、负责任的少年专门而博闻学者"、"实行科学教育，遵守科学法的态度"、"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主事业，成为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的、财主的人世"[③] 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贯穿周刊的始终。


每週評論

▲《每周评论》创刊号，1918年12月22日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周刊开始歌颂苏俄、德国、匈牙利的革命；报道国内劳工状况；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最后几段译文，其前言热情称颂《宣言》"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④] 该刊还发表了《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一文，对社会主义各派别作了介绍。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传播民主与科学外，还介绍各地进步团体和刊物，陆续开展"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对遗老林琴南卫道的批判，宣传了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

周刊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展，并发表短小精悍、立论精辟犀利的评论，深受读者欢迎，发行5万份。其办刊形

① 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创刊号，1918年12月21日。

② 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③ 赤：《兴三利》，《每周评论》第6号，1919年1月26日。

④ 舍：《共产党宣言（摘译）》，《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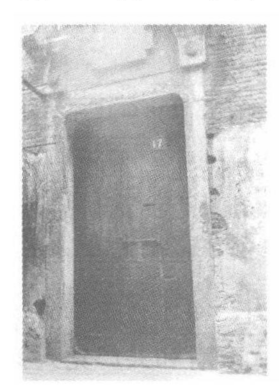
式、版式成为报刊时尚，一时以“评论”为刊名的进步刊物纷纷出现，如北京的《评论之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武昌的《武汉星期评论》等。周刊共出37号。1919年8月31日被军阀政府查封，其罪名是传布马克思主义。[①]

三、《星期评论》（以下简称《星评》）周刊

1919年6月8日创刊，是响应五四运动，尤其六五运动的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革命刊物。编辑先后有戴季陶、孙棣三、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等。刊址初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从第35号（1920年2月）起迁到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即李汉俊的寓所。这说明李汉俊此时成为该刊的中心人物。该刊主旨“就是在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继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人类运动”。[②]在其发刊词中宣称：“现在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便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世界’。又问现在的国家是谁的国家？我也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国家’。我又问现在世界的大势怎么了呢？世界的思潮又怎样了？我们的国家处于现在世界的大势该怎么样？处于现在世界的思潮又该怎么样？我就不能不用着我们的思想来创作《星期评论》。”[③]



▲上海《星期评论》创刊号，1919年6月8日


▲上海《星期评论》旧址，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介绍五四时期期刊的所有著述几乎均将《星评》定位“是在孙中山与国民党的指导下与经济支持下出版的”。[④]不知这个定位的根据何在？不错，最初周刊要创造的新世界，确实是在展现孙中山的建国蓝图，这集中反映在

①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文内用“马尔格斯主义”称谓。

② 《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③ 玄庐：《发刊词》，《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④ 《星期评论》，《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2页；《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周刊第2号的“本社同人”的《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中，但这只能说明周刊创刊初的政治倾向。不错，《星评》的主编戴季陶曾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但不能由此得出凡是戴季陶做的事情都与孙中山有关的结论。将《星评》定位为中国国民党刊物至少质疑有二：一《星评》是1919年6月8日问世的，此时中国国民党还没有产生，而老的国民党已经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既然中国国民党是1919年10月产生，何来6月去指导并与经济上支持《星评》？二在《星评》第3号上发表了戴季陶的《访孙先生的谈话》，文章披露：孙氏问：“你这几天研究什么东西？”戴答：“我和两个朋友，办了一个《星期评论》。”由此可推断，孙中山并不知道戴办《星评》之事。既然如此，何来“在孙中山指导之下”之说？

《星评》以第10期发表恩格斯于1891年起草的爱尔福特宣言为起点，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周刊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为止，在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50余篇，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销量从最初的1000多份，逐月增加，一度达到十几万份。1921年2月21日，蔡和森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评论近来国内舆论界时说：“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惟《星期评论》差善”。[①] 李立三称赞《星评》与《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占势力的两份刊物。[②] 有鉴于此，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上海时，便与之联系，使星期评论社成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细胞”之一。[③]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五位发起人，除陈独秀、陈公培外，其余三人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均为星期评论社的成员。周刊在传播方面的主要功绩：

第一，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醒目的成果就是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氏译文的日文底本是戴季陶提供的。1920年4月，陈氏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勤奋翻译，大约一个月后携带翻译稿回到上海时，《星评》已经被迫停刊，这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接手，以“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一种”的名义，于同年8月公开出版。《星评》停刊的第二天

---

①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通信”，1921年8月1日。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

③ 瞿秋白：《中共党史纲要大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页。

（6月7日），周刊同人又以“社会经济丛书刊行会”的名义，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刊预告”，表明“经济组织底改造，是社会改造底基础”，为使中国思想界“由空泛的文化运动，向着组织改造运动进行”，将出版社会经济丛书。1921年6月24日，他们又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邵力子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新时代丛书〉编辑源起》，宣称要普及先进文化，将贵族文化变成大众文化，先后翻译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妇人与社会主义》等书籍，做了传播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工作。

第二，热情鼓吹俄国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晨报》（《晨报》传播的情况见后）力求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苏俄的话，那么《星评》则是直接宣传苏俄，鼓吹苏俄的革命道路。《星评》旗帜鲜明地指出：俄国革命是世界性的，代表了世界的新潮。它与中国共有一万多里的国境线，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两国都是农业国，正在近代文化史上努力的时代都在一个水平线上”，[1] 号召中国人学习俄文，去研究俄国，讨论俄国的政策。《星评》是我国最早调动诗歌文艺手段来歌颂苏俄的刊物。1920年1月1日，《星评》刊出“新年号”，别开生面地用《红色的新年》的新诗作为“新年祝词”：1919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 / 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世界是我们劳动者创造的，为什么我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呢？“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 这是什么？ /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 / 从近东卷到远东 /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 呀！ / 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 / 一霎时遍地都红！”这首新诗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应该浓墨重彩，因为它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首歌颂苏俄革命的


星期評論新年號

▲ 1920年元旦，上海《星期评论》新年号刊登第一首歌颂苏俄的新诗

①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新诗。

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笔者注：即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声明)，单方面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戴季陶获悉立即在《星评》第15号(1919年9月14日)发表《俄国两个政府的对华政策》加以评论。1920年4月路透社披露"宣言"内容，4月11日，《星评》第45号全文登载了宣言，并发出欢呼："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思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我们如果是有了'人'的觉悟，就应该要合起几万万在重重奴隶境遇里面的人民，振起一个很大的革命精神，把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所遗传来的你、我、他的罪恶，都洗刷个干干净净。联合世界上一切被掠夺的人，为世界全体人类，建设一个全人类自由劳作、自由管理、自由享用的互助世界！"① 以上宣言与文章《新青年》及时加以转载。

《星评》在鼓吹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时代精神的同时，特别强调各民族应该"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罩下面，都各自由的发展起来"，"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30年前，这段话被作为《星评》要"中国人不要走俄国人的路"的证据，受到谴责。② 今天我们重新检阅相关的史料，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并将作者同时期说的"马克斯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③ "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④ "俄国的布尔塞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斯主义"⑤ 等话联系起来解读的话，被指责的这段话恐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啊。

第三，鼓吹劳工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劳工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但将劳工问题列为刊物的主旨之一，《星评》是六三运动后创刊杂志的首家，成为周刊最亮丽的风景线。在创刊号上，《星评》欢迎反

---

① 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② 《星期评论》，《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8页。
③ 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④ 戴季陶致陈竞存(1920年1月13日)，《建设》第2卷第1号。
⑤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映“工场工人生活状态”、“各处农夫的生活状态”等稿件。[①]在《星评》一年的生命里，发表了劳工问题的文章90余篇，几乎每一期都有劳工问题的文章，占的篇幅最多。1920年5月1日与《新青年》取一致行动，刊出了“劳动运动纪念号”。戴季陶在《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一文里，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概念，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剖析劳动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因果关系，指出文化运动的目的应该使创造世界财富的无产阶级享受文化。文化运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才有意义。它号召从事文化的知识分子，要认清这一点，切切实实地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而尽力。[②]《星评》号召爱国学生与劳动者团结起来，共同担负起彻底改造世界的责任，“联合全世界被掠夺阶级”，去“推翻强盗阶级，使全世界人民，都变为劳动者”。[③]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鼓吹劳工运动，《星评》与之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鼓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首先揭橥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的大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仅遭到军阀政府的文化围剿，而且还受到一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12月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次年5月7日又发表《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进一步鼓吹来自英国的工行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的革命道路与无产阶级专政。5月16日，《星评》发表了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其展开了批判。这篇文章奏响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序曲。相关内容详见第三章第二节。

第五，通过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史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争取解放的历史，我国传播者透过这个窗口，可以更好地帮助正在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科学社会主义。《星评》翻译恩格斯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纲领的核心部分是针对伯恩施坦反对“灾变论”（引者注：即“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必然性。这个观点对

① 《欢迎投稿》，《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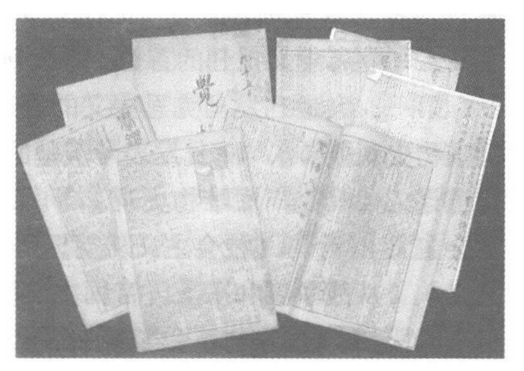
② 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2张，1920年5月1日。

③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正在开展救亡运动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星评》第51号、第52号、第53号（1920年5月23日、30日，6月6日），刊登了李汉俊撰写的《劳动者与“国际运动”》，全文约2.3万字。文章通过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历史的叙事，昭示中国人民要获得民族解放，就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四、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它是继《星评》在上海出现的另一份革命报纸。何时创刊，因报纸不全，倒成了一个谜。目前看到第一张的时间是1919年6月16日，[①]离《星评》诞生仅相差8天。“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创刊，有中华革命党的背景，中国国民党成立后，成为它的机关报。总编辑叶楚伧，总经理邵力子。“觉悟”只占四开一版的大半页，1920年起扩版为四开两页，5月20日扩大为单行八开对折四页，随报附送；7月起每月发行汇刊单行本。五卅运动后，被国民党右派所控制。1931年12月31日终刊。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邵力子（1882—1967）

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酝酿时，副刊“觉悟”事实上是中共的舆论工具之一，这与副刊主编邵力子有密切关系。邵力子（1882—1967）原名闻泰，字仲辉。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8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9年10月参加中国国民党。邵氏思想一贯激进，其主导下的《民国日报》成为宣传革命、新文化思想的主流媒体。五四运动后，邵氏的思想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激荡，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

① 这一期副刊“觉悟”没有创刊词，从内容上看，也不是创刊的内容，故创刊时间有待考证。

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最先就是住在邵氏在上海法租界打浦桥三益里5号的家中，他们与李汉俊等商议筹备共产党。要建党，就必须要有宣传阵地，除了《新青年》、《星评》外，就是副刊“觉悟”。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邵氏“以特别的方式”为其成员，不参加组织生活。[①]另一个编辑陈望道也是中共上海组织成员。有这样的背景，副刊“觉悟”就不单纯是国民党的刊物，而成了中共早期组织的重要宣传阵地。1926年8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工作，邵氏接受中共中央希望他做个纯粹的国民党员的意见，正式脱离中共，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副刊发行时间长、发行量大（笔者注：曾每天发行数万份）、发行面广，所以在传播方面的影响仅次于《新青年》，有人做过统计，在邵氏主持副刊期间，副刊发表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达950篇之多，篇数占所有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报刊的首位。[②]该刊主要贡献：

第一，大量刊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1919年7月连载《晨报》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11月发表考茨基的《商品生产的性质》和河上肇著、陈望道译的《马克斯底唯物史观》等。1920年以后刊发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列宁的《农税底意义》、《从战争到和平》、《帝国主义概论》（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第一章《阶级的社会与国家》（今译《阶级社会与国家》）、《马克思政治学》等。副刊“觉悟”还刊载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世界思潮之方向》（山川菊荣）、《马克斯底唯物史观》（河上肇）、《现代文明底经济的基础》（山川均）、《社会主义底进化》（河上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等等。

第二，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争。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以上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论争中，均可以看到副刊“觉悟”战斗的身影。《什么叫社会主义？》、《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一说明，旗帜鲜明地批判无政府主义。

① 《邵力子于1961年的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② 祥钧：《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20年5月16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率先对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判，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答汉俊君》后，一个叫陶乐勤的人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写文，企图调和他们的论争。5月20日，"觉悟"发表戴季陶撰写的《自由研究与自由批评》，公开支持李汉俊。5月21日、30日，副刊"觉悟"发表李汉俊写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批评》、《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对陶乐勤的调和立场进行批评。

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第二天，"觉悟"在第一时间就发表"江春"（笔者注：李达的笔名）的《张东荪现原形》和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第三天邵力子撰写《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进行批判。以后又发表《今日中国社会究竟怎样改造？》、《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分量重的文章，投入战斗。李达在《张东荪现原形》[①]里揭露张东荪善变的特性："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直接反对自己。这是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我们必先了解这一点，才能批评他"，给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第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觉悟"的突出特点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广大读者关心的社会改造问题，发表观点鲜明、短小精练的评论。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辩论时，《为什么要从事根本改造》[②]一文指出："要晓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顾到这里，又顾不到那里；东补一块，西补一块，这块刚好，那块又破；所以我们总要弄一个根本原因，从事根本改造。"1922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底乱源赶快终止？》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及革命基本问题的最初思考。作者站在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指出造成中国的乱源是帝国主义的侵入，已经落后的中国要赶快终止混乱，赶上世界的步伐，没有必要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老路，应该直接

①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7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27日。

“进化”到社会主义。要走社会主义之路，就必须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五、《晨报》副刊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为民初研究系的机关报。1919年2月7日起，该报刷新了副刊（第七版），增加了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①]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一度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媒体之一。



▲北京《晨报》

改版后的副刊社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第一天就刊登了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一文。“社会革命”是针对社会改良而出现的外来专用名词，在五四时期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就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彻底）革命，李文更是确信“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俄、德，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晨报》副刊与《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最突出的体现是1919年5月5日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 。副刊编辑确定这个时间作为专栏的开张，有明显的倾向性，因为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其纪念意义不言自明。这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专栏，不仅是全国报刊开辟马克思主义专栏的第一家，而且时间也最长，直到同年11月11日止，存续6个月的时间。值得研究的是，同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什么在北京两个媒体同时开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专栏？这绝非巧合。笔者推断至少是两位传媒朋友间互通声气，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一致行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编辑是李大钊；《晨报》副刊“马克思研

① “本报改良预告”，《晨报》，1919年1月31日。

② 守常：《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晨报》副刊，1919年2月7日。

究”专栏负责人是“渊泉”。“渊泉”是《晨报》记者陈溥贤的笔名。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他与李大钊关系密切。1915—1916年，他们两人同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中并肩作战。1916年回国后，他们又同时服务于《晨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陈溥贤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派驻日本，这时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复苏季节，陈氏深受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在《晨报》上开始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①]1919年5月，陈溥贤担任《晨报》总编，这时《晨报》副刊开辟的“马克思研究”极有可能也与李大钊直接有关，有学者指出这个时期，《晨报》副刊的“主持或‘主编’”正是李大钊，[②]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成立，李大钊与改版的《晨报》关系密切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时期我国首次开辟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是《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与《晨报》副刊，但由于本该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因印刷问题延到9月才与读者见面，这才使《晨报》副刊在这方面拔得头筹。


▲陈溥贤（1891—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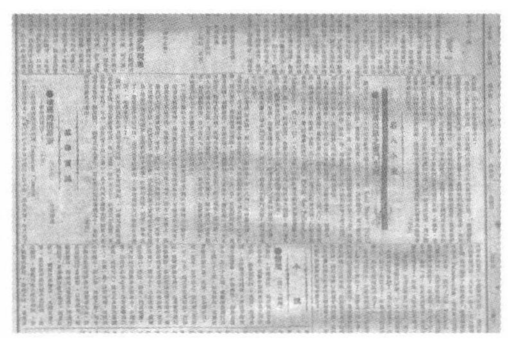
《晨报》副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建树：

第一，通过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宣传马克思、列宁的战斗精神与思想。从1919年4月1日开始，《晨报》副刊连载《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这是五四时期媒体上出现的重要的介绍马克思的小传。作者渊泉交代写作目的有二：“其一欲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之兴味；其一欲是诸君知古贤哲献身求学之生涯”，如果诸君从兹篇中“略有所得”，因此而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话，那么作者“诚无涯涘矣”。[③]小传用十分精练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与建树，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即以改造社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 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朱先生认定李大钊是《晨报》“改良”后的副刊主持人或“主编”是推测，尚需要挖掘第一手史料来证明。为此朱先生引用了“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晨报副刊》是“李大钊主持时期”的话来支持自己的断定，可惜张先生在书中没有交代这句话的原始依据何在。笔者请教张氏，张答对此并无研究。王宪明，杨琥在《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对此作了有价值的论证。

③ 渊泉：《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晨报》“名人小史”，1920年4月1—4日。



▲ 1919年4月1日，《晨报》刊登《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

会组织，为毕生事业。一切著述咸以解决兹事为目标耶。”他在而立之年写了“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之《共产党宣言》”。[①]1848年将在《莱茵新闻》所发表之论文，集结成《论文集》。1859年著《经济学批评》（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共202页。花了42年时间，于1867年，近世社会主义者所尊为圣经之《资本论》第一卷，始诞生焉。全卷739页，而所论之问题，与《共产党宣言》、《论文集》及《经济学批评》同为“马氏思想，由结胎而生育而长大矣”。[②]在此前后，报纸陆续刊登了《马克思年表》、“名人评传”《马克思》、《俄国过激派首领列宁》，以及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小传。读者透过这些小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加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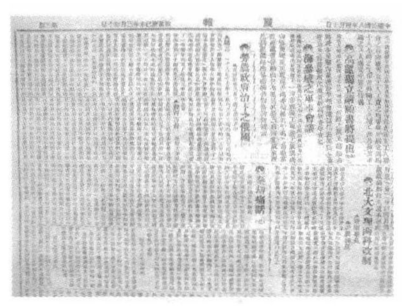
第二，直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1919年5月开始，《晨报》副刊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连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一个中译本。从6月3日到11月1日，副刊又用半年时间，刊登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笔者注：考茨基原著，书名《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部写于1886年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经典《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内容，是传播中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该书由陈溥贤翻译，后经过修订，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书名于1920年9月由文学社出版单行本。副刊还翻译了河上肇的名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唯物的经济史观的意义》等，影响了包括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

---

① 渊泉：《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晨报》“名人小史”，1920年4月1—4日

② 同上。

第三，介绍苏俄的革命和建设情况，向中国人民展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实践运动，是“以俄为师”的。西方主流媒体极端仇视苏俄，不仅对其真实情况实行封锁，而且攻击、污蔑俄国革命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等。中国军阀政府也三令五申严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过激主义”，对宣传的媒体不是钳制，就是查禁。《晨报》则反其道而行之，力求真实地向读者介绍苏俄的真实情况。1919 年 3 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回俄罗斯革命，总算二十世纪一桩大事。那些过激派的举动，究竟是祸是福，总应该大家细细的研究”。[①]《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一文中的议论，将报纸编发此文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列宁一派获得了政权的时候，世间有许多人都嗤笑他们，以为这不过如昙花一现，不久就要消灭的。然而在嬉笑怒骂之中所产生出来的劳农政府，现在是维持了一年有半的天下，往后还要维持多少的日子，固然是不能预测的，以现在形势看起来，空［恐］怕这个劳农政府是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与世同休的。……不过因为现在世界各国与俄国几乎是交通断绝，所以俄国的真相外间都不知道的，就有知道的，也是以讹传讹，不免有许多误会的地方，所以把俄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政治给我们国人看看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知道究竟俄国现在是怎么样子，一方面又可以知道世人所谓过激派政府所实行的政治到底是怎么东西，空［恐］怕说起来我们的政府还要害羞呵。”[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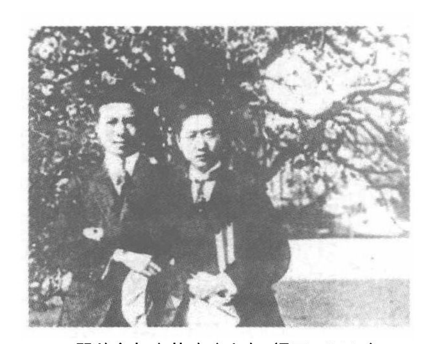

▲ 1919 年 4 月 10 日，《晨报》刊登《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一文


▲俞颂华（1893—1947）

1920 年 10 月，《时事新报》与《晨报》鉴于“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

① 《俄罗斯之研究》，《晨报》1919 年 3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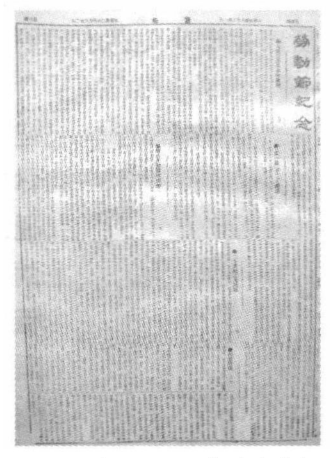
② 《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一），《晨报》1919 年 4 月 10 日。两天后（12 日）上海《民国日报》开始转载此文。



▲瞿秋白与李仲武（左），摄于1921年（瞿秋白纪念馆提供）

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特遴派瞿秋白、李仲武、俞颂华3人为驻俄特派员，“担任调查通讯事宜”。[1] 这也是国内媒体第一批派驻欧美的记者，实“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2] 他们于1921年年初前往莫斯科，发回了大批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大多收辑在《赤俄见闻记》、《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籍中，使中国人民透过浓雾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苏俄。《晨报》这个不同凡响的举动，不仅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了苏俄，也成就了瞿秋白为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晨报》在五四时期是最先刊发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的报纸。[3]1919年5月1日，《晨报》专号组织了《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五一节”May day杂感》、《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二十世纪之大问题》、《饭碗问题》等专文，介绍国际劳动节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将劳动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联系起来，指明这是世界的新潮。有的文章从人权的角度阐明劳动者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这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天赋人权”，实质上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产阶级的价值是彻底解决“贫富不均”的革命，从资产阶级与军阀官僚那里争得这三大基本权利，然而在封建专制社会，在资产阶级占统治的体制内是不可获得的，



勞動節紀念

▲1919年5月1日，《晨报》发行“劳动节纪念”号

①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共同启事》，1920年10月27日。

② 同上。

③ 《劳动》刊物于1918年5月出版的第1卷第3号，刊登了《劳动节》，报道了“五月一日之上海”等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

只有像俄国那样，“非使我们劳动者，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位”才能实现。只有劳动者有了自觉，只有“身的劳动者”与“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发扬广大新社会的新文化”，[①] 劳动者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些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讲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使广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成为自觉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社会才能实行根本的改革。第二年（1920年），它与《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又联合刊登“劳动节纪念”专号，来纪念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此时《新青年》编辑部已经迁至上海，这种南北呼应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现象绝不是偶然的。

以往史学界虽有学人提及《晨报》副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但评论多失公允，不是将宣传的功劳归功于李大钊的参与、帮助，就是诟病梁启超等办报人“从事政治投机的资本”。今日重新审视，这些评论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②]

《晨报》几乎与研究系在上海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同时倾向社会主义，就绝非偶然。笔者认为这与研究系主角梁启超、张东荪的思想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方面放到下面评述《时事新报》“学灯”、《解放与改造》时再议。副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与陈溥贤有密切关系。前面已说明，陈氏在1918年年末、1919年7—8月间两次作为《晨报》特派记者在日本采访时，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就是他在1919年5月担任《晨报》主编时，利用手中的决策、编审权，不仅自己在转译日文的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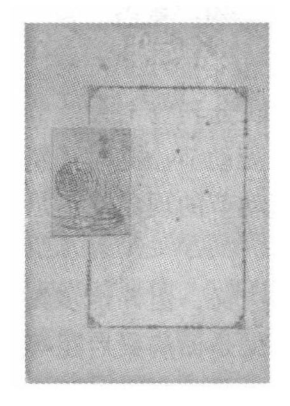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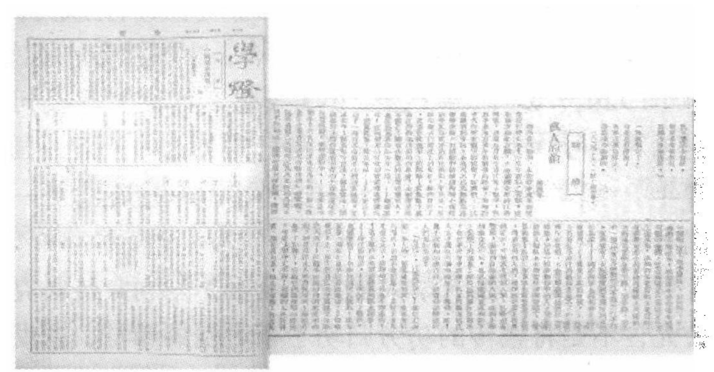
① 渊泉：《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晨报》1919年5月1日。

② 《晨报》副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已简单提及。同年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晨报副刊》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但评价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新时期，《晨报》副刊在这方面的成就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天火”在中国燃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均有记载，而且描述与评论越来越正面、越来越贴近历史。

著作，发表日本社会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撰写了他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中共早期组织没有出现之前，他的宣传、介绍格外耀眼，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排名榜上，不应该没有他的名字。

六、《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解放与改造》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这两份报刊与《晨报》一样都有研究系的背景。《时事新报》原名《时事报》，1907 年 12 月 5 日创刊，1911 年 5 月 15 日改名《时事新报》，民国后成为上海研究系的机关报，实际负责人是梁启超、张东荪等。1918 年 3 月 4 日，创办副刊“学灯”，初为周刊，后改为日刊，主编张东荪。1919 年 9 月 16 日起，《时事新报》增辟“社会主义研究”旬刊。在五四时期，“学灯”与《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被称为宣扬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副刊而名满天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主力。“学灯”在宣称新文化、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刊载过《社会党泰斗马格斯 Marx 之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马克思剩余价值》等。与《晨报》一起派出驻苏俄记者，发回了大量的苏俄通讯等。



▲《解放与改造》封面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1919 年 9 月 1 日在北京创刊，为北京新学会所办，主编张东荪。1920 年 9 月改名《改造》，编辑部移到上海，主编梁启

超、蒋百里等。无论《解放与改造》还是《改造》都标榜宣传社会主义，刊登过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介绍苏俄的文章。如《鲍尔雪克（引者注：今译布尔什维克）之排斥与要求》(1919. 9)、《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任务及其主义之实现》(1919. 10)、《俄罗斯之新法令三种》(1919. 10)、《广义派与世界和平》(1919. 10)、《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1919. 11)、《广义派政府下的教育》(1920. 1)、《俄国土地法》(1920. 1)、《苏维脱共和国》(1920. 3)、《苏维埃俄罗斯之文化事业与教育》(1920. 7)等，这些比《新青年》“俄罗斯研究”(1920. 9)中的文字还早。



▲ 1920年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改造》

那么为什么研究系所办的报刊在五四时期曾一度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呢？原因很复杂，笔者以为原因有这样几条：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我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研究系的三份报刊以宣传“世界之新潮流”为己任，[①]积极跟进，成为这个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使包括梁启超、张东荪在内的研究系健将们看到资产阶级文明“破罅一齐暴露；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②]正当全世界为之痛苦而无出路时，布尔什维克“振臂一呼，以试验”社会主义“于俄国，于是与之作桴鼓应者，遍于全欧”，这种现象与其说是“过激派之所为”，还不如说是“人心不安于现状之所致耳”。[③]而西方政界与主流媒体却肆意攻击布尔什维克，那么俄国真实情况如何呢？这是首先需要了解的，因此他们将俄国情况介绍给我国人民。他们并不反对苏俄革命，甚至一度有些好感。梁启超在1918—1920年旅欧时，曾赞扬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华毕竟不能磨灭。从前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

① 《〈时事新报〉广告》，《改造》创刊号，1920年9月15日。
② 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创刊号，1919年9月1日。
③ 《张君劢致张东荪》，1919年9月10日，《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

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①]“以人格论，在现在，以李宁（引者注：今译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②]张君劢总结人们服膺布尔什维克有二：“一曰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二曰排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③]但由于他们因袭着封建主义的包袱进入新时代，其价值取向又是资本主义，所以对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也就是说，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希望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实现废除雇佣工资本制度（笔者注：即消灭剥削制度）与实行产业民主自治，然而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兼容的。

第二，这与梁启超等的办刊方针有关。中国近代报业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时，形成了学理上兼容并包、各种思想并存的新风。所以像梁氏这样的新报人，坚持所谓“言论出版自由”、“报道真实”等办报原则，标榜“不党主义”，反对文化专制，因此在他们的报刊中对各种主义一般比较宽容，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新思潮中的一种加以一般介绍，并非信仰。

第三，这并不表明，研究系把持的报刊不是没有立场，恰恰相反它们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十分明确的，对此他们从不掩饰。对过激主义（笔者注：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张东荪表白得很清楚：“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对于过激主义之侵入，拒之乎，抑迎之乎，此不特英日之问题，乃各国所共同之问题也。据吾所见，压抑之法必属无效，盖抑之犹激之也，是火上加油，益其燃耳。然则奈何？曰：当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先行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于经济上得相安，于心理上得其平。然后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④]张君劢说得更清楚，他称“输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回事，要用它来在中国“对症下药”则是另一回事。他对苏俄废除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他与张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3页。
② 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3月15日。
③ 《张君劢致张东荪》，1919年9月10日，《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
④ 张东荪：《世界公同之一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1月15日。

东荪一样主张新型的代议政治机关应该是“劳力者与资本主义共同管理工业之机关”。[①] 所谓救国之良策“不在机器，不在物质，不在财产，而在此人心风俗”。[②]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行文化建设，将建立新道德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方法。他们公开主张“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③]

第四，按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看法，梁启超等研究系成员“鼓吹社会主义以争取中国青年的支持，但后来看到招集来的仅仅是改良主义者，他们便显示了真实意图，不主张社会主义，而是要资本主义。尽管如此，它仍希望以基尔特社会主义来吸引改良主义者们。”[④]

最后，研究系是一个松散的政治派别，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其成员各行其是，三份报刊的内容与风格与当班主编有很大的关系。前述 1919 年 5 月陈溥贤担任《晨报》主编，他与张东荪对过激主义的态度有所不同，至少他在任时是赞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1919 年 4 月 26 日至 9 月中旬，“学灯”的主编是俞颂华，俞氏较为开明，此时亦倾向社会主义，担任主编的第三天，他就发起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征文。以上提到“学灯”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都是在他任上发表的。无独有偶，《晨报》副刊和“学灯”宣传马克思主义高潮的时间是在 1919 年 5—10 月，正是这两位主编在任期间。1920 年 10 月，梁启超派俞颂华、瞿秋白等三人去莫斯科担任驻外记者，这三份报刊有关苏俄的报道和消息几乎都来自他们的笔下。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看研究系的三份报刊曾一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也正是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又有很多错误的观点。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苏俄革命则是他们报刊的主流。因此，它们与改版后的《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应该指出，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亦有脸谱化、定型化的倾向。其实梁氏思想十分复杂多变。他是我国知识分子中最早关注社会主义的，早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

① 《张君劢致张东荪》，1919 年 9 月 10 日，《解放与改造》第 1 卷第 6 号，1919 年 11 月。

② 同上。

③ 《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 年 9 月 16 日。

④ 《中国现存政党情况（国民党除外）》，李玉祯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0 页。

年，他在与中国同盟会论战时，就表明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简单地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中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在日本时期，他主张君主立宪，在五四时期他主张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是通过资本主义增加富力和实业，进而走向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成为思想界的时髦，涌现出的400多种报刊中，至少200多家程度不同地介绍、宣传社会主义思想。[①]最初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经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进步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才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除了以上报刊外，《每周评论》、《建设》、《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国民》、《新时代》、《华南日报》、《武汉星期评论》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亦有建树。传播的载体还有出版部门，将在以下的章节陆续介绍。

第三节　初期传播主要渠道

西方文化在我国传播是我国近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一次重构，必然形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撞、融合与嬗变。如果将西方文化作为整体来考量的话，那么近代中国新文化的重构实际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过程。笔者以为近代中国文化重构主要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四次文化冲撞、融合与嬗变，直接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在这四次文化重构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产生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科学政治观，后来中共将这种政治文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救亡运动相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时期。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通过哪些渠道传入我国呢？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

① 《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1982年版，第18页。

② 19世纪中叶波及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往学界是从农民起义视野进行肯定。如果从中西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它是一次基督教在中国空前的演绎，尽管它与西方原教有本质的区别，融入了农民空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资政新编》等。

一、日本渠道


▲片山潜（1859—1933）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主渠道[①]不是原产地德国与英国而是亚洲的日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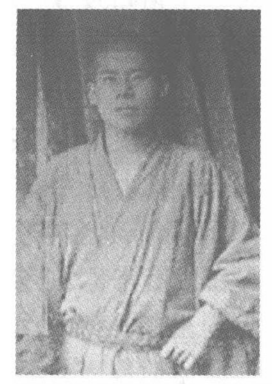
第一，这与中日地缘政治密切相关，是两国近代民主运动各自发展需要与政治文化交流的结果。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日本全面学习西方后不久，社会主义运动悄然兴起。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18世纪最后一个10年，此时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村井知至与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人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5月，片山潜、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安部矶雄等人创立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一时在出版舆论界，出现了社会主义热，一批有分量的杂志与书籍破土而出。


▲安部矶雄（1865—1949）
（石川祯浩提供）


▲木下尚江（1869—1937）
（石川祯浩提供）

甲午战争，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弹丸小国日本，竟打败了天朝上国的中国，朝野震撼。随后中日之间出现了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战败国的雪耻青年纷纷东渡扶桑，掀起第一波留学潮，据统计，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有上万人，像这样大规模的留学热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他


▲福井准造（1871—1937）
（石川祯浩提供）


▲西川光次郎（1879—1940）（石川祯浩提供）

①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传播主渠道是指某一个阶段在传播中起主要作用的途径，与此同时还有分渠道也发挥了作用。如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来源主要受到日文马克思主义著述的影响，但他也从英文文本中获取思想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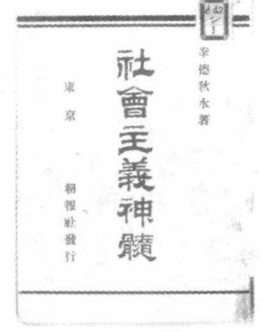
们尽管所学专业不同，但通过日本这个桥梁向西方学习以强国富民的愿望则是一致的。中国思想界在大量引进西方政治文化中，社会主义思潮占有一席之地。


▲有贺长雄（1860—1921）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从日本引进的。据说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登载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里第一次出现中文“社会主义”一词。[①] 以后中国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社会主义著述，其出版速度令人惊叹。1902年11月幸德秋水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广长舌》（全书32篇）出版，同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中文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1898年出版，1903年广智书局刊登了出版广告。1901年出版的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1903年也有了中文本。

1903年7月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是日本明治时代水准最高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之一，其中第七章基本上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解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仅隔两个月，即10月中文本就出现在市场上，像这样的出版效率即使今天也很难做到，从出版这个窗口反映出中国先进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好奇与欢迎。伴随印刷媒体的社会主义热，民国初年再次出现了社会主义热潮。1911年11月中国社会党成立，一时喧嚣，各地近500个支部组建，成员号称50多万。中国社会党的出现凸显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由文字宣传演变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


▲幸德秋水（1871—1911）（石川祯浩提供）



▲1903年日本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石川祯浩提供）

①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正如马克思主义是在惊涛骇浪中前进一样，中日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危难多舛。19 世纪初，日本政府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11 年 1 月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 11 人被处死，史称“大逆事件”。与日本政府镇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相呼应，1913 年 8 月 7 日，袁世凯政府以中国社会党“勾通外国虚无党，妨碍国际和平情事，显系倡乱行动”等罪名，勒令将其解散。[①] 至此中日社会主义运动均进人“冰河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也极大地冲击了日本，使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冰河期”解冻。一方面以 1918 年 8 月“抢米暴动”等事件为契机的日本民主运动日益高潮，劳动者要求解放，实现平民政治支配着社会的多数人心；两千年的传统、神权的迷信，帝国的威权已经在日本国民的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摇动”；[②] 另一方面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形成热潮。1919 年 4 月 24 日《晨报》第二版（笔者注：实际是头版，第一版是广告）报道：“日本学界最近关于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学说之研究顿盛，东京、西京帝国两大学教授争先恐后发表这种研究。”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社会主义者十分活跃，他们勤奋翻译，使《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日文本陆续问世，一些诠释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的著述也纷纷出现；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新社会》、《社会主义研究》、《改造》、《解放》等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直接影响了我国进步思想界。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基本队伍主要是由留日学生或旅日华人组成。中国第一批传播者（笔者注：绝大多数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匏安、施存统、周佛海、周恩来、陈启修、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沈玄庐、陈溥贤等都有旅日的经历。他们在日本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从“冰河期”到复苏，通过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这方面典型的例证就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氏在文章中特意说明唯物史观部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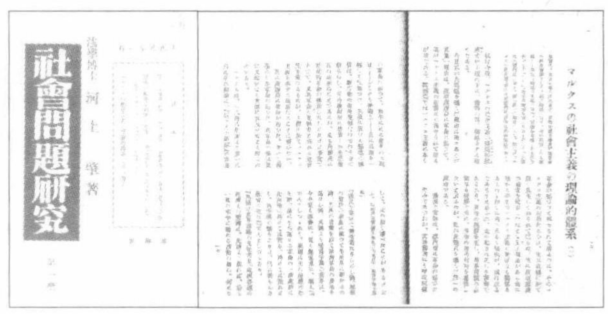
① 《大总统解散中国社会党令》，1913 年 8 月 7 日，《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04 页。

② 棣三:《日本人的解放运动》,《星期评论》第 1 号，1919 年 6 月 8 日。



▲河上肇（1879—1946）
（石川祯浩提供）

采用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哲学的贫困》等内容，来自河上肇博士。河上肇是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起先他醉心于人道主义经济学研究，在十月革命与“抢米暴动”事件的推动下，思想发生了剧变，1918年年底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彻底失望转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其标志就是在1919年1月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传播不仅在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反响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人不曾受过他的影响。据杨奎松粗略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2年年底，河上肇的著述（含译文）在中国发表专著4部，文章约30篇。这个数字，即使在中国进步思想界格外重视国外新思潮的当时，也是十分可观的。[①] 根据中日学者斋藤道彦、后藤延子、杨奎松、石川祯浩等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前半部的蓝本来自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第2册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后半部来自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当然，影响李大钊的并非河上肇一人，李氏在1919年年底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一）（二）（三）部分，则是以堺利彦《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宗教及哲学之物质的基础》两文为蓝本；在1920年5月1日发表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


社會問題研究
河上肇著
マルクスの社會主義の理論的體系

▲ 1919年1月，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上发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石川祯浩提供）



▲福田德三（1874—1930）
（石川祯浩提供）

① 杨奎松：《李大钊与河上肇》，《党史研究》，1985年第2期。

一文，吸收了山川菊荣的《五月祭与八小时劳动的话》、伊都子的《致不真面目的劳动论者》与 Morris Hillquit——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Karl Liebknecht——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 等人的成果。其他人士的情况在本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有较详细的描述。

第二，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是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主要思想来源。这方面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取自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如《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主要是从日文本转译的。1919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 日《晨报》刊载食力转译的《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底本是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第 4 册（1919 年 4 月）上的《劳动与资本》。二是一些来自欧美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本，主要也是从日文中转译，或者参考了日文本。如《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由远藤无水日译本转译的。《唯物史观解说》（作者 H. Gorter）的底本则是根据堺利彦由德文转译的。三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诠释的著述，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译自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译自堺利彦《唯物史观概要》。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李达译）对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等等。以上情况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请见表 1—3。

表1—3　中日社会主义著作翻译对照表

（1919—1921.8）

日文版	中文版
《现时劳动问题概论》高畠素之著，卖文社 1919 年版	《劳动问题概论》冯飞译述，华星印书社 1920 年 7 月版
《贫乏物语》河上肇著，弘文堂 1917 年版	1.《贫乏论》止止（李凤亭）译述，泰东书局 1920 年 7 月版 2.《救贫丛谈》河上肇著，杨山木译，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12 月版
《共产党宣言》翻译幸德秋水、堺利彦，《社会主义研究》第 1 期，1906 年 3 月版	《共产党宣言》翻译陈望道，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 年 8 月版
《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原著，远藤无水译，文泉堂 1920 年版	《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儿著，郑次川编译，群益书社 1920 年 8 月版

（续表）

日文版	中文版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K.Kautsky 原著，高畠素之译，卖文社出版部 1919 年版	1.《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考茨基著，戴传贤译，《建设》第 1 卷第 4 号、第 5 号、第 6 号，第 2 卷第 2 号、第 3 号、第 5 号 2.《马氏资本论释义》柯祖基著，渊泉译，《晨报》1919 年 6 月 2 日至 11 月 11 日。 3.《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9 月版
《通俗马克思资本论附马克思传》马尔西著，远藤无水译，文泉堂 1919 年版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 年 9 月版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岩波书店 1920 年版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泰东图书局 1920 年 9 月版
《社会问题十二讲》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新潮社 1920 年版	《社会问题概观》上下，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共著，周佛海译，中华书局 1920 年 12 月版
《社会问题总览》共三卷 高畠素之著，公文书院 1920 年版	1.《社会问题总览》共三卷 高畠素之著，李达译，中华书局 1921 年 4 月版 2.《社会问题详解》共三卷 高畠素之著，盟西译，商务印书馆 1921 年 4 月版
《法国总工会（CGT）研究》山川均著，《改造》1920 年 4 月号、5 月号	《劳动总同盟（之）研究》山川均著，邹敬芳（锦芳）译述，泰东图书局 1921 年 5 月版
《唯物史观解说》H.Gorter 堺利彦译，大镫阁 1920 年版	《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 1921 年 5 月版。注：中文本还参考了德文本
《欧洲工人问题大势》桑田熊藏著，有斐阁 1920 年版	《欧洲劳佣问题之大势》桑田熊藏著，刘景译，内务部编译处 1921 年 5 月版
《妇女的胜利》山川菊荣著，日本评论社出版部 1919 年版	《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山川菊荣著，李汉俊编译，商务印书馆 1921 年 7 月版
《苏维埃研究》山川均著，《改造》1921 年 5 月号	《苏维埃研究》山川均著，王文俊译，北京知新书社 1921 年 8 月版
《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著，《社会问题管见》弘文堂书房 1918 年版	《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渊泉译《晨报》1919 年 4 月 1—4 日

资料来源：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附录二 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

中文本《共产党宣言》有多种版本，请见本书第二章第 132—134 页。

第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直接交往。李大钊是日本著

名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的学生，1913—1915年他在日本就读私立早稻田大学时，安部矶雄在该校执教，教授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李大钊选修过安部矶雄的课，1916年回国时，携带了安部矶雄的一些著作。



▲宫崎龙介（1892—1971）（石川祯浩提供）

李汉俊与日本进步人士、社会主义者保持经常的来往。宫崎龙介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儿子。李汉俊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时与其相识，因志同道合而成了莫逆之交。1919年9月他们相聚在上海。一天宫崎龙介到李汉俊家，与上海学生团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交谈。宫崎向“他们披露了一些有关日本现在、将来动向的看法”。“大家在一起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通向未来理想的中国社会的道路以及与之相适的运动方针政策”。李汉俊表示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否则是行不通的。“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意见取得完全一致”。[①]



▲宫崎寅藏（1871—1922）（石川祯浩提供）

1921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日本进步文学家芥川龙之介与《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访问了李汉俊，李氏表示：“当今的中国该走什么路？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共和也非复辟，这般的政治变革是改造不了中国的。……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唯有社会革命一条路。”“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②]李汉俊十分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及时购买宣传社会主义刊物。五四运动期间，他不仅在其负责的《星期评论》上及时报道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还翻译了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章，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芥川龙之介（1892—1927）1921年摄于中国（石川祯浩提供）

戴季陶因思想激进，被日本当局“划成了过激派”

① 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解放》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

② 芥川龙：《上海游记》，《芥川龙之介全集》，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5卷。


▲近藤荣藏（1883—1965）
（石川祯浩提供）

（Maximalist）。[①] 所谓“过激派”是日本发明的一个名词，最初专指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②] 后来延伸到社会主义各派。日本政府将“过激主义”视为洪水猛兽。戴季陶上了日本政府的黑名单。宫崎龙介访问上海时，专门到渔阳里戴宅访问，戴氏向他打听东京的形势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近况。戴季陶与堺利彦、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时有来往，并将《星期评论》与他们负责的日本刊物《解放》等互相交换。

1920年6月中旬，在戴季陶帮助下施存统留学日本，戴氏请宫崎滔田父子给施氏以照顾。施存统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伊井敬（近藤荣藏）、宫崎龙介、山川均、高濑清等”有交往。[③] 施氏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快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并翻译了一些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施氏还接受陈独秀“联络日本同志”的任务。[④]1921年10月，张太雷奉马林之命到日本，施存统带他访问了堺利彦、近藤荣藏等日本同志。施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系的一条纽带。

陈溥贤作为《晨报》的特派记者多次到日本采访，与日本进步人士、社会主义者有很好的人脉。如前所述，他最早在《晨报》上介绍日本版马克思传与马克思的著作，是李大钊与日本进步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结识的介绍人之一。

他们经常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通信，促进了传播。这方面有案可稽的有：1920年4月27日，李大钊、陈启修、陈溥贤致宫崎龙介，请宫崎将北京大学学生访日团“介绍于贵国新派学者、社会运动者，乃至各文化团体中的青

① 宫崎龙介：《寄自新装的民国》，《解放》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

② 戴季陶在《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中写道：“‘过激派’这个名词，本来是日本那些因为怕‘布尔色维克’，便生了‘胆怯病’的人，制造出来的。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有害‘胆怯病’的人，也跟了用‘过激’两个字。这就是‘过激党’三个字发生的原因。”又据陈独秀言：“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③ 施存统口供，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④ 《周佛海致施存统》，1921年4月19日，同上书，第289页。

年有志”。[①] 戴季陶 1920 年 1 月致堺利彦恳请“赐教先生等倾尽热忱和精力而作的著作、杂志之目录”，“敬请惠借”先生译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伦理学》。[②] 这年年底，他收到了日本大镫阁出版社赠送的日文版《资本论》（高堺素之译，大镫阁 1920 年出版）后，写感谢信给出版社：称颂道：“贵译慎重严谨，更经著名学者校阅，使人未通读之前即觉值得相信。想我国青年能通日语而不易英法译书者，通读之后，亦可因此译本窥马克思主义学说之真谛。”[③]1920 年 6 月陈溥贤所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开始在《晨报》连载。该文是考茨基的著作，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读本。陈文是依据高畠素之的日文本翻译的，后来中文版以《马克斯经济学说》的书名出版。陈氏曾写信给高畠素之询问日文原文内空白部分应如何补正。根据施存统 1921 年 12 月在日本被捕后的口供，1920 年 12 月，李达曾经托他转交堺利彦的一封信，为翻译而问询堺利彦文章中的空字。1921 年 2 月施氏接到李汉俊的信，托请购买堺利彦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日文版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是卖文社的未公开出版物。[④] 由此可见，国内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日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及时掌握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新动态。

第四，先进的中国人运用从日本转引进的科学世界观，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鞭笞与对日本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热情评论，构成了传播的重要内容。五四运动是因日本抢占山东半岛而勃起，因此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看得很清楚，但对于它的帝国主义本质，以及中国内乱的主要原因仅仅是日本的强权还是帝国主义则需要新的世界观才能认识清楚。日本自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向外扩张成了它的基本国策，而中国、朝鲜首当其冲。但日本军国主义却极力鼓吹所谓中日亲善，制造出“大亚细亚主义”作为亲善理论。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揭露：“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日本为了独

① 《面递宫崎龙介先生》，1920 年 4 月 27 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45 页。

② 《戴季陶致堺利彦》，1920 年 1 月，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③ 《戴季陶致大镫阁出版社》，1920 年年底，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30 页。

④ 《施存统口供》，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70 页。

占中国，借用“大亚细亚主义”来挡欧美帝国主义的驾，是企图作亚洲盟主，“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因此“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①]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将山东出卖给日本，从而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指出：“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是没有觉悟。”他呼吁中国人民应该觉悟到这回外交失败，是英法各帝国主义国家硬用强权把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觉悟到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的，必须用强力拥护公理。就像俄国、德国那样，要社会党用强力将政府打倒。我们应该觉悟到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公理的仇敌。因此通过山东问题，我们“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②]李大钊鲜明指出，巴黎和会是一个分赃的会议，我们加以反对，“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③]“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④]“强盗阶级”、“强盗世界”当时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先进的中国人将帝国主义作为整体考量，得出山东问题是帝国主义的分赃结果，强盗阶级是世界与中国的乱源，世界与中国的问题根本解决，就是进行社会革命，推翻强盗世界。这个认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新觉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制定两步走的革命总战略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元素。

---

①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② 只眼（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③ 常：《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④ 同上。

战后，日本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潮。“抢米暴动”、“《朝日新闻》风潮”等事件连续出现，《星期评论》敏锐地看到，这些事件出现不是偶然的，体现了日本民族新觉醒。“‘抢米风潮’明明是为了米贵发生的，但是打的旗帜，并不是‘减轻米价’，却是‘打破军阀’、‘打破富豪’”。[①] 作为日本解放运动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东京大学教授发起的黎明会和学生发起的“新人会”。黎明会不是社会主义团体，但因有社会主义分子参加，使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陈独秀指出黎明会是“抱着‘反对军阀专制，资本家专制’的新思想”。[②] 李大钊热情地称颂黎明会“大张旗鼓的传布新时代的新思想，人称‘黎明运动’，是日本政治思想界的新曙光”。[③] 黎明会一班人，“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④]

黎明会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其成员的信仰不一，观点杂繁。在宣扬民主主义时，有的又凸显殖民主义的心态。福田德三在一次谈话中竟然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立即连续发表评论，指出“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我也劝黎明会中的真正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⑤] 福田现象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日本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有人主张在打破官僚政治，废除族级的差别，公认劳动团体的同时，主张革新殖民地的行政。李汉俊立即痛斥“‘革新殖民地的行政’一句话，不晓得作什么解。要主张解放，就是要彻底，‘殖民地’三个字，已经很不合道理，拿了这三个字做基本观念，无论怎么样革新，终是脱不了军国主义的旧套。我劝他们这些开口讲解放的人，把‘殖民地’三个字根本废除了罢。”[⑥] 日本还出现了一个“三益主义”，既鼓吹资本家、劳动者和消费者三者均得利益的主义，作为“免除”阶级斗争的办法就是作成阶级的互助。李汉俊讥讽道：“互助上面可以加上阶级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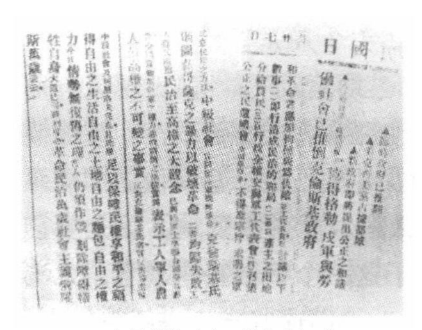
① I. C：《日本的“黎明会”和“新人会”》，《星期评论》第 2 号，1919 年 6 月 15 日。
② 独眼：《光明与黑暗》，《每周评论》第 8 号，1919 年 2 月 9 日。
③ T.C. 生：《黎明日本之曙光》，《每周评论》第 9 号，1919 年 2 月 16 日。
④ 常：《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 12 号，1919 年 3 月 9 日。
⑤ 守常：《忠告黎明会》，《每周评论》第 30 号，1919 年 7 月 13 日。
⑥ 先进（李汉俊）：《日本的新运动》，《星期评论》第 11 号，1919 年 8 月 17 日。

字，天下有这样好的互助方法，恐怕太阳要从西方出来呢？”[①]

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均是通过日本渠道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他们将从老师那儿学到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老师的所在国，其目的是教育中国人民不仅要看清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的本质，也要看到日本解放新运动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落脚点是要中国人民从日本解放运动中吸取斗争的力量。此外，媒体上许多社会主义的术语也是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如政治、阶级、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等等。

二、苏俄渠道

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并且形成社会运动，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兴起的，因此，了解俄国革命与苏俄建设的情况就成了传播的重要内容。但先进的中国人通过苏俄渠道了解马克思主义却要晚于日本渠道，主要是北京政府刻意封锁，苏俄内战造成远东的交通堵塞，以及国内懂俄语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中国媒体对十月革命的报道

苏俄渠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分成两个阶段。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到 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准确地讲应该是苏俄渠道的前史，是先进的中国人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必然趋势而无组织、无领导、自觉地宣传俄国革命与苏俄情况的阶段。传播主要手段是媒体。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鲜活的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成了先进中国人救亡之路的新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模式从怀疑到彻底失望，十月革命的成功则使他们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先进的媒体人首先从职业的敏感性朦胧中看到一个新的世纪，特作为世界大事加以持续性报道。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首都爆发了革命，11 月 9 日《申报》刊登了 7

① 先进:《三益主义》,《星期评论》第 41 号“短评”, 1920 年 3 月 14 日。

日伦敦电的短讯。10 日各大报纷纷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上海《民国日报》）、《俄人弃绝克安司吉政府》（《晨报》）、《俄临时政府颠覆矣》（《盛京时报》）等标题作报道。11 月 12 日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俄京革命时状况》、《俄京纷扰之现状》。媒体对俄国革命党与领袖称谓也各行其是，如对布尔什维克称“暴烈党”、“极端派”、“过激派”、“激进党”等，将列宁译为“里林”、“黎雷氏”、“李宁”等，11 月 16 日《盛京时报》东京专电，始用“列宁”的译名。《太平洋》第 1 卷第 8 号（1917 年 11 月）是首家刊登十月革命情况的杂志。

十月革命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1918 年 7 月《言治》季刊发表了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 月《新青年》发表了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这些文章从世界趋势的角度，指出俄国革命开辟了人类新纪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初从理性上认识到十月革命代表世界潮流是通过日本渠道提升的。1919 年 9 月 5—7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之潮流》译文，指出十月革命引发的各国人民的斗争，展示了“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一方面，正在突飞猛进，已经成了大势”。由此中文翻译者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决不在世界之外，中国迎头赶上世界的捷径就是以俄为师。

《晨报》1919 年 3 月 1 日发表《俄罗斯研究》，指出：“这回俄罗斯革命，总算二十世纪一桩大事。那些过激派的举动，究竟是祸是福，总应该大家细细的研究，要是过激派的主义果然有些真理，我们可以采纳一二；要是过激派的主义毫无道理，我们亦可辩驳一二，这种责任差不多全负在新闻记者身上。不幸我国的报章，对于国外新闻，大概都取材于路透电、日本报纸、上海英文报及数家通信社，其中以翻译日本报纸为拿手好戏。列位想想，这素抱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口中的过激派，已非真正的过激派，我们根据这种消息断定过激派的主义行为，未免牛头不对马嘴了。”[①] 为了让中国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苏俄，进步媒体想尽办法获取苏俄的消息在报刊上刊登。4 月 10—26 日《晨报》登载了长达两万字的报道《劳农政府治下之

---

① 若愚（王光祈）：《俄罗斯研究》，《晨报》，1919 年 3 月 1 日。

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两天以后，即 12 日上海《民国日报》开始转载）。文章介绍了苏俄的“教育方针”、“土地国有”、“行政组织”、“选举法”、“宣传运动”、“产业政策”、“失业保险”、“财政状态”、“军事组织”、“男女平权”、“银行国有”、“犹太人天下”、“布尔塞维克主义”等 13 个方面。尽管文章有些观点不尽全面，“犹太人天下”也不是事实，但整体上看，作者是同情与赞美苏俄的，像这样长篇幅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多角度客观报道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情况，在媒体上尚属首次。在此前后，《晨报》副刊发表了《俄国式革命的由来》、《地底的俄罗斯》（Stcpniack 作，可叔译）、《俄国革命史》（美国塞克作，志希译）等介绍俄国革命历史。

这个阶段的高潮是“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笔者注：当时有的报刊称之为“通告”）在国内公布。1919 年 7 月 25 日苏俄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秘密条约。9 月，国内已有刊物报道了这件事情，但过于简单。1920 年 3 月 27 日《申报》第 6 版，刊登海参葳消息，披露了宣言的主要内容。31 日《上海俄文生活报》以《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的标题全文刊出，因是俄文不为中国读者所了解。第二天（4 月 1 日），《政衡》月刊第 1 卷第 2 号将该宣言译成中文发表。4 月 11 日，《星期评论》（第 45 号）也刊登了这份文件，《新青年》及时转载。

苏俄政府给中国人民的宣言像春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对于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知道苏俄政府主动取消沙俄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是何等的振奋。4 月 11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电致苏俄政府：“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我们实在是钦佩得很，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激。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①] 有人撰文指出劳农政府单方面废除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的条约不仅

① 张冥飞编：《劳农政府与中国》，新文化共进社 1920 年版，第 144—145 页。

是对中国一国，而是体现列宁领导的新政府的宪法精神，“他们的宪法精神，是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是人道正义的精神，就是要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因此“自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国民所时时注意的，无非对日问题。但是对日问题，决不是专对日本政府所能完全解决的。从今以后，应该把注意点移在对俄问题上面。对俄问题，决不仅是对一国的问题，是对世界的问题。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侵略主义和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种种冲突，究竟怎样解决？都和各国对俄国的态度有关系，我愿全国舆论界、学生界、工业界以及其他国民，都大家起来研究”。[①] 山鸣谷应，《新青年》、《星期评论》、《申报》、《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救国日报》等报刊热烈欢迎这个“历史上空前的消息”。

一些报刊也将苏俄革命与建设作为报道重点。《新青年》第6号第4号（1919年4月15日）发表了《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上下。《每周评论》从第28号（1919年7月）开始，登载了俄国的土地法、新宪法、婚姻制度、新银行法。《国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刊登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Henry C.Emery著，周炳琳译）。《新潮》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孟真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7月刊登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等。《解放与改造》在创刊号（1919年9月1日）发表了列宁著的《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今译《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刊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星期评论》除发苏俄的消息外，与其他报刊不同处在于刊登了长篇评论，如《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第15号，1919年9月14日）、《谢米诺夫与张作霖》（第16号，1919年9月21日）、《联合国对俄政策的变动》（第17号，1919年9月28日）、《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华政策》（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虽然“俄国的事，报纸上的记载，各持一说，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形，几乎使我们看报的人坠在五里雾中”，[②] 但《星期评论》的媒体人肩负时代使命，通过评论力求透过“五里雾”，指出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苏俄是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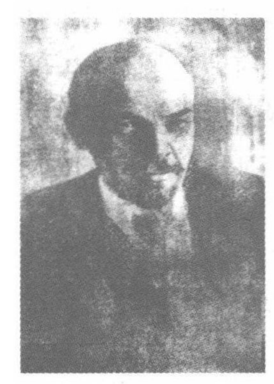
---

① 仲九：《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② 季陶：《俄国两个政府的对华政策》，《星期评论》第15号，1919年9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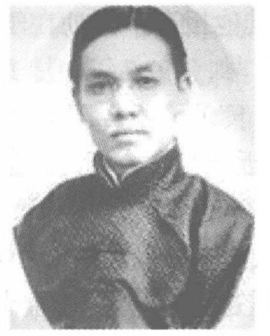
民的朋友。中俄是关系很密切的邻国，俄国发生亘古未有的大变动，我们“总非刻刻留心研究不可”。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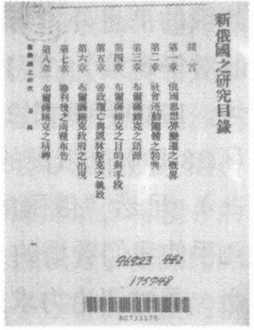
在这波宣传、学习苏俄热潮中，专门介绍苏俄情况的书籍也应运而生，《劳农政府与中国》与《新俄国之研究》是最早反映苏俄的图书。《劳农政府与中国》1920年6月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9月泰东图书局出版，张冥飞辑译。全书共172页，12小节：总论、俄国革命与劳农政府、全俄扰乱和劳农政府出现、劳农政府的由来和经过、劳农政府的宪法、劳农政府的新法令、劳农政府的教育、劳农政府的旁观者之审查、劳农政府与各国、劳农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总论、附录：列宁的手段与奋斗的精神、列宁的谈话、协约国与俄国消费协力社、俄现象杂记。该书可能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底本不得而知，书中有些按语式的部分表明辑译者的看法。书内记载了不少苏俄政府的法令、法规和布告，成为一个亮点。



▲《劳农政府与中国》封面，1920年6月汉口出版

《新俄国之研究》是著名报人邵飘萍编著，日本东瀛编译社（大阪南区）于1920年8月出版，中国泰东图书局发行。全书共140页，总论、绪论与24章：俄国思想界变迁之概略、社会运动团体之勃兴、布尔萨维克之语源、布尔萨维克之目的与手段、帝政覆亡与凯林斯克之执政、布尔萨维克政府之出现、胜利后之两种布告、布尔萨维克之精神、劳农政府之组织（上）、（下）、劳农政府之经济设施（上）、（下）、劳农政府之军队编制、劳农政府之教育事业（上）、（下）、劳农政府施政之成绩、各国驻兵与撤兵、俄国旧党失败之因果、劳农政府之外交、通商欤？承认欤？通商而又承认





新俄國之研究目錄

緒言

第一章 俄國思想界變遷之概略

第二章 社會運動團體之勃興

第三章 布爾薩維克之語源

第四章 布爾薩維克之目的與手段

第五章 帝政覆亡與凱林斯克之執政

第六章 布爾薩維克政府之出現

第七章 勝利後之兩種布告

第八章 布爾薩維克之精神

▲邵飘萍（1884—1926）与《新俄国之研究》目录

①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之滑稽、俄国社会之最近情形、列宁评传、却罗斯克评传、余论、附录。附录有四：美国派使勃烈之报告（William C.Bullitt）、列宁与《纽约世界报》特派员林康阿耶谈话、远东共和国宣言书与国民议会宣言书、俄国劳农政府之农业政策。书中的主要资料来自日文，绪言、余论为编著者写。编著者对苏俄充满了敬意："俄国今日所实行之社会主义，非独在俄国之政治与社会中为空前之创举，实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今后果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为尤著。然则为我国朝野无论在外交上有研究俄事之必要，而对此世界空前之奇剧，生活于此世界中之国民，胥不可不具正确之理解，又岂待言。"[①] 这个阶段从总体上讲，我国媒体上的消息基本上是转载西方、日本的媒体、通讯社的消息为主，这些报道、评论多半攻击俄国革命，将其视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

苏俄渠道的第二阶段，是以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为肇端。这个阶段的传播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传播工作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与中共早期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的进行，苏俄渠道渐渐取代日本渠道，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二是以宣传列宁思想和苏俄革命与建设为主要内容。三是传播的语种由日文为主变成以英文、俄文为主。四是由单纯的宣传转换为宣传与革命运动相结合。

这个渠道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其在华机构。他（它）们的活动大多数与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重叠在一起。主要是办刊物、出版图书、印刷宣传品等，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外国语学校等。这方面的具体内容请见本书第四章。

事实上，苏俄渠道要比以上叙述复杂得多，苏俄与共产国际一向高度重视对国外的宣传，苏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曾派人到欧美、东方各国，通过资助或创办左翼刊物、通讯社、出版机构等，曲线输入苏俄领导人的著作，发布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消息等。在魏金斯基来华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就派遣人员在上海等地活动，主要依靠俄侨中倾向苏俄的人士，通过"俄国民主俱乐部"、"俄侨事务局"和"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等俄侨团体和组织，以及它们的负责人协助

① 邵飘萍：《绪言》，《新俄国之研究》，东瀛编译社1920年版，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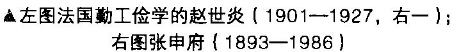
工作。其中霍多洛夫、李泽洛维奇、阿嘎廖夫、波达波夫等是比较重要与活跃的人物，他们与中国革命者发生直接联系，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著作、苏俄革命等。[①]他们的活动为魏金斯基来华起到了铺路作用，其中有些人后来还协助魏金斯基一行工作。

三、欧洲渠道

五四运动后期，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赴欧勤工俭学的热潮。运动的发起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张申府、陈公培、周恩来等少数青年赴欧前已经倾向共产主义。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等青年，则是到欧洲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与实践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们办的《少年》等印刷品，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译文。蔡和森等向国内报刊投稿，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通信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左图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1901—1927，右一）；
右图张申府（1893—1986）



▲张申府（左一）、周恩来，右二）、刘清扬（1894—1977，左二）、赵光宸（1902—1965，右一），摄于法国

四、美国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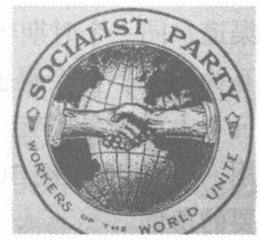
这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提出来的，主要依据：首先，《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和李大钊等翻译的苏俄情况、列宁等苏俄领导人的文章与书籍不少来源于美国的出版物。如《共产党》月刊翻译列

---

① 这方面情况，李丹阳发表的《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波波夫）》，《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和《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6期等文章。笔者撰写这部分与下面的美国渠道时，曾向李丹阳询问，承她慷慨地将《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修改稿寄来，并作若干提示，特此感谢。

宁的《国家与革命》，是转译美国社会主义期刊《阶级斗争》；《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刊于《共产党》第 2 号）译自美国《The Communist》；《加入第三国际大会》（刊于《共产党》第 2 号），译自美国的综合性期刊《The Nation》等。石川特别留意芝加哥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查尔斯·H. 克尔（Charles H. Kerr）出版社。其次，1920 年 9 月《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改版的封面图案，模仿的是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党徽。最后，魏金斯基早年曾加入美国社会党，1920 年下半年中共早期组织译成中文的有关苏俄出版物是从美国进口的，它们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要么是他帮助订购的。[①] 笔者查阅《新青年》从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起开辟的“俄罗斯研究”，就有大量译自纽约《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周刊上的文章，仅第 3 号到第 5 号三期就翻译了该刊 13 篇文章，以致曾担任《新青年》编辑的胡适惊呼：“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②]





▲上图《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封面，1920 年 8 月；下图美国社会党党徽（石川祯浩提供）

有学者指出：当时苏俄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曾派人带着大量俄国金卢布、珠宝到欧美、中国等一些地区与国家资助乃至创办左翼刊物、通讯社、出版机构等从事宣传。在纽约出版的《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就是苏俄驻外机构创办的刊物，也是美国社会党支持的。通过欧美渠道、利用表面上非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向中国曲线输入布尔什维克文献，是布尔什维克在宣传上的一种运作方式。所以，所谓的美国渠道，除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外，与苏俄渠道亦有密切的关系。[③]

---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二章：“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②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10 页。

③ 《李丹阳致笔者》，2010 年 4 月 3 日。以上内容在《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 年 6 期等文中有所论述。

此外，从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渠道的存在。河上肇称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英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们多半来自美国，如“Pocket Library of Socialism”第7册，是美国芝加哥发行。“Arm and hammer series”之一，系1902年纽约发行。另外，李大钊在1921年写的《俄罗斯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列出列宁的英文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等著作，是来自纽约共产党印书社、纽约 Rand School 印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渠道是多元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渠道，同一个时期各个渠道的作用亦不易孤立的认识，它们往往交叉配合，互为补充；每个渠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例如日本主渠道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后，被苏俄渠道所取代，但它依然在发挥作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史、社会性质论战中，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是一个因果关系，又是相互促进关系。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在传播中又改造了自己，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创立从组织上作了准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人员帮助与经费的援助下，专门成立了宣传机构，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从而在思想上武装了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着力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剖国情，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这种文化转场还只是初步、幼稚、粗糙的，甚至有照搬照抄现象，有些还属于误读，但他们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精神与学风，代表了五四时期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为中华民族复兴探索真理的勇气为后世作出了表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原因至今仍是海内外史学界争鸣的一个热点。争鸣的焦点是：中共的创立究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与矛盾剧烈运动、冲撞的结果（即所谓的“内因决定说”），还是第三国际切入的

产物（即所谓的“外因决定说”）。[①] 中国大陆学者多半取第一说，一些海外学者则认同后一说。大家将争鸣又聚焦在 1920 年 2 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没有来华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简称“建党说”）的案例上，将中共建党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如果“建党说”存在那么第一说就成立，反之“外因决定说”是正确的。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其力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质疑“建党说”两点：一是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认为中共建党这样重要的大事，仅凭一个人的回忆，而没有其他文献资料佐证就作结论是轻率的。二是这个说法来自高一涵。高是李大钊的朋友，最早出自他 1927 年 5 月 22 日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李大钊大会上的演讲。石氏指出高一涵并不是亲历者，当时他远在日本，因此“建党说”是道听途说，不可信。[②]





▲高一涵（1885—1968）





▲ 1927 年 5 月 24 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李大钊大会上演讲，首次提到“南陈北李相邀建党”一说

国内学者也花了不少工夫加以论证，萧超然先生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百年潮》2001 年第 7 期）一文中，他指出这个问题是“关乎中共创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章对这个说法的来历以及“建党说”为什么被历史湮灭等进行了深入考察。令人遗憾的是，萧先生用大量篇幅论证的是“南陈北李”的真实性，而对陈李相约建党并没有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南陈北李”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并不是一回事。

---

① 所谓外因论主要指共产国际派来代表，从组织上直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而非仅仅指思想上的指导。

②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9—91 页。

为什么一定要将党的创立成因纠缠在“建党说”上呢？即便它存在也只是为“内因决定说”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没有也无法否定中共创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五四时期的必然产物这个历史事实，正如1921年7—8月举行中共一大的时间有其偶然性，但中共一大迟早必定会举行的那样，因此这件事并非“至关重要”。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其置入近代中国救亡运动作动态、立体的考察，就不难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答案。

一、从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发展轨迹看，在中国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知识群体的必然选择

19世纪40年代，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被英国的大炮与鸦片所轰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为此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振兴浪潮。

短短80年，潮起潮落，几乎所有西方的现代政治思潮都在中国演绎过，西方政治制度中“好”的东西都在中国实验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村、工读互助为标志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爱国热潮一浪涌过一浪。结果，中华民族危难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失望，抛弃了“以西方为师”的道路。

十月革命与因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促成了先进中国人的新觉醒。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推求，终于认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既然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救亡振兴的必由之路，而且无产阶级通过五四运动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那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事情就迟早会发生，不管有无外来政治势力的因素。

二、从中国早期政党史看，创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党发展到五四时期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政党在中国是随着西方政治理念移植而出现的政治概念与政治组织。中国早期政党史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政党往往是由社团演变而成的，而与此相关的社团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近代意义的社团最初出现在晚清，主要目的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知识分子目睹国势日衰，建立社团，期以合群之力，开风气与民智，以复兴国家。中国同盟会最典型。孙中山在1894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0年后他产生“纠集同志，合

成大团”[①]的思想。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在与华兴会、光复会领袖会谈时，强调革命必须要合成大团与主义。合成大团是革命的中坚，主义是大团的灵魂和方向。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实行大联合，组建了中国同盟会。迄今人们强调的是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却被人们忽略了。然而90年前，冯自由——一个中国同盟会很重要的成员却说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他在五四运动后不久撰写的《社会主义与中国》里指出，在中国率先提倡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中国政治团体首先拿社会主义做他的党纲，“同盟会就是嚆矢”。[②]孙中山不仅公开宣称“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③]而且还于1905年比利时之旅时，造访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笔者注：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要求参加社会党。[④]1918年夏，他主动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电，热情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⑤]这个对俄国革命欢迎的鲜明立场，比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还要早近半年，表明孙氏是中国最早欢迎苏俄革命的政治家。孙中山晚年更是执行联俄外交战略。1924年2月24日，孙氏在悼念列宁的演说中说：“你给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底道路，我愿意走着你的路，虽然我的敌人要反对我，但我的人民将因此而尊敬我。”[⑥]同年10月9日，他在致蒋介石私人函中表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⑦]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以英文口授的《致苏联遗书》表达了这位伟人对苏联最后之敬意：“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

---

① 尚明轩：《一代天骄 孙中山的历程》（增订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②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3月印刷，第4页。

③ 孙中山：《应在中国广为鼓吹社会主义》，《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④ 《孙中山致陈楚楠》，1905年7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5页。

⑤ 《孙中山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页。

⑥ 孙中山：《追悼列宁的演说》，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

⑦ 《孙中山致蒋中正》，《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

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①] 孙中山这种鲜明的政治观点，是他一贯政治立场的表露。早在中国国民党成立前后，聚集在他身边的激进骨干分子，如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一度热衷宣扬马克思主义（笔者注：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叠），有的还参与了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系统吸收列宁的建党原则、经验与孙氏“以俄为师”的立场不无关系。[②]



▲蒋介石（后排左一）与戴季陶（后排右一）、中间朱执信等，摄于1919年上海（台北“国史馆”提供）

虽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性质、改造中国的手段与终极目标等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但振兴中华的深层动因，以及政党组织的一般元素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③] 邵力子、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中嬗变出来的，所以他们对建立政党并不陌生。从形式上讲，他们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转换成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没有多大障碍，当他们的世界观实现伟大转变后，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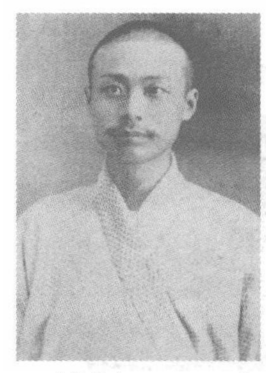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新式学校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李达、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周恩来等是杰出的代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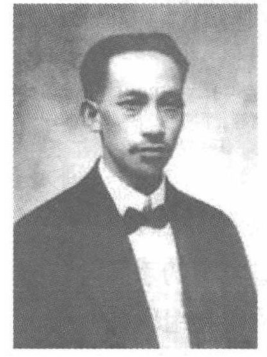
① 孙中山：《致苏联遗书》，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1页。

② 关于孙中山与社会主义，近来有些学者进行了探索。姜义华的《重新审视孙中山俄国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田子渝的《浅议独具中国特色的孙氏（中山）社会主义》，《孙中山研究》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民报〉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2011）论文。

③ 李汉俊不仅因二哥李书城是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与孙中山的革命党有关系，而且他本人于1912年在南京曾参加过国民党。



▲林伯渠（1886—1960）



▲吴玉章（1878—1966）

他们几乎都是在新文化运动集结号中，以社团（笔者注：或者杂志社，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形成纽带而聚集起来的激进青年，成立团体在先进知识青年中蔚然成风，各种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团体名称虽然各异，主义、信仰、宗旨也是五花八门，甚至相左，但“集合同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初创团体时就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小团体向大联合发展，大联合又组织政党的思想在某些团体胚芽时便已发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五四人那里，有人就是将团体与政党视为一件事。S. C（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①]中的团体对应的英文就是“Party”。他在1919年2月撰写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②]与《大联合》[③]（12月28日）里表示：“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鉴于团体与“Party”连在一起，因此李氏的大联合新组织的思想包孕着建党的意思。恽代英在1917年成立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一个爱国小团体互助社，随着爱国运动的向前发展，他提出了要做改造中国的大事，就“不可不先结一个死党”。[④]1920年4月在讨论少年中国发展前途时，他提出要建立像少年意大利党那样的组织来救中华民国。不久他和邓中夏等少年中国学会左翼成员，就明确主张学会应该成为“波歇维式的团体”（笔者注：即列宁式的党）。[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他与林育南等人于1921年7月自主地成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性质的团体共存社。比互助社稍晚成立的新民学会灵魂人物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影响

---

① 《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② 《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③ 《新生活》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
④ 代英：《未来之梦》，《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⑤ 《代英致钟健》1921年11月，《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92页。

了一批湖湘青年。以后，他与蔡和森讨论学会发展方针时，蔡氏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使之成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1]

以上这些思想与活动，说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前，中国部分激进青年正顺着激进团体—“死党”—无产阶级政党的轨迹发展。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看，在1920—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与五四时期同步，五四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传播，具有指标意义的是1919年5月《新青年》与《晨报》分别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与“马克思研究”专栏，接着上海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广东中华新报》等跟进，南北呼应，使马克思主义春潮在神州大地荡漾开来。在初期传播中，媒体特别注重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仅对《晨报》、《民国日报》1919年5—8月的统计，有关报道、文章就有《劳农政治之下俄国》、《三鼎力之德社会党》、《德国各党与其领袖》、《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德国社会党之历史谈》、《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等10余篇。这些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社会党的历史发展，厘清了社会党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与过激派（笔者注：指列宁的共产党）的区别。《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6月19日）、《社会主义的目的》（1919年6月19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1919年6月20日至7月3日）是李达撰写的。[2]《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1919年8月



▲詹大悲（1887—1927）


民國日報

▲詹大悲、李汉俊译文《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8月28日

[1]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50页。

[2] 不清楚的原因，此文没有收入1980年出版的《李达文集》第1卷中。

23—30 日）是李汉俊与（詹）大悲合作翻译的。

这些文章非常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在各种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只有列宁的党和德国的斯巴达克斯团（Spartacus League，亦译斯巴达克斯同盟）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派，他们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专制，建立第四阶级的"独裁"政治（笔者注：即无产阶级专政）。正统派、修正派想通过议会斗争进入社会主义与英美的资产阶级一样，宣扬的所谓德谟克拉西是虚伪的，只有过激派是以劳动者为中心，是"彻底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①]俄国的革命派原本也是改良的，但沙俄政府残酷的镇压才使革命党人"觉悟了非用急激手段不能"[②]推翻专制政府。要革命就要有革命党来领导，俄国革命之所以胜利，苏俄之所以在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中挺立，就是因为有列宁领导的俄共坚强领导。因此，传播者们在主张效法"俄罗斯新文明"时，提出在中国建立列宁式的党应该是其思想逻辑的必然，体现了他们振兴中华的政治自觉。

与之相呼应的就是以六三罢工为标志，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号召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且主动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自身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1920 年 2 月，陈独秀在武汉组织当地的进步青年到工厂进行社会调查，随后他们写了《汉口苦力状况》、《武昌五局工人的状况》在《新青年》上发表。4 月 2 日，陈独秀、李汉俊等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③]16 天后（4 月 18 日），陈氏又出席了上海中华工业协会等 7 个工界团体代表举行的联席会议，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派人到北京长辛店、丰台、唐山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便呼之欲出了。

据笔者看到的资料所及，李汉俊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人。1919 年 9 月 5—7 日，他与"大悲"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

① 大悲等：《从虚伪的德谟克拉西到真正的德谟克拉西》，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 年 8 月 23 日。该文是日本著名经济学者福田德三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大阪每日新闻演讲会上作的演说，刊登在《大阪每日新闻》1919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3 日。

② 鹤（李达）：《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 年 6 月 21 日。

③ 《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 年 4 月 5 日。

节译了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简称《方向》）一文，在“译后短语”中写道，面对这个新世界潮流，“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他宣布自己是“平民、民众、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①] 这条史料意义非同小可，说明在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前6个月就有中国人公开提出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



▲山川菊荣（1890—1980）
（石川祯浩提供）

这条史料披露后，有学者以“民党”通常只是指中国国民党而提出质疑。[②] 这个质疑缺乏说服力，因为：首先，对李汉俊的话语诠释不能脱离语境。山川菊荣的《方向》一文是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在文中她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指出十月革命成为人类社会的分水岭，“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觉悟的无产阶级在俄国已占支配者的地位，革命知识分子的新思想与劳工运动的“两种激流”相结合，作“永续的运动”，已成为世界思潮之方向。文中的“新思想”在这个特定的语境里，当指马克思主义无疑。李汉俊建立“民党”、“革命党”的打算是由此而发的。其次，众所周知，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919年10月10日，译后语的时间是1919年9月7日。此时中国国民党并没有成立。再次，“民党”也绝不



民國日報

覺悟

商業實用全書

▲《世界思潮之方向》“译后短言”，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9月7日

---

① 大悲、汉俊：“译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9月7日。

② 叶累（任武雄）：《最早提出建党思想的是李汉俊吗？》，《上海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

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专用名词，只要翻阅一下 1917 年 10 月至 1919 年年初上海的报纸，不难发现所谓“民党”还有指德国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的。[①] 此外亦有共产党人称共产党为“革命党”的。[②] 最后，从李汉俊后来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来印证，他所说的“民党”、“革命党”当指无产阶级政党无疑。

还有两份史料可以佐证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已经出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议论。第一份是 1919 年 2 月，“若愚”（笔者注：王光祈的笔名）在《每周评论》发表《国际的革命》[③] 一文，高度赞扬“国际社会党”后说：我们中国人“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及我们中国的国际社会党，先将这国际的强权推倒，这就是我主张国际革命的意思”。

▲曾琦（1892—1951）

另一份是 1919 年 8 月 25 日，少年中国学会骨干曾琦离开上海赴法国之前，写了《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④] 希望学会成为“最纯洁最坚实的团体”，而并非如像“荒谬绝伦的一班人所谓‘特殊势力’，不过愿为国中无数青年之‘前驱’或‘先锋队’而已。”

所谓的“先锋队”的“特殊势力”，曾琦虽然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无产阶级政党。因为：首先，这个“先锋队”与无数青年联系在一起，当不是指与北京政府有关的政党（笔者注：当年报刊有“段党”的提法）与研究系等。其次，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先锋队”之称谓。如上面引用蔡和森致毛泽东的信，就清清楚楚说明他主张在中国建立先锋队——共产党。再如 1921 年 6 月出版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

① 《民国日报》1918 年 11 月 18 日《革命告成中之德国》，报道德国独立社会党内欲组织新民党（指斯巴达克斯团欲脱离独立社会党一事）发表宣言书、1918 年 12 月 2 日《日本民党之活动》。姑且不论报道中所指“民党”的性质，至少说明“民党”并非国民党专用名词。此外在光绪年间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一书中，就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称为“德国民党”。《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 页。

② CT（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有“我们革命党”一句，《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③ 《每周评论》第 10 号，1919 年 2 月 23 日。

④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9 月 15 日。

机关。”“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最后，曾琦后来创立青年党（国家主义派）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印证了曾氏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以贯之的。这份材料从另一方面证明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国内就有“一班人”在议论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问题。

李汉俊的打算不是偶然的，展现了历史大趋势。戴季陶在1920年元旦发表的《民国九年的工作》很明确指出这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劳动者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1月29日，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劳动团体与政党》指出，“劳动者应该尽国民监督政治的天职，劳动团体也可以有政治的活动，但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①]同年7月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里开会，讨论新民学会的方针与方法时，蔡和森明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国）。”[②]8月13日、9月16日，他两次致函毛泽东，更是“明目张胆”地主张在中国“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③]蔡氏以上主张，是迄今中文资料中第一个最明确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史料。虽然他的主张发生在魏金斯基来华之后，甚至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之后，但没有资料显示，蔡氏的主张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系，反而有史料证明他的想法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无关，[④]这是他在法国“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之后，独立思考的结果。











▲ 邓中夏（1894—1933）　▲高君宇（1896—1925）　▲罗章龙（1896—1995）　▲ 张国焘（1897—1979）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29日。

② 《萧旭东给毛泽东》，1920年8月初，《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1页。

③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④ 蔡氏1920年8月、9月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主张成立共产党，毛氏于1921年1月21日回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说明此前蔡氏对国内建党之事一无所知。

以上主张在中国建立“革命党”、“民党”、“大同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魏金斯基“使华”没有直接联系的言论白纸黑字地印在印刷品上，谁也无法否定。

不管“南陈北李相邀建党”之说是否成立，[①] 事实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使者来华前后，筹建党的活动已经展开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研究会不仅是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而且是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胚胎，其主要成员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后来均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抵达上海，初住在惠中旅舍、亚东图书馆，4月迁居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出版地亦由北京迁到上海，编辑部就设在渔阳里陈宅。有趣的是，李汉俊、邵力子、戴季陶、沈玄庐等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激进分子均住在附近。[②] 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其中建党是重要议题之一。

4月，魏金斯基[③] 专程到上海，与陈独秀等联系。同行者还有魏氏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即金万谦）等人。[④] 魏金斯基的使命之一，就是促进中国共产党的组建。首先他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星期评论社负责人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等接触，就中国革命及建党等问题进行讨论。他在华的最初活动有了档案资料，主要



▲魏金斯基（1893—1953）

① 任武雄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依据对一些当事人回忆的分析，认为陈李谈的并非建党，而是酝酿社会主义同盟的问题。

② 戴季陶住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与陈独秀寓所相距仅百米左右，魏金斯基来华后，由陈独秀、杨明斋租赁下来，办起“外国语学社”，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祥地。李汉俊住在白尔路（今分为三段，北段为太仓路，中间一段为顺昌路，南段为自忠路）三益里17号，离老渔阳里大约一站路。邵力子亦住在三益里。

③ 事实上在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前，俄共（布）、第三国际均已派人在旅俄华人中和中国展开活动，但学界公认正式代表始于魏金斯基。共产国际与俄共对华工作分有不同的系统，错综复杂，即使是一个单位名称亦有变化，对此我国学者李玉贞、黄修荣、杨奎松、李丹阳，以及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均有研究，具体情况请见本书第四章。

④ 根据俄国解密前苏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说明魏金斯基同行者为以上三人，此外马马耶夫、斯托杨诺维奇、旅俄华侨杨明斋先后加入使团。

有：1920年6月9日魏金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信、8月17日给刚成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以及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9月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与报告，使我们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筹备过程的了解有了文字依据。



▲金万谦（1886—1938）
（郑斗音提供）

从组织方面讲，共产国际最主要的成绩就是成立了革命局（亦译“革命委员会”）。从魏金斯基1920年8月17日的信获知，此前成立了上海革命局、北京革命局，拟建立广州革命局和汉口革命局。上海革命局工作卓有成效，最早成员有魏金斯基、陈独秀、李汉俊等5人，但它的性质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却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①

在革命局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正式展开。从有关材料来分析，中共的早期筹备工作存在两条线：一条是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积极筹建；一条是共产国际（通过驻华代表）的活动。这两条线时有重叠，多数情况是分开的。



▲俞秀松（1899—1939）

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② 为上海早期党组织诞生作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6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就在陈独秀的寓所宣告诞生。以往学界将它成立的时间定在8月，然而由于俞秀松日记的发现，建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

① 关于“革命局”的性质，以及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讨论。代表性观点有四种：一种认为革命局就是中共早期组织。黄修荣、杨奎松、日本学者石川祯浩、韩国学者徐相文均持此观点。金利人断然否定以上观点，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田子渝认为上海“革命局”是魏金斯基主导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各有各的性质，不能等同。李丹阳、刘建一则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它的分支机构。

② 有学者认为上海成立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任武雄：《中共创建史上若干问题的探索》，《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三联书店2002年版。



▲俞秀松在《星期评论》社致家里人的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月。确定6月的根据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第一批成员5人的行踪。这5个人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就是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的时间必须是这5个人都在上海。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行踪有案可寻，这一年基本在上海，陈公培是第二年4月到达欧洲的，这样施存统去日本的时间就成了判断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间的关键。施存统自己回忆，他是1920年6月20日离开上海去东京的。[①] 俞秀松日记记载1920年6月19日“存统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②] 这个时间与施氏回忆的时间是吻合的（笔者注：通常有这样的情况，轮船清晨起锚，乘客前天晚上就上船），因而可以确定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于6月19日以前。

关于党的名称，最初有“共产党”、“社会党”、“社会共产党”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施存统的回忆。[③] 第二种说法来自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曾数次称“吾党”为“社会党”。第三种说法来自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日记：“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④] 张申府1979年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⑤]

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原因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共产国际这一条线。俄共（布）与共产国际最初在中国与各方面联系，寻找依靠的力

---

①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85页。

② 《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月—7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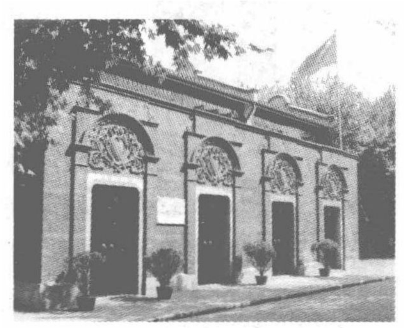
③ 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6页。

④ 《俞秀松烈士日记》，1920年6月—7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⑤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量；国内曾经短暂出现过一些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党”，有的与共产国际发生过关系。[①]魏金斯基来华后，才确定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这样陈独秀等的建党活动与共产国际代表便发生了直接的关系。1920年5月，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设立了中国科，其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学生组织、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7月4日，他们举行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近期工作是“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②]7月19日，在魏金斯基的主导下，“中国积极分子”会议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具有统战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次会议在后来被认为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准备。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组织很快扩大，计有先前的5位外，又有沈玄庐、陈望道、杨明斋、邵力子、李达、袁振英、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等。陈独秀为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后，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书记。11月7日在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以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为标志。





▲上图中共一大会议旧址；下图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继续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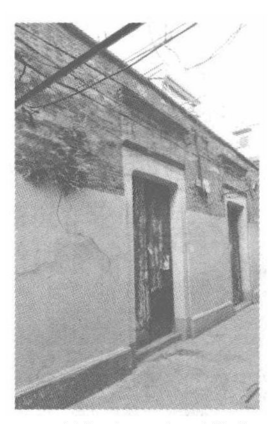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问世后，北京、武汉、广州、湖南、济南、日本、法国等地相继成立了性质相同的组织，继而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随之诞生。1921年7月23日至8

① 1919年6月到1921年之间，中国出现过“无政府共产党”、“大同党”（“共产党”）之类的名称，一则史料奇缺无法考证它们的来龙去脉；二则有的有名无实，有的昙花一现；三则其成员不是无政府主义，就是国民党系统的人，与中国共产党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不在本节的视野之内。

② 《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社1997年版，第41页。

月初，来自上海、北京、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代表，代表50多名党员聚集上海一嘉兴南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参加并指导了大会。

第二节　传播机构、杂志、重要著作



▲又新印刷厂旧址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第7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中共地方早期组织成立后，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

一、成立专门宣传机构

中共早期地方组织有些方面是与“革命局”联合办公的。“革命局”专门成立出版部、宣传报道部，从事宣传工作。“革命局”将“群益书店”作为团结社会主义团体的核心组织，[①]并出资成立了又新印刷厂，厂址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第7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1921年7—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机关，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至此党的宣传工作有了专门机构和专职干部。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传播，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一，成立出版机构。新青年社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个发行机构，成立于1920年8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刊登的《本志特别启事》，[②]宣布“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编辑部在老渔阳里2号，即陈独秀寓所，在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设立总经售处。

① “群益书店”来自魏金斯基的报告，疑指群益书社。群益书社创办于1901年，是《新青年》的出版商，地址在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由新青年社发行，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群益书社于1951年关闭。黄修荣认为“群益书店”显然是魏金斯基代指新青年社，见黄氏著《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② 《新青年》第8卷第1号封底，1920年9月1日。

新青年社除发行《新青年》、《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外，还出版“新青年”丛书，其中《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共产主义 ABC》、《劳动运动史》、《社会主义讨论集》，以及重印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我国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书与《共产党宣言》一起造就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主张，中共中央于 1921 年 9 月 1 日成立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①] 社址为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今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即李达的寓所。人民出版社的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定者袪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②] 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

第二，办社团。最响亮的社团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产生在北京大学。成立的时间有待考证，[③] 有学者考证 1918 年岁末北京大学便成立“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苏俄的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不久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继北京、上海之后，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同样性质的团体（名称稍有区别）。北京还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长沙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其会务：一是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是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三是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④] 湖北利群书社、共存社与武汉地方党组织发生了关系。武汉地区的党团成立青年戏剧社，以“发扬艺术，改造社会”为使命。[⑤] 该社可能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艺社团。

第三，成立各类学校。通过不同类型的学校，向不同群体传播马克思主

① 传统说人民出版社是中共第一家出版社机构，不准确，此前中共早期组织已经有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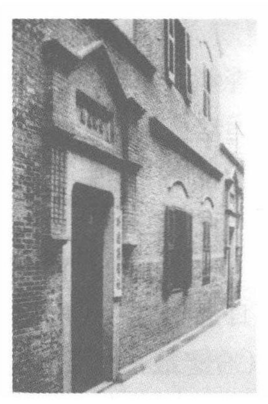
② 《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1921 年 9 月 1 日。

③ 见本书第 36 页注释②。

④ 《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民国日报》，1920 年 9 月 23 日。

⑤ 《青年戏剧社宣言》，《大汉报》副刊“楚社日刊”，1922 年 5 月 10 日。

义。最著名的学校就是上海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0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与陈独秀等为输送进步青年去苏俄学习而创办，校址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此处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杨明斋为校长，俞秀松为秘书，杨明斋、库兹涅佐娃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组织介绍入学，如彭述之、任弼时等人是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原准备留法的刘少奇是通过船山学社负责人贺民范介绍来的。学习人数从二三十到五六十，其中大多数是团员。学生半天上课，半天自修，十分重视政治学习，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学社教学效果很好，教师颇受学生欢迎。据彭述之回忆：“李达是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启蒙人。当我们埋头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李汉俊成了我们的向导。”[①] 同时，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党团活动，如参加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和上海纪念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



▲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在此设立外国语学社



▲刘少奇（1898—1969）

1921年春，学社学员共30多人分三批辗转抵达莫斯科，其中有罗亦农、彭述之、汪寿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等。他们被编入莫斯科东方



▲任弼时（1904—1950）



▲柯庆施（1902—1965）



▲罗亦农（1902—1928）



▲萧劲光（1903—1989）



▲汪寿华（1901—1927）

① 《彭述之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6页。

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到 1921 年夏中共中央成立后，学社的活动基本停止了。

此外中共通过武汉中学、湖南自修大学、励新学会（济南）、“注音字母教导团”（广州），以及各类研究会、读书会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党成立后，高度重视在劳动群众中灌输马克思主义，几乎所有的党团员都深入工人集中的地区，通过平民学校、劳动补习学校、识字班等业余学校，对劳动者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将马克思主义向工人群众灌输，从事传播工作，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开展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

二、创办报刊

报刊是近代主要传媒形式，是宣示党的信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迅速、最有力的工具，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党除创办《劳动界》、《共产党》外，还改造已有的报刊，如《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广东群报》；或利用进步报刊，如上海《民国日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等，为无产阶级舆论宣传的阵地。主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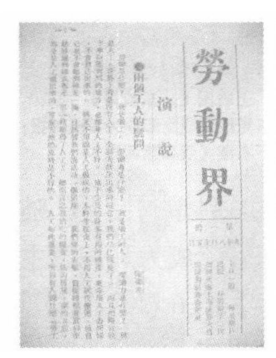




▲上左图《武汉星期评论》，1921 年 1 月 2 日创刊，后成为中共武汉党组织机关刊物；上右图《广东群报》，1920 年 10 月 20 日创刊，中共广东党组织成立即成为其机关报；下左图《大汉报》，下右图《汉口新闻报》

《新青年》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1920 年 9 月便将《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开始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原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宣扬科学与民主，随着该刊灵魂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皈依马克思主义后，该刊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军刊物。如第一章所介绍的那样，1919 年《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第 7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陈独秀发表的《本志宣言》，表明杂志由原来宣传民主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 5 月，与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晨报》、《北京大学日刊》等相呼应，推出了“劳动专号”。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采取的联合行动。

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党的喉舌后，编辑先后由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袁振英等担任，面貌焕然一新。首先封面换了新图案，两只大手紧紧相握，背景是一幅地球图。按照沈雁冰的解释，象征中国人民与社会主义的苏俄人民紧密团结，寓意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①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发现该象征性的图案是模仿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来自美国芝加哥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的出版物。②《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的《谈政治》。这篇文章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早期传播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陈独秀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成果。如果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宣传的标志的话，那么《谈政治》就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剖析中国社会的标志之一。从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颇有声势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理论战线上，与在先进青年中颇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论争。论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促使一部分激进青年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基本路向。该刊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一直到1922年7月暂时停刊为止。1923年6月复刊，由月刊改为季刊，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报，1926年终刊，共出版9卷78号。



▲ 中共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劳动刊物


▲《劳动界》编辑陈为人（1899—1937）

《劳动界》 1920年8月15日创刊，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工人阶级的刊物。《劳动界》为周刊，新青年社为总经售处，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主要编辑、撰稿人李达、袁振英、邵力子、陈为人等。目前看到的最后一册是1921年1月23日出

①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第4辑，1979年。

②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4页。

版的第 24 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劳动大众是传播的基本对象。《劳动界》的读者群主要是不识字的劳动大众，所以编辑非常注意语言的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杂志成为五四时期用大众化的语言向劳动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宣示了周刊的宗旨："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无论是热天，无论是冷天，天还没有亮就扒［爬］起来，上的上工场里去，到的到田里去。……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他们就是这样苦，这样做得多。他们还是住的没有得好的住，吃的没有得好的吃，穿的没有得好的穿。""我们再看那做东家、有钱的人，一天到黑一点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时候了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不是叉麻雀［将］，就是谈天；不是跑马车，就是坐汽车；不是逛窑子，就是抱小老婆；不是逛大世界，就是逛戏园子。"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①《劳动界》用工人日常熟悉的语言，解释劳动价值理论。值钱的就是价值，不值钱就是没有价值。社会上的什么东西都是劳动做出来的，"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②那么世界既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为什么劳动者却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而资本家不劳动却享受荣华富贵？《劳动界》用很浅显的劳动情况来作解释："一个工人每天穿的吃的住的，只消 5 角钱，只要做 6 点钟的工作，便可以造出和 5 角钱相当的货色，他们（引者注：指资本家）都硬要强迫着工人做 12 点钟的工，依旧只给他 5 角钱的工钱，于是还有 6 点钟内所做出的东西，他们也就作为利钱卷上腰包去了。"③这些被资本家卷上腰包去的利钱，就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劳动者既然认识到自己劳动的价值，认识到剩余价值，就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工人运动，推翻资本主

① 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 1 册，1920 年 8 月 15 日。

② 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第 1 册，1920 年 8 月 15 日。

③ 季陶：《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劳动界》第 10 册，1920 年 10 月 17 日。

义，在“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①]

周报设有国内劳动界、国际劳动界、演说、通讯、调查、时事、小说、诗歌、读者投稿等栏目。该报很受劳动者的欢迎，被热情称赞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

此外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创办了一些相同性质的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1920年11月7日创刊）与《工人周刊》，广东的《劳动与妇女》（1921年2月13日创刊），济南的《济南劳动周刊》（1921年5月），湖南的《劳动周刊》（1921年10月20日创刊），武汉的《劳动周报》（1922年12月23日创刊）等。1921年8月20日于上海创刊的《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周报。这些刊物的共同特点就是用通俗、平实易懂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劳动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他们的认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载体。



▲中共创建时期党出版的劳动刊物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半公开理论月刊。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创刊，铅印，16开本。在《新青年》上刊登的启事和要目称月刊在广州发售，实际编辑部在上海法租界辅德里625号，主编李达的寓所，作者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均用化名、笔名，如陈独秀用TS，李达用江春、胡炎，李汉俊用



▲左图英国共产党党刊 The Communist（石川祯浩提供）；右图《共产党》月刊封面，1921年11月

① 李中：《一个工人的宣言》，《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

汗、均，沈雁冰用P．生，袁振英用震瀛、施存统用C．T，周佛海用无懈、沈泽民用朗生等。该刊原定每月7日出版，实际因故常常脱期，月刊未设目录，《新青年》从1921年5月1日出版的第9卷第1号开始，连续刊登《共产党月刊社启》与要目；《广东群报》也经常刊登《共产党》月刊要目。

月刊内容大致为三部分：一是社论性质的"短言"，每期一篇，刊登在首页刊头下，分别由陈独秀、李达执笔；二是论文与译文，每期五六篇、十余篇不等，三是"消息"，除第五期外，第一、第二、第三期有"世界消息"，第四期有"中国劳动界消息"，第六期既有"世界消息"，又有"国内消息"。除首页外，双栏直排，每期约50页，共出版7期，现存1—6期，1921年7月终刊（实际上现存最后一期中曾提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劳动周刊》已出4期的消息，据此推定停刊最早在1921年9月），发行量最高达5000多份。

《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也是五四时期唯一以"共产党"命名的中文刊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共产党与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共产党》用十分明确的语言作出回答。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的祸乱，共产党就是颠覆资本主义的政党。共产党主张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劳动者的国家"。[①]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是俄国共产党颠覆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权的一天，"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今天我们"不单是为俄国共产党底成功而纪念，也不单是为俄国人民得脱离了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纪念；乃是为世界革命底前途而纪念，为社会主义底前途而纪念的"。[②]我们的同胞要想从奴隶的境地完全解救出来，就只有跟着俄国共产党，将全体劳动者团结起来，用劳农专政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军阀、官僚，实行社会主义。

《共产党》刊登了《第三国际党（今译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大会缘起》、《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英国共产党成立》、美国共产党党纲，以及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道，通过介绍外国共产党的历

---

① 《短言》，《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② 无懈（周佛海）：《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第1号。

史、党纲，传播了共产党的宗旨、信仰、组织条规等，给正在筹备中的中国共产党以思想资料的支持。

苏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共产党》用较大的篇幅刊登了苏俄《共产党第九次大会》、《莫斯科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关于新俄教育的一夕话》、《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介绍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情况，使中国人民透过浓雾看到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复兴中华的前进方向。

当时，党正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围绕着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展开论争，《共产党》月刊与《新青年》成为这场论争的主战场，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等文章，驳斥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当时在欧洲盛行的议会派等改良主义，旗帜鲜明地宣示："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和无政府主义不同底要点：是主张在现在及近的将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有相当强制力的法律，不赞成一概不加限制的自由。"① 杂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上：就是颠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生产方式；一是政治上：就要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中抢夺来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②

《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刊登了李汉俊以"汗"的笔名撰写的《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分量最重的一篇时评，长达1．9万字，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洋会议"是美国要参与日英两国所掠夺的中国这赃品的会议，只不过是日英美三国间的分赃会议，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受分配的赃品"。文章提醒中国人不要对这个会议抱有希望，帝国主义因分赃不均，必然会爆发战争，我们应该起来革资本主义的命，与世界的平民共同起来，"速行社会革命"，"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这篇文章还被印成5000多份小册子散发。这篇长文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撰写的，1922年6月23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汇报了这篇

① 《短言》，《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

② 《短言》，《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文章写作背景，宣传情况等。

三、以丛书的形式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文本是传播的主要载体。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就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大致分三类：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类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一类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本。

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初主要以丛书的形式组织出版。第一套丛书是“社会经济丛书”。1920年6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预告”，预告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即将出版，这是报刊第一次披露该书的出版消息。丛书预告恩格斯的“Socialism Utopian and Secientrfio”、《社会主义伦理学》（柯祖基著，李君佩译）、《资本论解说》（柯祖基著，戴季陶译）、《社会经济的基础》（罗利亚 a. Loria著，李汉俊译）、《布尔色维克底俄国》（Prof. E Antonnell著，林云陔译）、《社会主义运动史》（李汉俊编）等。市面上首先看到的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发行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书。1921年6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一个月，党又组织了“新时代丛书”，编辑部就在李汉俊寓所，即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地。1922年年初李汉俊离开上海后，丛书就由沈雁冰负责，出版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等，发行所为商务印书馆。

1920年11月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刊登了《列宁的著作一览表》，这是列宁重要著作第一次在中国被集中介绍，共19种，目录如下：

1. 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问题（1897年出版，The Problems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s，今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笔者注：以下英文原文照录。）

2. 俄罗斯的资本制度发达史（189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The Development of Copitalism in Russia，今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 经济的劄记和论文（189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Economic monographs and articles，今译《经济札记和论丛》）

4. 要做什么（1902年在德国出版，What is to be done? 今译《怎么办？》）

5. 告贫乏的农民（1903年在瑞士由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出版，To the Peasant Poor，今译《给农村贫民》）

6. 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在瑞士出版，One G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ward，今译名：同名）

7. 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两个政策（1905年在瑞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出版，Two Policies of the Social-Democrats During a Democratic Revolution，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r Party，今译《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8. 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A Pagc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agrarine Program，今译名待查）

9. 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1906年在俄国出版，The Dissolution of the Duma and the Aims of the Proletariat，今译《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0. 1905年至1907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大纲（1907年著，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The Agrarian Program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 During First Revolution，1905—1907，今译《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11. 经验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1910年出版，The materialistic Philosophy and Emperiocrtlicism Critical Notes on a Reactionary Philosophy，今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1915年著，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Imperialism，the Latest of Capitatism，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3.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 and the aim of the Proletariat，今译《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4. 论进行方法的文书（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Letters on Tacties，今译《论策略书》）

15. 革命的教训（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The Lessons of the Revolution，今译名：同名）

16. 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New Data Regarding the Law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Agricalture Vol，I Capitalism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今译《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

17. 国家与革命（1917年在彼得格拉出版，The State and Revolutaon，今译名：同名）

18. 苏维埃政府的要图（1918年在彼得格拉出版，The Immediate at Problem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the Soviets at work，今译《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9. 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靠斯基汉奸（1918年在彼得格拉出版，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xy，今译《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921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亦将以上19种著作了推荐。

1921年9月《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布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计划出版：

"马克思全书"15种：《马克思传》（王仁编）、《工钱劳动与资本》（袁湘译）、《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定译）、《哥达纲领批评》（李立译）、《共产党宣言》（陈佛突译）、《法兰西内乱》（孔剑明译）、《资本论》（李漱石译）、《剩余价值论》（刘英译）、《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革命与反革命》（李漱石译）、《自由贸易论》（吴智译）、《神圣家族》（钱润译）、《哲学之贫乏》（黄式遵译）、《犹太人问题》（胡琰译）、《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张九思译）。

"列宁全书"14种：《列宁传》（张亮译）、《国家与革命》（康明烈译）、《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无产阶级革命》（张空明译）、《现在的重要工作》（成则人译）、《劳工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成则人译）、《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译）、《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孔剑明译）、《劳农政府之效果与困难》（李墨耕译，笔者注：出版的书名为《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中共创建时期出版的列宁与苏俄书籍

《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张空明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末局》（罗慕敢译）、《第二国际之崩坏》（孔剑明译）、《共产党星期六》（王崇译）、《列宁文集》（孔剑明译）。

“康民尼斯特（引者注：即共产主义者译音）丛书”11种：《共产党计划》（布哈林著，张空明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张西望译）、《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布哈林著，彭成译）、《世界革命计划》（胡友仁译）、《共产主义入门》（布哈林著，罗雄译）、《共产主义》（鲍尔著，张松严译）、《创造的革命》（鲍尔著，李又新译）、《到权利之路》（柯祖基著，孔剑明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托洛兹基著，罗慕敢译）、《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李墨耕译）。

“其他”9种：《马克思学说理论的体系》（布丹著，李立译）、《空想的与学科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著，陈佛突译）、《伦理与唯物史观》（柯祖基著，张世福译）、《简易经济学》（阿卜列特著，张空明译）、《多数党底理论》（波斯格特著，康明烈译）、《俄国革命记实》（托洛兹基著，周诠译）、《多数党与世界和平》（托洛兹基著，周诠译）、《马克思经济学》（温特曼著，杨寿译）、《家庭之起源》（伯伯尔著，张空明译）。[①]

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委托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母本是英文本，与《社会主义史》和《共产党》开出的19种列宁的重要著作，以及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图书，均来自英文本（以后又有俄文本、德文本），这显示我国传播的底本由日文单一文本变成多种语言文本。改变这个状况的主要推手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第四章介绍。

在建党时期，虽然以上著作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没有面世，但它们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我国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基本了解。这方面的详情请见本书附录《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兹将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著作介绍如下。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848年2月在伦敦用德文出版的这本书，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科学理论和政治纲领，是马克思

① 通告中的图书目前有案可稽的共有全书和丛书16种。见陆米强《中共建党前后四则重要史实辩证》（下），《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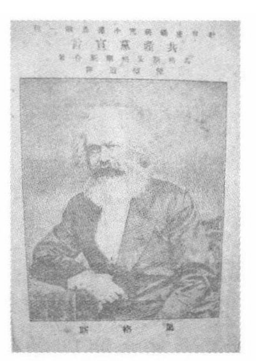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手稿


▲《共产党宣言》封面

主义诞生的主要标志。一百多年来，它在中国的作用是巨大的。据现有的资料显示，1899 年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的《大同书》上，在我国第一次提到该书名。1906 年 1 月和 4 月，朱执信在《民报》第 2、第 3 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首先介绍了《宣言》的基本思想，节译《宣言》的十大纲领等部分内容。第一本中译本是 1907 年在东京出版的，由署名“蜀魂”的留日学生翻译；第二年署名“民鸣”的留日学生翻译了第二个版本，可惜这两个中译本至今没有找到。[①]1907 年 12 月《天义报》首次摘译了《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 年 1 月《天义报》第 15 卷刊登了恩格斯为 1888 年英文版的《宣言》写的序言；第 16—19 卷翻译了《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第一版封面，1920 年 8 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翻译者陈望道（1891－1977）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第二版封面，1920 年 9 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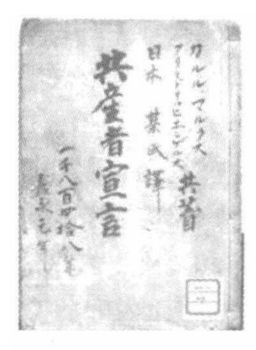
《宣言》第三种中译本是陈望道翻译的。陈氏原是受《星期评论》之委托，其底本是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在校对时参照了英、俄文本。[②] 陈译本的底本

①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 23 种中译本》，《光明日报》，2008 年 10 月 16 日。

② 《俞秀松 1920 年 6 月 27 日记》，《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 1 辑，开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8 页。


共產黨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翻译的底本之一
（石川祯浩提供）


共産者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参考的日文手抄本手稿
（石川祯浩提供）

基本上是1906年3月发表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刊号上，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宣言》，可能还参考了日本大正9年（1920年）流传在民间的《共产党宣言》日文手抄本。[①]1920年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专心从事翻译，“费了平时译书的5倍工夫”，[②]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将其译完。1920年5月底，或6月初陈氏携带中译本回到上海，住在星期评论社，即李汉俊寓所，但此时《星期评论》已经停刊，委托人戴季陶亦离开了上海。6月28日，陈望道到渔阳里2号陈寓，将译稿交给陈独秀。[③]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由又新印刷厂印刷。《宣言》是“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1920年8月第一版，比现在的小32开本还要小一些，竖排平装本，3号铅字，共56页。初印了1000多册。封面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水红底色，因排字工的疏忽，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于是立即印了第二版（9月），作了纠正，封面颜色换成了蓝色。

陈译本是我们能够看到《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在陈译本的前一年（1919年），《每周评论》、《国民》、《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节译了《宣言》。此外据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有个中文油印本。《宣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特别是唯物史观，促进一代又一代进步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1936年毛泽东在对美国记者斯诺回顾自己早年思想转变时，曾说受到三本书的影响而改变人生，第一本就是《宣言》。[④]《宣言》问世后受到热烈欢迎，6年内便印了17版。[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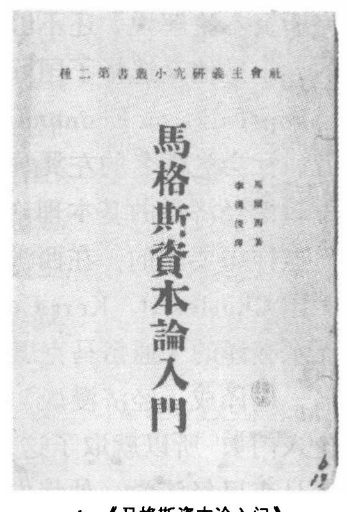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② 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30日。

③ 《俞秀松1920年6月28日记》，《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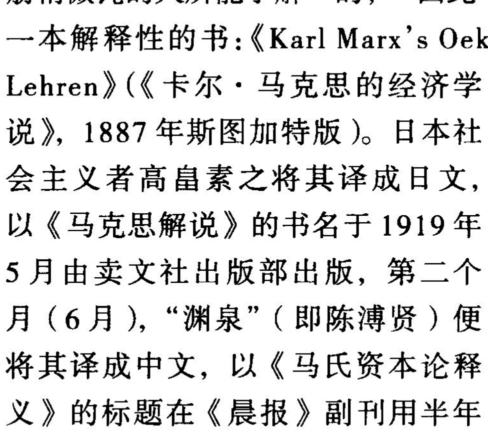
④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⑤ 马建萍：《早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封面（李丹阳提供）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以下简称《入门》）1921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它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出版的第二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者李汉俊。《资本论》这部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引起了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李汉俊指出，《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每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不可”的三部马克思主义经典，[①]但《资本论》“里面的材料理论都太复杂，不是脑筋稍微钝的人所能了解”的，[②]因此考茨基写了一本解释性的书：《Karl Marx’s Oekononische Lehren》（《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斯图加特版）。日本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将其译成日文，以《马克思解说》的书名于1919年5月由卖文社出版部出版，第二个月（6月），“渊泉”（即陈溥贤）便将其译成中文，以《马氏资本论释义》的标题在《晨报》副刊用半年的时间连载。1920年9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译文很快被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转载。同年12月戴季陶与李汉俊、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又合译，[③]以《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之名在《建设》月刊第1卷发表，从第4号起分5期刊出（未完），192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李汉俊看来，《马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者马尔西（1877—1922）（李丹阳提供）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日文翻译者高畠素之（1886—1928）（石川祯浩提供）

① 李汉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译者序，社会主义研究社1921年版。

② 同上。

③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中文本实际上是以戴季陶为主、朱执信、李汉俊、胡汉民参加的合译本，《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序，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克斯资本论解说》还不够通俗，没有一定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人是很难看懂的，于是他又选择了国际工人协会评论联合编辑米里·伊·马尔西撰写的《Shop Talks on Economics》介绍给中国人民。马尔西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著名的左翼领导人，他的《Shop Talks on Economics》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很通俗的语言和方法"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书为第一"。[①] 该书1911年由美国Charles H. Kerr Co-operative出版，李汉俊的底本则来自日本远藤无水翻译的《通俗马克思资本论》（1919年日本文泉堂出版）。按照英文书名，应译成《经济漫谈》，李氏"审其作用，以为莫过于叫做《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所以就取了这个名称"。[②] 同时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好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经济学，他将书中"有点抽象之处，非略有经济学常识者不能了解"，令读者"非费点思索不能了解的地方，又略略加了点注解"。[③] 为了同样的原因，他还希望中国读者在学习这本书的同时，阅读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在这里。

人民出版社成立后，再次发行。全书54页，约2. 7万字，共有8节：第一，劳动者将什么东西卖给资本家；第二，商品底价值；第三，物价…（价格）；第四，利润是怎样得的；第五，便宜的物价与多的利益；第六，贵的物价与专卖物价；第七，工银；第八，缩短劳动时间。在英文原著中，每一章后都列有一系列问题，以助读者深入思考，末章的问题就有"利润从何而来？""什么是剩余价值？"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是什么？"可惜，日译本、中译本均没有译出。[④]

《入门》的问世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李大钊、陈独秀大力推荐，北京、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把该书当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材料。湖南的文化书社在7个月内，就销售200本，排在销售榜的首位。[⑤]

《社会主义史》作为"新青年丛书"第一种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

---

① 李汉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译者序，社会主义研究社192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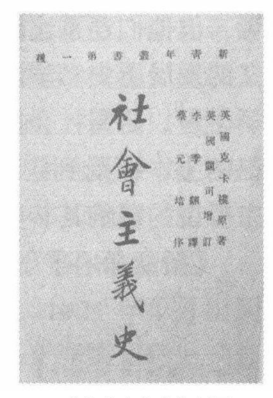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李丹阳:《关于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情况的探索》,《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⑤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2页。

出版。作者英国人克卡朴（今译柯卡普），1892年年初版，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轨迹。译者李季在自序中说明："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澳、美各洲非常发达，而派别亦复甚多；我们对于这种运动要想有统系的知识，须先从历史下手。我译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的目的，就在这点上。"[①] 蔡元培除了代译德法文书名外，还特意作序；胡适"指示疑难之处"，[②] 张申府改正专门名词的译音。全书共22万字，分上下卷，650页。上卷：一、绪论；二、初期的法国社会主义；三、1848年的法国社会主义；四、初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五、拉塞尔（今译拉萨尔）；六、拉伯尔塔斯（今译伯恩斯坦）；七、马克司（今译马克思）；八、国际工人协会；九、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卷：十、俄国革命；十一、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十二、各国社会主义的进步；十三、近世国际工人协会；十四、英国派社会主义；十五、社会主义通论；十六、结论。附录：I、圣西门派的辩护；II、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党纲；III、费边会的基础；IV、总同盟罢工表；V、澳洲工党内阁一览表；VI、英文书籍解题。书后的"中西名词对照表"十分珍贵。翻译用语有时代性，五四时期的翻译用语与当今有很大的差别，"对照表"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据此我们可以了解中英文名词翻译的时代演变过程，有利于我们对初期传播史的研究，有利于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翻译与理解。



▲《社会主义史》封面，1920年10月出版

《新青年》特别向读者推荐："诸君要想知道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源流，不可不先读这本书。"此书是欧战以前一部包罗最宏富的（Most comprehensive）社会主义史"。[③] 该书二位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克卡朴是英国著名的学者，辟司是著名费边社会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时有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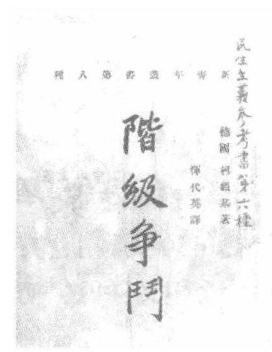
① 李季：《〈社会主义史〉序》，新青年社192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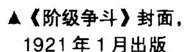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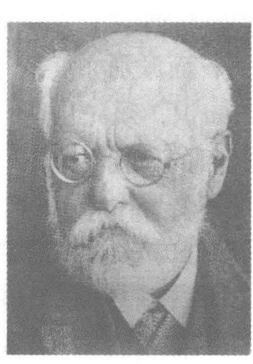
③ 《新青年丛书出版广告》，《新青年》第9卷第4号封一，1921年8月1日。

评，但他们还是比较客观地介绍了社会主义各种派别，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学说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阐述，对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思潮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书，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文化书社半年就销售 100 本。它是毛泽东所说的影响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本书之一。

《阶级争斗》是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的，于 1921 年 1 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精髓，贯穿于马克思学说始终。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到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镇压，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但阻挡不住工人运动的发展，1890 年《反社会党人法》被迫取消。第二年（1891 年）10 月德国社会党在爱尔福特（Erfurt）举行大会，通过了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即党纲。这个党纲恩格斯参与了起草，是一份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文本曾于 1919 年 8 月在《星期评论》第 10 号上刊登。纲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阐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部分说明党在新时期的任务、策略等。为此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撰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用唯物史观对党纲进行阐述，是考茨基及他所处的时代最重要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一。




▲《阶级争斗》封面，1921 年 1 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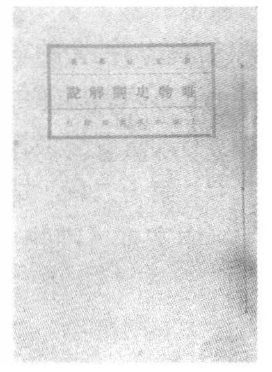

▲《阶级争斗》作者考茨基（1854—1938）

《阶级争斗》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第五章，中文版小 32 开本，198 页，共五章——小生产制的经过、劳动阶级、资本阶级、未来的共同生活、阶级争斗。该书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重点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指出人类社会基本活动是经济活动，社会制度是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剥削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进步”，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是对立的，其矛盾无法克服；资产阶级在获取大量利润时，也促进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国家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主要是用来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的统治机器，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明白这个

道理，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便是唤起无产阶级劳动者进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方式有多种，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改良手段，如捣毁机器、组织工团、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工资等，虽说是正当和必要的，“但若以为这样的社会改良，便能延缓社会革命，欲究是个大错”。改造社会的最根本之法是铲除私有制，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阶级争斗》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因而得到恩格斯、倍倍尔的支持。

该书实际出版的时间比书上标明的时间要稍晚一点，1921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8 卷第 5 号上刊登了出书消息。8 月在第 9 卷第 4 号上刊登的《新青年丛书出版广告》中作了专门介绍：“《阶级争斗》是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斯所发见的重要学理，也就是俄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余进步国的人们‘现今社会运动底基音’。凡要彻底了解近代各国社会思想，须得先彻底明白‘阶级争斗’是什么。这书原本是马克思派著名人柯祖基做的，对于‘阶级争斗’说得很详尽，在外国也算是一部名著，在我们这知识荒的中国更不消多说，要算是重要的粮食了。”[1] 它与《共产党宣言》等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促进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德怀等许多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转化。

《唯物史观解说》荷兰人郭泰著，1909 年出版。中文本由李达翻译，中华书局于 1921 年 5 月作为“新文化丛书”一种出版。这部书是郭泰“为荷兰的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2] 它是当时诠释唯物史观比较好的一本书。


▲《唯物史观解说》封面，1921 年 5 月出版

该书由考茨基作序，共 131 页，14 章：第一章　本书之目的。第二章　历史的唯物论与哲学的唯物论。第三章　这学说的内容：一、劳动技术 劳动器具　生产力，二、劳动关系　财产关系　生产关系，三、生产力与财产关系之矛盾，四、掘翻资本家的基础石。第四章　实例之

① 《新青年丛书出版广告》，《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封二，1921 年 8 月 1 日。
② 李达：《译者附言》，《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 1921 年版，附录第 7 页。

说明：一、最单纯的实例，二、新技术所生的各种变化，三、新技术与新阶级的关系，四、物质生活之物质的原因，五、劳动是人类精神的根源。第五章 科学，智识，学问：一、劳动者的知识之由来，二、科学家，技术家，法律家及僧侣之必要，三、生产过程欲求的结果，四、第一反对说（欲求乃精神），五、第二反对说（纯粹智识欲），六、成为进化动力的地理的要素。第六章 发明：一、精神与发明，二、中世之发明，三、过渡期之发明，四、现代之发明，五、原始之发明，六、由必然的世界到自由的国家，七、超过欲求而发达的科学。第七章 法律：一、所有观念变化之实例，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例，三、原始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四、对于犯罪思想之变化，五、阶级斗争与权利思想，六、表同情于贫人的富人。第八章 政治：一、社会问题发生之原因，二、德国劳动阶级之发达，三、有产阶级中之差别，四、大资本家的地位，五、旧贵族阶级之地位，六、中等阶级之地位，七、中下阶级之地位，八、中上中下及劳动阶级，九、阶级与个人之关系。第九章 习惯与道德：一、精神界之高级方面，二、习惯变化之实例，三、善恶观念之变化，四、妇人解放运动之原因，五、女权论者与社会主义的妇人，六、大理想与地上的根底，七、善恶的根本之难解，八、社会的本能即道德心，九、私有竞争与阶级。第十章 宗教与哲学：一、由自然力的崇拜到精神的崇拜，二、善恶的观念与社会的本能，三、罗马之统一与一神论，四、适应封建制度的耶稣教，五、宗教改革的真意义，六、抽象的不可解之神，七、宗教之灵化空化，八、劳动阶级无宗教，九、狄更之哲学，十、宗教是个人的私事。第十一章 艺术。第十二章 结论。第十三章 真理之力。第十四章 个人之力。

中文本《唯物史观解说》的底本来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由德文转译，大镫阁1920年出版。日译本不是全本，除了缺字很多外，还没有翻译考茨基所作的序，以及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李达复参照德文本补译，成为全译本。他还写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作为附录，他在《译者附言》中特别说明：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的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译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我特意在这里表示我的谢意。[①]

① 李达:《译者附言》,《唯物史观解说》, 中华书局1921年版, 附录第7页。

第三节 传播主要内容

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后，传播就进入了有组织宣传的阶段，传播者们翻译、撰写了大量文章与著作，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有：

一、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

从两个方面展现。第一，通过无产阶级领袖的传记、生平、年表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战斗、传奇的生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人民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内容的了解。五四时期《晨报》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第一篇马克思传略是该报于1919年4月1—4日发表的《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作者渊泉），《新青年》第6卷第5号立即转载。接着《新青年》、《晨报》、《星期评论》等报刊刊登了《马克思传略》（作者刘秉麟）、《马克思年表》（作者绍虞）、《马克思传》（威廉·里布列希著）、《马克思逸话一节》（T. T. S）、《马克思逸话》（衡石译 志津野又郎著）等。



▲《星期评论》刊发的《马克思传》

威廉·里布列希（今译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他著的《马克思传》堪称马克思传略的代表作。中文翻译者戴季陶主要依据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1906年发行）所载的志津野又郎的译文，并参照1919年发行的《批评》所载宝伏高信的译本转译，于1920年元旦在《星期评论》“新年号”刊登。1921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



▲《马克斯传》作者威廉. 里布列希（1826—1900）

104 周年之际，中共早期组织第一次有组织地纪念马克思时，印刷了《马克思纪念册》2 万册，将此传收入。

《马克思传》与其他小传，阐述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创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历史，特别精练地勾勒了马克思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马克思旅居巴黎时，发表的《赫格儿法理哲学》（今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关于犹太人》两篇文章，是他“从哲学里面发现了进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两篇文章很可以证明，这时他已经脱出赫格儿（引者注：今译黑格尔）哲学，一直线的向前进步，达到他的学说，遂著出他那有名的《资本论》。”[①]1844 年 8 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首次见面，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因共同的信仰，他们“结极可羡慕的友情，相依相信，长短相助，在政治上，在学问上，互相提携，始终无渝”。[②]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针”，又是无产阶级“战略和信条的根本义”，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合作的结晶。“这里面那一部分是马克思作的，那一部分是因格斯（引者注：今译恩格斯）作的，我们不必问”，他们“是一心同体的”，“纵使马克思和因格斯除了做这篇宣言书而外一样事情也不作，他们也能得不朽之名”。[③] 马克思 1859 年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实在是他的价值论最初问世”的成果。[④]1867 年，“近世社会主义者所尊为圣经之《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资本论》，“盖马氏思想，由结胎而生育而长大矣”。[⑤] 马氏晚年自觉残生无几，信笔走书，留有遗稿。马克思去世后，其战友恩格斯清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溯自马氏于 1852 年立志著作到 3 卷出版长达 42 年。[⑥] 马克思学说创造一个“新纪元”，“吾侪固深信马氏之说，乃现代万恶社会之唯一疗法也。”[⑦] 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是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奋斗。马

---

① 《马克思纪念册》，1922 年 5 月 5 日版，第 6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8—9 页。

④ 同上书，第 12 页。

⑤ 渊泉：《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晨报》，1919 年 4 月 1 日。

⑥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注释 2 对《资本论》的诠释：1843 年马氏立志著作，1895 年出版第 4 卷。这样《资本论》写作起止时间当为 52 年。

⑦ 渊泉：《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晨报》，1919 年 4 月 3 日。

氏身体"素健"，因频年苦心著述，"终日伏案"，有时一日竟工作18小时；又因生计困难，举"重利之债"，健康受到很大摧残。1881年12月2日，他的爱妻——"幼小时的女友，他一生的同志，他的友人，他的助手者"燕妮去世，[①]对他是可怕的打击，其境况"益惨，病亦益惨"，"自知不久于人世，欲兼程并进，以完成其大著。"[②]1883年1月最心爱的小女儿又去世，马氏"形影相吊，悲不自胜"，[③]但他毅然扶病执笔，奋斗不已，1883年3月14日"竟坐其案前椅上与世长辞矣"。"呜呼马氏最后之奋斗之精神，读之能不使人肃然起敬耶。"[④]

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的中介，而北京政府与反动媒体步日本政府后尘，攻击布尔什维克是过激主义，列宁经常被妖魔化。传播者竭力搜集资料编辑列宁小传，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列宁。《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刊登AI的《列宁的历史》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个小传记载了列宁从出生到十月革命前夕的历史，简略地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历史，盛赞列宁是俄国"多数派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勇敢最精神的首领"，是"劳工贫民的唯一战将首领"。这个小传与李大钊1921年7月《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中的"列宁履历"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⑤]它们指出列宁最大的贡献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相结合，与修正派、议会派等机会主义作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总之传记、生平、年表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具体、生动、通俗的形式。

---

① 《马克思纪念册》，1922年5月5日版，第18页。

② 渊泉：《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晨报》1919年4月3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列宁历史》与"列宁的履历"结构、文字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列宁自己在西穆比尔斯克中学受教育，这个中学校的校长，就是1917年2月革命后的那个临时政府的国务总理克伦斯基的父亲。这个校长，自然是没想到他的儿子克伦斯基后来得了俄国行政机关的最高位置，那个监督学校员乌尔彦诺夫更是梦想不到他的儿子改造新俄"。《列宁的历史》，《共产党》创刊号。"列宁曾在Simbiirsk中学肄业。那临时政府的领袖Alexander Kerensky的父亲Feodor Kerensky充当此校的校长。他断想不到他的儿子后来竟据过全俄的最高地位。他更梦想不到由他所管理的学校出身的学生，竟是取他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人物，现在正以坚强的精神和手腕，指导全俄的运命，全世界大革命的运命"。"列宁履历"，《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5页。



▲ 1922年6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体系进行诠释。这方面传播者着力甚大，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此外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关于马克斯主义的一个误解》、李汉俊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具有代表性。他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①]不能将其哲学、经济学等截然分别出来，否则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解。他们之所以将其分成若干部分，是为了研究的便利。[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基本精神是相同的，但因时间、着力点不同，阐释侧重点亦有稍许差异。

李大钊将马氏的理论分成了三部分，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③]李氏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代表了同时代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李汉俊也有相似的表述，他将马克思主义分成理论与政策两方面，理论部分是“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政策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引者注：今译“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是一条金线一般把它们根本缝起来。[④]杨匏安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的历史观为经，以革命的思想为纬，再加上了在英法各国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因而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所以又有人叫他做科学的社会主义。”[⑤]他们的诠

① 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6日。

② 同上。

③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④ 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

⑤ 杨匏安：《马克思主义浅说》，《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版，第152页。

释并非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而是接受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与《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第三讲第二段唯物史观绪言的思想。[①]我国初期传播者热衷传播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受到1917—1919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鼓舞。他们指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之势，而俄国、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均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的。[②]马克思主义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当代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③]他们高度赞扬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其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马克思都主张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直接行动）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只要读过《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人都会知道的”。[④]

他们当时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客观需要，亦有一定的根据和某种使用价值，但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全部内容，则显示出某种实用性、片面性的倾向。

二、剖析各派社会主义，确定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来自日文，对应的英语是“Socialism”。它的原始含义与我们今天一般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社会主义是相当庞杂的思潮、流派及其社会运动，据统计有200多个派别。社会主义第一个派别是16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却是1832年在法国圣西门派主办的《地球报》上。[⑤]而作为进步思潮被先进中国人所了解则是在19

---

① 河上肇在《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第三讲第二段唯物史观绪言中阐述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马氏之思想为理论与政策（实际）两部分。马氏社会主义分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唯物史观）、“关于现在的理论”（即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论）、“关于将来的理论”（即社会主义运动论），加上其政策之内容（亦谓“社会民主主义”）。“由此观之，唯物史观、资本论、社会民主主义三者，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两方面之三大原理也。而此等原理……所以互相联络密切不可分离者，实如金丝一线之阶级争斗说有以系之。”《近世经济学思想史论》第4版第83页，学术研究会总会发行，1927年。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③ 光亮（施存统）：《河上底左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23日。

④ 无懈（周佛海）：《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第1号，1920年11月7日。

⑤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社会主义史》（上），第4页，称这个名词最初出现于1833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写道：“1833年有保贫党（Poor men's guardism）用这个名词。Sosialism对于G. J. Holyoake所著《合作史》中，谓凡用政治权力，以变私有土地及资本为共有者，是为社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世纪末，在《西国近事汇编》就有“康密尼”（今译共产主义）、“主欧罗巴大同”（今译社会主义）等词出现。1898年，一个叫胡贻谷的中国人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中文名词。1901年1月这个名词在日本中国学生办的刊物中再次出现。第二年日本幸德秋水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本《广长舌》被译为中文，以后日本介绍社会主义的著述《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评论》（选录，久松义典原作，杜士珍译撰）、《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等陆续传到中国。



▲ 江亢虎（1883—1954）

社会主义作为运动在民国初年形成过二次热潮。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江亢虎[①]领导的中国社会党，公开标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江氏社会主义是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西方社会改良主义、单税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相融合的大拼盘。

孙中山也是社会主义的极力鼓吹者与实践者。他坚持说他的民生主义，英文对应的词就是“socialism”。在他的影响下，他最亲密的战友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一度热衷于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是在五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掠夺性暴露无遗，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彻底失望，开始寻求救国的新路，于是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时髦。坐而论道的老式社会主义者已经无法担任历史舞台的主角，一批热情奔放的青年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成为这场运动的鼓吹者与实践者，以致德先生和赛先生都黯然失色。“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②]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潮，几乎每一种社会主义，都有一群崇拜与践行的热血青年，特别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占有突出的地位，一度成为五四新青年的主流意

①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1921年4月曾前往苏俄，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重组中国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新社会民主党）。1940年参加汪伪政权，担任伪考试院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判无期徒刑。著有《新俄游记》、《江亢虎文存初编》等。

②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8月再版，第2页。

识。社会主义一时让人们目迷五色，难以分辨。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①

那么应该传播与践行何种社会主义才是救国的正道呢？这个问题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厘清的问题。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分析，最早阐释确定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必走之路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他就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李达在1919年6月18、19日也写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什么叫社会主义？》、《战前欧洲社会党活动的情况》等，对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后来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中对各种社会主义再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杨匏安于1919年10—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一一作了介绍。此外，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等也分别进行过论述。

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是《社会主义史》和《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Social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前者在本章第二节已专门介绍。后者是美国“各校社会主义社”秘书列德萊所著，李季1921年3月翻译脱稿，经陈独秀推荐，





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
(Social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

此書爲美國各校社會主義社的秘書列德萊博士(Harry W. Laidler Ph. D.)所著，係一九二〇年出版。書的內容，分爲兩部：第一部（即社會主義之思潮）敘述社會主義的學說，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對於反對論的辯駁等等，非常透澈；第二部（即社會主義之運動）紀載國際主義的源流，各國社會主義者在歐戰爆發前後所持的態度，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年底各國社會主義的運動等等，詳盡無遺。此書的第一部係羅列世界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大家的思潮，著者自己並未嘗參以私見，故於各派學說，持論平允，絕無黨同伐異之弊，這是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所必讀之書；此書的第二部與我所譯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恰相銜接（克氏社史至一九一三年爲止），尤足爲研究大戰後世界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人之考鏡，故特譯成國語，以饗國人。全書約二十四萬字，現已脫稿，不日付印，特此預告

十年三月十七日。　李季白。

▲ 上图左《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作者列德莱（1884—1970）（吴应銧提供）；上图右《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封面，1923年出版；下图《新青年》刊登《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广告。

① 瞿秋白：《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胡适审查，由商务印书馆 1923 年出版。该书共 15 章，上卷记述社会主义的学说与思潮，下卷描述社会主义之运动，特别是 1914—1919 年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详尽无遗，正好与《社会主义史》相衔接。该书附 15 页英文书刊及“书目注释”颇有价值。

厘清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是择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陈独秀指出：“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①] 杨匏安指出，社会主义有广义、狭义之解释。从广义上见解，“使个人的活动，悉向于从属社会公共目的，则名之社会主义。”从普通广义上见解，“主张于一般社会间，持平等主义设施敷布（如业产上生产机关，为人群共有，分配平等），则名之社会主义”。最狭义的社会主义，“所称为近世社会主义是也。如于产业制度，则要求土地公有，资本公有；于分配法，则要求劳动上比例的报酬”。[②] 李大钊则视野宽广，从“智”、“情”、“意”、“运动”、“社会”等方面综合归纳：“由智的方面观之，Socialism 此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由情的方面言之，则以为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由意的方面言之，则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由运动的角度，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由社会方面观察，可分为政治、法律、经济三个方面。“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包含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种。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所以此种亦可分共产主义及集产主义两派。”[③]

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点：批判资本主义、废止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但在如何达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因途径、手段、政策、策略等不同而分出许多不同的思潮与派别。杨匏安将社会主义分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类 10 种，共产主义：“在英、法之共产主义、社会民政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社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 9 卷第 3 号，1921 年 7 月 1 日。
② 杨匏安：《社会主义（Socialism）》（1919 年 10 月），《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5 页。
③ 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3 页。

会主义："纯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基督社会主义、集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际社会主义"。[①]



▲伯恩斯坦
（1850—1932）

陈独秀有针对性地将社会主义主要派别分成五种：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陈氏对前四种一一批评。工团主义是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两派"合演"出来的，重要精神：一是主张阶级斗争，这是出于马克思；一是不要国家及政权，这是出于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这是受到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但失去了工团主义阶级斗争的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失去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的作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颇有市场，它的精髓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约束，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②]但无政府主义强调的绝对自由是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而这些因素却离不开政治、经济制度，离开了政治经济制度的路是走不通的，非"撞得头破额裂不可"。[③]国家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出来的派别，在德国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因它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达到社会主义，所以也叫社会民主主义、议会派，内又分伯恩斯坦的修正派和考茨基的正统派。[④]它们虽然彼此斗争，但主张却"大同小异"。[⑤]

马克思原本就是共产主义，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大部分社会

---

① 杨匏安：《社会主义（Socialism）》，1919年10月，《杨匏安文集》第126页。

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③ 同上。

④ 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亦加以论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标榜为马克思派，实际上是"坠落"的，"非驴非马"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⑤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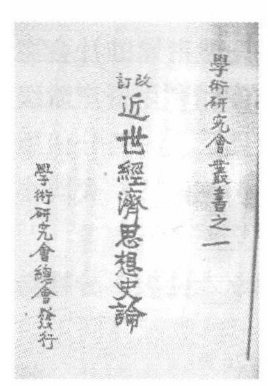
民主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走上赞成战争，主张议会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国列宁领导的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称列宁领导的党为共产主义（派）。俄国的党最初叫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领导的激进多数派叫布尔什维克党，后改称共产党；温和的少数派叫孟什维克党。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同源”于马克思，但其政治主张却大相径庭。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直接进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运动。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张，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列宁的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①

三、传播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五四时期，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从宣传唯物史观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1919年5月5日《晨报》“马克思研究”栏目上刊登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大幕，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俄德的社会革命，发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底，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他的历史观，普通所谓‘唯物史观’就是了。”这篇文章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作了通俗的解释。同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全文转载。《晨报》从7月18日开始分7次刊登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笔者注：原著为堺利彦的《唯物史观概要》，见《社



▲ 1919年5月5日《晨报》刊登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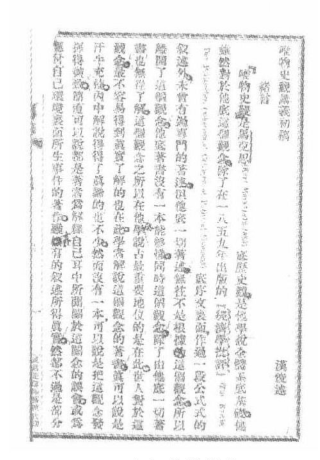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封面，1920年9月出版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会主义研究》第 4 册，1919 年 4 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亦及时转载。陈望道将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岩波书店 1920 年版）第三讲第二段唯物史观序言译成中文，在 1920 年 6 月 17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同年 9 月泰东图书局出版了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1921 年 5 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诠释彻底唯物论的专著，影响较大。

1919 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人第一篇比较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重点解读了唯物史观。之后《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广东中华新报》、《建设》等报刊相继发表许多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其中《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上的价值》（李大钊）、《谈政治》（陈独秀）、《马克思学说》（陈独秀）、《唯物史观不是什么？》（李汉俊）、《马克思还原》（李达）、《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施存统）、《看了郭泰底唯物史观以后》（〈沈〉泽民）等文章分外亮眼。李大钊、李汉俊还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①]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走进高等院校。他们宣传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如下：


唯物史觀講義初稿

緒言

漢俊述

▲ 李汉俊编述的《唯物史观讲演初稿》（李丹阳提供）

第一，确定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是后人确定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哲学界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列宁提出的概念，斯大

① 据 1922 年 10 月 31 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李大钊在政治、史学两系讲授《唯物史观》，讲义尚待挖掘。目前看到唯物史观讲义实物的是李汉俊的讲义，有两份。一份是《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由武昌正信印务馆代印，时间不详。一份是《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印刷单位、时间不详。这是李汉俊在武昌高师的讲稿，估计时间在 1922 年夏至 1924 年夏之间。

林则将马克思哲学指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此这个提法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定名，不可撼动。这个提法长期在我国政治思想界占统治地位。

当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什么？也就是说应当如何称谓？这个问题，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以来，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①] 这段话给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才进行讨论的印象，其实早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时就热议过。李汉俊指出："'马克斯是不是哲学家？马克斯底学说是不是哲学？'这是马克斯批评家们所热心议论的问题，也是各学者们意见分歧毫不一致的问题。"[②] 他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称谓进行了研究。为什么历史与当代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呢？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科学定位。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将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称之为“哲学”，以致马克思逝世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还不存在，他们是通过日本的渠道，从恩格斯那里寻求答案。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因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科学、具体的诠释，他的诠释或是马克思授意的，或是马克思同意的，或是马克思参与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定义及其诠释最初亦非通过欧洲渠道，而是日本渠道，对我国早期传播者有决定性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多方面的，有两个发现非常突出，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不同于剩余价值

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的讨论请参见石云霞：《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重点难点解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东、林锋：《马克思哲学创新实质新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张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及其称谓》，《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等。

② 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23日。

理论，就在于后者在《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看得很明白”，而前者“却没有系统的著作，比较有系统的东西只有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859年的《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新哲学作了经典表述。1859年6月该文出版后，马克思建议恩格斯写文章谈一下其中的“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②]2个月（8月）后恩格斯便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首次将马克思的新哲学称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③] 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是党的“理论基础”，[④] 其基本观点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⑤]

1877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编即哲学部分以论文的形式在欧洲发表。在论文中恩格斯全面阐释了马克思新哲学的来源、本质属性，以及主要内容，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了彻底改造，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伟大发现，“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⑥] 同年他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从传记的角度再次确定了这两大发现。1880年恩格斯将《反杜林论》的精华改编成独立的通俗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书名出版，3年后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发展》的第二章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进行了经典论述，阐述马克思哲学的来源，明确阐释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联系与本质区别。马克思

---

① 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晨报》，1919年5月5日。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7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页。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④ 同上书，第599页。

⑤ 同上书，第598页。

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为《发展》法文版（第一版）专门写了序言，[①] 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890年9月恩格斯致康德拉施米特与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唯物史观”，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并用。[②] 很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同义词，指向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方法论，从此唯物史观的称谓流行开来。

目前全面描述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接受并传播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有相当的难度，但他们接受了恩格斯的论述，并最终锁定“唯物史观”的称谓则是可以肯定的。李大钊的话具有代表性：“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是马氏的朋友恩格斯在1877年始用的。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1867年出第1卷的《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1859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引者注：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c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c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es’，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irminism’。在（1）（2）两辞，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此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③] 李汉俊的解读可以视为李大钊的补充：“‘唯物史观’这个名称在德文原文为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英译为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History）。马克思并没有用这样的名称，是他底亲友因格尔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为他取的这个名称。在德文原文固然是可以这样译，但亦未尝不可译作‘物的史观’。”[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587、第591、第593页。
③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④ 李汉俊：《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绪言，武昌正信印务馆代印，第2页。

以上两段文字，说明在早期传播者那里：（1）马克思的哲学名称有多种称谓，“唯物史观”的称谓是恩格斯取的，我国之所以确定唯物史观，正如李大钊所言“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故且仍之不易”。[①]（2）对马克思哲学的每一种称谓，都会引起误会，“唯物史观”亦然。李汉俊认为这些误会主要来自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真谛缺乏科学的了解，为此他撰写了1.3万字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根据恩格斯的《发展》的基本内容，[②]强调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不能了解他底唯物史观就不能了解他底主义；误解他底唯物史观，就要误解他底主义”。[③]在文章中，他进一步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误会一一辨析，指出马氏的唯物论是彻底的唯物论，将辩证法的思索法与唯物论的观察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第一代传播者那里，他们根据恩格斯的提法，是将马克思的哲学称谓唯物史观，是彻底唯物论与自觉的辩证法的统一。

第二，传播唯物史观的物质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即彻底的唯物论）是传播者最先传播的内容，这是时代的客观需要。近代中国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救国。此前先进知识分子总是在上层建筑里寻求各种救国的思想武器，但均以失败告终。实践教育了先进的中国人，要救国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指导，必须要有先进的阶级来领导。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救亡图存的科学宇宙观。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④]从此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最终改变了中国与世界。

李大钊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就摘录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来强调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根本要素：“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

---

①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② 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最初了解来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非《反杜林论》，这是因为前者在1912年就有中文翻译（1912年5—7月，《新世界》第1、第3、第5、第6、第8期发表了施仁荣的译文，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而后者直到1930年才有中译本。

③ 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23日。

④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蒲鲁东
（1809—1865）

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①（今译文：“经济学者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

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说得更清楚：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一直解释世界是精神支配物质，这是因为“他们利用精神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麻痹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握住了科学、法律艺术、政治等精神，所以他们当然要支配劳动者。②劳动者要想变成自由人，就必须认识人类是社会生活决定人的精神，是劳动者创造了世界。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劳动者觉悟到社会主义不单要进行政治战争、经济战争，还要对剥削统治者进行“哲学上的思想战争”。③

如前所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经典概述，引起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高度重视，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李达、李汉俊、施存统等在其著述里均反复引用与阐述。《我的马克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② 郭泰：《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2页。
③ 同上书，第1页。

思主义观》中摘录了《序言》中的五段内容，其中这段经典被传播者们多次引用："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①]（今译文："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李达在翻译《唯物史观解说》时，专门撰写《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特别翻译了《序言》中重要段落，将唯物史观的精髓展示出来：

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生活和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产的历史过程。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关系若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3．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4．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

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5.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摘录，说明早期传播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唯物史观的要领，至今我们对马克思唯物论基本原理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这些范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革命性、批判性的本质，必然导出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的存在与斗争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演变，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陈独秀曾说："1848 年马克思和因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①] 在有阶级的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必然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传播者运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精神加以论证。"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使劳动阶级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即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底手里，就是集中在组成权力阶级的劳动阶级手里！"[②]（今译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 页）《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经典，更是被传播者们频繁摘录出来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社会作了科学的预言，早期传播者多次引用该经典中的这段著名的话："从资本主义社会推移到社会主义社会底中间，必须经过一个革命的变形时期。同这个革命的变形时期和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

①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1922 年 7 月 1 日。

②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1921 年 8 月 1 日。

渡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①]（今译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施存统似乎预知有人会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话来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强调《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逝世前8年的著作，体现了他的“成熟的思想”。[②]他们不仅将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识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派”、“正统派”区别的标志，而且作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革命手段。毛泽东曾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之旅：“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视阶级斗争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一条联系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的金线。毛泽东更是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经历了我国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探索，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的剧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成了热点议题之一。这种反思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必要的，是走向成熟的标志。有的学者也反思到早期传播史，这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其运用。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考察，必须将历史放在特定的环境里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在此笔者谈几点看法：

首先，恩格斯曾明确表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为了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而提供的科学理论，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真正动力”、“直接动力”、“现

① 分见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3、第6号），无懈《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创刊号），均《劳农制度研究》（《共产党》第5号），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2号），CT《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等。

②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③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页。

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等表述。尽管到他们晚年，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在改造社会的动力、途径等方面他们有了新的认识，但还是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1894）[①] 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他们中不少人，在寻求救国之路时，曾企图避免用激烈的流血手段（即“温和的革命”），达到国强民富。但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教育了他们，在中国鼓吹改良主义道路是空想。他们都曾追求过资本主义，但帝国主义的侵略阻塞了他们的追求，这样才另觅共产主义的新路。青年毛泽东的话有代表性，他说：“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②] 众所周知，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还说过“我们的觉悟”是“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③]20 世纪末，有学者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所谓反省，提出“告别革命”、“改良万岁”等“新思维”，一度在中青年学子中流行。鼓吹这种论调的人，如果不是对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严重缺失，或者幼稚无知，那就是故意歪曲历史，别有用心，不然就是玩弄历史，标新立异，标榜自我。

其次，当年传播者旗帜鲜明地传播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我国社会科学史上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为救亡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单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时髦学说引进的，而是作为改造中国的锐利思想武器。长期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索、实验过各种救国方案，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其原因是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乱源、解决中国乱源的动力，以及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等社会革命的基本问题。然而通过唯物史观的引进，给先进的中国人提供无产

①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5 页。

②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 年 12 月 1 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8 页。

③ 守常：《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 29 号，1919 年 7 月 6 日。

阶级宇宙观，使他们逐渐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通过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再次，当时世界与中国社会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民主革命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尖锐对立而没有调和余地的时代，是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革命时代，因此阶级斗争成为救亡图存的最主要手段和形式（笔者注：不是唯一手段和形式，例如李达就肯定议会斗争；又如在中共一大上就讨论是否可以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等），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也是近代中国现状的客观要求。

最后，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受一定经济条件的制约。因此毛泽东早年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表明在早期传播中确实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单一、简单化，以及实用主义的倾向。这种传播中的缺陷后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更是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传播唯物史观的“自觉辩证法”。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称谓“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斯大林的提法。马克思生前称自己的辩证法为“我的辩证方法”，[①] 并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阐述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本质上的不同，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②] 恩格斯在经过马克思同意的《反杜林论》第2版的序言[③]中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自觉的辩证法”，它与彻底的唯物论成为唯物史观的两大组成部分。





▲ 瞿秋白（1899—1935）与《社会科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铅印本）（瞿秋白纪念馆提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迄今为止我国学界一致认为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简称“三讲义”）等讲义第一次将辩证唯物主义传播到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影响的近现代思想史与瞿秋白研究专著，如《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陈铁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庄福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唐宝林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持此说。到21世纪这个结论依然被沿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陶德麟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专门设计了一节："瞿秋白：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2008年出版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刘小中、丁言模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仍承袭此说。

如此反复宣传，“瞿秋白是我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几乎成了定论，无人质疑。然而历史并非如此，这个提法不是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历史，而是用后来的概念诠释历史、“先入为主”研究方式的典型实例。

首先，根据现有的史料，五四时期马克思“辩证法”第一次明确出现是在1919年7月18—24日《晨报》副刊刊登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中，该文开首就说明“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就是当时世上流行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他学说的新特征，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拢起来就是了。”“世人往往将辩证法看做有诡辩的意味……辩证法并没有诡辩的意味，……其实这辩证法，可算是进化的思索法，换句话说，就是将一切事物，作为历史的考究。因为一切事物，是变化不息的。所以要理解事物，便不能不理解他的生死和盛衰。主张唯物论的人，要把这个思索法，应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上头，这就是‘唯物史观’，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据。”①

其次，1922年1月23日、3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用了

---

①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登的《马克思学说》（顾兆熊）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受黑格尔Hegel、费巴赫Feuerbach的影响，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宇宙是在不停变化之中的思想，“以为历史是一个永久不停的变化轮机，并且是一个永久不停的进步轮机”的思想。此处虽然没有出现“辩证法”这个词，但有唯物史观包括辩证法的意思。该号《新青年》因印刷拖延，到9月才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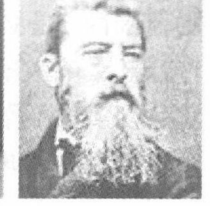
4个版面刊登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简称《什么？》）一文，在早期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篇1.3万字的论文其实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第二章哲学部分的解读本。它比《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进步之处就在于在理论上论证了唯物史观是“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的“巧妙地结合”体。[①] 此前人们只是注意唯物史观的物质本体论，而没有认识到它的辩证方法论原则，《什么？》根据《发展》的思想，指出唯物史观彰显了19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终结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近代德国哲学，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去，但唯物史观又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后继者”，它很“巧妙”地将黑格尔哲学里面的辩证法的“思索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观察法”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使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哲学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覺悟

民國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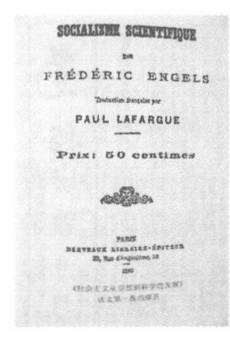
▲1922年1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


▲黑格尔
（1770—1831）


▲费尔巴哈
（1804—1872）

《什么？》用辩证的思想剖析近代唯物主义，指出近代唯物主义虽然看到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但他们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史观则吸收并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克服了近代唯物主义的不可逾越的认识障碍。《什么？》直接翻译了《发展》第二章中关于对“新德意志哲学”（今译“近代德国哲学”）三段最精彩的论述，指出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将近代德国哲学达到了“极顶”（引者注：这词后译为“顶峰”。在2009年版的《马克思恩

① 此小节引号内的话，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出自《唯物史观不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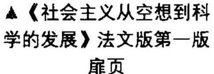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FRÉDÉRIC ENGELS

PAUL LAFARGUE

Prix: 50 centimes

PARIS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第一版扉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各种中文本

格斯文集》第3卷第538页，用“完成”代替“顶峰”）。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处在不断的运动与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把历史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但他最终又将历史看成是“观念”的结果，物质是不断运动着一个通过“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顶峰的过程。他虽然认识事物是内部运动的结果，但在事物之外还有一个“绝对观念”，从而“把一切事物都弄颠倒了”（引者注：今译为“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

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近代唯物主义都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与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形而上学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必要的方法”，但若一旦超出了所限的范围，就成为“偏见”、“空想”，陷入不可解的矛盾中，结果是“只见树而不见林了”。形而上学是将一切事物不作“活的观察”，而作“死的观察”，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一切事物都是在有规律的运动着。正如恩格斯所言：“这唯物史观底思想，恰如对于自然的辩证法（Dialectic）解释之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不可能了的一样，使历史方面的哲学告了终。”

《什么？》强调辩证法是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在《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①] 这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什么？》运用辩证法，特别强调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指出经济、环境产生意志、思想，“人底力量、人底行为，都是由人底意志出发，思想就是这意志底表现”。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经济支配权，必然造出制度、习惯、思想、意志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496页。

"以确保其优胜地位"。新的生产工具出现，新的生产力出现，必然就会产生新的政治力，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信仰。新思想是"革命的要素"，被支配的阶级为"新思想所动，而加入革命军。因为新思想是经济变革底反照，而这经济的变革又是社会全体进步底表现的原故，所以新思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素，是物质的生产变化所依以传到社会组织的唯一媒介。"经济越落后，越是需要"新主义、新思想"以启蒙，这样落后的国家才能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因此文章特别强调在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传播马克思"新主义、新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样，通过李氏的诠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体较为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中国救亡运动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

再次，1923 年 3 月 1 日，在《少年》第 7 号上，发表了石夫节译，阿多那斯基（V. Adoralslay）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阐释了马克思辩证法的 5 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思想（意识）由人生存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第二个规律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以统揽全局的观念观察事物的发展。"在政治上，这个规律要我们不仅注意到一国的情形，还应注意到各国的情形。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全国中和全世界大势中观察阶级斗争的发展与事变。"第三个规律是在运动中研究问题，说明辩证法观察事物的方法论。第四个规律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们不应只在环绕我们的环境，我们应改变环境。我们不应只争斗、思索争斗，我们应加入争斗，从争斗中吸取教训。"第五个规律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着的，没有永远不变的"真实"，因此制定方略时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变化。《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油印本，读者极其有限，国内读者无法读到，瞿秋白后来将其在《新青年》第 3 期（1924 年 8 月）刊发，说明此文的重要。同期还发表了普列汉诺夫著的《辩证法与逻辑》。

最后，"瞿秋白是我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也有悖瞿秋白的原意。这从三个方面来论证。

第一，本著作绪论已经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是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苏联哲学界确定的，瞿秋白编写三讲义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因此我

们不应该将瞿秋白还不知道的概念强加于他。

第二，瞿秋白在以上三个讲义中，传播的是“dialectics”（“互辩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有意思的是，瞿秋白就是生怕别人误解他的意思，特意在相关译著里，专门说明他不同意将“dialectics”译为“辩证法”，指出将“dialectics”译成“辩证法”是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这种翻译“不甚确切”，因为“‘辩证’两字和普通论理学（逻辑）无所分别，而且和互辩法原义无甚关系。互辩法的原意，本从希腊字‘Dialog’——‘对话’而出，意义是互相辩驳；至于互辩法一词的哲学上的意义，实在是：相反者往往相成，矛盾者有时可以互变。……所以如果意译，则不如译为互辩法及互变律，两词可以同用，重要却在那一个‘互’字上”；或者音译“第亚力克蒂”（罗马字母之音）。[①] 至于瞿秋白的见解是否正确，应该将“dialectics”译成“辩证法”，还是译成“互辩法”，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时，应该尊重瞿秋白，“回到瞿秋白”。

第三，瞿秋白阐述的“互辩法”实际上与恩格斯的“自觉辩证法”是同义语，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瞿秋白传播“互辩法”的理论直接来源于布哈林1921年年底出版的《历史的唯物论》。瞿秋白以上3种讲义实际上是《历史的唯物论》的中文解读本，《现代社会学》第1章、第4章，直接取材于《历史的唯物论》的第2章、第5章。布哈林对马克思哲学的诠释基本上是遵照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思路。换句话说，布哈林是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置入唯物史观的框架内阐述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历史的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切基础之基础”，“这种学说底要点是创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人称之为唯物史观或简称‘经济的唯物论’”。[②] 因此1930年上海泰东图书馆出版这本书时，直接将书名译为《唯物史观》。布哈林在书中非常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除了全书贯穿这个理论外，还辟第3章“辩证法的唯物论”进行专门论述。在布哈林那里，辩证法是唯物史观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概念和内容。

值得强调的是，“瞿秋白是我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第一人”的说法还无法正确评价瞿秋白三讲义的历史价值。

---

① 瞿秋白译：《新哲学——唯物论》，1926年版，第157页译注。

② 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普益出版社1930年版，第9页。

首先，瞿秋白的三讲义标志着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者。这些讲义并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运用唯物史观建立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肇始。社会学是年轻的学科，创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盛行于美国。19世纪末随着西方社会科学传入我国。“社会学”一词最早是从日文转译的，严复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学的最早传播者，他将来自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译成《群学肆言》而成为我国现代思想启蒙的重要书籍。1913年上海教会学校浸礼学院（后称沪江大学）首开社会学系。1921年厦门大学开设历史社会学系，此乃为国人办系之始。随之各种社会学著作、讲义也就纷至沓来。1923年1月瞿秋白从苏俄回国不久，便被国共合办的上海大学聘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除亲自授课外，还编写了以上三个讲义。此前无论教会大学，还是国人开设的学校，社会学的教材与书籍都是美英出版的专业著述，孔德、斯宾塞、斯摩尔、齐美尔、苏维尔等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所编著的社会学至多是资产阶级的“产儿”。[①] 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学鼓吹的各种观点，指出：“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发展和崩坏的原因何在？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法律、科学等）之间的关系如何？”[②] “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③]《现代社会学》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是物质的社会，经济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他引用“互辩法”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是由矛盾运动着的物质所组成的，社会各种复杂关系是互相联系又互动。他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精神（思想）的关键作用。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它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有目的的行动，因此精神作用很大，特别是社会革命，被压迫阶级的思想觉悟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现代社会学》其目的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最终必然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现代社会学》与其他两个讲义，成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①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页。
②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③ 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其次，瞿秋白的三讲义第一次论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基本法则。《社会哲学概念》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详细地介绍了辩证法的矛盾运动、否定与否定、量变与质变等基本法则，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考察宇宙、社会、思维的方法论，矛盾运动是“宇宙及社会的‘根本属性’”，[①] 在三个法则中起主导作用。瞿秋白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在三讲义中分析了物质与精神、自由与必然、偶然与必然、一般与特殊、善与恶、经济与政治等哲学范畴，初步分析了中国特殊社会与革命的性质，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我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据此制定正确战略、策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最后，三讲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主渠道由日本渠道转向苏俄渠道的重要标志之一，瞿秋白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俄文翻译家。众所周知，我国传播主渠道最初是日本，语种是日文。第一篇宣传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底本是河上肇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主要底本来自日文；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主要参考堺利彦翻译的《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的参考文本来自日文本和英文本。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正式特使魏金斯基来华后，苏俄渠道逐渐成为传播主渠道，但最初语种多半是英语，并非俄文。在第一批传播者中，掌握俄语的人只有瞿秋白、杨明斋、俞颂华、李仲武、张西曼等几位，而瞿秋白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于 1920 年 12 月至 1923 年 1 月，在苏俄采访，发回了大量的报道，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个真实的苏俄。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是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本，前后出版了 20 余种语言的版本，影响很大。该书的中文本虽然是 1930 年才出版，但瞿秋白由于精通俄文，捷足先登在三个讲义中首先运用了书中的主要内容，而且《现代社会学》第 1 章、第 4 章，直接取材于《历史的唯物论》的第 2 章、第 5 章。从某种意义上讲，三讲义实际上是《历史的唯物论》的中文解读本。也就是说，《历史的唯物论》主要思想是先被瞿秋白运用于中国革命，随后才有中文本。从此由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述越来越多，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的统治地位。

---

①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4 页。

四、传播剩余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科学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这个伟大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创立，使人类摆脱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桎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一切主要方面所呈现出的规律，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馬克斯資本論解說

晨報

馬克思研究

勞動與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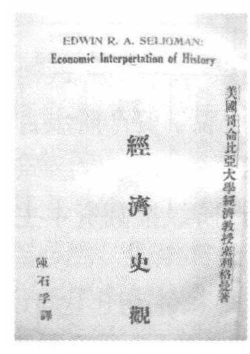
婦女問題

▲ 1919 年 6 月开始，《建设》发表戴季陶等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

▲ 1919 年 5 月 9 日《晨报》发表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一文

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早期传播者最用力的方面之一。1919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 日，《晨报》刊登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食力”根据河上肇的日译文转译，今译名《雇佣劳动与资本》）。6 月 3 日至 11 月 1 日，连载了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今译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均有介绍政治经济学的专门内容。戴季陶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合作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建设》上连载，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有《近世经济学史论》、《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文学社 1920 年版）、《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10 月版）、《经济思潮史》（小林丑三郎著，高一涵译，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1921 年版）、《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 1922 年版）、《价值价格及利润》（马克斯著，李季译，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等。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是随着物



▲《经济史观》封面，1920年10月出版


▲《经济史观》作者塞利格曼（1861—1939）（吴应銚提供）

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亦有人将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对人类经济规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进行深刻剖析，因此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的有机的联系。[①] 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以前的经济学不同之处，就在于剩余价值论的发现，所以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的“根本观念”。[②] 传播者指出“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主，资本利息土地货币，都是劳动者创造的”，[③] 结果劳动者却一无所有。为什么？因为被资产阶级劫走了。资产阶级劫走劳动者劳动成果的秘密在于剩余价值。什么叫剩余价值？传播者从价值入手，将物品价值、资本、利润、价格、劳动价值一层一层的剥离，说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小部分作为工资给了劳动者（即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将其劫去，通过流通过程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本质即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④]

传播者将剩余价值理论向劳动群众进行灌输，成为传播史的一大亮点。这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劳动界》等刊物上，体现在1920年5月中共早期组织有组织地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举办的纪念活动中，而多家媒体开辟“劳动日纪念专号”形成高潮。传播者用劳动大众的语言，向劳动大众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运用提问的形式进行宣传：有人说资产阶级的衣食住行是买来的，但他的钱从何处来呢？钱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体现的是物品交换价值，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商品是劳

---

① 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③ H.M.（李达）：《劳工神圣颂》，《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④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

动者创造出来进行交换的物品，因此钱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表面看来，资产阶级用钱换商品是合理的，但考核生产—产品—商品—货币转变过程，就会发现劳动者做工时间所造成的价值，超过了所得工资的价值，这部分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无偿剥削去的钱。资产阶级用这些钱过着奢华的生活，无偿掠夺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他们是强盗阶级，劳动者应该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社会的主人。①

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

妇女问题在我国十分重要，主要是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深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妇女的解放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先进知识分子反对封建礼教的一个重点话题。新文化运动的猛士们，对封建妇女观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声讨，强烈谴责封建专制对妇女的压制，痛斥儒家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鞭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毒害妇女的罪行，攻击所谓的“贞操”、“节烈”等戕害妇女的“畸形道德”，探寻妇女解放的途径。他们旗帜鲜明地要求男女平权，掀起女权运动。有的主张妇女要自立，要有受教育的权力；有的主张妇女应经济独立，应有经济支配权；有的反对婚姻包办，主张自由恋爱；有的主张妇女社交公开，甚至要有参政权。李大钊提出了废娼的五大理由：为尊重人道、为尊重恋爱、为尊重公共卫生、为保障法律的人身自由、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他提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首先“应该把这妇女界最大的耻辱革除，不使他再留一点痕迹”。②毛泽东的态度最激烈，他主张成立“女子革命军”，③铲除万恶的封建社会，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

新文化运动的猛士们虽然尖锐地针砭了封建的妇女观，有的也认识到妇女问题是社会的问题，并提出只有妇女真正解放，真正的 Democracy（民主）才能实现。但他们对罪恶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还无法认识，因而也就无法找到妇女解放的物质力量和真正解放之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后，他们重新审视妇女问题，就有了全新的认识。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先驱，在酝酿《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他就运用已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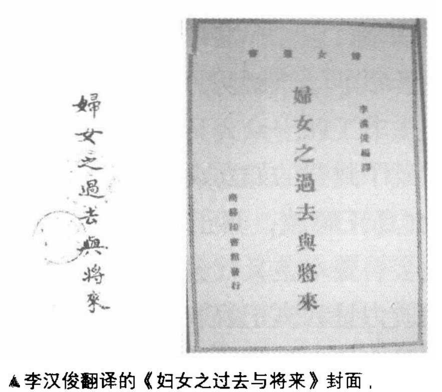
① 汉俊《强盗阶级底成立》，《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10张，1920年5月1日。

② 常：《废娼问题》，《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

③ 泽东：《女子革命军》，《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问题，鲜明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有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有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①]1919年8月，他非常鲜明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包括妇女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②]陈独秀对妇女运动也发表了《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鲜明地将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早期传播者中，对妇女问题谈得最多、最深刻的恐怕是"二李"（李达、李汉俊）。1919年10月，李达在《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上发表的《女子解放论》，可谓是开了五四时期用唯物史观论述妇女问题之先河，将妇女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赶紧由精神物质两方面，预备做自己解放的事。为男子的既然晓得世界大势，标榜人道，就应该晓得'平民福利'，'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道理，赶快帮助女子解放才算得拥护人权。"[③]后来他还发表了长文《女权运动史》（1922），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现代女权运动的历史。李汉俊在《星期评论》1920年新年号上发表长文《男



▲李汉俊翻译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封面，1921年7月出版

① 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③ 李鹤鸣（李达）：《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

女解放》，在社会上反响较大。第二年7月，他编译了山川菊荣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27年再版了6次。全书五章203页：绪论、原始社会的男女关系、文明社会的男女关系。近代女子运动、结论。此外还有附录：女子与职业问题，其中有"劳动阶级底女子问题"专节。《男女解放》虽然发表在前，实际上是李氏受到该书启示写出来的，主要内容：

第一，剖析妇女在旧社会所处的地位。广大的妇女，受到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家庭中，在社会中，束缚重重，精神肉体，不能自由，活像监狱中的罪犯一样"。[①] 为什么呢？李汉俊从政治、法律、经济、伦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妇女在家庭里是男人的奴隶，经济上不能独立，所谓贞操、娼妓等所有妇女的问题，都是因为存在极其不合理的私有制造成的。

第二，指出妇女根本解放之途。妇女解放不是妇女单独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造成社会不公不平的是私有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②] 他批评了妇女要男子解放的观点，指出女子与男子是绝对的平等，女子解放是女子自己的事，男子只有帮力的能力，是没有解放女子的能力的，因此"男女解放是同时的，没有先后的"。[③] 妇女不仅是要求与男子在职业、教育、经济等方面平等，其解放根本之途是与受压迫的男子一起，团结起来，推翻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实行了男女平等，妇女的自由与解放才能真正地解决。

六、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欧洲两次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部国际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历史，因此介绍国际共运史，成为中国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我国媒体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时，就陆续介绍国际共运史。1919年3月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后，我国报刊及时作了报道，甚至刊登了第三国际成立宣言。[④] 但作为自觉介绍第三国际、传播共产国

---

① 李人杰（李汉俊）：《男女解放》，《星期评论》1920年新年号。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1919年8月7日《晨报》刊登了"毅"翻译的《新共产党宣言》。翻译者声明："我并非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不过世界上发生了这件事情，应该翻译出来，供作研究世界新潮的材料罢了。"


星期评论

▲ 1920 年 5 月《星期评论》分三次发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一文

际的革命理论则是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其中“三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的贡献十分耀眼。李大钊是我国最早在媒体上赞扬苏俄革命与国际共产运动的，他撰写了《庶民的胜利》、《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等文章。李达在 1919 年年初登上舆论舞台便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等文章。1920 年 5 月李汉俊发表的《劳动者与“国际运动”》则是比较系统和全面介绍国际共运史的文章，全文约 2. 3 万字，分三次在《星期评论》第 51 号、第 52 号、第 53 号（1920 年 5 月 23 日、30 日，6 月 6 日出版）上发表。

国际共运史是一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对国际共运史的介绍，使中国人民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纲领、手段、策略、目标等，确定共产主义才是劳动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是世界性的，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社会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方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国际共运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的历史，通过学习这段历史，使中国人民知道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提高了对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鉴别力，特别是具有迷惑的“正统派”支持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恩格斯组织的第二国际的革命精神“付之流水”，是公开的“变节”；战后他们又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主张议会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①] 而列宁领导的红旗万国同盟（笔者注：今译第三国际），坚持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派。

同年 8 月、9 月，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两封信，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

① 汉俊:《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下),《星期评论》第 53 号，1920 年 6 月 6 日。

共产党与第三国际，使毛泽东等湖南同志通过欧洲渠道对共产国际有所了解。

先进的中国人是通过十月革命的曙光确定马克思主义的。五四运动后，他们聚焦苏俄革命与建设。这方面的图书陆续出版的有《劳农政府与中国》（张冥飞辑译，1920年6月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印、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新俄国之研究》（邵飘萍编著，1920年8月日本东瀛编译社发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19年7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先刊登，1920年出单行本）、《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李绰译）、《劳农俄国研究》（李达编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新俄国游记》（瞿秋白，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等，这些图书与《晨报》发自苏俄的报道，有益于中国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苏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中国与俄国相比较，认为两国有许多相同之点，如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中国有武人、官僚、财主的跋扈，与俄国的贵族、僧侣、资本家、大地主的暴虐没有什么不同。中国无产阶级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与俄国无产阶级相同。中俄两国情形既然相同，列宁领导的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政权，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的”。[1]

宣传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的重点。他们在叙述国际共运史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无产阶级建党的历史和党的宗旨、纲领与原则等，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思想指导与实践的榜样。其中《俄国共产党党纲》中文本的问世在我国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俄国共产党党纲是列宁1918年起草，于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八大上正式通过。共产国际的文件显示，在1920年国内出





▲左图《俄国共产党党纲》封面，1922年1月出版；右图《俄国共产党党纲》中文本翻译者张希曼（1895—1949）（张小曼提供）

① 无懈（周佛海）:《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创刊号，1920年11月。

版过一个单行本，但迄今没有找到。[①] 有案可查的是1922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希曼译，以下简称《俄共党纲》)，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党纲是政党的一面公开的旗帜，但中国共产党是在秘密状况下成立的，当时没有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纲领。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中共通过公开出版俄共党纲，亮出了自己的战斗旗帜。这恐怕是《俄共党纲》第1版就印行3000册，到1927年发行了6版的主因。

《俄共党纲》中文本共40页，有总纲、普通政治范围、民族关系的范围、军事范围、裁判范围、人民教育范围、宗教的关系范围、经济范围、乡村经济范围、分配范围、货币和银行事业范围、财政范围、居住问题的范围、社会安全劳动保护的范围、人民健康的保护范围。《俄共党纲》全面阐释了列宁在苏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与创新，规定了俄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执政任务，基本精神与1918年7月10日全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有相通的地方。其实《俄共党纲》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距离，但对中共影响很大，就直接影响而言，首先，它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帮助年幼的中共对世界进行整体把握。其次，它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阐述，使中国革命获得从军阀、财阀手中夺得政权的根本手段。再次，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权的提法，“少数资本家利用和压制多数劳动家〔者〕的手段”[②] 的分析，以及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性，一方面用政权的力量压制无产阶级，一方面仅在形式上公布劳动群众有“集会、结社、印刷种种的自由和人民一律平等诸政治权力”，实际上劳动群众始终处在“经济的奴隶地位”[③] 等，武装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劳动大众，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劳农制度的“民主政治”；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给劳动群众“以享受民治的权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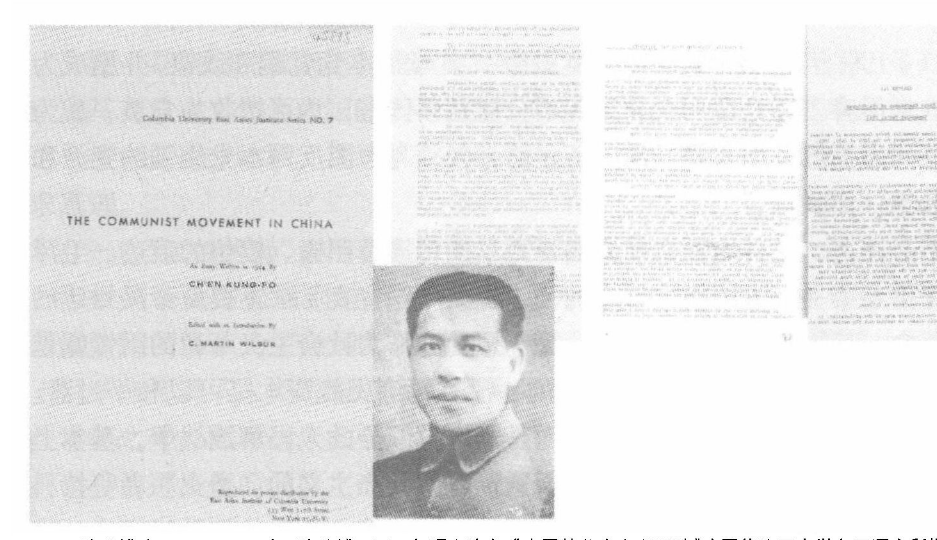
① 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1920年9月1日披露：“现已出版了《俄国共产党纲领》”(《丛书》第1辑，第41页)。又根据张西曼在1949年亲笔写的简历，称1918年他开始节译俄共党纲，1920年出版了党纲，张小曼：《俄国共产党党纲》，《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② 希曼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印行，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11页。

自由”，① 等等。以上思想在 1920 年 11 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第一个党纲中有所反映。最后，这份党纲与《共产党》月刊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英国共产党党纲一起，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的制定。

目前我们看到的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是俄文本，长期庋藏在第三国际的档案机构里，直到 1957 年才由苏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部分档案一起移交中共中央；一是英文本，来自陈公博 1924 年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国内广大读者看到的这两个中译本，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于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公布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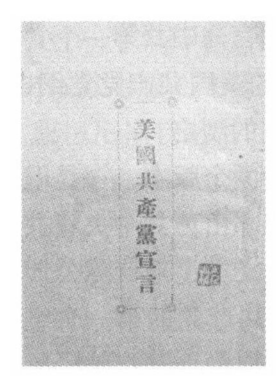


▲陈公博（1890—1946）；陈公博 1924 年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提供）

以美国共产党党纲为例，第一章：“第一条 本党定名美国共产党。就是国际共产党（笔者注：即共产国际）在美国的一个支部。第二条 美国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织的。他的宗旨是要教育劳工们组织去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工专断的政治，废除资本制度，发展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第二章 入党资格：“第一条 不论任何人，凡接受国际共

① 《俄国共产党党纲》，广州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印行，第 11 页。

② 《“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11 页。这两个纲领均有 15 条，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内容是一致的，为了简便计，本处以俄文本为准



▲《美国共产党宣言》封面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产党及本党的原理和方法的，愿意顺从本党的规律并活动本党的事务，就可以入党做个党员，但先须脱离与其他一切政治团体的关系。”①

1921年中国共产党党纲与此相对照的内容有：“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② 入党资格：“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③

不必讳言，这种比较也使人们看到早期传播者照搬、模仿的痕迹。毛泽东曾评价与第一个党纲精神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是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④ 尽管有这些缺陷，但这批盗取共产主义的“圣火”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给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他们敢于探索，敢于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进者永远学习、颂扬。

---

① 《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③ 同上。

④ 《编者按》，同上书，第1页。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最初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背景下所发生的一次伟大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场。20 世纪初的世界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面对和平与战争的时代主题，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了“修正派”、“正统派”和“多数派”（笔者注：列宁领导的俄共）。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以及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我国早期传播者看到了新世纪曙光，于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指导思想，初步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尽管这个探索还十分幼稚，甚至革命战略发生了偏差，但勇于实践使他们不断寻求真理。

一、“以俄为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中国革命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回答：为了救国。他们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来重塑救国之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世界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中国不在世界之外，面对这个大变局，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是救国并赶上世界前进步伐的便捷之道。这个新认识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的《短言》中有着清晰的表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引者注：今译为生产方式）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实验场。”中国的劳动者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俄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因此“以俄为师”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是欧洲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李汉俊翻译了 1867 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的话：“我在这本书里面

所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与这方法相应的生产事情和交换事情。现在作这生产方法、生产事情、交换事情底模范的，就是英国。所以我把英国用作了我理论的说明底主要例证。如果说德国底读者，说英国农工劳动者底状态不与自己相干，或说德国底状态还没有那样坏，聊以自慰，我就要向他们说‘这是你自己底事！’了。”[①]（今译文：“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产生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的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后写道：“我现在要把马克思赠送他底同肥〔胞〕德国人的这一段话，一字不易地转赠给我们底同胞中国人。我希望我们中国底同胞，不要把现在先进各国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对岸之火’，取‘与我无关’的态度，也把彼底由来、内容、结果，拿来仔细推究，以准备缩短并缓和我们中国‘分娩底苦痛’！不幸之幸，是我们中国比人家进化在后；中国将来必然经过的环境，人家都已经过了，由这些环境里产生出来的学说，人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只待我们拿来求了解，无须我们像这些学说底创立者们绞肠挖肚地思索了。这在我们后进中国人实在是天赐之幸。这天赐之幸只在等着我们中国人伸手去受，我们如果连这手都懒得伸，就未免是太甘暴弃，恐怕终免不了要遭天谴呢！”[②]

二、马克思主义要与国情相结合

传播者们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但又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活的东西”，不能死死地“抱着”，[③]必须与国情相结合。最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李大钊。他在宣传西方民主思想时，就意识到外来文化传播要与本土文化相结合。1914年11月，他在《国情》一文里斥责“洋客卿”有贺长雄、古德诺等为袁氏新约法而侈谈国情是“皮相之见，不叶

① 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6日。

② 同上。

③ 汉俊：《读了张闻天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6日。

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1]1919年8月，李氏的国情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看到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新纪元，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初步分析。李大钊的“国情说”并非仅他个人所见，而是代表了传播者的共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进行所谓社会主义论战时，均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境”相结合。

▲ 1922年6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中关于“天谴”的一段话

1920年12月，恽代英与刘仁静围绕“社会革命”等展开讨论时，刘仁静指出“中国社会革命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 Inslitions Customs 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3]1921年6月12日，张崧年（申府）在巴黎投书陈独秀，介绍英、法共产党的最新动态后指出，“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中国改造之路在于搞代议政治，搞议会，那“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然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4]张崧年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的话，与9年后毛泽东说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在哲学层面上的意思是一致的。但是，中国的现状毕竟与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境况相差太远，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两个决不会”的思想，[6]中国现代经济十分落后，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亦为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利用，作为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攻

---

① 李大钊：《国情》，《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③ 《仁静致代英》，1920年12月2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

④ 《张崧年致陈独秀》，1921年6月12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

⑤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⑥ “两个决不会”指的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着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6卷第6号。

击传播者的重点。传播者们群起反驳，在驳辩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基本路向。

传播者们非常清楚“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并且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与基础巩固的必要条件至少有两个：无产阶级的成熟（有自觉，有训练，有组织）与生产力比资本主义要发达。[①] 他们承认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以落后的现代经济去实行共产主义，违背马克思的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原则，只能是“空想”。[②] 那么他们是如何迎接挑战，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第一，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应抱正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能随便割舍。它提供改造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随意改变的，这个理论体系正确地解释了历史，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经济决定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从世界大势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制度已经崩坏，十月革命标志着共产主义新制度必然继起。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绝不是没有资产阶级；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十分幼稚，但绝不是没有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均带国际性，“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因此中国也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③]

第二，强调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死的东西，作机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其政策、策略是随着国情、国民性、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以为共产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配提倡才能实现，这实在是大错特错，被死书蒙蔽住了”。[④] 传播者从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的思想、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⑤]中获得启发，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一些闪光思想，接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

闪光思想之一：有人引用马克思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本写

① C.T（施存统）:《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

② 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的提法及其内容，学界有不同的议论，有学者提“东方列宁学”、“东方革命战略”、“东方理论”等，本书采用“东方革命理论”这个提法。

的序言里，回答俄国这个现代经济落后，仍保留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的国家是能够发生革命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俄罗斯革命成为西欧劳动者底革命信号，双方革命都能因此完成，则近世俄罗斯村落自治体里底土地共有制度，变成共产主义发达底基础，也未可知。”[1]（今译文：“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 页）这是对马克思早年“共同胜利论”的发展，或者说是对“共同胜利论”的修正（补充）。据此提出问题，既然像俄国这样现代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以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步其后尘呢?

闪光思想之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释了从资本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分有革命过渡期、共产主义的半熟期、共产主义的完成期。[2] 与过渡期相适应的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俄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它与中国这样产业幼稚的国家，其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3]

闪光思想之三：列宁正是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过渡期思想，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在《关于俄国现时经济》里指出：“我想研究俄罗斯经济的人，否认其‘过渡性质’的，恐怕一个人都没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名称，不过表示必定要实现向社会主义推移的这苏维埃底决心而已，并不是‘说现在的经济秩序已经到俄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的东西’底意味，这决不是的。”“在物质的意义，经济的发展，产业的意义上，我们连社会主义底玄关（引者注：指大门口），都还没有达到。”[4]（今译文：“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从物质、经济、生产的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

① 光亮（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 年 9 月 8 日。
②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1921 年 8 月 1 日。
③ 同上。
④ 河上肇著，光亮翻译:《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1922 年 7 月 1 日。

口'，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入口'，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论粮食税》，《列宁选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

这些闪光点有极大的价值，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必由之路，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若干过渡阶段；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阶段性、长期性，中国进行社会革命不能一步到位，而要分几步走。但他们充满信心，因为俄国与中国一样，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现代产业不发达，既然俄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第三，强调建立共产主义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必须有"人类底意志"作用。[①] 社会运动固然是物质运动，但人类的物质运动具有特殊的精神表现形式。早期共产主义者强调意志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一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变化之间是由人类意志作"媒介的"。[②] 人类的意志就如同机器里面的连杆、链带、齿轮，如果人类的发展失去了意志，就"如同离掉了连杆之类不能想象机器底运转"。[③] 革命需要发动无产阶级自觉地参加，建设共产主义制度更需要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现代经济才能快速的发展。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无产阶级，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行动起来，就可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传播者还认为意识是没有国界的，苏俄既然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便可影响中国，劳动群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便必然提高思想觉悟，转化成革命的行动，推翻资产阶级，握有政权。

第四，传播者根据列宁的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思想，指出现代实业落后的中国，要赶上世界的步伐，其捷径就是不必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将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工业化的进程将比资本主义要快得多。

但从总体上讲，以上思想缺乏实践支撑，是有选择性的从马克思主义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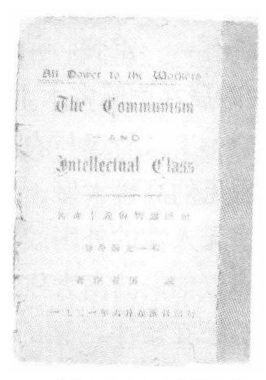
① 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作、苏俄新经济政策中获得的灵感，因此这些思想有很大的模仿性，其概念也比较模糊。同时，他们的探索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发展普遍（一般）规律来解答我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而没有突出“个性”，即中国社会、革命的特殊性，因而存在着片面性。但是这些探索，初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来中共民主革命两步走的战略作了理论铺垫。

三、《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简称《阶级》)体现了中共一大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最高水平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封面（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阶级》1921年6月在汉口印行出版，作者田诚，小32开本，铅印，共10页，5600余字。封面白底黑字，印有中英文对照的书名，最上面印有英文“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尽管作者的生平目前尚不清楚，[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该小册子的考察。

第一，《阶级》第一次正确提出我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剖析各个阶级，指出革命的对象、动力等。社会性质的正确判断是政党制定政略的客观依据和出发点。前面已经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判断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此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战略。令人兴奋的是，《阶级》从世界大趋势透视中国，提出中国是“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②]这是传播者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前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接近实际情况的表述。《阶级》进而对这样一个特殊社会的阶级构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秩序的封建社会，“稍微明了一点中国现状的人，都知道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渐渐布满了这个酣睡的中国”，它们“用伟大的经济力”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做后盾”，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麇集中国，都在这里张牙舞爪的想夺到权利”，所谓的新银行团就

---

① 田诚在中共早期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如第9期上就有《资本主义世界的休战纪念》、《国家主义者要注意罢工运动》、《真不愧好人奋斗》3篇，在第10期、第13期、第14期、第15期、第16期上均有文章面世。说明他不是一般党员，而是中共早期重要成员。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谜。

② 本小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

是代表的国际资本主义是吸取无产阶级“血髓之有力的铁甲车”。《阶级》虽然没有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但文中的“国际资本主义”、“国际掠夺阶级”实质指的就是帝国主义则是无须争辩的。这样就使中国人民知道造成中国之乱，造成中国衰落的主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军阀是造成中国的另一个乱源，它们的互斗、兵匪的劫掠，造成了一般贫民惨遭杀戮，流离失所的“惨痛的生活艰难的现状”，“这种遭遇不是特殊阶级——军阀——赐给贫民的恩惠吗？”本国的资本家也是掠夺阶级，它们“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作恶更是厉害呢。”

工人阶级与农民是遭到资本家、地主剥削的劳动者。大都市“随处可以看见的高楼大厦，那一个不是劳动者流了许多血汗造成的，现在住的却是强横无人性的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他们货栈里积满了掠夺得来的货物。但是靠近他们的高大住房和货栈的侧边，那些替他们流过血汗的无数劳动者，或是缩在矮小污秽的茅屋里，或是流落在街道上，现出极褴褛饥饿不堪的样子。”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把气力卖给资本所有者”。乡村的贫苦农民，没有田地，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汗、牛、锄、犁等，来耕种田地，但是地主们是很有福气的，能够安乐的坐在家里，得到他的佃户供奉他半数以上的田地产物。要是遇到干旱水灾，地主并不减少租谷。佃户呢，吃了一年的累，结果还是受饿。佃户还要奉承他的主人，服从他，把钱送给他，要是不然，地主就会把他的田地夺回去。”“为什么地主能这样做呢？因为他有土地的私有权。”

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是《阶级》的亮点之一。文章从国际视野论述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不是受生活的压迫，变成掠夺阶级的走狗，便会被利诱而作掠夺阶级的爪牙”。十月革命后，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世界两大敌垒，“界线愈加分明，激斗越加紧张”。一方是日益颓萎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中心组织就是第三国际。知识分子必须作出选择，“是做压迫阶级的附属物呢？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呢？这是要你们自己仔细选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像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那么唯一的责任，就是“在国际红色旗帜之下”，推广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造成“往田间和工厂里去”的声浪，和“工人和农民握手”。革命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中应该发挥作用，主要就是“把我们的知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我们要去教育劳动者，组织劳动者的先锋队，指挥他们与军阀官僚资本家抵抗，引导他们向着共产主义的道上走。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只有共产主义是解放世界的明星。”

特别要强调的是，《阶级》中突出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握手”，以及向劳动者灌输先进思想的认识，体现了“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精神，它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创立的必备条件。

关于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问题是五四时期舆论界的热门话题。1918年11月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鼓吹劳心者向劳力者位移。1919年2月，李大钊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①]5月5日，《晨报》发表文章，十分明确地指出“身的劳动者”与“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②]10月21日，一个叫沈乃人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知识阶级觉悟者的办法》指出：“其实劳动阶级未尝无知识，知识阶级不可无劳动”。社会之所以产生出劳动阶级与知识阶级的区别，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一方面劳动阶级——种种社会情形压逼了他们，使他们不能求学，就牛马一般的替知识阶级尽力。但是那些劳动阶级的人要是不甘被役，那知识阶级里面的人——久失劳动本能者——便要跟劳动阶级的人同归于尽。”劳动阶级要解放，不是罢工，而是要有知识，要有思想觉悟，这需要知识阶级觉悟。所谓知识阶级一方面要消除“役人者贵，衙于人者贱”的观念，设法自己劳动，废除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帮助劳动者求学，抬高他们的人格，同我们平等”。无独有偶，5天后，李汉俊以“先进”的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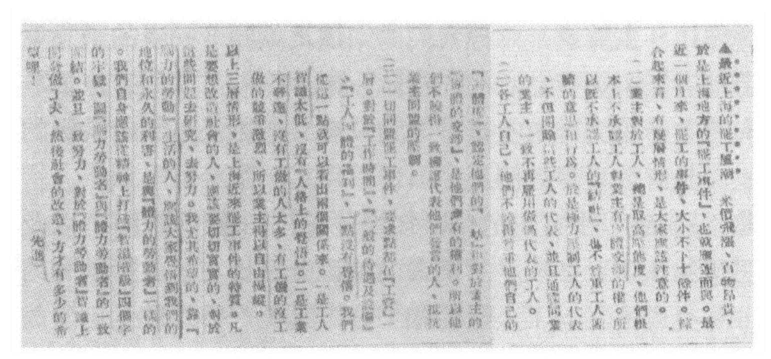
民國日報 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廿一日 第二張

覺悟

▲ 1920年10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知识阶级觉悟者的办法》

① 守常：《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② 渊泉：《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晨报》1919年5月1日。



▲ 192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评论》发表的《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一文

名，在《星期评论》发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明确指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这两篇文章虽然谈的都是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问题，但立场有所不同。①1920 年元旦戴季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民国九年的工作》② 中称：“有知识的心力劳动者应与知识缺乏的体力劳动者联合一致，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俩人均将知识分子视为劳动者。翌年 1 月，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对此专门进行了论述。他是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来阐释的。人类生产有三大基本元素：土地、劳力、资本。这三个元素中，劳力是最重要的，没有劳力，土地、资本就失去了价值。“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劳力有体力与脑力两种，“大凡以体力脑力作工的，一概都是劳力的运动”。“在独立生产上，脑力不可少，体力也不可少。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体力劳动者 ，把体力卖给资本家做工，是一个被雇者；知识分子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因此，脑力劳动者要和体力劳动者携手，“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打破雇主与被雇者，不生分别，没有阶级，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③

《阶级》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与地主。工人、农民与革命的知识分子

① 沈文并非主张劳动大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是通过文化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李文则希望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一致团结，开展运用罢工等手段进行社会改造。

②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 年 1 月 1 日。

③ 陈独秀：《在工业学校演说词》，《广东群报》1921 年 1 月 29 日。

团结起来，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建设苏俄式的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

第二，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潮，确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社会上有多种方案，其中教育万能论和无政府主义很有市场，《阶级》着重进行了批判。教育万能论相信改造社会先要改造个人，相信单独改造个人的心理是改造社会的成功之道，而好的心理素质靠的是教育。《阶级》指出，教育万能是错误的，主要就是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是不能独立的，要依环境为转移。为什么工人农民受压迫，而没有接受教育的自由呢？根本原因是私有制。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各国都是一样，资本主义下的教育，没有不是受资本主义的牵制的”。劳动者要获得正当的教育权利，只有“实行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正当的教育事业才能发达，劳动人民才能受到教育。无政府主义主张自由联合和小组织，这种小组织生产制的结果不是脱离资产阶级的压迫，反而会引起生产的纷乱和无序的竞争，“结果还怕要回复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劳动者再受虐待欲压迫呢？”共产主义“主张有紧密计划的工业集中的大工场大田地的生产制，把全世界弄成一个劳动团体”。

要实行共产主义最要紧的“就是主义的信仰”，“因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现在有许多社会主义，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极合科学的能解放人类的唯一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主义的根本观念：政治上，推翻资本家国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打破私有制，把一切生产资料——土地、机器、运输工具等收归公有。社会的观念上，废除一切阶级，实行共产主义。

第三，以俄国革命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劳农专政。《阶级》针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中国的产业还没有发达，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回答道：中国与俄国一样，“彼此都是大农业国，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是一样的产业不发达。一个是在皇帝暴力专制之下，一个是在军阀官僚暴力专制之下。现在俄国已脱化成了全新的社会革命的祖国，这又可以证明中国是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当今的世界已经是互相联系的整体，资产阶级是国际化了，无产阶级也是国际化了，中国不在世界之外，它应该自觉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赶紧跟着俄国同志往前走，建设第三国际——无产阶级革

命运动的中心。

社会革命不仅需要科学的主义作指南，更需要有政党来领导，因此社会革命可以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第二步就是要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

《阶级》受到热烈欢迎，一上市立即一抢而空。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中共一大前，它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高理论水平，集中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社会最初尝试的成果，第一次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出判断，初步剖析了社会各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策略。其间闪光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最初认识。

其次，它发表的时间是 1921 年 6 月，即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一个月。这是否是党有组织的文宣活动，目前虽然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但至少在客观上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造舆论。鉴于中共一大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中文资料，《阶级》就显得弥足珍贵。

最后，其中有的分析烙有时代印记，表明传播者探索中的不成熟。主要在革命的道路上，仍然是按照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式，提出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分析方面，没有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多元性，没有将资产阶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一律视为革命的对象，等等。这些认识上的局限，后来中共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得到了克服。第二年（1922 年）中共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启发下，便制定出了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和党的最高奋斗目标。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交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北京军阀政府攻击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并下令严禁、查封《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每周评论》、《国民公报》、《新社会》、《湖南通俗报》（解散）等进步刊物。军阀政府还与上海等地租界当局勾结，采取销毁、禁运、查封以及经济手段，迫使《星期评论》、《来报》等停刊。《共产党》月刊第3号（1921年4月7日）出版时，第一页开了天窗，编辑部愤怒地在上面写道：“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

马克思主义传播还遭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的批评，他们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次大论争。交锋的焦点：改造社会的根本之道，是枝节地解决具体的一个一个问题，还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彻底的改造；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手段是改良主义，还是社会革命；中国是发展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不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

五四运动后，作为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便是新村——工读互助运动，这种实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度风行一时。

经过三次论争与新村——工读互助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分裂，形成了左中右三派，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三次论争与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中诀别了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皈依马克思主义，投身到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通过论争，特别是社会改造的实践，无政府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逐渐淡出中国历史文化舞台，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五四时期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节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振兴民族、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审视救国之道路，从西方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中寻求国家解放之思想武器。“当时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先后出现400多种。这些刊物的绝大多数都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①] 中国的封建顽固势力也出版刊物与新文化运动争夺阵地，各种思潮、主义激烈冲撞，出现了罕见的“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文化场景。“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改良主义的一次大讨论。

一、“问题与主义”论争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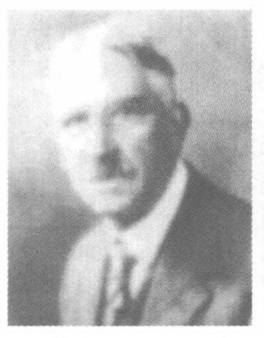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角之一是胡适。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1917年1月在美国留学时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声名鹊起。同年7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倡导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在进步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 1915年胡适（1891—1962）在哥伦比亚大学（台北胡适纪念馆提供）

胡适是五四时期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受赫胥黎“存疑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前者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他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成有待证实的假设。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1936年为其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1915年在美国留学时，发奋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杜威（1859—1952）



▲《杜威五大讲演》封面

读杜威著作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①] 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他又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②] 直到晚年，他还恋恋不舍地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③] 由此可见，杜威对胡适思想影响之深。

胡适所推崇的实用主义，在我国知识界有很深的影响，这与杜威来华讲学有密切关系。1919 年 4 月至 1921 年 7 月杜威在中国进行两年多游学，宣扬实用主义一时成了中国思想界、媒体的中心话题。实用主义不仅被胡适奉为圣明，而且在我国进步思想界颇有市场。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著名《敬告青年》里，对“实利主义”和“实验主义”，曾以赞美的口气说：“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④]

1917 年 7 月，胡适因陈独秀推荐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回国。在途中的船上，“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对他有强烈的刺激，于是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

---

① 《胡适・自序》,《藏晖室札记》,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39 年版，第 5 页。

②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 2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4—75 页。

③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4—95 页。

④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1915 年 9 月 15 日。



▲ 1919 年 7 月、8 月《每周评论》关于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文章

的基础。”[①] 回国不久遇到五四运动，他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但政治运动又冲击了他所希望的从事单纯的文化运动的梦想。在谈及五四运动时，他总有“不幸的政治干扰”的遗憾，由此也奠定了胡适一生的思想基调。

五四爱国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思想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一时成了时髦的话语，充塞在各种媒体上。学生、教授、企业家、政客各种各样的人都热衷于谈论社会主义。1919 年 7 月安福系[②] 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发表了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说，北京主流媒体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为安福部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等，“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辑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③] 对此，正负责编辑《每周评论》的胡适颇有感想，“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④] 于是他在《每周评论》第 31 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指出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因为，“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辑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辑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⑤] 他的主张集中反映在文章的标题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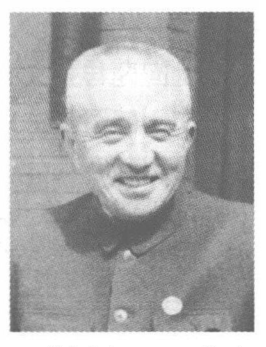
① 《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 3，亚东图书馆 1926 年版，第 96 页。

② 安福系又称安福部，北洋军阀的政客集团。1918 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控制选举，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该国会为“安福国会”。1924 年该集团又拥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 年段垮台，安福系瓦解。

③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 31 号，1919 年 7 月 20 日。

④ 同上。

⑤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 31 号，1919 年 7 月 20 日。



▲蓝公武（1887—1957）

8月3日，进步专栏作家蓝公武[1]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问题与主义》，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批评。他指出，“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趋向或态度。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问题实行的方法，需要一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改造社会要有理想，而新理想，“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2]胡君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3]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再次批评。胡适很快作出回答，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原打算发表“五论”，因《每周评论》被北京政府查封而未面世。1919年12月1日，胡氏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企图把新文化运动限制在纯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把革命青年引向故纸堆，继续宣扬“一点一滴的进化”的改良主义。与胡适针锋相对，李大钊1920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新思想是因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社会的新要求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每週評論

▲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



每週評論

▲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发表的知非《问题与主义》

① 蓝公武（1887—1957）原名庆章，又名蓝知非，字志先，笔名知非等。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1917年7月任北京《国民公报》社社长，宣传新思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1957年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② 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3号，1919年8月3日。

③ 同上。

播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表明了与胡适观点的鲜明对立。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从1919年7月开始，到1920年1月基本结束。

二、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要内容

要正确客观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历史事件，必须从论争的文本中提炼出双方的观点，并结合历史实际加以对比分析。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表达了以下的基本观点：“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奉劝舆论界，“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了。”他指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①]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同胡适展开了交锋：

第一，“主义”与“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只有主义明确，问题才能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之间“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的满意不满意的尺度”。[②]“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③]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

①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③ 同上。

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

第二，要认定自己的主义。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其他的冒牌的社会主义。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对于反动统治的攻击、威胁，我们要立场鲜明，就是“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社会问题。”[2] 在各种主义中，李大钊公开宣布自己相信唯物史观，喜欢苏俄的布尔什维克。

第三，用阶级斗争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分成若干彼此相联系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是一条金线，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在李氏那里，阶级斗争是联系各个理论部分的中介。他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学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都可以解决”。[3] 同时，经济制度的改造不能消极地等待自行实现，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4] 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5] 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用阶级斗争手段，建立劳动者掌握统治权的制度。

胡适作为对李大钊批评的回应，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释自己的观点。一方面他调整了一下观点，把“少谈

---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些主义”，改为“少谈些抽象的主义”，表示“对输入学理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①] 并进一步提出了输入学理的方法：(1)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2)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3)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他主张：“如果是为了实际的改革，那就应该使主义和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决不可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我常说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症：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②]

另一方面，胡适继续强化“多研究问题”的主张：“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③]

同年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④] 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主张，并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甚至发出：“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等论调。一个月后，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唯物史观剖析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指出经济是社会变动的最根本的原因，伦理、精神、思想、学术等变动的原因，要从经济上去解释。因此：第一，“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第二，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封建家族制度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症候”。第三，“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由此“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作出的。”胡适的

①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②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③ 同上。
④ 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新思潮的意义》与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实际上是"问题与主义"论争的继续和总结，至此这场论争就基本结束了。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以往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相关论述中，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将"问题与主义"之争多看做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搏斗"。这种观点没有正确反映李大钊与胡适辩论的实际。其实胡适并不反对主义，而是反对"纸上空谈的主义"。他曾辩白："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①] 虽然他后来回忆与李大钊的论争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那是回忆时加上去的意识形态。他和李大钊辩论的实质是用实验主义还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胡适以实验主义为理论依据，主张社会改良；李大钊主张社会革命，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

2000年4月，史学界10余名专家学者在讨论中共历史上卷修订时，曾议及"问题与主义"之争，与会者一致认为：这场争论并不是胡适专对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包括对所有宣传"主义"的人，因当时社会主义非常流行，他以社会主义为例来宣扬他的实用主义。这场辩论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辩，而应以学术讨论为主，政治论争次之，况且论争中双方的态度是平和的；论争后，双方还保持着较好的私人关系，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还曾结为盟友。胡绳认为：胡适派在当时属于中间力量，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



▲ 1920年3月14日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右一李大钊，右二胡适，左二蔡元培，左一蒋梦麟（1886—1964）。（台北胡适纪念馆提供）

---

①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政治斗争，而是朋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的，不赞成革命。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①] 所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围绕采取何种方法达到改造中国的争论，李大钊等主张用革命手段，胡适主张用改良手段。通过这场论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时，李大钊从胡适那里也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应该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时，实验主义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市场，辩论初期还占明显的优势，《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后，受到了欢迎。如 1919 年 7 月，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给北京会员的信中，[②] 便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主张；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曾说：“现在世界上一切组织多不合理、不满意，皆非根本改造不可”。[③] 可是，当上海分会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时，他又表示“对于上海同志之建议极表同情”。[④] 新潮社早期主持人傅斯年提出：“研究一些问题，出几本书和刊物，‘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需求’。”[⑤]

一些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也受到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例，以往的研究大多或者回避，或者认为青年毛泽东是站在李大钊一边的，其实，“青年毛泽东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热心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⑥]1919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制定了会议章程——《问题研究会章程》。在这个章程里，提出了亟待研究和解决的 140 多个问题，并通过《湘江评论》寄往全国各地的许多团体和个人。[⑦]

---

①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② 《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1 期，《会员通讯》，1919 年 7 月 15 日。

③ 《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 4 期《会员通讯》，1919 年 6 月 1 日。

④ 《北京会员答上海会员》，《五四时期的社团》(1)，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319 页。

⑤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2 卷 1 号，1919 年 10 月。

⑥ 郭建宁：《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 页。

⑦ 1919 年 10 月 23 日，《北京大学日刊》467 号刊载了北京大学邓康（即邓中夏）的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便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陈独秀所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①周恩来编辑的《天津学会联合会日刊》的《发行旨趣》②中，也认为"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即胡适在中国宣传的改良主义思想。"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③胡适的观点，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易为一些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少激进青年不赞成阶级斗争，总希望通过道德革命、教育、劳资协调等改良手段改造社会，因此他们很容易将实用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混合起来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恽代英曾说："我信我并非决不参加流血事业，总只认他是最后手段，亦只认他是利害参半的手段"。④这种态度在当时并不鲜见。

四、论争的历史作用

第一，促使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场论争发生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年初，正值一部分激进青年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在论争中，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产生了影响。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⑤中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1920年6月，他在《湖南人民自治》中又说，"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⑥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⑦这个曾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的青年的转变是显见的。

陈独秀新世界观的萌发一样受到了这场论争的影响。问题与主义论争之

① 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
② 《南开日刊》第35号，1919年7月12日。
③ 胡适：《我的自述》，《胡适文存》第2集卷3，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④ 《代英致业裕》，1920年10月，《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页。
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
⑥ 同上书，第486页。
⑦ 同上书，第554页。

初，陈独秀正在蹲监狱，但也正是他的思想转型期。出狱不久，他在《〈新青年〉宣言》中，虽然将实验哲学作为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但承认“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①]不久他在武汉演讲，极力鼓吹“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②]他在强调主义（学说）的重要性时，指出一种学说之所以能够输入，“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③]但他反对青年专门空谈主义，不去做实际的努力，指出：“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④]当有一些人批评他的这个说法是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时，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里辩解道：这是“一般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⑤]若不努力则永远“达不到方向所在”，所以主义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⑥]

第二，在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得以进一步传播。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本意并非专指马克思主义，而是泛指一般“主义”，但李大钊在辩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则十分鲜明。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他专门写了“所谓过激主义”一节，特意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⑦]众所周知，在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列宁思想为主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以极大的热情写道：“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⑧]在论争中，他进一步传播了唯物史观，并且用其立场、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指出，延绵2000多年的孔学是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现

① 《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② 《陈独秀来鄂后之学界》，《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③ 独秀：《学说与装饰品》，《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④ 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⑧ 同上。

在动的西洋文明打进来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孔子主义也就首先“崩颓粉碎”。[①]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②]因此，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论争过程中，中国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诞生，一批进步杂志进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可将问题与主义之争与《晨报》、《新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专栏的开辟，视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始。

第三，明确指出改造中国的正确道路。李大钊与胡适在改造社会的方法上是对立的，他针对胡适的改良道路，非常明确地指出，改造社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③]“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二是取阶级斗争是从事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进行社会改造的根本解决的方法。[④]

第四，在论争中，鲜明地提出了“主义”要联系实际的学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理论必须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耐人寻味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理性的角度第一次彰显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李大钊从辩论对手那里获得启示而提出来的。李大钊对胡适的观点并不全然反对，而是有的或可与对手的“主张互相发明”，[⑤]吸取对手合理的成分，以作改造社会的工具。他对胡适主张务实，反对空谈的意见持肯定的态度，“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⑥]“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⑦]

这里，李大钊实际上提出了研究理论的思想方法问题，尤其是政治理论必须与解决社会与国家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胡适推动

---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② 同上。

③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了“主义”与“实境”相结合的过程，尽管胡适强调的主义是实验主义，但就观察问题的方法论而言，强调学理要考察社会的需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效果，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思想方法上是相通的。李大钊从中觉悟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结合，从而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救亡图存的科学思想方法。因此有学人认为这场辩论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奠基性探索，[①]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问题与主义”之争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和行动路径，一是着眼于问题，主张点滴改良；一是强调主义的指导，主张根本解决的激进革命路线。对此的选择，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路径，同时，大体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与走向。

第二节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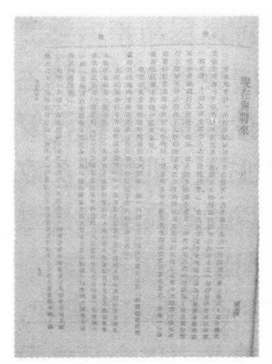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登上了我国思想舞台，一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的出现引起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警觉，以1920年5月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为始，对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批判。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初期传播过程中的又一次大讨论。


▲张东荪（1886—1973）

一、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出现与主要内容

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将是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他是辛亥—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早期思想较为复杂。早年接触了西方哲学并受其影响。民国初年，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以后成为研究系的骨干，鼓吹中间路线（非资非无）。1917年担任《时事新报》

① 刘小林：《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读〈再论问题与主义〉》，《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1920年12月15日《改造》第3卷第4号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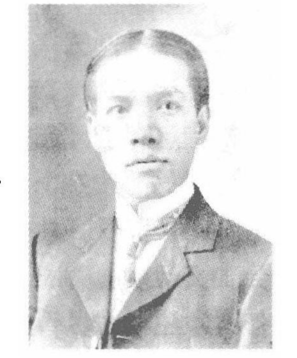


▲1920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



▲1921年2月15日《改造》第3卷第6号发表《一个申说》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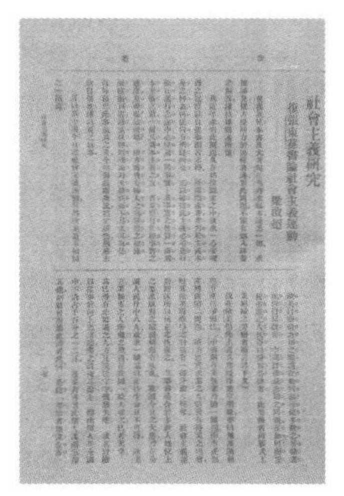
主编，立志从事文化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热烈鼓吹社会主义，这是基于他对世界与中国形势判断作出的济世抉择。他将世界分为三种文明，第一种文明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即“宗教的文明”；第二种文明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①] 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文明破产，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②] 他虽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其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却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即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改良的社会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稳健的社会主义”，[③]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他在《罗塞尔的“政治理想”》、《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一个申说》、《对于中国共产主义及其反对者的忠告》等文章里，阐述其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1873—1929）

张东荪的主张得到梁启超的坚定支持。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其思想跨越之

① 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创刊号，1919年9月1日。
② 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期，1921年2月15日。
③ 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解放与改造》创刊号。



▲ 1921年2月15日《改造》发表梁启超对张东荪支持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

大、之快在思想界颇具代表性。民国初年，梁启超的思想随着中国急速嬗变而一变再变，由君主立宪演进到共和政治，再进到社会主义。但不管其主张、立场如何变，用改良主义（即缓进）改造社会的立场则始终不变，可以说改良主义是梁氏接受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断求新求变，敢于否定自我，用他的话讲，就是“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1918年12月至1920年4月，梁氏为了获得救国的新知，与同道张君劢等数人到欧洲一游。这次游历使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破产，向往起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与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梁氏在他的同道中是比较激进的。早在1902年，他在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时，就曾提到麦喀士（今译马克思）。欧洲之旅时，他特别留意社会主义运动，认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潮流，无法抗拒。他曾赞扬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赞扬列宁：“以人格论，在现在以李宁（今译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①] 他甚至对中国未来的无产阶级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战胜，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②] 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唯物史观，反对在中国实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1920年年底，张东荪为了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评，特意写了《现在与将来》的文章寄给梁启超，梁氏立即将文章刊登在自己主编的《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出版）上，在第6号上专门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进行讨论，并撰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梁氏是跨世纪的思想家，赫赫有名，因此他的参战，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他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多，但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就影响巨大，对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极大的鼓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3页。《梁任公先生近著》第1辑（上），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页。

②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舞，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箭靶。

梁启超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贡献还表现在组编了共学社丛书，其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书籍有《基尔特与农业的复兴》(A.J.P，Guild and Agriculture Reconstruction)、《基尔特的国家》(G.R.S.Taylor，Guild State)、《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劳动》(G.D.H.Cole，Labour in Commonwealth)、《基尔特社会主义》(G.D.H.Cole，Guild Socialism)、《基尔特社会制度与贷银制度》(S.G.Hobson，National Guild)等。围绕在张东荪、梁启超周围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同志有蒋百里、蓝公武、彭一湖、蓝公彦、徐六幾、郭梦良等。



▲蒋百里（1882—1938）

宣传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阵地有《解放与改造》、《社会主义研究》和《时事新报》所谓二刊一报。《解放与改造》1919年9月创刊，半月刊，32开本。该刊的目的如刊名，即为社会的解放与改造。面对新的世界，刊物的责任就是先定了一个趋向(Tendency)。半月刊标榜的“解放”包括自我精神与物质的完全解放。在“本刊启事”中明确指出该刊的宗旨：“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为改造地步”。[①]但它所说的解放与改造一开始的定位就侧重于精神世界，“当面的问题，既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又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既然文化普遍了所有的各阶级各民族，就应该把人类全体做一个目标去求全人类均衡的幸福”。[②]由此可见该刊的愿景是追求抽象的人类全体的幸福。该刊的宣言与启事对其具体的主张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杂志的职能与内容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立场，简言之，就是引进基尔特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振兴。该刊发行一年，共出2卷24期。

《解放与改造》从1920年9月第3卷第1号起易名《改造》，改为16开本，编辑部亦由上海移到北京，1922年9月停刊。《改造》是梁启超创办

① 《本刊启事一 编例》，《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日。

② 《宣言》，《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

的共学社的言论机关，成为实现梁氏从欧洲回国后，以办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其改造中国抱负的一个舆论阵地。发刊词则比《解放与改造》创刊宣言要明朗得多，共列出16节“同人公定之趋向”，宣示“本刊所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①] 其主要精神体现了梁启超用文化教育济世的主体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倾向很明显。



▲《社会主义研究》

《社会主义研究》旬刊是《时事新报》的副刊，“今人会”的机关刊物。1921年9月16日创刊，1922年6月出到第25号停刊。编作者张东荪、郭梦良、徐六幾等，其主旨正如其宣言表白的那样：“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树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②] 刊物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论争，反对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

《时事新报》是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1911年5月创刊，张东荪为主编。1918年3月副刊“学灯”出版，负责人亦为张氏。“学灯”在传播新思潮时，亦突出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

“二刊一报”在这方面宣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详细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是英语的音译，原本是指中古时代商人或生产者为着规定生产或售出而组织的团体，与我国古代的“行会”、“帮会”有些近似；但欧洲的“基尔特”又不完全是于商业、工业，还有慈善事业、宗教事业、教育事业等，因此把它叫做“行会”、“帮会”、“同业”又不妥，故用其译音为名。作为一种主义则是20世纪初（1906年）在英国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种思潮与组织形式。与古代的“基尔特”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松散团体（Regulative body），而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有正式严密规约，依民主形式管理工业的团体；不是只限于一个城市或地方的组织，而是必须支配一国、数国带有世

---

① 《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

② 同人：《宣言》，《社会主义研究》，1921年9月16日。

界性的经济组织；劳动者与业主、商人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人人都是独立的劳动者，因而人人都是‘主人’”。[①]

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反对私有制，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它与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亦有异，与国家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反对集产于国家，主张各业自治；与工团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反对各产业独立，要国家；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不改变现行的社会制度，通过同业联合或行业的管理，改善劳动者的环境，以渐进的方式达到人人平等自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在于不改变现行国家制度（即资本主义），通过协社经济组织管理的途径，达到劳资和谐的社会，体现人（主要是劳动者）的独立自由民主价值。

第二，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从主观上讲，引入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治国势日衰的中国，因此他们力求与他们认识的“国情”相结合。张东荪将中国的现况归纳为四个：“无知病”——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没有多少差别；“贫乏病”——大多数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兵匪病”——军阀当道，连年混战不已；“外力病”——帝国主义各国联合，以压倒中国。[②]中国唯一的问题是贫乏，根本解决之途是“增加富力，发展实业”。[③]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简言之：发展资本主义。首先，中国的乱源是军阀当道，发展现代经济是消灭军阀的主要办法之一。其次，对现代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唯一者。最后，中国缺乏真正的劳动阶级，要产生真正劳动阶级（大工业的生产者），就非要发展现代企业不可。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将增加生产力与富力，并非对劳动者不利，所以发展资本主义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

第三，反对在中国实行“伪赤化”。张东荪等一般不反对苏俄，但非常鲜明地反对中国走苏俄的道路。首先，从价值取向的角度。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是“人格论”，即“人类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最高的方式是人

① 《译名》，《社会主义研究》第17号。

② 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③ 同上。

格的发展的自由”。换句话说是使劳动者在自由、民主的状况下，过着良善的生活。[1]从这个角度出发，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作区别，一概加以反对。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专政都是实现“人格论”的障碍。

其次，从社会主义特质的角度。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根据麦尔文（Ford Melvin）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想》（Socialism as Sociological Ideal : A Broader Basis for Socialism），将社会主义特质分为体制（Organization）、社会公认的理想（Socially Perceived Ideal or Purpose）、智断（Intelligent Decision）、民治（Democratic Rule）等四个方面，其中民治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政治，是对专制的反动。在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都是专制，与民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再次，从所谓国情的角度。他们异口同声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主要理由就是国情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1. 社会党（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是有无产阶级就有党，必须待阶级自觉才能成党，而中国无产阶级为数极少，更谈不上阶级的觉悟。没有俄国劳农革命的条件却要进行劳农革命，是逾越阶段，只能是伪赤化，伪劳农革命。2. 中国地域广大，交通不便利，“若举全国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惟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即使各地可以自决，然而中国人的传统，“亦决不能借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决与社会自动必然使劳农主义无法实行。[2]

最后，从所谓的马克思理论的角度。他们声称“马克思自己说产业发达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兴盛的国家，方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本是农业国，产业不甚发达，有很多的地方，简直无产业可言。产业不发达，就依马克思的理论来讲，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3]总之，中国如果进行直接的社会革命，只能产生伪劳农革命，这样“只能是破坏的不能是建设的，只能是假借的不能是真正的”，决“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4]

---

① 六幾：《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秘密——资本主义的总鉴定》，《社会主义研究》第 18 号。
② 《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 1922 年版，第 50 页。
③ 勉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合作》，1922 年 10 月 2 日。
④ 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 3 卷第 4 号，1920 年 12 月 15 日。

二、中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争

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几乎同步，但在如何使中国进入世界潮流的道路上彼此对立，因此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言论出笼不久，便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尖锐批评。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的是李汉俊，继而陈独秀、李达等参战。论争大致以张东荪 1920 年 11 月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以下简称《又一教训》) 为分水岭，划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20 年 5 月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为始到张东荪发表《又一教训》为止。1920 年 5 月 7 日张东荪继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后，又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对"稳健的社会主义"作进一步阐释。张氏的政治主张引起李汉俊高度关注，他在 5 月 16 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 50 号上发表长篇批评文章《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3 天后，又写了《社会主义与自由批评》，刊登在 5 月 21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是月 30 日在同一副刊上再发表《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


星期评论

▲ 1920 年 5 月《星期评论》第 50 号刊登《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第一，明确主义的内容，揭露张东荪"浑朴的趋向"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主义是"解决一个特殊问题的基本原理"，"是我们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①] 因此李汉俊质问道："既然是一个主义一定有一个内容，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可以说是主义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但绝不是没有内容的，社会主义有许多派别，如集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波尔色维主义、珊地加利主义等，都有一定的内容，决不仅只有一个趋向和"境象"。张东荪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竟没有内容，只有一个"浑朴的趋向"，连将来的"境象"都不清楚。这样张

① 汉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0 年 5 月 30 日。

氏的社会主义“就好比是一个瞎子，手里棍子也没有拿一根，只朝着一个方向，也不晓得前面有路无路，是山是水，只向前面走的一样。瞎子所趋向的前面却是浑朴的，到了尽头或是遇着虎豹，或是吊〔掉〕下崖去，或是落下水去，或是走到桃源去，总是要达到比现在不同的一种特别境象的”。所以张氏的社会主义是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他是走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①]

第二，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张氏主张劳资互助的改良主义。李汉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张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没有内容，他很清楚地表明：“我以为在现在中国不必促进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敌忾心，而只应促成工人对于工人的同情心。换句话说，就是暂且不要提倡工人对于异阶级的反对观念，而只要提倡对于同阶级的互助观念。”这段话表明了张氏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立场。李氏通过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指出“劳动是商品，卖的是劳动者，买的是资本家”，这两者之间是不能互助的。资本家是掠夺阶级、强盗阶级，剥削工人是它的阶级本性，工人是被掠夺阶级，与掠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是无法调和的。至于工人自决，也绝不是张氏所希望的“由资本家底桎梏之下的自决”，所谓自决的行动，“就是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只有实现“阶级觉悟”才能产生相互间的同情心和互助观念，才能有自决的行动。而工人的“阶级觉悟”，就是“晓得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他们底厉害是一致，晓得他们底利益不是巴结资本家，互相排挤敌视，可以得到，一定是要以资本家为敌标”。我们应当是促进工人阶级实现“阶级觉悟”，向社会大众“应当大大地灌输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或强盗阶级得观念，使社会一班（般）都明了资本家底横暴，劳动者底不合理的痛苦的理由。”张东荪一方面希望工人有团结有组织，一方面又杞忧工人对资本家发生的反感的行动，同时又反对工人阶级觉悟，“这又不是叫人走投无路么？”[②]

第三，在辩论中，应取“自由研究”、“自由批评”的立场。当李汉俊与张东荪展开论争时，一个叫“陶乐勤”的作者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意见，企图调和他们之间的争论，声称大家都是走同一条路，“异趋同归”，希望停

---

① 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
② 同上。

止争论。李汉俊严正指出：主义和社会问题是改造社会的重大问题，决不能含糊。“我底这篇（引者注：指《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评是我底自由批评，不是对于东荪君这个人的批评，是对于东荪君研究的这两个问题的批评；不是对于东荪君批评的，是对于社会批评。”张东荪宣扬的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浑朴的趋向，及一个不能详知的特别境象，因此“不能成为主义”，与我走的恐怕不是一条路，更谈不上“异趋同归”。[①]

第二阶段从张东荪1920年11月发表《又一教训》为始到北伐战争结束，论争在1921—1922年达到高潮。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的邀请到中国讲学，张东荪陪他去了湖南。罗素在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与教育的思想影响了张东荪，张于是写了《又一教训》。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的批判，继而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周佛海、许新凯等相继参战。1921年2月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亦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助战。中共党团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先驱》、《向导》等发表文章予以批判。1922年陈独秀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两次论争的主要文章辑录成《社会主义讨论集》由新青年社出版。此阶段参战的人数多，规模大，问题广泛、深入，时间长，更具理论形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罗素（1872—1970）

第一，指出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法救国，只是空想。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乏。这里涉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来回答这个问题。李汉俊指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绝不是中国的贫乏，贫乏只是现象。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图谋占领的“市场”。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为了竞争和夺得中国市场，世界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生争夺战，它们必然帮助中国的封建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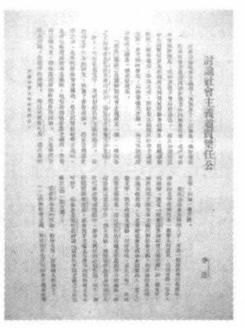
① 汉俊：《社会主义与批评自由》，《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21日。


社會主義討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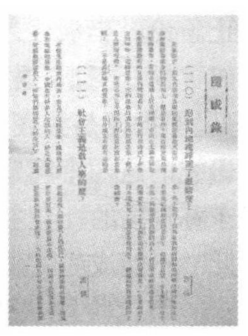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讨论集》封面，1922年出版


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

▲ 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刊登陈独秀编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

▲ 1921年5月《新青年》第9卷第1号刊登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隨感錄

▲ 1921年5月《新青年》第9卷第1号刊登"随感录"

族，反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资本主义国家要独占中国的市场，就必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矛盾，这样中国"在政治上的纷争情形，就复杂起来；中国底封建贵族本来没有存在的实力，但似倒而不倒；中国底资本阶级本来可以握得政治，但似得而终不得；[中国]终陷于不死不活的状态，纷争终不得解决。"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剖析世界大势时，虽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鲜见，但"世界底资本阶级"、"国际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等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乱源的根本原因则是十分明确的。那么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呢？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开出的药方就是发展协社（行会）才有实现强国的可能，"其余概为空谈"。②协社正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核心方案。陈独秀剖析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斗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底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底权利，这样的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它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

① 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② 《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50页。

陆、军警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实践，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①

用改良手段改造社会是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基本方案，与协社紧密相关的是组织劳动组合（工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视其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施存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谓提倡组合协社、工会，实质不过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聊以自慰而已”。② 因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而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协社，组织工会，这种蚕食主义的蚕是加入协社、工会的劳动者，所要食的东西却是资本主义。这种主义只能是空想。基尔特社会主义发达的英国人口有 4700 万，劳动者有 3000 万，加入工会的不过 800 万，“假定这 800 万加入组合的劳动者都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也不过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强，全劳动者四分之一强，以这样的数目，就能够蚕食资本主义，废除资本主义吗？”③ 何况资产阶级还掌握了国家政权维护其统治。中国有四亿人口，而产业劳动者不到 100 万（笔者注：应为 200 万），工会组织才开始萌芽，要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还更伟大的空想，幻梦了”。④

第二，揭露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发展实业的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的发展资本主义是在增加富力，打着发展实业的幌子，并企图与“稳健”的社会主义调和下提出来的，故有很大的欺骗性。陈独秀在复张东荪的信中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极〕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⑤ 因为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陈氏引述戴季陶的话说明资本与资本家的不同：“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

---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 9 卷第 3 号，1921 年 7 月 1 日。

② 存统：《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1922 年 7 月 1 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独秀先生复东荪底信》，《新青年》第 8 卷第 4 号，1920 年 12 月 1 日。

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①] 施存统揭露这种社会主义者“就是存心要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儒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②]

第三，中国不必蹈资本主义覆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共产党宣言》的观点作武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私有，生产过剩，造成了它“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③] 资产阶级同时“锻炼”出的无产阶级，成为“致自己死命的武器”。[④]（今译文：“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争夺殖民地市场又酝酿国际资产阶级的更大危机，其结果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末日。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弊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暴露无遗，那么后进的中国为什么还要去蹈其覆辙呢？要救中国，却要“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⑤]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逐一驳斥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制造的理由。理由之一，中国没有资本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中国工业固然幼稚，但不能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固然是资本较小的资产阶级，但资本的大小，无法改变资产阶级的本质。资产阶级无论大小，中国、外国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性质是绝对没有差别的，“我们不能说外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应该反对，本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就不应该反对”。[⑥]

理由之二，中国没有进行社会主义的主体产业劳动者。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类之状况所差未必

---

① 《独秀先生复东荪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② 存统：《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6号。
③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④ 同上。
⑤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⑥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甚大”，[①] 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有更多的劳动者，才能在将来实行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调查，指出中国有现代工业，有现代意义的劳动者，“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②] 中国的游民其实是失业的劳动者，他们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 [苦] 更甚”，因而革命性更强。劳资是互相关联的，既然有资本家，就必然有劳动阶级。劳动者要成为自觉阶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张东荪等亦强调教育，但二者的目的根本不同。张氏的教育，是作为增强富力，社会改良，以及防止中国出现伪赤化的手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其头脑，提高阶级觉悟，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推翻军阀政府、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走社会主义之道路才能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的最亮点就是在否定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他们运用马克思晚年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展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工业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发展实业，相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能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力也就会大大增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现代工业、农业将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其次，驳斥张东荪用马克思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理论来反对在现代经济十分幼稚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鲜明地指出，这是“把马克思的招牌拿出来压人”。[③]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我们决不应当对它“食古不化”。[④] 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俄罗斯革命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辟了新纪元。中俄两国是邻国，现代经济均十分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的比重，既然俄国能够革命成功，为什么与它国情相同的中国不能成功。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以俄国为榜样，奋起进行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落后的中国赶上世界现

---

① 《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 1922 年版，第 54 页。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

③ 周佛海：《进化与革命》，《新青年》第 9 卷第 2 号，1921 年 6 月 1 日。

④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 9 卷第 4 号，1921 年 8 月 1 日。

代化的捷径。

再次，驳斥张东荪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前面已经说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与民主、自由对立的独裁制度加以反对。传播者指出专政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统治阶级利用专政维护其统治，劳动阶级要获得解放，只有用暴力推翻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劳动阶级实行社会主义后，要维护政权，防止资产阶级的颠覆也必须依靠专政。他们多次引用《哥达纲领批判》中“从资本主义社会推移到社会主义社会底中间，必须经过一个革命的变形时期。同这个革命的变形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①]的著名论断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个人的独裁，而是阶级的专政，苏俄的独裁“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上面的”。[②]

第五，指出落后的中国走苏俄革命的道路，是追赶世界潮流的最便捷途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世界的视野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性的。俄国十月革命，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崩坏”的表现。中国要赶上世界的步伐，完全可以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向资本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逆而必败之道；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下去，是顺而必胜之道”。[③]他们还以俄国革命胜利后，实业取得了发展为例，反问道：既然苏俄实行社会主义还能振兴实业，为何我国不能？“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④]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从意识层面来论证这个问题，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人的意志支配的，而人类的意志不是独立的，乃是环境的产物。社会主义意识既然已经在俄国产生，中国不在世界之外，完全可以引进社会主义的意识，急促跟上世界进步的步伐，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

①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② C.T（施存统）：《第四阶级独裁专政底研究》，《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
③ 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④ S. C（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三、对社会主义问题讨论的再认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学人用当代语境对发生在80年前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这场大论争作了新探讨，提出一些新观点，得出一些新结论，并且将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成果，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看法，求教学人，以推动该问题的研究。

第一，当今在评论社会主义论争时，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较为流行，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对国情的分析，对在中国发展实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料或启示，甚至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提供了一些资料。这样一来，至少涉及了两个问题。

其一，这场论争的实质是什么？本来这个问题很清楚，是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复兴国家。简言之：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企图将资本主义与协社调和起来使国家复兴，按照张东荪的话就是“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旗帜鲜明地主张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复兴，按照李达的话说就是“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②] 两条道路，两种途径，泾渭分明。

至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贫乏、现代工业落后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极端赞成增加富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实业非增加资本不可；对发展合作社（协社）、工会（组合），劳动者参加管理等，他们并不反对，反对的是把中国主要社会矛盾说成是贫乏，中国的出路是发展资本主义与协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不改变旧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采用协社、工会等作为复兴国家的方法不仅是空想，而且还伪善。

诚然，张东荪等强调研究、实验任何主义、政策必须与“国情”（笔者注：张氏用“本土情形”、“国内情形”来表述）相结合，曾指出采用彼辈主义、政策一定要与国内情形相比较，“若将本土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止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我也。”[③] 从认识论的角

① 《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56页。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③ 东荪：《东荪先生“长期忍耐”》，《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53页。

度看，张东荪这个立场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他所说的“国情”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如贫穷、实业落后等，而他开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即基尔特社会主义，则根本不适合国情。对此他自己都缺乏信心，在回答友人的信中曾清楚表白：“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①] 他承认在中国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还为期甚远，目前第一步只是宣传原理，第二步是“择业实验”。[②] 因此，同样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看出张东荪的认识是脱离实际的，是唯心的，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其二，有人称张东荪等人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提供了资料。这涉及如何正确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总结。前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有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分析丝毫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提供一些资料，不能将两个毫无关联的问题硬扯在一起。再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民主革命实践中，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本质属性与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得出科学结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是采用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资料。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正确把握国情，提出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这说明当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不高，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机械套用于中国。但很快，即1922年，他们就在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实行社会主义。在《先驱》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进行论争时，他们便用这个最新认识投入了战斗。

第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时候，亦有情绪

---

① 《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50页。

② 张东荪：《对于中国共产派及其反对者的忠告》，《时事新报》1922年4月10日。

化的倾向，指责张东荪等为投机的政客有失公允。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人物、事件时，存在着单向思维，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衡量近代中国人与事的唯一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在近代中国思潮的选择上，凡是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凡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就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其他则是反动的，或落后的。

1988年5月，邓颖超致函在美国的宋美龄时写道："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①] 这句话对我们审视近代中国的人与事是一个标志性的启示。在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有很宽泛的内容，这是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国情所决定的。面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势日衰，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中国人寻求着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和道路，凡是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就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就值得肯定。

从这个角度考察，张东荪、梁启超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目睹民国初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军阀横行，国势日衰而提出的救国方案。他们企图将资本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调和起来振兴国家，希望在中国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间走出第三条救国之路。尽管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资本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相混合的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则应该给予肯定。

张东荪等还看到了"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②]"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③] 认识到军阀是中国内乱的主要祸源，他主张用武力和经济力致军阀的死命。从张东荪、梁启超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态度角度考察，他们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对象，是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同盟者。同时张东荪的救国设计虽然是空想，但他从西方引进改造中国方案时，强调要结合国情，将资产阶级分成外国和国内两部分，主张中国要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强调文化运动的重要性等，对于设计中国现代化的方案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应该指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但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误解，以及苏俄一度采取的激烈的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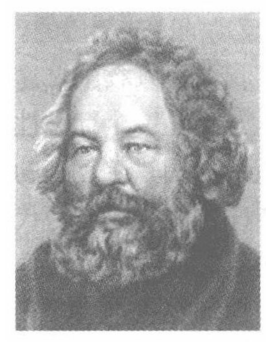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东荪先生致独秀先生底信》,《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62页。

“左”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节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巴枯宁（1814—1876）

无政府主义旧译“安那其主义”，安那其来源于古希腊文 Anarchia，原文 Anarchism，盛行于 19 世纪后半期的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蒲鲁东在其所著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首先提出“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施蒂纳和蒲鲁东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则；巴枯宁使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克鲁泡特金主张所谓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把无政府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无政府主义流派与主张虽然十分复杂，但基本主张则相同，即反对一切权力与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个人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至于如何得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者们则是各说各话。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① 它在中国的经历跌宕起伏，特别是在五四时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障碍，于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展开了批判。

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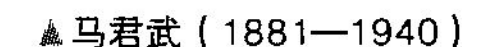
20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传入中国的，最初传播者是留日、留欧的学生与中国同盟会会员。20 世纪初期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流行，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都有市场，日本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混合，陆续介绍给日本知识界，出版了烟山太郎翻译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宫崎梦柳翻译的《虚无党》等著作。此外，流亡日本、深受巴枯宁思想影响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也给日本带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鱼龙混杂的思想成为早期中

① 列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8 页。

国无政府主义者吸取的主要思想来源。[1]

1902 年，马君武翻译的《俄罗斯大风潮》，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据说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书籍。[2] 随后《社会主义广长舌》（1902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无政府主义》（1903 年，上海出版）、《近世之社会主义》（1903 年，广智书局出版）、《近代无政府主义》（1904 年，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等发行。在这些宣传品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浪潮。





▲马君武（1881—1940）



▲李石曾（1881—1973）



▲刘师培（1884—1920）



▲吴稚晖（1865—1953）

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主要在国外活动。1907 年，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受日本无政府党影响，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者也"。[3] 他们出版《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的李石曾、吴稚晖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 121 期，1907 年创刊，1910 年 5 月停刊），《新世纪》周刊还发行《新世纪丛刊》等小册子，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与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为主。中国无政府主义围绕着《天义》、《新世纪》，形成了东（天义派）西（新世纪派）两大派别。



▲张静江（1877—1950）

① 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5 页。

② 《无政府主义传入与 20 世纪初年的革命风潮》，《山东大学文科论文丛刊》1983 年第 1 期。

③ 《续社会主义讲习所第一次开会纪事》，《新世纪》第 25 号、第 26 号。

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者陆续回国。这与中华民国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本身是中国同盟会的成员，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纷纷回国，一度使无政府主义泛滥开来。民国初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奉为楷模的是刘师复。刘师复（1884—1915）原名绍彬，又名师复。广东香山人。1904 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 年 5 月，在广州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晦鸣学舍”。第二年 8 月创办《晦鸣录》(从第三号起改为《民声》)，作为“晦鸣学舍”的机关刊物。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后来又成立“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在工人中鼓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刘师复（1884—1915）

中国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十分松散、复杂的政治派别。1915 年，刘师复病逝后，黄凌霜、区声白继承了他的衣钵，宣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力军。克氏的“互助论”，是对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颠覆，主张通过伦理革命，改造人的思想，从而塑造善势力，以铲除恶势力，建立起无阶级、无压迫的美好共产主义。他们主张“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①


▲朱谦之（1899—1972）

以朱谦之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推崇新的虚无主义。朱氏早年入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有深厚的中西哲学基础。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鼓吹劳动运动。在思想上则把施蒂纳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同叔本华的唯心哲学、柏格森的“创化论”与中国老庄的无为主义融合在一起，炮制“新虚革命”为主要手段的无政府虚无无主义。


▲区声白（1892—？）

以郑太朴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他反

① 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1919 年 5 月。

对机械照搬欧洲各派无政府主义理论。有趣的是，他在《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一文[①]里提出了“中国式”的命题，指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意思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社会情形，人民性情而酌定的无政府；不是贸贸然把西洋那个无政府学者底办法胡乱装上；因为地理历史既各不同，断不能囫囵吞枣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化’和‘中国式’虽非一个概念，但意思很相近。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知道引进无政府主义，要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②]但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方案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所以郑氏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除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声明外，与中国社会毫无相干。



▲郑太朴（1901—1949）

袁世凯掌握政权后，人们对民主共和的希望破灭。随后连年不息的军阀内战，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导致小生产者对国家、政治、法律的疑惑与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他们找不到国家的前途与出路，同时对军阀的黑暗统治强烈不满，便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③]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废除一切国家，痛斥军阀政府的罪恶，争取“绝对自由”的理想，迎合了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近90多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70余种，影响涉及国内14个省市。随着“新思潮”的不断涌入和“社会改造”之声的不断高涨，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出路，因而备受知识分子的关注。其中主要原因，首先，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要更早来到我国。其次，无政府主义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憧憬的“共产主义”与我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有相似之处，对先进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再次，无政府主义对劳动大众充满了同情。最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伦理革命在深层面与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17日。

② 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③ 列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289页。

儒家伦理政治相契合，而受到先进青年的青睐。陈独秀曾撰文指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①] 李大钊"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②]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坠落的人心"。[③] 毛泽东曾回忆："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了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④] 恽代英亦声称："吾自信无政府主义。"[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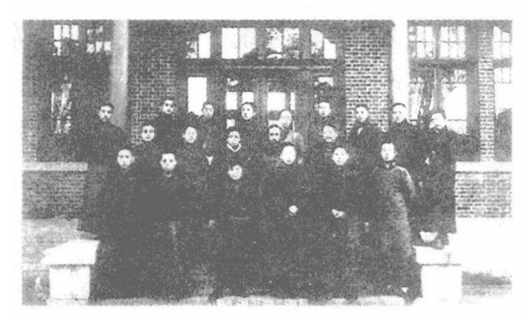
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及封建主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在反封建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调转笔锋，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919 年 2 月，黄凌霜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那'社会民主主义'，都是'集产社会主义'。德国的马克斯算做他的创造人。""马克斯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虽然现在还有许多人崇拜他的玄想的经济学，我们都是反对的很"。"我们极端反对马克斯的集产社会主义"，"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奉集产主义为瑰宝、为家珍"。[⑥] 同年 5 月，他又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⑦] 一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1920 年 2 月，易家钺、朱谦之等无政府主义者在《奋斗》上，公开发表以《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⑧] 为题的文章，竖起反对苏俄的旗号，指

① 记者（陈独秀）:《答李平敬》,《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2 号，1915 年 10 月 15 日。
②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9 月 15 日。
③ 同上。
④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8 页。
⑤ 见《恽代英日记》，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17 页。
⑥ 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2 月 20 日。
⑦ 《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1919 年 5 月。
⑧ 《奋斗》第 2 号，1920 年 2 月 24 日。

出："反对布尔扎维克主义，换一句话，就是反对马克斯主义。"


▲易家钺（1899—1972）前排右一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泛泛的政治学说，而是作为一种旗帜鲜明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吸引了大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1920年9月1日发表的《谈政治》[①]是这一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剖析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分析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罪恶，指出世界上最不平最痛苦之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之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的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些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觉悟起来，掌握国家机器，利用国家这个强制的工具，即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征服资产阶级，这样才可望消灭私有制，建立劳动者的平等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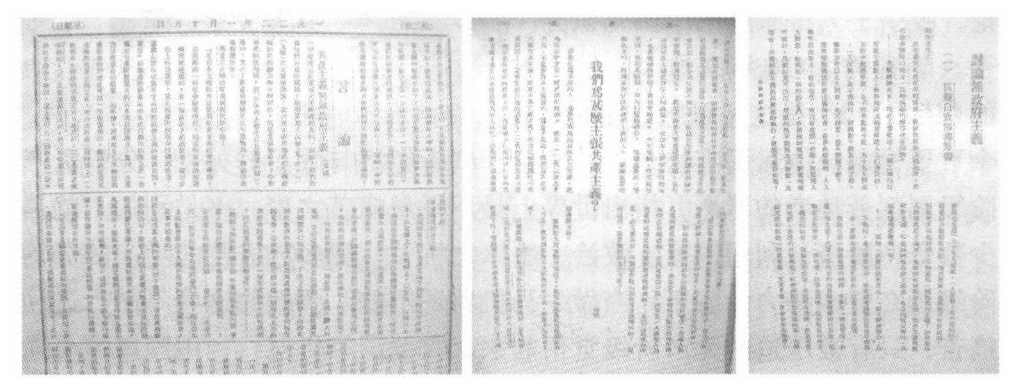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逐渐洗刷了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告别改良主义，皈依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刚刚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争。陈独秀的《论政治》揭开了这场论争的序幕。他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示政治的实质，宣传阶级斗争理论，明确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么，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机会。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批评，陈氏指出："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他最后断言："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郑贤宗的辩诘，他致信陈独秀提出反对意见，陈氏则回信加以批驳，由此引发了一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论将是陈独秀、李达（江春）、周

---

① 《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佛海（无懈）、施存统（光亮、C.T）等，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商榷》（江春著，《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江春著，《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无懈著，《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夺取政权》（无懈著，《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C.T著，《共产党》第



▲与无政府主义论争的文章

5号，1921年6月7日）、《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著，《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1日）、《讨论无政府主义》（陈独秀与区声白辩论的书信，《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以及李大钊的《自由与秩序》（《少年中国》2卷7号，1921年1月）、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论将是区声白、郑贤宗、郑太朴等，发表了郑贤宗致独秀（《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17日）、区声白三致陈独秀书（《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等。

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争的主要内容

第一，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理念是“反对一切强权”，即反对国家、政权、军队、政治、法律等。他们主张“无限制之自由”，绝对不承认“法定之权力”，认为“政权就是自由的魔敌”，宣称一切国家都是坏的，“凡有政府，皆属万恶”，都属反对之列，因

为“国家是所有的权威的总汇”。[①] 国家就是权力，在权力支配下的人就不会平等。[②]

马克思主义者抓住无政府主义者抽象反对一切强权的错误，指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谐的一个证据”。[③] 国家只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形式、制度、工具、机关，它本身并不可恶，是有人拿它来作恶，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即外部的侵袭”。因此，“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④] 既然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来维护其私有制，剥削劳动者，那么劳动者也可以“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⑤] “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引者注：指资产阶级）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治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政权……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激之至”。[⑥] 因此，必须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以改造它，“不必抛弃不用”。[⑦]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必然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不同本质不加区别，一概反对，宣称要“反对任何形式而具有强力的国家”，“凡一切政治和权力一概否认之，无论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也好，君主专制的政府也好，劳农执政的政府也好，均反对之”。[⑧] “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

① 叶麟：《“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1日。
② 倩吾：《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观念》，《工余》第14号，1923年2月。
③ S.P.：《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7号，1920年5月23日。
④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⑤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S.P.：《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刑》第17号，1920年5月23日。

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也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①] 他们指责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专政，污蔑列宁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大皇帝”。[②] 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必将使资本主义复辟，即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不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声称如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利用强权压制自由，剥削压迫劳动者，造成社会新的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者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批驳。首先，指出国家的实质。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强权的工具，是“一阶级压迫一阶级的机关”，[③] “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资产阶级奴役劳动者的利器。既然强权是工具，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利用呢？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④] “我们底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我们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⑤]

其次，阐释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手段取得统治权的国家形式。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劳动大众通过社会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经济政治的统治权，建立起了新的国家组织。资产阶级失去了私有制，必定还会夺回统治权，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防止资产阶级的再生。无政府主义者反问：资产阶级既然失去了国家，它的私有财产归了公，也就变成了无资产阶级，那还怎样复辟呢？陈独秀指出，这种论调是将复杂历史简单化了。私有制的消灭，实际要经过长久的岁月；而“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如何都有发

① A.D（易家钺）:《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奋斗》旬刊第 2 号，1920 年 2 月 24 日。
② 同上。
③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④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
⑤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①]陈氏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私有制的制度，一个是私有制的观念。后者比前者的消失则要长久得多。这实际上提出了思想战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因此彻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必须长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器来占领无产阶级的“权力阶级的地位”。[②]

最后，正确诠释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与制度。但它被资产阶级污名化，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集中攻击点。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攻击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们是从反对一切强权出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对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反复引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须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的理论，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他们以苏俄国家强权为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信仰与主义，而是手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他们将无产阶级专政与封建主义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区别开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作用：一是“压服”资产阶级，一是教育训练无产阶级。他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只是少数人的专政，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必须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教育、训练，使他们“急速成熟”，[③]个个觉悟起来，信奉共产主义，使专政成为无产阶级多数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维护个人特权，更不是维护列宁的专政，而是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拿来“废除”剥削阶级，“压伏”反动阶级，“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帮助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障”无产阶级的自由，[④]“是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特别强调：为了防止无产阶级专政造成袁世凯第二的现象出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届时无产阶级的监督，无产阶级领袖信奉共产主义，并且要为主义努力，为主义牺牲，接

① 《陈独秀答郑贤宗》，《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②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③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④ 同上。
⑤ C.T：《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

受无产阶级的监督，如果“一旦有人背叛主义，势必为众所弃”。[①]

第三，关于自由和组织纪律的问题。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无政府主义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主张自我，主张发展心意性格，改变内部生活、精神生活”。[②]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黄凌霜说：“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③]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应该是自由自在的，个人的绝对自由不容丝毫的侵犯，正如区声白所说：“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④]在政治取向上，主张取消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驳斥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绝对自由”的错误思想，指出在人类社会中，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个人的自由总是相对的。他们从四个方面来驳斥：首先，通过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来论证脱离了物质的自由只能是空想。自由作为一种意识和行为，必然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经济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无政府主义主张铲除私有制，这点与马克思主义相似，但新的社会，如果不实行中央集权管理，那么所谓个人自由、生产自由放任，都是“迷想”、“空想”。[⑤]

其次，用现实生活中的寻常问题来说明社会没有“绝对自由”。陈独秀以房屋搬迁为例，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房，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搬迁，但有的因各种原因，决计不愿迁移。如果满足这些人，那么多数人同意搬迁的自由在哪里？如果搬迁，那么这些少数人的自由又在哪里？“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的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⑥]“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

①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5月7日。
② 江春（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第4号，1921年6月7日。
③ 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2号，1919年2月20日。
④ 《陈独秀答区声白》，《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⑤ 江春（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
⑥ 《陈独秀答区声白》，《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①]

再次，通过历史来证明“绝对自由”行不通。作为自由思想在组织方面的体现，就是克鲁泡特金推崇的中世纪自治都市，陈独秀问道：中世纪的自治都市为什么会失败？原因有二：一是自治都市没有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垄断了政权；一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自由贸易，自由掠夺劳动者，自由经济造成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因此对劳动大众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②]

最后，在学理上驳斥“绝对自由”。李达通过对无政府主义起源和派别的分析，将无政府主义分为“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两大类。前者主张绝对的主权和自由。后者则放在经济改造上，其中“绝对自由”则是共识，只是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声明：他们非但不反对，“而且是力求与彼接近”，[③]这些原则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共产主义建立，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四，关于生产和分配的问题。要不要“产业国有”和“按劳分配”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无政府主义者从永久维持自由涣散的小生产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产业国有”和“按劳分配”。在生产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④]在分配方面，主张在革命以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为“不平等”。“按各人劳动的多寡，来给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将至不能生活”。[⑤]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各人在团体中不以工作之多寡而定其酬给，只依能力之多寡而定其义务之大小，故共产主义原则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⑥]黄凌霜甚至指出：“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

① 《陈独秀答区声白》，《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②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③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
④ A.D（易家钺）：《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奋斗》旬刊第2号，1920年2月24日。
⑤ 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⑥ S.P.：《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7号，1920年5月23日。

'各尽所能'四个大字。他们所主张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四个大字。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辩的焦点，就在这个了"。[①]这些思想是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

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②]中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主张立即实行"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取所需"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因为生产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限的，而以有限的生产来满足人们消费的自由取得是不可能的，"只是在社会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同时指出"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③]陈独秀说："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针对黄凌霜提出实行"按劳分配"会出现强欺弱的现象，指出："共产主义底原则，就是不做工的人不准吃饭；做了多少工，才能得多少报酬；以强权的正当用法，防止强权的滥用"。"在我们底共产制下，虽不能保没有懒人，却没有人不做工……虽不能保没有想欺弱的强者，却可保没有强欺弱的事实。"[⑤]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取所需"能否实现，而是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之后，"是否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问题"，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取所需"才是可以实现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主义，国家也会消灭，"所以我们底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⑥]

第五，关于斗争手段问题与建党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黄凌霜

---

① A.D（易家钺）：《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奋斗》旬刊第2号，1920年2月24日。
② 《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
③ 同上。
④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90页。
⑤ 无懈（周佛海）：《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
⑥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

等人企图用“少数人的暴动”和“教育”手段来“得到革命成功，那便是梦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鼓吹的所谓“经济的总同盟罢工”，“与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并无何种关系，决不能当作社会革命的手段”。[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史观，反复强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走上现代之国家。

由于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迷信自发的革命斗争，所以反对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无产阶级要有觉悟，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作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群众〕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②] 旅欧的蔡和森提出必须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给国内的毛泽东的信中，进一步说明“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他还介绍了俄党（布）入党的条件和党的纪律。[③] 毛泽东给予热情的回应，在回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④] 他和蔡和森一样，坚决主张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争的意义

第一，通过论争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促进了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均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通过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在这场大辩论中反思，他们逐步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恽代英的思想转变之旅具有代表性。

恽代英于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时，开始接触克鲁泡特金的互

① 江春（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2号。
② 李达：《评第四国际》，《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
③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3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70页。
④ 《毛泽东给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助论。1917年10月 成立进步小团体互助社。他接受互助论主要是用来批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他将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是权利论者，是“天下争攘之源泉”，西方文明是“万恶之凶手”。[①] 与此对应的是他从克鲁泡特金的社会进化论中憧憬美好的社会——“破除私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的共产主义。[②] 如何达到理想社会呢？恽代英认为：首先养成善势力去扑灭恶势力，“吾望有志之士，善用其由文明进化所得之智力，群出于善之途，使道德有进化无退化，以早促黄金世界之实现也。”[③]

有鉴于此，当新村、互助工读运动出现时，受到了他的热烈欢迎，并立即行动起来。1920年2月1日，他与志同道合者创办利群书社，这是一个“工读互助团性质”的营业机关，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一个修养团体的结晶体，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④] 以后他又希望在林育南的家乡湖北黄冈浚新小学办一个新村性质的基地。他们企图用这种避开黑暗社会，单纯办实业，搞文化事业，建设资本团体的方式，“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⑤] 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美好梦想处处碰壁，促他逐渐觉悟：新村运动于“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⑥] 对工读互助运动，他的觉悟更彻底些，“我们要知道工读虽是好事，究竟在生活能力不充实的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呢。”[⑦] 对无政府主义，他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文章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甚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⑧] 新世界观在否定旧我中萌芽，在同一文章里，他赞成阶级斗争：“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

① 恽代英:《义务论》,《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年10月。
② 恽代英:《金钱与工作》,《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4月22日。
③ 代英:《文明与道德》,《东方杂志》第12卷第12号，1915年12月10日。
④ 《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⑤ 代英:《未来之梦》,《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⑥ 恽代英:《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
⑦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
⑧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

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①]1921年7月，他在黄冈浚新小学组织成立了共存社，确定了“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图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思想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萧旭东、蔡和森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③]相当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与恽代英、毛泽东一样，在这个时期，与无政府主义决裂后，先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是一批曾被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精英反戈一击参加进来而逐渐壮大的。

第二，通过论争进一步分清改良与革命的区别，确定用阶级斗争手段彻底改造社会的复兴中华的道路。走什么道路才能振兴中华，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主张在精神层面改造社会。克鲁泡特金将社会的弊端归罪于恶道德，要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在于善道德的养成，去战胜恶道德，即企图通过道德的进化达到共产主义。克氏的伦理改造论与传统的“政治伦理”是相通的，对五四时期的广大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以致“立品救国”、“人心革命”等一度成为他们的济世良方，从道德领域改造社会的思想也成为长期困扰激进知识分子寻求正确救国道路的关键问题。利群书社在讨论社会改造问题时，恽代英总是希望避免“流血事业”。[④]施存统也说：“革命手段，并不是不可变的，我们也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最好的手段的；不过没有发见更好的革命手段之前，我们却不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彼是最有效的革命手段的。”[⑤]

---

①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

② 《浚新大会纪略》，《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③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④ 《代英致胡业裕》，《互助》第1期，上卷，1920年10月。

⑤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

这场大论争，给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改造社会的正确方向。他们用唯物史观作为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武器，指出无政府共产主义宣扬道德救国，是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善道德才能建立，恶道德才能铲除。无政府主义在不改变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所谓通过“道德革命”达到共产主义只是空想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才能达到共产主义。

第三，通过论争，加速了无政府主义队伍内部的解体。1922 年 6 月 16 日，黄凌霜致信陈独秀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①] 无政府主义刊物《互助》月刊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政治派别（引者注：指无政府主义）已奄奄一息，几无生气”。[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无政府主义组织派别是因遭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痛批，被打中要害才逐渐在历史舞台上失去作用。

第四，通过论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扫清了障碍。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场论争使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肯定了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抽象反对强权的错误思想，为中共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准备了思想条件。中国第一代传播者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出，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就是走苏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 Revolution，决不容 Evolution；理想的社会就是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③] 同时，论争中对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的必要性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这有力地促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准备了组织条件。正如刘少奇在五四运动 20 周年时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

---

① 《凌霜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1922 年 4 月。

② 晓星：《怎样宣传安那其主义》，《互助》第 1 期，1923 年 3 月 15 日。

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译稿），《“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 页。

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1]

四、对我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再评价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论无政府主义时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定势，即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思潮。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中，将无政府主义作为对立的一方加以彻底的否定，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毫无妥协的斗争。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简单的话，那么为什么军阀政府一直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视为“洪水猛兽”，作为“过激党”，对其活动加以禁止，对其宣传品给予取缔？为什么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等无不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为什么共产国际使华代表在建党前后，曾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争取、合作的对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仍明确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统战对象？这四个为什么提示我们，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对我国的无政府主义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加以认识。

第一，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进步思潮在晚清传入我国的。历史往往有这种现象，西方某种思潮到东方，其作用、结果会完全不同，这是因国情不同，时代不同使然。无政府主义在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无政府主义在欧洲已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痛批，但来到东方，却成为一部分激进爱国主义者进行救亡运动的思想武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鸦片战争后，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无政府主义主张的自由是针对封建专制的，他们反对的强权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他们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憧憬的共产主义与我国传统的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给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好前景。

无政府主义思潮比马克思主义要早来到中国，此时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寻求救国的爱国青年企图找到一条避开资本主义的新道路来济世，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一度吸引了他们，成为他们救国道路的首选，即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也没有改变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正如刘少奇说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各派社会主义都来了，我就看过各派社会主义的书，在最初一个

---

① 《中国青年》第1卷第1期，1939年5月。

时期，无政府主义受到欢迎，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很多人相信无政府主义，以为痛快得很，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①

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是我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桥梁。如前所述，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所谓桥梁作用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的：首先，无政府主义猛烈地批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同情劳动大众，以及憧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这些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其次，无政府主义在哲学层面的唯心主义，在政治层面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产党，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与之进行彻底决裂，才能在世界观上完成伟大的转变，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蔡和森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实现伟大转变之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无政府主义者曾是党的统战盟友。历史是极其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之初，无政府主义者曾充当了传播的主要中介。1907 年张继、刘师培等人在日本发起组织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发行机关刊物《天义报》。《天义报》是介绍《共产党宣言》最早、最多的刊物之一。同年 12 月的第 13 卷、第 14 卷合刊上就刊登了《宣言》中关于“论妇女问题”的论述，“编者按”中指出：“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比俟经济规模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② 次年 1 月，刊登了恩格斯 1888 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在编者写的《跋》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言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③ 在 16—19 卷合刊上，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摘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外在巴黎的《新世纪》也宣传马克思主义。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是刘师复的晦鸣学社，其刊物《民声》（由《晦鸣录》改名）在宣传社会

① 刘少奇：《1948 年 7 月 1 日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党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

② 《天义报》第 13 卷、第 14 卷，1907 年 12 月 30 日。

③ 同上。

主义时，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主要是经济理论。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刊物《劳动》(1918年3月创刊)、《进化》(1919年1月创刊)，极力鼓吹劳动与互助，成为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最亮点。《劳动》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工人农民的悲惨生活，说明劳动的价值和尊重劳动的重要性；揭露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鼓吹通过劳动、互助的手段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作为实践这个理想社会的手段之一就是工读互助与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前后，赴欧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是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种豆得瓜，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一批激进青年抵达欧洲后，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在与工人相结合中，逐渐与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线，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歌颂十月革命，善意地介绍过列宁。十月革命后，《劳动》发表了《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李宁之解剖》等文章，称赞道："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那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现在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法兰西一革命，乃孕育19世纪之文明，俄罗斯一革命，将转移20世界之时局"。[①]列宁是领导俄国谋求"人类的幸福"，"所抱的主义，是要这世界一般的人男女同一样，贫富一般齐"。[②]该刊用了较多篇幅力求报道一个真实的苏俄，这与当时充斥其他报刊大为污蔑与攻击的报道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颇具声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震寰(袁振英)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发表大量赞扬苏联"劳农政权"之"成就"的译介文章。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最早将社会主义宣传转向工人运动，并从事职工运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严厉的抨击；对苏俄持友善的立场，共产国际使华代表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来华工作的对象之一，魏金斯基来华的第一份报告就说明了这个况："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大会"。[③]1920年7月19日，在

---

① 劳人:《李宁之解剖》,《劳动》第3号，1918年5月20日。

② 同上。

③ 《维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丛书》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笔者附言：此信时间石川考证时间为6月9日。


▲斯托扬诺维奇（1886—1938）
（李丹阳提供）

他的主导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联合会议，共同组成社会主义者同盟。魏氏使团成员斯托扬诺维奇还在北京、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参加中共早期组织。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袁振英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早期党组织的工作，参加党办的劳动刊物，如袁振英担任《劳动界》的编辑，黄凌霜、陈伯根主办《劳动音》。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资助下，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221弄12号开办的又新印刷厂，是党的第一家印刷厂，则由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全权负责。无政府主义者后因在组织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严重分歧，便退出了北京、广州的早期党组织。

尽管如此，党一方面在理论战线上批判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仍然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统战盟友。《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5月7日）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写此文的“旨趣”是：“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无政府党要推倒资本主义所以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以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我因为要约同这些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共同对世界资本主义作战，共同剿灭世界资本制度，以便早期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出来和各位朋友们商量一下”。

在1922年年初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将无政府党作为革命团体，邀请黄凌霜、黄壁魂作为代表莅会。基于对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政治判断，中共二大制定了与无政府党合作的策略。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称：“为工人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①] 无政府主义“虽于政策上有许多错误的地方，然为富于革命性及为无产阶级的团体。所以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们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种奋斗起见，应与之结成共同的战线。”[①] 决议案指出，在联合中继续批评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教育无政府主义者，促使他们思想转变。

在探索中共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还需要考察苏俄、共产国际对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这方面的内容远比现在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的要复杂得多，这恐怕需要专题研究，此处只能稍作说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空前的孤立，为了打破这种状况，鉴于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些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十月革命，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赞扬等因素，列宁曾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合作，故有“安那其布尔什维克”（Anarcho-Bolsheviks）之称。共产国际成立后，曾制定与无政府主义合作的策略。但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反对苏俄政府及其许多政策等原因，1921 年 3 月俄共（布）十大决定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为此共产国际也改变了对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认识要比魏金斯基清楚一些，魏氏刚到中国不久，即 1920 年 9 月，陈独秀就发表了著名的《谈政治》，揭开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在我国，作为对共产国际改变对无政府主义策略的反映，就是各地社会主义同盟的解散和李达、施存统、周佛海等重量级批判文章的出台（笔者注：这批文章均在 1921 年 5 月以后发表绝不是偶然的），使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进入高潮。

第四节　新村、工读运动失败后的觉醒

五四运动后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其中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作为一股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与实践一度成为时尚，在进步知识分子群落中备受欢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的进步青年，纷纷建立起“新村”、“工读互助团”等组织，积极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企图通过互助劳动改造国民性，用闭门改良的方式实现其救国救民的美好愿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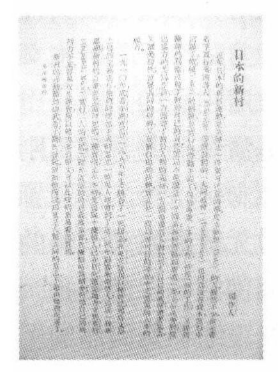
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1922 年 5 月），《“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5 页。

一、新村、工读主义释义

新村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来自日本，主要由周作人介绍到国内。1919年3月，周氏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发表《日本的新村》，介绍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随后他又撰写了《新村运动的解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26日)、《新村的精神》(《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19年11月8日)、《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上海《民国日报》第四张，1920年6月26日)、《访日本新村记》(《新潮》2卷1号，1919年7月)等，详细介绍武者小路的新村思想。这种新村的模式，也获得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欢迎。李大钊还撰文《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对美国7种具体的新村模式作了介绍。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新村运动就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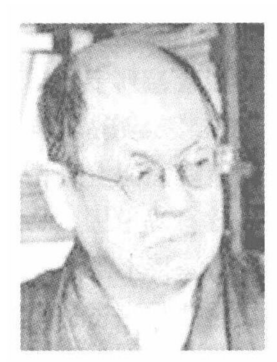
▲周作人（1885—1968）



日本的新村

周作人

▲1919年3月《新青年》第6卷第3号发表《日本的新村》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新村运动在于“提倡协力共同生活”、“提倡实行人的生活”、“互助的生活”，“重在建设模范的人的生活，信托人间的理性”。[1] 新村的目的“是在于过正当的人的生活”，其中有两条重要的思想：“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的个性”。新村的精神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既关注人类，又注重个人。新村的思想是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简单的说，新村“是人的生活”，“主张以协力的劳动，造成安全的生活”，[2] 以“实现

①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

② 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1920年6月26日。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①] 新村运动“一方面是要提倡互助共同生活，一方面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涵庐（即高一涵）认为新村运动是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大新村”，“不但没有阶级的界限，就连那政治的界限也渐渐地化除了”。[②] 有人指出新村运动的要旨：第一是共产主义，第二是劳动主义。[③]

新村运动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建立新村的原因是“新村的人不满现今的社会组织，想从根本上改革它”；建设新村的手段是通过“和平改革”而非“暴力革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村，以至扩大到全世界；建立新村的目的是“在于过正当人的生活”，人人平等，互助友爱，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新村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④] 新村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充满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融合一起，希图通过非暴力的改良手段达到人类大同社会。这种政治理想迎合了包括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先进中国人探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想需要，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



▲王光祈（1892—1936）

促进新村成为运动的推手是王光祈。王光祈（1892—1936），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1918年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同年6月与李大钊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正式成立，被推为执行部主任，成为该会核心人物，在全国进步青年中颇有影响。7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重要分子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小组织的提倡》，鼓吹新村，并在《少年中国》上以“讨论小组织问题”栏目（通信）的形式展开讨论。[⑤] 王光祈提出了具体的设想：“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



▲《少年中国》创刊号封面，1919年7月15日

---

① 郭绍虞:《新村研究》,《新潮》第2卷第1号，第66页

② 涵庐（高一涵）:《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上海《民国日报》第3张，1919年8月24日。

③ 谢婴白:《新村提倡者武者小路氏》，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1920年1月4日。

④ 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上海《民国日报》第4张、1920年6月26日。

⑤《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汇集了有关通信10篇。

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王氏深为自己的设想所陶醉，说道：“我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着我们……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①]但这种乌托邦式的乡村乐园，在各地略作试验就宣告破产了。

工读主义（笔者注：又称工读互助主义或工学主义）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是五四时期对青年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发轫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它融合了当时传入中国的几种“新思潮”，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故受到相当多先进青年的热捧，无论是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还是激进青年学子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等，一度都深受其影响，不仅竭力鼓吹，更是付诸实践。工读主义思潮的兴盛与衰落，生动体现了“五四青年”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探索历程。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可视为他将主张付诸实践的“宣言书”。“宣言书”提出以工读主义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社会之目的。“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最终的理想就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②]工读主义以互助论为基本精神，王光祈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集产制度”，俄国式无产阶级专政，“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③]“我们即主张互助”，把



▲《晨报》1919年12月4日刊登城市新生活发起人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

① 《若愚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② 《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③ 《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1919年6月1日。

这种“互助”精神推而广之，使社会都养成“互助”的习惯，逐步“消灭差等”，“创造新社会”。[①]工读主义以新村为外壳，王光祈所构想的“菜园式”的小组织，都带有浓厚的新村主义色彩，这种“菜园新村”，每天2小时种菜，3小时读书，3小时翻译，其余时间“均作为游戏阅报时间”。这种“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②]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实际已被激进知识分子融合为一体，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迎合了救国救民知识青年的心理，因此得到迅速传播。

二、新村、工读主义的社会实践

新村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青年，不少人表达出对新村的向往。1919年11月1日，恽代英在日记里写了《新村的企望》，说他与林育南“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③]毛泽东也曾主张：“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试图在湖南先搞“分解决”，后在全国搞“总解决”的试验。他在致周世钊的信[④]中希望“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1920年3月5日，他与陈独秀、王光祈等联名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上海互助团募捐启》。蔡和森、瞿秋白等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接受武者小路“新村”的主张，认为“组织新村是创造新环境的试验石”，[⑤]企图通过新村的计划，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将工读互助思想变成行动的还是王光祈。1919年秋，他与少年中国的骨干左舜生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间新生活，提倡在城市中建立类似新村的“新生活”。[⑥]“这个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城市的新生活“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

① 《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
② 《若愚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③ 《恽代英日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2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页。
⑤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33页。
⑥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现在生活的根据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①] 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响应，“不到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②]1920 年 2 月，周作人组织了“新村北京支部”。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学校学生，1919 年到 1920 年间，按“新村”的模式，成立了小组，还把宿舍命名为“新村”、“平民村”、“大同村”和“友谊村”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思想教育界的 17 名知名人士，在报上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表示支持和赞助。

工读互助团的第一个实体——北京工读互助团随后成立，成立之初共分三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共 11 人；第二组设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三校附近，共 11 人；第三组全是妇女，所以又名“女子工读互助团”，有 10 余人；1920 年增设第四组。团员们一面从事办食堂、洗衣、印刷、装订制造小工艺品和贩卖新书报等体力劳动，一面分别在各校听课，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将来把各地的小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就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的社会”。因此把工读互助团称为“新社会的胎儿”。[③]

附《工读互助团消息》（摘录）[④]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

①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7 期，1920 年 1 月 15 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新青年》第 7 卷第 2 号、第 3 号，1920 年 2 月、3 月。

发起人　　李大钊　陈独秀　蔡元培　胡　适　周作人　顾兆熊
　　　　　陈溥贤　王星拱　高一涵　张崧年　程演生　陶履泰
　　　　　李辛白　孟寿椿　徐彦之　罗家伦　王光祈

关於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 1 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 4 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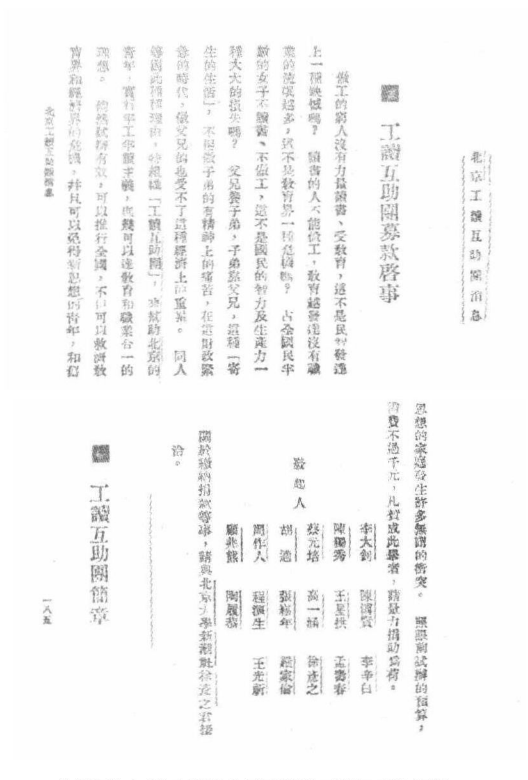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　暂分 9 种：1. 石印。2. 素菜食堂。3. 洗衣服。4. 制浆糊。5. 印信笺。6. 贩卖商品及书报。7. 装订书报。8. 制墨汁及蓝墨水。9. 其他。

（六）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组织　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事务员设总会计 1 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设庶务 2 人，


北京工讀互助團消息

工讀互助團募款啓事

做工的窮人沒有力量讀書、受教育，這不是民智發達上一種缺憾嗎？ 讀書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發達沒有職業的流氓越多，豈不是教育界一種危機嗎？ 占全國民半數的女子不讀書、不做工，這不是國民的智力及生產力一種大大的損失嗎？ 父兄養子弟，子弟靠父兄，這種「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這財政緊急的時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這種經濟上的重累。 同人等因此種種理由，特組織「工讀互助團」，來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 倘然試辦有效，可以推行全國，不但可以救濟教育界和經濟界的危機，並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舊思想的家庭發生許多無謂的衝突。 照眼前試辦的預算，消費不過千元，凡贊成此舉者，請盡力捐助為荷。

發起人　李大釗　陳溥賢　李辛白
　　　　陳獨秀　王星拱　孟壽椿
　　　　蔡元培　高一涵　徐彥之
　　　　胡　適　張崧年　羅家倫
　　　　周作人　程演生　王光祈
　　　　顧兆熊　陶履泰

關於繳納捐款等事，請與北京大學新潮社徐彥之君接洽。

工讀互助團簡章

一八五

▲《新青年》第 7 卷第 3 号刊登的工读互助的资料

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於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附则　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凡报名愿入本团者，请明愿在本团何组工作。通讯处：北京东华门内宗人府东巷蓬庐王光祈。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

本团因便利团员求学起见，暂分为3组，共需费1000元。

第一组27人，地点在北京大学附近。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石印及装订。（三）洗衣。

第二组19人，地点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洗衣。（三）制造小工艺，如糨糊墨水等。

第三组若干人，地点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本组全由女子组织。）

营业要目:（一）编织。（二）小工艺。

第一组开办费400元。（食堂与石印局系在两处）

（一）开素菜食堂共需房费设备费等100元。

（二）石印机器及其附件150元。

（三）石印局房费100元。

（四）买家具50元。

工作分配方法:（略）

收入捐款（略）

各组地点及人数

第一组在骑河楼门鸡坑7号，团员现共15人。

章铁民　张树荣　吴名世　孟雄　焕业　施存统　秀松　党家斌　俞鸿　周方　彬然　百棣　张伯根　仰煦　周昌炽

第二组在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团员现共11人。

王恕　郭曾楷　张衡沛　张纯　刘晦　刘豪　罗汉　李实　匡僧　欧逊訾久

第三组现尚未举办。

开办经费

第一组　预算房金60元。家具123元。食堂开办费160元。洗衣开办费40元。其余杂费30元。电影股开办费预算共约400元。共500元。

第二组开办预算费共约400元。

工作情形：

第一组工作现有食堂、电影、洗衣3股，英算专修馆及石印股尚在预备中。

食堂股共8人，分2班，每班4人，两班轮流工作。早班自上午7时至下午2[时]，晚班自下午2时至9时，外雇厨司1人以资指导。会堂开设在北京大学第二宿舍对门，房租每月6元，营业收入因开办未久尚无确定数目。

电影一股共4人，每星期一下午7时至9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开演；星期二星期三下午7时半至10时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开演；星期六星期日在男子高等师范风雨操场开演，星期四星期五尚未一定。每月影片租钱300元（以后可略改），司机2人，月薪30元（因现在团员尚未能自己作司机，将来熟悉即可省去），杂费60元。洗衣股共3人于今日开始。共〔其〕余英算专修馆及石印将来开始时再行报告。

第二组工作分消费公社、洗衣、包饭3股，己〔已〕着手豫备开始 职务分配

第一组　总会计张树荣。

食堂会计吴名世。

书记张伯根　仰煦。

交际仰煦。

以外各职团员自由轮流

第二组　会计刘豪　訾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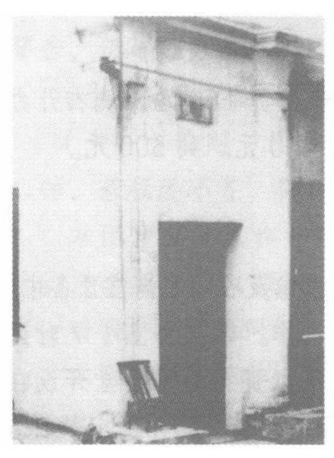
交际王恕　罗汉。

书记郭曾楷。

通信员

第一组　北京东城骑河楼门鸡坑7号仰煦。

第二组　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罗汉。





▲右为陆定一题词“利群书社”；
左为武昌利群书社旧址（湖北博物馆提供）

在武汉，1920年1月，恽代英等发表了《武昌工学互助组织大纲》一文，宣布要创办一个独立的共同生活，其目的在于“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1]1920年创办的利群书社，起初便是“工读互助团体性质相近的东西”。[2]他还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创办了浚新学校，作为试验新生活的基地。在长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曾有办“新村”的设想。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随后列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同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3]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在上海，1920年3月，由彭璜创办了工读互助团，得到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大力支持。此外还有由天津女子师范毕业生平莠英在上海狄思威尔路筹办的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湖南籍学生在上海创办的“沪

▲1920年1月31日《汉口新闻报》刊登《武昌工学互助组织大纲》

① 《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② 《恽代英致光祈》，《少年中国》第2卷12期，1921年6月。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476页。

滨工读互助团”等。当时，工读主义试验在中国是相当广泛的，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工读互助主义本身就具有空想性，这种改良的社会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如此。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之初，团员对工读互助比较热心，读书工作都很积极。但随着时间推移，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尖锐地显现出来，严重影响了工读互助团的维持和发展，工读互助团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

首先，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例如，食堂“生意冷落”，“每日亏本二元”；洗衣“办了两个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个铜子”；经营的日用品“很少有人光顾”；生产的小工艺品“也卖不出去”。由于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动用募款，然而筹款有限，使团员生活难以维持。其次，组内思想产生分歧。“工读互助团是团员的工读互助团，不是发起人的工读互助团”。“讲到发起人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主张本来就不一致。若愚、独秀等是主张试验新生活的，适之、孟和等是主张实行工读的。他们发起的时候，意见既不一致，所以各人对于工读互助团的见解主张不同。”[①] 再次，由于团员脱离学校，脱离家庭和婚姻，躲进工读互助团这个“世外桃源，去做理想社会所应当做的事情”，[②] 因而受到学校和家庭的歧视与反对，导致部分团员思想发生波动，自动离团而去。最后，由于缺乏正确思想教育，致使团员之间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也是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们在实验他们的新生活时，一开始就碰到了两个尖锐的矛盾，一是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的矛盾；二是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矛盾。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说明在私有制的社会生活中，这两个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这也是“一切新村式的乌托邦组织失败的根本原因”。[③]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说明，五四时期的这批知识精英，虽然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统治和阶级的严重对立，并企图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

---

①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

② 同上。

③ 《少年中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5页。

但是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①]他们“不去利用旧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局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②]

三、新村、工读运动失败后的觉醒

在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是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新村、工读运动的实践是一个分水岭。新村、工读运动失败后，他们从失败中觉醒起来，对工读互助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予以彻底否定。李大钊说：“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活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③]何孟雄在总结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大声疾呼：“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听文化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④]恽代英从实践中也认识到：“我们要研究唯物史观，以发现历史发展进化必要的条件，因用以制造历史……但我们要造历史，不可以不注意历史进化的必要条件，不然我们造不出历史来”。[⑤]又说，“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⑥]一度痴迷于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从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更深刻些：“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⑦]毛泽东这时认识到绝对自由，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都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他赞成蔡和森“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同上书，第478页。
③ 李守常：《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④ 《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11期，1921年5月15日。
⑤ 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⑥ 恽代英：《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
⑦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

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①]

通过反思，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政治目光由西方转向北方，“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②]新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否定中开始萌芽。李大钊主张改造社会要“根本解决”，而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③]恽代英也指出：“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④]

毛泽东曾主张“由君主立宪政体进到‘新村’，再转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⑤]1921年元旦，他在新民学会长沙大会上交流了自己初步研究的成果，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诸种方法进行了比较，认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都行不通，唯有激烈的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明确表示完全同意蔡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⑦]恽代英、林育南等湖北进步青年亦如此，他们通过艰难的探索，1921年7月在浚新小学宣布成立与中共早期组织同等性质的“波歇维式”（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共存社，明确宣布“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图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⑧]表明以恽代英、林育南为代表的一批湖北先进青年与改良主义救国道路决裂，转向了俄式的“劳农专政”之路。

---

① 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1920年12月1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③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1919年5月。

④ 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少年中国》第3卷11期。

⑤ 郑邦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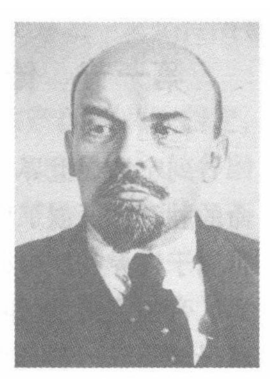
⑥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⑦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⑧ 《浚新大会纪略》，《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总之，五四时期是进步思潮飞扬的时代。矢志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精英，通过三次论争与社会改造的实践，迅速发生分化与嬗变。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选择了社会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新村、工读互助极力提倡者王光祈，后来则收敛起一度高扬的少年中国旗帜，渐渐淡出政治舞台，潜心研究音乐。可以说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最激进知识精英，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代替空想社会主义，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他们积极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新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四章
在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与影响


▲列宁（1870—1924）

中国共产党与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发展的结果。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自恩格斯逝世后，出现了左中右三大派。右派是以伯恩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修正派”，以资本主义发生巨大变化为由，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派是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正统派”，提出“超帝国主义”的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背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滑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左派以列宁为主要代表，肩负起历史重任，团结欧美共产主义者，与“修正派”、“正统派”作坚决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时也创建了共产国际。列宁倡导的共产国际规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但在共产国际实际起决定作用的是俄共（布）政治局。列宁逝世后，决定权逐渐集中到斯大林一个人手中。

列宁领导俄国共产党（布）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爆发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的设想无法实现，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却风起云涌，这样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了无

产阶级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的天然同盟军。列宁根据这一历史变化，制定了东方革命理论，成为列宁主义的精粹之一。

中国作为落后民族中的最重要国家之一，自然成为苏俄、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博弈中重点争取的对象，因此苏俄、共产国际派出代表来华，帮助建立共产党，寻找同盟者，以在远东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派遣魏金斯基，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华。这是有正式文件记载的使华代表，从此筑起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联系的正规渠道，中国革命也与苏俄、共产国际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①因此，共产国际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的主要任务之一，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第一节 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之一

列宁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制定了共产国际的全球战略，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东方落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帝国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社会主义革命与落后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相互配合，建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被压迫民族只有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获得解放，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②而苏俄只有在东方落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援下，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保证领导世界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保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功。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要实现以上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③所谓系

①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②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③ 同上。

统的宣传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东方战略思想向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进行灌输。

一、共产国际的性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的性质决定的。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指出："72 年以前，共产党就已经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纲领（引者注：即《共产党宣言》)，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预言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西·恩格斯所写的宣言"，"聚集在苏维埃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们，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感到并意识到自己是 72 年以前就已公布了纲领的那一事业的继承者和实现者。"[①] 这些"继承者和实现者"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诞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脉络关系。很显然，共产国际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同时，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之一又是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笔者注：共产国际一大制定，六大作了修改）总纲第一条指出："共产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原则和目标的体现者，它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和贫苦农民的广大阶层，为确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为完全消灭阶级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奋斗。"[②] 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必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掌握者，然后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组织和领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产主义原则和目标的体现者"，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导言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关系："共产国际根据各大洲各民族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自己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中毫无保留地站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共产国际捍卫并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它这种革命方法来认识现实、

① 《共产国际宣言》，1919 年 3 月 6 日，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83 页。

② 《共产国际章程》，同上书，第 74 页。

从而达到革命地改造这一现实的目的；共产国际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形形色色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展开积极的斗争。”[①]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重要、明确的职责，是共产国际的基本工作内容，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共产国际纲领》第六章“共产国际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第二节规定：“共产国际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胜利斗争的前提，乃是在各国都有一个团结一致、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有纪律的、集中的、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党”。[②]这一点说明共产国际的首要目标是在各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因此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各国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时也将是共产国际向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和中间环节。这样，共产国际文件中对各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工作安排。

如果说宣言、纲领、章程中的内容对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间的关系阐述得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就十分具体了。

1920 年 7 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是各国党组织能否加入共产国际的基本判断标准，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性质的具体体现。仔细阅读这些条件，除程序上的一些要求条款外，几乎所有关于责任和义务的内容都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问题。二十一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刊物，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编。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只当着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加以宣传，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报刊上逐日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管整

① 《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16 页，第 17 页。

② 同上书，第 67 页。

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执行与党的政策不完全一致的政策。"[①]第四条指出："特别需要在军队中进行始终不懈的宣传工作，这也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义务之一"。第五条说："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②]第十八条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对传播的一种具体要求："各国一切指导性的机关刊物，都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重要文件"。[③]这一条后来体现在《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中："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和正式文件；各支部的其他刊物也应尽可能地刊登这些决议"。[④]可见，是否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各国共产党组织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成为了各国共产党能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条件。1920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时说："第三国际在1919年3月建立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在整个第一年里它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当时欧洲刚刚经历了一场如此可怕的毁灭性战争，工人们正在探索新的道路，在这样的时刻，成为国际性的宣传组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应当坦白地说，当时它不过是一个想向群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组织广泛的宣传团体。"[⑤]这虽然指的是共产国际的不足，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重视。因此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特别强调："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了的意志。它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共产主义。"[⑥]

二、共产国际对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与指导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度重视，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每一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都提出过具体要求。

① 《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同上书，第153页。

④ 《共产国际章程》，同上书，第77页。

⑤ 季诺维也夫：《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⑥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丛书》第2卷，第145页。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通过的《论策略》（提纲）决议中指出："共产国际早在成立初期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不是固步自封地成为一个个的宣传小组，而是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被迫提供给它们的一切机会：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机构（尽管这种机构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作为共产主义的武器，来对工人阶级进行鼓动和组织工作。"[①] "共产党的出版和宣传机关不应该是一个从理论上来证实共产主义的正确性的机关，而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扬者"。[②] 要求党的出版和宣传机构成为无产阶级向敌人进攻的手段。三大通过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对共产党进行宣传的原则、方式、对象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无产阶级群众中扎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必须来自工人的具体生活，来自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愿望，特别是来自他们的共同斗争。""共产党人的宣传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宣传的革命内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方式是：对个人的口头说服，参加工人的职业运动和政治运动，通过党的报刊和书籍扩大影响。"[③] 提纲要求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紧紧结合工人斗争的实际进行，不要"总是仅仅宣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④] 要到工厂、农业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的海陆军中进行宣传。提纲还用较长的篇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党报，提出了专门的要求。提纲指出："任何一种报纸如果不服从党的指示，就不能被承认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党应当注意使报纸办得多，但更应当注意使报纸办得好。每一个共产党首先要有一份办得很好的中央机关报，最好是日报。"[⑤] 共产党的报纸首先要关心被剥削者和斗争中的工人的利益。它应当是我们的优秀宣传员和鼓动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指导员。"共产党的报纸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企业，即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⑥] 每一个党员

① 《论策略（提纲）》，《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62页。

② 同上书，第274页。

③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同上书，第293—294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④ 同上书，第296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⑤ 同上书，第305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⑥ 《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纲）》，《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6页。

都应当对党的报纸有所贡献。“直接参加党所领导的运动，是战斗的共产主义报刊固有的特色”。[①] 为此，三大第一次扩大会议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共产主义报刊的文件。[②]

1922 年 11 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使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加具体化。会议通过了《东方问题》提纲，专门针对东方各国的传播活动作出指示：“共产国际对东方各国共产党的帮助，首先表现在协助它们创办以本国文字发行的各种报章杂志”。[③] 这一规定被有的学者看成是“中共早期新闻事业及新闻传播思想的源流，主要源自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影响”的重要证据。[④] 四大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要求的决议。决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进行教育工作是一切共产党的必要任务”，“作为党的整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应当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为了对全党的教育活动进行领导，最好能够在每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教育书记处’”，“为了开展党的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为各班聘请教员和讲师，设立图书馆，等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面设国际教育工作部”。[⑤] “为了对共产国际所属各国支部有关同志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实际的共产主义教育，决定在俄国社会主义学院中开办各种国际讲习班以及其他类似训练班”，“必须使每个党员在非党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⑥]

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的历史使命，从共产国际诞生到解散，这一使命从始而终。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国际这个历史使命，这里有必要对共产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308 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3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319 页。

③ 《东方问题（提纲）》，《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452 页。

④ 张之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早期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上），《国际新闻界》2004 年第 2 期。

⑤ 《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第 466—467 页。曹军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书中说，共产国际四大上决定成立宣传鼓动部，下设群众鼓动工作处、宣传教育工作处、新闻出版和情报工作处。见该书第 14 页。

⑥ 《各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第 468 页。

国际五大的相关内容进行介绍，虽然这次会议的时间超出了“初期传播”的时间界限，但精神是一致的。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继续强调和加重了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要求，使五大在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大会通过了有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门文件——《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提纲》共分六大部分（35条）。“一、共产主义宣传的目的和任务”（1—4条）。这一点主要强调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提纲认为，要摆脱第二国际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种偏向，只有通过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来实现，而“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通过对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实现的”，“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这种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产”。[①]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党的影响的迅速增长。可以认为，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精神来进行理论工作方面，几乎在所有的共产国际支部中都是停滞不前的。由于理论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具体情况，因此上述情况的存在，尤其值得痛心。揭示出革命的具体动力、革命条件和革命前途，就有可能更精确地制定党在政策上、组织上和宣传上的种种方法。这种理论工作，可以使党的政治工作更有把握。”[②]“二、宣传工作方面的一般组织措施”（5—8条）。首先，指出宣传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直到目前为止，无论共产国际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宣传机构，即使有的话，也是残缺不全的。在贯彻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教育工作的决议方面，各国支部的工作做得还太少，以致没有收到什么具体效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的散布不广（无论是原著或是有利于宣传工作的开展与普及的通俗教科书和参考书，都很不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图书馆里极为罕见”，“共产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人员之间缺乏联系”，“现有的寥寥无几的理论刊物和

① 《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宣传刊物”“互不通气”。[1] 其次，提出共产国际在对宣传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和促进该项工作开展的六项具体任务：（1）组织宣传鼓动部。“建立宣传机关——宣传鼓动部，由这些机关来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仍然是第五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之一”。（2）“改组并扩大共产国际的出版活动，以便除了供给各国党以日常必须的政治书刊外，还供给它们以理论宣传书刊。”（3）出版一本宣传杂志，以便对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宣传员的工作进行指导。（4）选派一些支部的工作人员到莫斯科，以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5）筹备并召开各支部负责宣传活动的工作人员和党校领导人的会议，规定党内教育及教育方法的专门化和统一化的具体的主要任务。（6）大力支持青年共产国际适当地组织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三、各支部在宣传工作方面的组织任务”（9—14 条）。这一部分要求各支部成立专门的宣传机构；注重宣传人才的培养；党员要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办好党的刊物；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馆，利用图书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制度”，（15—27 条）这一部分要求各支部：“必须根据共产国际各支部所处的不同环境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建立各种不同的宣传制度和采取各种不同的宣传方法”。指出：“必须按照两条路线——党校学习和自修，来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机关的制度”。[2] 并对党校和自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五、关于宣传提纲和宣传方法”（28—31 条）。这一部分强调了宣传的原则和宣传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必须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问题、策略任务和组织任务联系起来。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宣传。在比较高的共产主义学习阶段，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国际理论，还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和组织问题。“共产党的教育制度的任何一级，都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问题”，要宣传主要国家和本国的工人运动史和党史。为了使宣传具有成效，必须认真制定教学方法。“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著述活动的组织”（33—35 条）。提纲指出：“直到目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在共产国际内

---

① 《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2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61 页。

进行过系统的讲授。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无论就积极性而言，或是就必要的组织工作而言，都是不够的。”“共产国际除了在宣传意义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来从科学研究工作意义上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① 提纲对研究机构提出了具体要求。五大还专门通过了关于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文和书信全集的决议。

共产国际五大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显见的。它对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使共产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开始朝规范化和制度化方面发展，开始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把落后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作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条件，并制定了十分具体的工作条例与策略。这些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产生了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很容易就能看到共产国际的这些原则性规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20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宣言中就有“宣传共产主义”的内容。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有专门一节谈“宣传”，其基本精神就是共产国际的精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中有“在工人中的宣传”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的情况汇报。中共三大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对宣传的对象、内容、手段都进行了规定，并指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在这一时期，大家都当以上述的方针为标准去实行。”③

① 《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2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66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 页。

③ 《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1 页。

第二节　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初期传播的媒介与渠道

解密的共产国际文件表明，苏俄、共产国际远东的工作中心在中国上海，日本、朝鲜的许多工作也是通过上海进行的。它们派遣特使的使命始终是围绕着苏俄国家战略展开的：即在中国寻找苏俄的同盟者，以打破帝国主义在远东对苏俄的包围；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宣传。特别是后一个任务十分重要，因为在列宁看来，像中国这样现代工业十分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单纯靠落后的"中国苦力是不可能自己发动一场革命的"，[1] 劳动者更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以提高无产阶级意识。本节对苏俄、共产国际通过哪些媒介与渠道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探讨。

一、派遣代表到中国进行传播活动

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使者是苏俄在华传播马克思主义主渠道的主要中介。目前学界公认 1920 年春俄共（布）派遣的魏金斯基一行来华，是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正式开展工作的开始。事实上在魏金斯基来华前，苏俄、共产国际就派出多批人员在华活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苏俄、共产国际派出的，其中有布尔特曼、M. 波波夫、朴镇淳、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霍多洛夫等。一是旅华俄侨，其中有李泽洛维奇、波塔波夫、伊万诺夫、斯托帕尼、柏烈伟等，



▲ M. 波波夫（？—1930）
（李丹阳提供）



▲霍多洛夫（1886—1949）
（李丹阳提供）



▲朴镇淳（1897—1938）
（郑斗音提供）

① 拉兹教、哲瓦科维奇：《列宁与共产国际》（Lenin and Cominter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44 页。

他们有的是前俄官员，后来同情苏俄，为苏俄情报机关服务；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有的是联共（布）党员。一是旅俄华侨，其中有刘绍周、刘谦等。活动地点较为集中在东北、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

这些使者的身份较复杂，有的具有多种身份，如M．波波夫曾被苏俄政府委任为驻上海总领事、苏俄情报人员等。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工作也有多个系统，有俄共（布）中央、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俄共远东滨海州委、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旅俄华工联合会”（“俄国共产华员局”）、远东共和国外交部，以及苏俄军事情报部门等，造成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错综复杂，但最终统一于俄共（布）政治局。为了简便计，在本章中，将苏俄、共产国际使华代表一般简称共产国际代表。[①]

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是受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外交科派遣，身份是全权代表。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7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1921年3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因地址在伊尔库茨克（Irkutsk），故亦称伊尔库茨克局。这样苏俄、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组织系统就基本理顺。此时魏金斯基奉令回到伊尔库茨克，担任远东书记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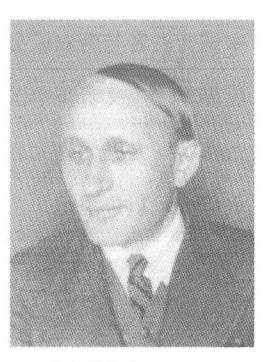
▲马林（1883—1942）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马林（1883—1942）原名亨·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用名马林、孙铎

① 关于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情况请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黄修荣：《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第二节列宁的东方战略；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李玉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苏俄密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丹阳、刘建一：《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波波夫）》，《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李丹阳：《最早与李大钊接触的苏俄代表——伊万诺夫》，《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6月；李丹阳、刘建一：《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斯托帕尼在上海》，《百年潮》2003年第3期等。

等。荷兰人。早年投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913 年到荷属殖民地爪哇（今印尼）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印尼共产党的创立。1920 年 6 月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因熟悉亚洲，又坚决拥护列宁的东方战略，遂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1921 年 6 月 4 日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会合，立即与李达、李汉俊等筹备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 年 4 月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同年 8 月以苏俄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华。8 月底参加了中共西湖会议，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 12 月 23 日结束了第二次在华的工作。1923 年 1 月第三次来华，同年 8 月离开中国。他三次来华，宣传、贯彻列宁的东方战略，对中共的创立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尼克尔斯基（1889—1938）原名涅伊曼·符拉基米罗维奇·阿勃拉莫维奇，化名瓦西里、瓦西里耶夫。生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州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毕业于赤塔商业学校，曾在沙皇军队服役。1920 年随同军队倒向红军。1921 年加入俄共（布）。6 月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同时具有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军事情报处工作人员、红色工会国际代表等身份。1921 年来华，与马林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上，他“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赤色职工国际情况，建议给远东局发电报，报告大会进程。”[①] 会后他与马林全面负责对华工作。同年 12 月离开上海到东北。1922 年 1 月出席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1923—1925 年主持东北的情报工作。次年回国。1933—1935 年再次来华。他长期是苏联国家安全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马林、尼柯尔斯基第一次使华时，尼柯尔斯基的作用要大于马林，这是因为尼柯尔斯基直接接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令，又掌管着支援中国革命的财务，而马林在组织关系上虽然受命于共产国际总部，但在华时这种联系实际上不存在，正如马林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和尼


▲尼克尔斯基（1889—1938）（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① 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柯尔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①

尽管苏俄、共产国际最初来华人员和组织复杂，但任务却基本相同。苏俄、共产国际的使者来到中国后，通过不同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共产国际驻华主要代表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等。具体情况请见表4—2—1。

表4—2—1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著述（1920年4月—1922年11月）

题　名	署　名	出　处	时　间
五一	J. Lizerovisteb. 李泽洛维奇	上海《星期评论》 “劳动纪念号”	1920年4月30日
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	吴廷康	《劳动界》第13册	1920年11月7日
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角逐		《新远东》第1期	1921年
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大会		《新远东》第5期	1921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	尼柯尔斯基		1921年8月11日
评勃莱斯福德的著作与（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	尼柯尔斯基	《美洲快讯》	1921年8月21日
远方来信	斯内夫利特	《论坛报》(荷兰)	1921年10月17—18日；11月9—10日；
中国建设与对苏关系	斯内夫利特		1922年1月10日
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者	吴廷康	《真理报》	1922年5月11日
远东通讯	斯内夫利特	《论坛报》	1922年5月6—8日
俄国革命与东方人民	斯内夫利特	《论坛报》	1922年6月20—21日
中国南方的斗争	吴廷康	《真理报》	1922年7月18日
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	吴廷康	《新东方》第2期	1922年
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者	斯内夫利特	《真理报》	1922年9月7日

①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续表）

题 名	署 名	出 处	时 间
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	斯内夫利特	《共产国际》第22期	1922年9月22日
俄国革命五周年	孙铎	《向导》第8期	1922年11月2日
吴佩孚和陈炯明	孙铎	《向导》第9期	1922年11月8日
外国资本家对孙中山的劝告	孙铎	《向导》第10期	1922年11月15日
新俄罗斯	孙铎	《向导》第10期	1922年11月15日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悟	孙铎	《向导》第11期	1922年11月22日

资料来源：1.《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二、通过苏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传播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有组织地进行传播，传播也是共产国际、苏俄驻华各种机构的任务之一。

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5月在魏金斯基等筹备下于上海建立，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担任执行局主席。它是苏俄在远东统一领导与协调中国、朝鲜、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东亚书记处下设三个科，即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工作纲要如下：1. 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 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 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 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①] “东亚书记处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报刊宣传工作上”，[②] 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出版中心。在海参崴出版了报纸《红旗》、《农民真理》和刊物《创作》，印刷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俄共（布）领导人的画像和介绍苏俄的明信片。在哈尔滨出版了英文、中文和日文的宣传材料20余种，成立了北满通讯社（苏俄通讯社罗斯塔在哈尔滨设立的分机构）与中国报刊促进会。在北京除了帮助出版《新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外，还出版一些著作。上

① 《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1920年9月1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中心，东亚书记处拥有《上海生活报》(俄文)，并与《新青年》、《劳动界》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书记处把很大的精力用在莫斯科出版的主要书籍上，将其翻译成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供宣传使用。

革命局。这是由魏金斯基领导有中国同志参加的机构，其机构的性质在学界引起了讨论，有学者判断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下属机构有一定的道理。[①] 首先成立的是上海革命局，成立准确时间有待考证，当在1920年6—8月之间。上海革命局由5人组成，已知姓名的是魏金斯基、陈独秀、李汉俊，其他两名成员是中国革命者，具体名字待考。[②] 革命局继而在北京、汉口、天津、广州成立了分支机构。[③] 应该强调的是，中共没有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前，革命局成了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早期组织的机构，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是革命局的主要成员，因此陈、李又成了革命局与中共早期组织发生密切关系的中介，革命局与中共早期组织的许多活动高度重叠的原因也在此，这只要看看张太雷1921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④]就清楚了。同样也要强调的是中共早期组织与革命局并不是从属关系，中共有些活动又是独立进行的。

革命局内部的机构与任务大体相同，上海革命局的资料相对详细一些。上海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机构中有两个主要从事宣传，可见传播工作的重要性。主要工作是：1. 组织、经费上帮助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劳动界》，将《新青年》改成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2. 在经费上支持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经常利用北京大学印刷厂。3. 直接到工厂、学生中，甚至到军队中进行宣传。4. 在上海成立“俄华通讯社”。5. 出版部输送、印刷宣传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⑤]

---

① 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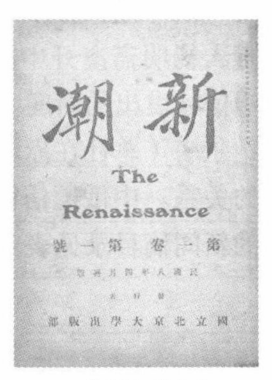
② 《关于苏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1920年12月21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④ 《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179页。

⑤ 《维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8月17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下属机构，因此他们之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也是重叠在一起的。同时他们向主管部门的工作报告中亦有夸大成分，例如《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从策划、文本、翻译与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直接的联系，到印刷时才由又新印刷厂印刷（笔者注：该厂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但共产国际代表在报告中将此说成是他们的成绩。又如《新潮》是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创办的刊物，虽然刊物得到过陈独秀、李大钊的支持，负责人罗家伦甚至还翻译过托洛茨基的《新共产党宣言》，杂志也可能在经费上得到东亚书记处的资助，并通过李大钊与之有所联系，但刊物基本倾向自由主义，东亚书记处将其列为自己的出版物与《新潮》的性质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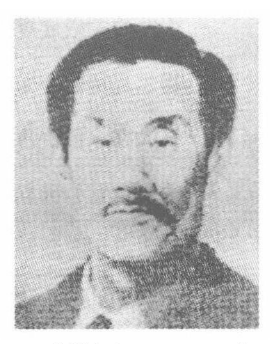


▲《新潮》创刊号，1919年4月

中俄通信社。（笔者注：在上海报刊用的是中俄通信社，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文件里用的是俄华通讯社）1920年7月2日在上海成立，是上海革命局宣传报道部下属的通讯机构，由魏金斯基的翻译和助手杨明斋负责，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外国语学社同地。在北京有分社。它的复杂性在于机构有多重属性。因负责人由俄共党员杨明斋转为中共党员，以及革命局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密切关系，俄华通讯社又可以视为中共早期组织的通讯社，因此说它是中共第一家通讯社也是可以的。中俄通信社又是苏俄中央新闻通讯社罗斯塔北京分社的上海分机构。



▲罗家伦（1897—1969）



▲杨明斋（1882—1938）

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从苏俄中央新闻机关俄罗斯通讯社北京机构、莫斯科、西伯利亚寄来的苏俄报刊，以及《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刊物）、俄国远东的报纸、《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周刊（美国）、《新共和》周刊（美国）、《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苏俄在美国出版的通讯）等诸多报刊中搜集信息，

提供给中国31家报刊使用。中俄通信社的稿件搜集到的类别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女等以及有关苏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息。稿件方面，形式多种多样，有长篇专论、演讲、制度与组织介绍，革命领袖介绍，苏俄近讯等。[①]1920年12月中旬停止发稿，原因是通讯社负责人杨明斋离开中国去了苏俄。1921年1月，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华俄通信社发出的新闻。这个“华俄通信社”是苏俄罗斯塔（总社在莫斯科）与达尔塔（总社在赤塔）两个通讯社合组在华的新闻机构，[②]与中共没有垂直的关系。中俄通信社1920年7—12月在上海《民国日报》、《新青年》上发的新闻稿目录见表4—2—2。

表4—2—2　中俄（俄华）通讯社新闻稿目录

（1920年7—12月）

篇　　目	发　表　时　间
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	1920年7月2日
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	1920年7月14日
英俄交涉之近况	1920年8月1日
（挪）威社会党之活动	1920年8月1日
劳农委员议会的俄国	1920年8月3日
红军与波军之纪律谈	1920年8月10日
中欧与东欧底现状谈	1920年8月15日
霍尔瓦特野心未死耶	1920年8月20日
日人在东俄侵占行动	1920年8月21日
伯利市宣告独立	1920年8月22日
劳农俄国之新制度	1920年8月23日

① 陆米强:《中共建党时期的中俄和华俄通信社不能混为一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② 《本报记者与华通讯社驻华经理之谈话》,《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

（续表）

篇　　目	发　表　时　间
扰攘中之东俄局面	1920年8月24日
俄国劳动合作社小史	1920年8月24日
劳农国之新教育制度	1920年8月26日
莫斯科俄波战事电讯	1920年9月1日
远东俄国之统一计划	1920年9月2日
大乌里谢军之现状	1920年9月2日
赴俄华代表之行程	1920年9月3日
列宁与特洛次基史略	1920年9月4日
中俄通商之进行	1920年9月5日
东俄日军之越轨行动	1920年9月6日
劳农俄国底重要人物	1920年9月7日
中俄自然通商之机能	1920年9月8日
最近红军方面之捷报	1920年9月9日
谢氏自相矛盾之文件	1920年9月10日
劳农国之实业及交通	1920年9月13日
黑河代表谈话记	1920年9月15日
赤塔俄民之制宪运动	1920年9月16日
俄波战争之真相	1920年9月19日
俄京空前之大会议	1920年9月22日
远东政闻	1920年9月24日
俄国严惩投机奸商	1920年9月28日
谢米诺夫又违约弄兵	1920年10月1日
日人又拟强占俄地	1920年10月3日

（续表）

篇　　目	发　表　时　间
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	1920年10月7日
优林发表中东路意见	1920年10月8日
俄军民拥护劳农主义	1920年10月11日
日人掠取库页岛矿权	1920年10月17日
远东当局指斥日政府	1920年10月19日
日军在俄制暴行种种	1920年10月24日
东俄各政府与优林	1920年10月26日
英工党游俄底报告	1920年10月27日
国际“休兵”会议决议	1920年10月28日
兰格尔军败报片片	1920年10月29日
新俄国外交消息撮要	1920年10月30日
新俄国防疫之成绩	1920年10月31日
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	1920年10月1日
印度经济的革新现象	1920年11月3日
列宁答英记者底质问	1920年11月5日
列宁小史	1920年11月11日
列宁小史（续）	1920年11月12日
列宁小史（续）	1920年11月13日
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	1920年11月15日
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续）	1920年11月18日
布尔塞维克沿革史	1920年11月20日
布尔塞维克沿革史（续）	1920年11月22日
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续）	1920年11月23日

（续表）

篇　　目	发 表 时 间
英俄争雄小亚细亚	1920年11月29日
意社会党与俄德携手	1920年11月29日
新俄生产事之进行	1920年11月29日
意工人赤化的大运动	1920年12月3日
列宁小史（续）	1920年12月3日
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续）	1920年12月4日
意工赤化的运动愈烈	1920年12月9日
意工人没收富人财产	1920年12月12日
美工界预防未来战争	1920年12月19日

资料来源：1.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编：《中俄（华俄）通信社新闻稿目录》，《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上海．开明出版社1992年。

2．新闻稿刊登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的一篇除外，余均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


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
Mr. WU

▲《上海俄文生活报》，1919年9月21日创刊（石川祯浩提供）

《上海生活报》（俄文）。中文名称《上海生活日报》（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1919年9月21日创刊，主编（社长）谢麦斯科。初为俄侨在上海办的俄文民营报纸，周刊，后改为日刊，1920年2月被苏俄政府收购，遂成为俄共（布）在远东的重要宣传机关，社址上海Seward路12号。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成立后，该报就成为东亚书记处的宣传机构。1922年年底终刊。由于它是俄文报纸，因此读者面有限，但有着特殊的功能：1．该报是苏俄在中国、远东的一个重要喉舌，它通常采用苏俄罗斯塔和达尔塔的电讯稿，以及苏俄《消息报》的新闻等，及时向外界准确地传递苏俄、共产国际的消息。1920年3月31日，它全文刊

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家刊登该宣言的媒体。2. 它又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个外围掩护机构。1920年4月魏金斯基就是以该报的编辑、记者的身份申请来华的，并以这个身份展开活动。魏金斯基筹备的东亚书记处机构就设在《上海生活报》（俄文）报社，成为共产国际派遣人员的居住地之一。报社一些记者本身就有多重身份，除了魏金斯基外，重要的还有阿嘎芮夫，俄共党员，后出任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巴兰诺夫斯基，为报社的核心人物之一，后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考夫曼，曾担任报社秘书、代理主编，俄共党员，后为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成员；斯托帕尼，报社记者，又在外国语学社担任世界语教授；李泽洛维奇，曾担任《上海生活报》（俄文）代理，他在1917年就来到中国，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新政权，与中国进步人士、社会主义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布尔什维克、欧美社会主义组织同中国联系的使者。这些人员经常来往于苏俄与远东，承担着共产国际交代的在中国、朝鲜、日本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特殊使命。这些对上海租界当局、中国有关当局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如1920年4月15日，中国参谋本部呈报内务部的一份文件就指出，《上海生活报》（俄文）“已变为过激党机关报，鼓吹过激主义”。[①] 谢麦斯科因宣传布尔什维克的色彩甚浓，被人视为上海的“俄国过激派的领袖”，[②] 以致他受到上海租界当局严密监视。1922年3月14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曾会同原沙俄政府驻上海的领事商议将他驱逐出境。马林第一次使华时，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荷兰驻印尼总督的报告就说明马林住在《上海生活报》（俄文）财务主管古尔曼处，古尔曼，“俄国籍，是布尔什维克《上海生活报》（俄文）的编辑”。[③] 由于该报与东亚书记处几乎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不少工作人员参加了中共创建工作，这部分主要是通过魏金斯基使团来进行的。[④]

苏俄罗斯塔—达尔塔驻北京分社。罗斯塔（Роста）是苏俄中央新闻通

① 《参谋本部呈报内务部函》，1920年4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01（2）/1102。

② 李丹阳、刘建一：《〈上海俄文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④ 李丹阳、刘建一：《〈上海生活报（俄文）〉与布尔什维克早期在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二章第二节。

讯机构的缩写，1918年9月成立于莫斯科，是塔斯社（ITAR—TASS）的前身。达尔塔（Дальта）是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1920—1922）远东电讯社的缩写，1920年4月成立于赤塔，虽然它是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新闻通讯机构，表面看是一个独立的通讯社，实际上在组织系统、业务等方面与罗斯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至少驻华分社是一个机构。罗斯塔—达尔塔驻北京分社成立于1920年6月，在上海、广州有分社。上海分社与《上海生活报》（俄文）在同一幢建筑物内。罗斯塔—达尔塔驻北京分社的经理（社长）霍多洛夫1919年4月来到上海，曾担任《上海生活报》（俄文）记者。北京分社的主要任务是向中俄通讯社、《上海生活报》（俄文）等在华的报刊、通讯社提供苏俄的新闻电讯稿；向苏俄新闻机构提供有关中国、远东的新闻稿。该社还特别按照东亚书记处指定的地址，每天向该机构提供不少于1000字的新闻。同时它还承担搜集情报，与中国进步与革命势力、中共组织联系。因它有较好的通讯设备，实际上又是苏俄、共产国际与其驻华代表、中共联系的电讯渠道之一。鉴于苏俄政府与北京政府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分社或分社的负责人还承担苏俄政府外交的部分职能。①

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是全俄贸易企业合作社中央联社设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全俄贸易企业合作社中央联社总部在莫斯科，远东分部在赤塔。该处在上海九江路14号，1920—1923年塔拉索夫、廓索拉波夫先后担任主任。上海办事处是苏俄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构，同样也是苏俄、共产国际在华的一个中转站和提供秘密经费的单位。目前看到的魏金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处的第二份报告（1920年8月17日）中，要求民族处给他邮寄报刊就是请上海办事处的格里高里耶夫转，汇款由上海办事处的塔拉索夫转。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其中包括宣传费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俄国共产华员局，这个机构虽非苏俄、共产国际在华机构，但他们曾是对华联系并寄予厚望的组织。它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在宣传方面与共产国际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共产华员局是旅俄华工联合会

① 李丹阳、刘建一：《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的统一的华人共产党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政府雇用了人数达二三十万之众[①]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十月革命胜利前，这些华人在俄国生活悲苦，地位低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他们的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很快就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一些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早在1918年12月华籍共产主义者就领导成立了统一的华人革命组织——留俄华工联合会。1920年7月，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经过俄共（布）中央批准，在莫斯科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同年秋该组织迁到远东赤塔。其主要任务就是派党员回国，协助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旅俄华工联合会、俄国共产华员局先后出版《华工》、《共产主义之星》、《震东报》等报刊，在华工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该组织陆续派遣了10余名华籍共产党员回国，"在自家兄弟之间撒播俄国革命的种子，唤起他们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而这将使东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将改造整个世界"。[②]非常遗憾，共产国际信任的刘绍周（笔者注：第一任留俄华工联合会执委会主席）被派到中国，但他"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③]俄国共产华员局其他"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④]这批被共产国际寄予厚望的华籍俄共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中，没有多少建树，以后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三、通过交谈、座谈、演讲等方式进行传播

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后，与进步知识分子、革命者进行广泛接触，广交朋友，交谈、座谈、演讲成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最直接、简单的方式。曾与共产国际代表有过接触的中国早期革命者回忆最多的也是这几种方式。李达在回忆魏金斯基时说："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魏金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魏金斯基到了

① 乌斯季洛夫：《在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③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④ 同上书，第57页。

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①罗章龙的回忆更详细："魏金斯基来北京后，首先访问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魏金斯基与李见面谈话后，李把我们几个同学邀去（即后来的小组成员），参加座谈会。魏金斯基讲话内容主要是宣传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介绍苏维埃政府将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及苏俄建设的情况。"进行几次座谈会后，他又找同志们作个别谈话。他邀约我们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魏氏"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一席话使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大家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了。"②马林来中国后不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还在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交谈中，不断灌输共产国际的主张，成功推行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不仅如此，魏金斯基和马林还与中国其他革命势力进行广泛接触，把苏俄革命的情况向孙中山等传递。

四、输送、出版各种出版物

第一，输送、出版的渠道，大致有三个：一是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远东共和国赤塔、海参崴等地，通过邮寄（甚至快件），或者使者携带。如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负责人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 1920 年 9 月 1 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透露，海参崴是俄文书报出版基地，翻印 50 种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印数从 2.5 万册到 4 万册不等，出版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的画像以及"苏俄"系列明信片。③一个叫刘江的报告中称在上海"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④二是通过国外媒体、出版社等。据日本学者石川考证，《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和《共产党》月刊大半资料来自欧美的杂志《Soviet Russia》（纽约）周刊、《The Class Struggle》、《The

① 《李达回忆维经斯基》，《丛书》第 2 卷，第 103 页。

② 《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丛书》第 2 卷，第 108—109 页。

③ 《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要）》，1920 年 9 月 1 日，《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 页。

④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 年 10 月 5 日，《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

Communist》等。[①] 有些苏俄的书籍由美国芝加哥查尔斯・H. 克尔出版社、纽约 TSPS 出版社出版。这些宣传品不是来源于苏俄，而是迂回从欧美传入的现象很有趣，需要深入研究。三是在哈尔滨、北京、上海成立印刷基地。有的是利用已有的印刷单位，如北京大学的印刷厂；有的是专门成立的，如上海的又新印刷厂；有的是通过罗斯塔驻华的办事处和《上海生活报》(俄文)，它们均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良好的印刷设备。

第二，在思想上指导，在经费上资助中共早期组织的宣传媒体。《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向导》(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机关报，1922 年 9 月创刊)、《先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个刊物，1922 年 1 月创刊)，《工人周刊》(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主办的工人通俗刊物，1921 年 7 月创刊）等均与共产国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魏金斯基亲自为《劳动界》撰文。1921 年 7 月《共产党》月刊停刊，马林与中共筹备《向导》周刊。在经费发生问题时，马林向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请求支持。越飞回信表示："我这里的钱也很少。但我将尽可能地支持你们的周报"。[②]《向导》发行后，马林担任编辑并撰稿。后来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时指出："这份报纸在上海印刷、发行 5 至 7 千份，确实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 [③]


▲越飞（1883—1927）

中共早期出版物几乎均得到了共产国际在经费上的支持。彻底搞清楚经费问题，因档案资料不全已不可能，但"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支出预算" [④] 清楚地告诉我们，共产国际当时给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资金大部分用在了宣传工作上。中国共产党 1923 年的支出预算共 7 项，12000 金卢布。月支出 1000 金卢布，其构成如下：支持《向导》210，支持《工人周刊》40，印刷传单、宣言等 60，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 370，两名中央委员旅差费

①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47 页。
② 《越飞给马林的信》，1922 年 9 月 18 日，《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1 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录》，《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0 页。
④ 同上书，第 184—185 页。

100，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住宿差旅费 120，意外开支 100。除两项不直接涉及宣传工作外，其余 5 项全部是直接为宣传工作开支的。

第三，印刷宣传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与建设的资料。这方面有些出版物是与中共印刷品重叠在一起的，加上资料的匮缺，很难将它们彻底搞清楚。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多份报告，在 1922 年前后，在中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书籍 22 种，具体情况请见本章第三节。

五、通过发动反帝运动与开展纪念活动等方式进行传播

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紧密配合，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推向高潮。

第一，围绕纪念日、节日展开宣传。魏金斯基来华组织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是 1920 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尽管以前中国已经有劳动节纪念活动，但这一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有组织，统一行动，规模比较大。这天，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 运动史》等文章，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等文献。这部劳动法是共产国际代表带到中国来的宣传品之一。《星期评论》罕见的用了 44 个版面十大张，刊登“劳动纪念号”，发表《劳动世界歌》、《“五一”May Day 运动史》（李大钊）、《强盗阶级底成立》（李汉俊）、《文化运动与劳动》（戴季陶）、《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施存统）等文章，特别是刊登具有苏俄背景的李泽洛维奇的文章《五一》。通过媒体的宣传和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


五月一日　星期評論　第四十八號

勞動紀念日

▲ 1920 年 5 月 1 日《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

1920 年 11 月 7 日迎来了十月革命 3 周年，这一天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半公开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第 1 期除《短言》外，几乎都是与苏俄、共产国际有关的稿件，其中关于苏俄的就有《俄

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 8 篇，占全部稿件的 62%。共产国际的代表还出席各种纪念会，宣传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为纪念俄国革命胜利 5 周年，马林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向中国读者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俄国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并且是构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步骤，如果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功了，什么种族不平等，少数剥削群众的事，贫困与战争等等都是会消灭的。"[①]



▲ 1920 年 5 月 1 日《星期评论》发表李泽洛维奇的《五一》

1922 年 1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同青年团一起发起了纪念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活动。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9 年 1 月 15 日被反动派杀害。列宁高度评价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限忠诚，象征着一心一意，舍生忘死，坚决无情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精神"。[②] 中共各地党组织主办 Karl Liebknecht、罗莎·卢森堡纪念会，"由全部党员出席演说，分散纪念册五千本；纪念册内载 Karl Liebknecht 及卢森堡女士传及'斯巴达卡司团'宣言。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游行者二千余人。"[③] 上海的纪念会有

▲卡尔·李卜克内西
（1871—1919）



▲罗莎·卢森堡
（1871—1919）

① 孙铎（马林）:《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向导》第 8 期，1922 年 11 月 2 日。

② 列宁给欧美工人（1919 年 12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5—446 页。

③《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 页。

800多人参加，发言者有中国、朝鲜、日本和印度等地的共产主义者，“会议进行得很成功”。①



▲达林（1902—1985）
（李丹阳提供）

1922年1月28日是农历新年，这一天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领导以及在上海的朝鲜革命者一起展开新年宣传活动，在上海的党团员几乎全部出动，在街上进行了一天的活动，散发8万份两种传单：“一种是新年贺卡，一面印有老一套的贺词，一面印有告工人书；另一种是焕发民族感情，号召为建立统一的中国而与苏俄携手战斗的呼吁书”。②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日。这一天“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③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和欢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笔者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5月1—6日在广州举行）同时在广州举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首先，由主席张太雷“致开会辞，继则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及本团团员演说。演说者共16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5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④

第二，反对华盛顿会议运动。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以美日英法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继巴黎和会之后的又一次分赃会议，“这些强盗们集合在华盛顿——美国交易空气的浓荫里，图谋成功一个结合更有力的来侵略远东各民族。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他们已结成了他们吸血者的同盟”。⑤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远东各国共产党揭露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新阴谋，掀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

① 《利金就在华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0页。

③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28页。

④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⑤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中共立即行动起来，发动社会各阶层，掀起反对华盛顿会议运动，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大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中共译印共产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山川均与堺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各5000份；印陈独秀论太平洋会议论文与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各5000份。在上海国民大会、上海工人集会上散发传单各5000张。[①]

第三，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年4月4日由全世界学生基督教徒协会在北京清华园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会议，立即遭到我国进步知识界的强烈反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借此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反基督教政治运动。1922年4月，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中说："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它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是一种抗议运动，尔后变成了广泛的运动，现在在号召为国家的统一而联合起来，已在更广阔的基础上进行。"[②]这场原本是爱国学生进行的一场非基督教运动，但在中共领导下，很快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运动；成为了一次社会总动员的爱国运动，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运动中，"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③]同时它也是一场宣传列宁东方战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文化运动。

六、利用各种会议进行传播

利用各种会议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国际常用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国际举行了各种重要会议，这些会议通常是带有全局性的，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的思想，对国际形势作出判断，有针对性地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行动纲领等，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性、实践性、革命性的具体生动体现。这些会议对创建时期的中共来讲尤其重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启蒙的一部分。

---

①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②《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1922年4月6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

③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第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进行总结，对各国共产党进行指导，而且还是共产国际集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代表大会的文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如共产国际一大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二大的《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三大的《论策略（提纲）》；四大的《共产国际的策略（提纲）》等。尤其是共产国际在清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修正主义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具体而又详细，向与会者上着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课。

虽然共产国际一大、二大举行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这并不妨碍共产国际利用大会的方式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了旅俄华工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参加会议，刘绍周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工作。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正常联系后，张太雷、杨明斋（笔者注：即杨和德）、瞿秋白（笔者注：以记者的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回国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卓有成效，马林后来回忆说："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完全中断，可是自张太雷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回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了对青年的宣传工作。"[①]1922年11月7日—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王俊出席了大会，瞿秋白任翻译。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这有利于中共直接与共产国际领导进行交流，了解共产国际的信息。陈回国后，曾作关于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中共创建时期，中共整体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特别是中国社会又特别复杂，共产国际的会议对年幼的中共正确判断形势，制定战略、策略是大有益处的。最经典的就是中共二大接受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极大地提升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

①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第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简称少共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的国际联合组织，成立于1919年11月，其代表大会是对各国革命青年组织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次大检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少共代表大会发生关系是1921年7月9—2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早在这年3月，少共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就致信中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热情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以讨论推翻压制的旧世界的斗争问题，并解决新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建设问题”。[①] 并明确指出：“在东方的宣传方法，将在此会议中讨论”。“我知道在中国革命力量是非常缺乏。你们派去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三个月之久，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他到那个地方也将十分受所有各国的革命党青年的欢迎。你们的代表带你们的经验给此会议者少，而带来会议的经验给你们者多”。[②] 这次会议通过了《青年共产国际章程》、《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农村青年工作的提纲》、《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等文件。会议不仅向与会者传播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对青年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中该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大会指出，青年团应该参加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城市的青年团组织要到农村青年中组织共产主义宣传，给农村青年安排报告会，戏剧演出等等，逐门逐户地宣传、散发书籍等等——这一切会把共产主义教育的第一颗火种带到农村青年中去。中国代表张太雷和俞秀松出席了会议，并向大会汇报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情况。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任务之一就是贯彻少共二大会议的精神。

1922年12月4—16日少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东方国家工作的决议》，少共专门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青年团的工作给予了具体的指导：“第三次代表大会极为满意地表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大会认为必须指出以下几点：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把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年工人当中去”。“2. 为了从组织上巩固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实行一系列办法，首先是把运动严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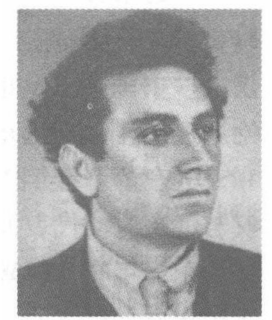
---

① 谷林：《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致中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集中起来”。“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把团的机关报《先驱》变为反映工农青年生活和斗争的通俗刊物”。[①]大会正式接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少共的一个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参加了大会。

第三，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亦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②]1922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在莫斯科召开，是与华盛顿会议分庭抗礼的会议，也是远东劳动人民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9 个国家的 414 名代表，中国代表团 44 人参加了会议。[③]


▲季诺维也夫（1883—1936）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四项：一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二是各国代表团介绍本国情况；三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作关于《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四是通过大会宣言。大会揭露了帝国主义把远东作为转嫁经济危机之地的企图，批判帝国主义的虚伪民主，号召远东人民觉悟起来，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萨发洛夫的演说和大会宣言都把中国革命作为重点。宣言指出："国际共产党早已向世人呼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呵！'我们准备着要去将这样呼声传到我们穷苦的乡村，传到为人奴役的田场，传到我们的工厂，传到我们的学校，传到我们的兵房。"[④]

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处境、土地关系、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等方面的情况。产业工人代表邓培介绍了中

---

① 《关于东方国家工作的决议（节录）》，《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7 页。

② 会议名称说法不一，有："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远东共产党和革命组织代表大会"、"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莫斯科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民族大会"等称谓，本书简称"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

③ 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有 54 人、39 人、44 人等说法。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④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7 页。

国工人运动的情况。高君宇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作报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介绍了国民党和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情况。会议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等决议。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工人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等，表达了希望国共合作的意向。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者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使中国代表团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推动了国共首次合作，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青年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远东革命青年第一代表大会（后来没有再召开会议），“中国十三个组织的七万三千名成员派出了二十七名代表”。[①]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和《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致中国、日本、朝鲜、蒙古青年书》等文件。会议与远东劳动代表大会一样，强烈地谴责帝国主义对远东劳动者的压迫，号召远东青年联合起来，开展反帝反封的斗争。

第三节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初期传播的内容与影响

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后，便在组织上领导，思想上指导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此时苏俄、共产国际的国际战略重心正由“西方战略”开始向“东方战略”转变，其标志是共产国际二大。二大通过的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的纲领。1922年11—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以文件的形式，强调与东方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共产国际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中国革命，确定中国为莫斯科东方战略的重中之重。1920年7月，苏俄任命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为驻中国全权特使出使中国。1921年3月，共产国际将领导远东革命的机构由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升格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无论是共产国际驻华代

① C.A.达林:《远东青年代表大会》，1922年1月31日，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91页。该书第636页说中国代表为39人，其中有表决权者22人。

表，苏俄驻中国全权特使，还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及其在华的其他机构，均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传播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作为主要工作之一，使中国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新局面。

一、计划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与政治普及读物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后，传播方面突出的成绩是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与宣传品。共产国际与中共建立联系后，中共的全部宣传、出版都与共产国际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出版了哪些书籍呢？完全厘清这个问题有很大困难，主要原因是原始材料匮乏。我们大致根据两条线索来探询，一条是中共方面。中共一大后，中共成立了人民出版社，1921 年 9 月 1 日《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刊布的“人民出版社通告”，表明计划刊印“马克思全书”15 种，“列宁全书”14 种，“康民尼斯特（笔者注：即共产主义者音译）丛书”11 种，其他 9 种（笔者注：具体书目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三）），共 38 种。这些书有的此前已经出版，如《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有的只是计划，因经费等原因并没有面世。另一条线索就是实物，即出版的中文图书。有学者对这方面考证，认为当时共出版了 16 种书和丛书。[①] 笔者可以确定的有 22 种，书名如下：

1.《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 年 8 月出版。

2.《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 年 9 月出版。

3.《阶级争斗》，柯祖基（今译考茨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 1921 年 1 月出版。

4.《工钱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袁湘译，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12 月出版。

5.《劳农会之建设》（今译《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列宁著，李立译，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12 月出版。

6.《讨论进行计划书》（今译《论策略书》），列宁著，成则人（笔者注：即沈泽民）译，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12 月出版。

① 陆米强：《建党时期人民出版社成立始末》，《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 8 辑，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7.《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今译《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列宁著，墨耕（笔者注：即李梅羹）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2月出版。

8.《共产党礼拜六》(今译《伟大的创举》)，列宁著，王静译，人民出版社1921年12月出版。

9.《共产党底计划》，布哈林著，太柳译，人民出版社1921年12月出版。

10.《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著，希曼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出版。

11.《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国际编，成则人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4月出版。

12.《国际劳动运动之重要时事问题》季诺维埃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著，墨耕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出版。

13.《俄国革命记实》托洛次基（今译托洛斯基）著，周诠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出版。

14.《列宁传》山川均著，张亮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出版。

15.《两个工人的谈话》 安利科马赉特斯太著，李少穆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出版。[①]

16.《李卜克内西纪念》李特（笔者注：即李达）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出版。

17.《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

18.《一个兵的说话》1920年8月再版。

19.《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李绰译，原件64开，无版本记录页。

20.《美国共产党党纲》无版本记录页，版本长13CM，宽9CM。

21.《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彭成译，新青年社1926年1月出版。

22.《马克思纪念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1922年5月5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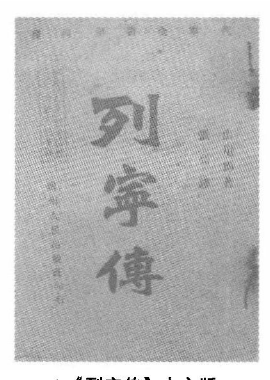
此外在马林1922年7月11日的报告中，专门提到共产主义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是由中共办理的，其中“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已由一个中国同志

① 该书无版本记录页，《新青年》第9卷第6号刊登人民出版社广告，已刊，由此推知该书在1922年12月至1922年年初出版。

翻译出版”。[1] 这个中国同志是陈望道，其翻译的《国家与革命》是我国最早的译本，但没有看到实物。

这个阶段与传播自发阶段明显的不同，就是出版苏俄领导人的著作与苏俄革命与建设的书籍增多，主要著作介绍如下：

《列宁传》（Lenin's Life） 我国出版的第一个列宁生平的单行本，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著，张亮译，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出版，为“列宁全书第 4 种”，全书共 72 页，16 章，其主要章节为：第一章：列宁之出生——兄之处刑；第二章：学生时代——思想的背景；第三章：彼得格勒时代——劳动运动底组织者；第四章：西伯利亚流刑——“危险人物”；第五章：“火花”（笔者注：今译“火星”）运动——“应该做什么？”（笔者注：今译“怎么办？”）；第六章：社会民主劳动党底分裂；第七章：1905 年革命——最初的劳兵会；第八章：反动时代——为学者、为著述家；第九章：复活底曙光——列宁底议会政策；第十章：欧洲大战——“第二国际”底破灭；第十一章：“第三国际”底勃兴——秦麦华德会议底列宁；第十二章：瑞士底亡命生活——住在靴匠底楼上；第十三章：列宁回归俄都——“德探列宁”；第十四章：革命之前日——“一切权力都归劳农会！”；第十五章：克历姆灵宫底生活——暗杀者底枪弹；第十六章：俄罗斯革命和列宁。



▲《列宁传》中文版，1922 年 1 月出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列宁传》是根据季诺维也夫 1918 年关于列宁的讲演写成的传记。季诺维也夫是俄国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他是俄共（布）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列宁的战友。与一般传记作者所不同的是，他讲列宁的生平有许多是自己亲身的经历与感受，自有其独特的视角。《列宁传》全面介绍了列宁的生平，弥补了《共产党》月刊的《列宁的历史》的不足。《列宁的历史》只写了列宁 1917 年俄

[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8 页。

国二月革命之后回到俄国前的活动,《列宁传》则详细记录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情况，特别是评述列宁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勇敢地迎接挑战，把马克思主义“实验”于俄国，并取得成功的历史。他将保卫革命政权的极大责任背在肩上，他是“救彼得格勒，救莫斯科，救共产党，救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①] 该传曾被《广东群报》1922 年 4 月转载。



▲《马克思纪念册》封面，1922 年 5 月出版

《马克思纪念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1922 年 5 月 5 日出版。小 32 开本，水红封面，印有马克思照片，共 35 页。主要内容：关于“马克思诞生 104 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通告、戴季陶翻译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著的《马克思传》与陈独秀著的《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介绍了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与劳农专政。该书共印了 2 万册散发，是对工人群众规模较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宣传。

《纪念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出版。水红封面，印有李卜克内西肖像，彩页有李卜克内西遗体、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追悼会与葬礼及卢森堡少年时代的照片等。共 44 页，有独眼（笔者注：即陈独秀）的《发刊旨趣》，李特的《李卜克内西传》，卢淑的《卢森堡传》，则人（笔者注：即沈泽民）翻译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的启事《悼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



▲《纪念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封面，1922 年 1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印这个纪念册？《发刊旨趣》说得很清楚：俄国的列宁，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底见解，都和我们的相同。列宁是共产主义的笃信者，所以不和中产阶级妥协，所以和克伦斯基战；李卜克内西也是共产主义的笃信者，所以和爱伯尔特（Kauat）战。列宁战而胜利，李卜克内西战而失败而死，我们都一样尊重。李卜克内西因反对战争而舍命与恶魔的军阀斗，因反对妥协而舍命和有产阶级的政党斗，他虽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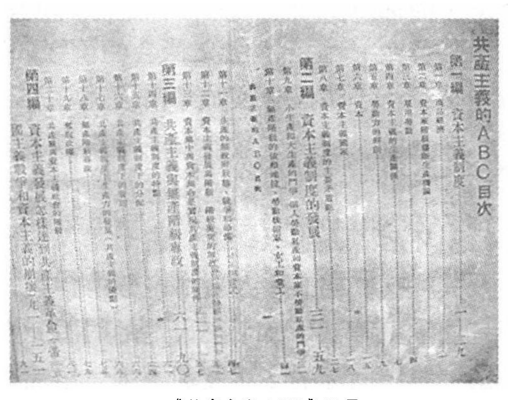
① 山川均，张亮译:《列宁传》，人民出版社 1922 年版，第 70 页。

他这斗的精神还活泼泼地生存在我们的血中。

“今天 1922 年 1 月 15 号——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等诸同志为主义而战死的第三周年纪念日，我们生存在这冷酷的私产制度和军阀之下的青年男女，对于他们笃信的主义和他们的人格，都应该发动深刻的同情！

我们受本国外国两重金力武力压迫的中国青年诸君呵！在‘五四运动’已经开始显现我们的组织与威力之第一步，然也是仅仅第一步；现在国内底政治是何等绝望，华盛顿会议黑幕又已经解开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四国协定的大铁枷快要加到我们的颈上了，我们快快猛省！奋起！！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青年和全世界有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决斗！！！”①

通过宣传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这两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家的战斗生涯，提高了我国劳动者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觉悟，对广大无产阶级与革命知识青年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动员作用。


共産主義的ABC目次

第一編　資本主義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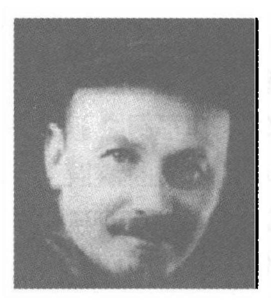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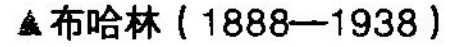
第二編　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

▲《共产主义 ABC》目录

《共产主义入门》（又译名《共产主义 ABC》）为“康民尼斯特（笔者注：即共产主义者音译）丛书”之一，1921 年 9 月《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刊布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将其列入出版计划，由罗雄译，目前笔者没有看到实物（有人购到 1921 年 3 月第 2 版。②），看到的是 1926 年 1 月出版的《共产主义 ABC》（新青年社出版，简称《ABC》）。《ABC》全书五编 35 章：第一编　资本主义制度　第一章　商品经济，第二章　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机关，第三章　雇佣劳动，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五章　劳动力的剥削，第六章　资本，第七章　资本

① 《纪念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22 年版，第 2—3 页。

② 根据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致科别茨基德的信（1921 年 1 月 21 日）获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曾以举借贷款等方式，印行过《共产主义 ABC》中文本 2 万册，此版本目前没有看到。有资料称柏伟烈在 1920 年曾将英文本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郑超麟回忆，他曾翻译过此书。秦杰在《收藏与写作》（www. artxvn. com，2008 年 11 月 26 日）称，他珍藏 1921 年 3 月版本。



▲布哈林（1888—1938）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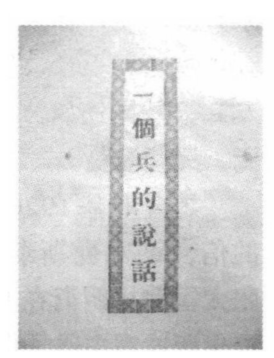
主义国家，第八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矛盾点。第二编　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九章　小生产和大生产的斗争、个人劳动私产和资本家不劳动私产的斗争，第十章　无产阶级的依赖地位、劳动后备军、女工和童工，第十一章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和恐慌，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与阶级阶级冲突的加烈，第十三章　资本集中与资本集合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第三编　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第十五章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分配，第十六章　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管理，第十七章　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优点），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专政，第十九章　夺取政权，第二十章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第四编　资本主义发展怎样达到共产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崩坏）第二十一章　财政资本，第二十二章　帝国主义，第二十三章 军国主义，第二十四章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十五章　国家资本主义与阶级，第二十六章　资本主义崩坏与工人阶级，第二十七章　国内战争，第二十八章　国内战争的形式及其耗损，第二十九章　全般解体呢？共产主义呢？第五编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　第三十章　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胜利的条件，第三十一章　第二国际的崩坏及其原因，第三十二章　保护祖国口号与和平主义，第三十三章　社会爱国派，第三十四章　“中央派”，第三十五章　第三共产国际。全书共176页。

《ABC》是布哈林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理论部分，有5章；第二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建设，有14章。中文本的《ABC》只翻译了原著的第一部分。《ABC》是为配合1919年俄共（布）八大通过的新党纲的宣传和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而写的通俗读物，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颇受读者欢迎。列宁称这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该书多次再版，有20种语言文本，成为畅销书。

《ABC》在我国一度与《共产党宣言》并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

响的两本书之一，影响了我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杨尚昆、彭德怀、方志敏、赵醒农、阮啸仙等在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过程中，均受其熏陶。薄一波曾回忆：“20年代初，基本上没有什么马列著作可读。只有《共产党宣言》，大革命时又译出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一般党员就靠这两本书来进行活动。”[①] 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讲话里回忆：“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②] 可见《ABC》曾在初期传播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因苏共内部斗争，布哈林后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这本书在初期传播史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就被人为地抹煞了，改革开放后，才被人们重新提起。

《一个兵的说话》 64开的小册子，约4500字，通过一个叫李得胜的士兵口述，讲述一个士兵的遭遇，揭露了军阀对士兵的压迫，号召士兵起来进行社会革命。这个士兵非常尖锐地指出：一个人入营当兵，为的是爱国。但这个国却不是咱们穷人的，而是大元帅、督军、师长的，“他们可以救他们管辖的地方，向他们管辖的人民，征收租税，克扣粮饷；还可以拿一国一省的名义，把大众靠着生活的各样产业，押卖给外国人，得些个金钱，同着少爷姨太太们，胡花乱糟，把国当做他们的摇钱树、护身符；把国内的人，当做他们的家人奴婢、鸡犬牛马。非藉着这个国字，他们就不能卖大众的产业，夺当中的吃穿，所以他们张口也是爱国，闭口也是爱国。”[③] 当兵的所谓爱国都是当官私自造出来的，士兵为做官发财打战，去压制百姓，“给那当财主的做官的当看家犬，当侩子手去镇压乱党、革命党、过激党。”我们当兵的要明白：“第一样是：土地是生产五谷棉花和各种财宝的东西，应该归大伙公有，谁也可以使用，不应该地主私有。第二样是：吃的穿的住的，全是拿人工换来的，能够作工的，都要作工。第三样是：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古来



▲《一个兵的说话》封面，1920年8月出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① 薄一波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6月23日。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③ 《一个兵的说话》，1920年8月印行。

的人和现在的人合起力量来造成的，应该大伙消受。第四样是：无论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男对女，都要平等的待遇，谁也不欺谁，不出租，不要官，一切的事情，由大伙商议办理。”[①] 最后，李得胜士兵讲“我同病相怜的弟兄们呀，你们想想，他这话说的，岂不是真情实据吗？时候到了，我们快起来来把这些压制我们的东西除掉了去罢！”并叮嘱读者“看完请转给别人，识字的请念给不识字的听”。[②]

这本 1920 年 8 月再版的书，是 1919 年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宣传品。小册子出来后，引起北京政府紧张，江苏都督杨善德在致北京政府参陆办公处的公函内称，该书内容即无政府之共产主义，“此等狂悖之说……其中显系有人主使，藉以扰乱秩序，破坏治安，若听其蔓延，不但国家无以存立，人类且随以灭亡，星火燎原，不能不预为防范也。”因此他要求“敢情知会友邦，共同饬属严行查禁，务使狂悖之说及其发行之印刷物，一概从速扑灭，无使滋蔓”。[③]

魏金斯基 1920 年 8 月 18 日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M. 布龙斯泰因 1920 年 12 月 21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以及张太雷和杨明斋在 1921 年 6 月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均将出版这本小册子作为宣传工作的成绩。需要探讨的是这份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物，何以得到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青睐？这要从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重点去寻求答案。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有三个重点：一是对知识分子，一是进行工运，一是进行兵运。与这工作重点相呼应的是施存统，他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指出如何夺取政权呢？就是由无产阶级、士兵、学生形成三角联盟直接行动。其中士兵是最有力量的，在中国“谈社会革命而不主张用军队的，简直是笑话”。而要士兵参加革命，宣传是非常紧要的，“我们要去运动一个一个的弟兄们，使弟兄们一个一个底相信我们底主义，能为主义去牺牲”。[④] 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在兵运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十月革命前，

---

① 《一个兵的说话》，1920 年 8 月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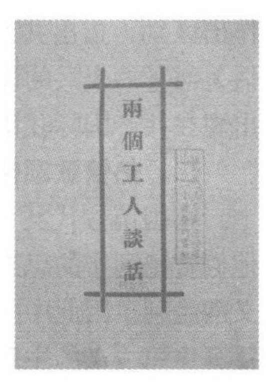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③ 杨善德检送《兵士须知》致参陆办公处函件，1919 年 5 月 26 日，《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 页。

④ C.T（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俄共并没有自己的军队，而是到旧军队中做宣传鼓动，使士兵起义参加十月革命。共产国际代表带着这个经验来到中国，十分注意争取高级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①]《一个兵的说话》正是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对军队进行宣传的印刷品。

《两个工人谈话》（简称《谈话》）　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劳动界》就是在魏金斯基的指导和提供经费下诞生的。魏金斯基在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以“吴廷康”的署名在《劳动界》第13册上发表了第一篇中文稿《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号召中国劳工农民“要免除军阀（统治）的痛苦”，“要解除官吏所加的负担”，要脱离“困苦境遇，就应该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然后再和各国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齐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有勇敢有精神的俄国劳工农民啊！快快的帮助你们在水火之中的劳工农民伙友罢！”



▲《两个工人谈话》封面，1922年出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谈话》是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本共产国际向我国工农大众进行宣传的通俗读本，《谈话》的作者是意大利人安利科马赉特斯太，李少穆译，192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74页，以一位名叫魏连（William）的老工人与一位名叫解克（Jack）的年轻工人对话的形式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宣传。

首先，用非常通俗的语言阐明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真相，资本家是“真正的无赖的匪徒”，在青天白日之下，“在我们眼睫毛的泪珠上，享受奢华淫逸的日子”。他们霸占我们的一切东西，“工人底身体，压弯了跪在地下，像一群绵羊一样，随他们剪毛割肉”。政府是有钱人造成功的，因此必然保护有钱人的利益。[②]

其次，指出社会财富是由劳动阶级创造的，劳动阶级通过革命将土地、机器、原料、工具等生产资料夺过来，变成公有制，实行人人都劳动，人人

①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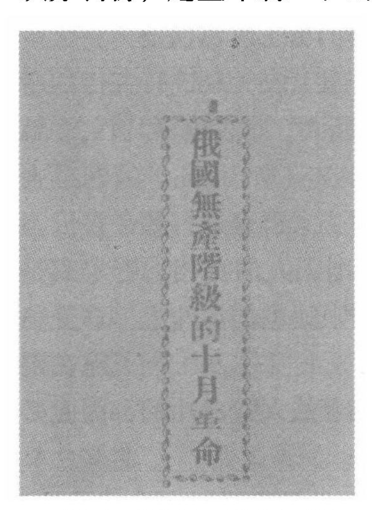
② 《两个工人谈话》，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4—5页。

都自由，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政府与士兵只是阶级的战器，“中产阶级的政府，用武器来反对我们，并用她的势力，兵力与金钱力，要想把我们封锁在奴隶狱内，我们必定也要照他们的样子，用我们科学上最新发明的战器，去如法的教训他们。”[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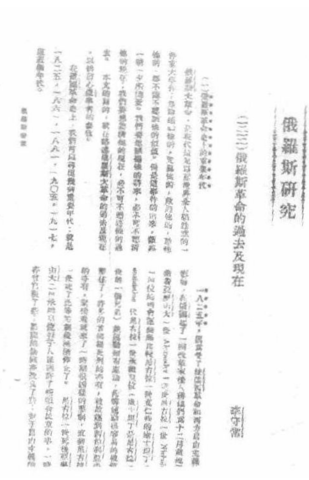
最后，对共和制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与社会党、无政府党、集产党作出区别，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社会。《谈话》与《一个兵的说话》一样，均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这两本书却多次出现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张太雷的报告中，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二、热情歌颂俄国革命与苏俄建设

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是通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价值的，他们赞扬列宁的思想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此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宣传俄国革命与建设很自然就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共产国际代表要求莫斯科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中转站，发送共产国际文件、苏俄报刊、书籍等。共产国际通过资助中共早期组织办刊物，建立印刷厂、出版社，以及中俄通讯社等宣传机构，密集宣传苏俄革命与建设。魏金斯基的第一份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报告，表明俄共（布）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②] 仅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提到的小册子就有《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米宁著，



▲《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封面，1920年出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俄羅斯研究

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

李守常

▲ 1920年9月《新青年》第9卷第6号开辟“俄罗斯研究”

① 《两个工人谈话》，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54页。

②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又名《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论工会》、《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苏俄的教育》、《共产党纲领》(布哈林著)10余本。

以上内容在中共传播活动方面的最新反映：首先，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开始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以这一号到《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暂停为止，共12号，以"马克思主义宣传"、"俄罗斯研究"等专栏共发文45篇，其中与苏俄有关的有42篇，占宣传文章的9成。

其次，由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共产党》，出版了6号，发表文章(消息除外)54篇，与苏俄、共产国际有关的文章29篇，占54%。此外在上海发行了《新俄罗斯》(英文，周刊)，马林在《向导》上特别介绍这份周刊是"专门介绍俄国内部情形，俄国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远东各重要问题和俄国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民运动的结合。"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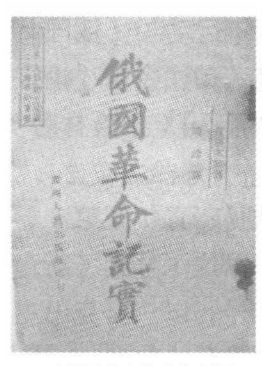
最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俄革命和建设与列宁的著作，对此上文已作了介绍。报刊、图书宣传重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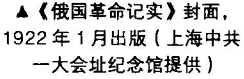
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刊物《共产党》选在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创刊本身就有象征性的意义。创刊号开篇《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中指出，十月革命"为20世纪的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我们不单是为俄国人民得脱离了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纪念，乃是为世界革命底前途而纪念，为社会主义底前途而纪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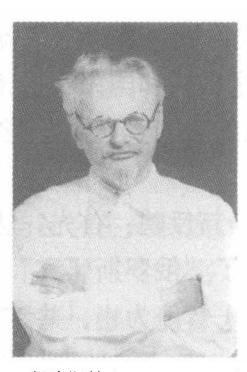
以往十月革命的消息主要来自西方媒体，多半将其妖魔化，攻击其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新青年》、《共产党》刊登大量来自苏俄的资料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苏俄。记载十月革命最有权威的图书是《俄国革命记实》(笔者注：英文书名"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sk"，直译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以下简称《记实》)。《记实》作者托洛斯基是俄共早期著名政治家、列宁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与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因此他撰写的《记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记实》小32开本，1922年1月

---

① 孙铎(马林)：《新俄罗斯》，《向导》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




▲《俄国革命记实》封面，1922年1月出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托洛斯基（1879—1940）

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纽约TSPS出版社1919年英文版本翻译。全书27节，共127页，详细叙述了十月革命从酝酿、发动、成功，新生政权的巩固，直到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我国读者通过该书不仅了解到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而且加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并体认到中国革命者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记实》最后一节（笔者注：即27节“总结”）进一步阐述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思想，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家底全世界底基础都动摇了。我们无敌的力，就在这个里面。帝国主义者用来缚我们的铁环，定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所击破的。我们暗中斗争的数十年之间，深信皇帝主义定要没落的，现在更信这个铁环定要被击破。……历史正在为我们活动，欧美无产阶级的革命早晚就要爆发的。这个革命不单是解放小俄罗斯、波兰、里窦亚里亚、可尔兰，及芬兰，并且解放受着痛苦的全人类。”①

1922年11月，马林在《向导》上发表《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一文，希望中国步十月革命后尘：“我想我们一定要庆祝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因为俄国革命是近世史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并且是构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步骤，如果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功了，什么种族不平等，少数剥削群众的事，贫困与战争等等都是会消灭的。”“我们知道，在11月7日这一天中国革命领袖的同情和赞美必定都趋向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是诚实促进人类进步的新中心。”“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必须与新俄国发生密切的协助和亲善关系，才能使解放和独立的奋斗得到一个光荣的胜利”。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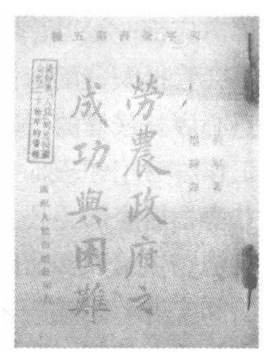
宣传苏俄建设。苏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人民展示这个美好的实景，将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苏俄的革命与

① 托洛次基著，周诠译：《俄国革命记实》，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1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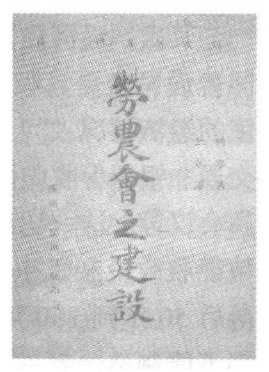
② 马林：《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141—142页。

建设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十分重视报道这方面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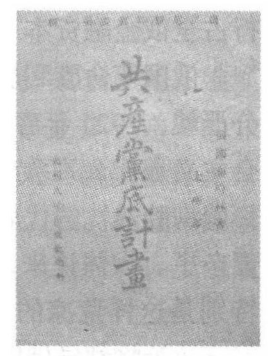
首先，政权建设。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大的功夫，通过组织翻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劳农会之建设》、《共产党底计划》等，传播列宁的国家学说。列宁通过苏俄革命的实践，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强制性地从有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若以为不要什么强制和独裁政治，可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真是妄［荒］诞的，梦想的主义”。① 无产阶级专政是用劳动大众的民主代替了有产阶级的民主。俄国苏维埃政权向世人展示俄国普通民众在政治上所享有的从未有过的权利。共产国际文件表明苏俄“在建立以劳动和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这一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部大工业已经成为公有财产，完全由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来管理，其各个部分则由工人委员会管理。颁布了劳动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实现了超越于社会民主党原来最低纲领的一系列改革。法院、高等学校、医院、宫殿——总之，一切公共机关实际上都已转归人民掌握。在其他各个生活领域，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是开始，而且是已经实现了。”②



▲《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封面，1922 年 2 月出版



▲《劳农会之建设》封面，1921 年 12 月出版



▲《共产党底计划》封面，1921 年 12 月出版

《新青年》第 8 卷第 2 号（1920 年 10 月 1 日）上刊登的中俄通讯社来稿“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对苏俄政府一些部门的职能进行了介绍。新政府设立粮食委员会、教育经理部、劳工经理部、公共幸

① 无懈（周佛海）：《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创刊号，1920 年 11 月 7 日。

② 《告世界各国工人书》，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130 页。

福需应部（公共幸福经理部）、供给和实业经理部、运输经理部等。粮食委员会管报酬分配，俄国的食物不得私售，在三种不同的点心店中售出，儿童点心店是最好的。教育经理部是最完善而且最广大的机关，管理国家的教育工作。劳工经理部是监督劳工分配和普通工程的，在俄国不劳者不得食。公共幸福需应部（公共幸福经理部）是专门料理小孩、老人和不能做工的人的机构。供给和实业经理部、运输经理部则是俄国重要的机构，负责国家的供给和实业、运输等重要工作，由有才能的专家构成。《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劳农协社》、《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等文章，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俄国民众的政治待遇。

其次，经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宣扬俄国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我国普通民众更具吸引力。据罗章龙回忆，魏金斯基与他们交谈时常介绍苏俄的经济情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把工业、矿山、交通、银行等收归国有，实行工人管理监督。1917 年 12 月成立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等。这一切都是一新耳目的。他又介绍当前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收政策和远东共和国等具体问题。""他说帝俄时代的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 50 年到 100 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比美国落后 7 倍，比德国少 3 倍，燃料比美国少 17 倍，比英国少 10 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 50% 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三分之一。" ①

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围攻与经济封锁，使苏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1921 年春，苏共采用"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什么？它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当时在俄国亲历这一政策实施的张国焘就说："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方向发展呢？" ②《新青年》、《先驱》发表了《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俄罗斯的实业问题》、《过渡时代的经济》

---

① 《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109 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9—180 页。

（列宁著）、《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著）、《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李特著）等文章，以及瞿秋白等从莫斯科发回的跟踪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阐述了俄国实行的粮食税政策、租让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与意义。这些文章论述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夺得生产权，全力发展经济，政权才能得到巩固。第二，无产阶级要学会妥协与调和，允许私人贸易、自由贸易、奖励私人生产是对农民的妥协，这个妥协是刺激农业生产，获得粮食和资金，恰恰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①] 第三，像苏俄这样现代经济很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之后，必须有一个过渡期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不是直接过渡。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已经被打败，但还没有消灭；共产主义已产生，但还是很软弱"，需要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社会经济的制度的特别状况联合起来"。[②] 第四，这个时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有大工业，而国家资本主义"便是准备这种大工业的工具"。[③] 新经济政策凸显了列宁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考，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通过"中间环节"，即必须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商业和市场的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使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战略构想进行了反思。

最后，文化教育的成就。《新青年》、《共产党》等媒体发表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等文章，对苏俄的教育事业作了详尽的介绍。俄国的教育体现了全体国民教育，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是国民教育委员会。苏俄新教育实行强制性的全民义务教育，学校是国立，没有私立，国家教育儿童，一律免收学费，"供给衣食、书籍、靴子以及一切什物"，虽然因战争对此无法完全做到，但政府尽量供应。[④]

苏俄教育实行的是平民教育，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全国

① 李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先驱》，1922年1月15日。
② 震瀛译:《过渡时代的经济》,《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③ 李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先驱》，1922年2月5日。
④ P.生译:《劳农俄国的教育》,《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7日。

最好的建筑通通把他变成‘劳工的宫殿’。这种‘劳工的宫殿’里面，有‘自由图书馆’、‘自由阅报室’、‘自由喝茶室’和‘自由的学校’等等。”苏俄教育体现了教育平等，打破过去的等级和男女差别、城乡差别，学校共有，取消文凭制。苏俄教育有多种教育形式，主要有“普遍的教育”和“劳动界的教育”。“普遍的教育”分两级，第一级8岁到12岁的孩子，定为5年；第二级12岁到16岁的孩子，定为4年。苏俄政府的新教育大纲，规定“凡儿童无分男女应受9年教育”。[①]“劳动界的教育”指“从事于劳动群众的教育”。16岁以上者可进专门工艺学校授业。“劳工学校之目的，就是要以劳动工作为教育学术的根本，以图唤起学者的劳动兴趣。”第一级学校“就从游戏、远足、饲养家畜，做木工，装订书籍等等事中得到知识。”教育者“把自立自助的要义灌输到他们脑子里”，鼓动“孩子的勇气使他自己做自己的工作，[教育者]而在旁加以帮助”。[②]学校教育强调劳动实践。在第二级学校中，“广设生产工造式样”，每天让学生到工厂实习1—2小时，“学校所练习的工，务要借以发达其体育唤起前进，乐于作工之心”，[③]有益于智德体全面发展。

苏俄的大学新规则：俄国大学为平民敞开大门，凡至16岁者无分男女皆可入各大学修业或听讲，大学教授10年一改选，各大学互相联络。为造就建设急需人才，随时设立“平民大学”，“凡略识字及不识字者，皆可入平民大学，领受各学科的知识”。[④]学校强调共产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苏俄教育的目的，就是“（一）是使人人能自助；（二）是把教育工业化”。[⑤]

苏俄国民教育委员会还是苏俄国家科学、文化的最高行政机构，设立了科学司、美术科。国家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加强科学技术、文化建设。在《文艺和布尔塞维克》、《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等译文中对新政权的文艺工作与文艺理论作了介绍。这些文章与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刊登的《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再感俄国文艺生活》

① 《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苏维埃的平民教育》，《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② 震瀛译：《过渡时代的经济》，《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③ P.生译：《劳农俄国的教育》，《共产党》第4号。

④ 同上。

⑤ 震瀛译：《过渡时代的经济》，《新青年》第8卷第4号。

等，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最初内容。

总之对苏俄的革命与建设的介绍，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未来，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

三、宣传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机关”，[①] 其主要任务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组织各国共产党集结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断行革命”，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主义。[②] 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芬兰、保加利亚、德国、匈牙利等国一度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起工人苏维埃政权。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波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列宁曾经对欧美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这场革命是俄国革命的最主要、最忠实、最可靠的战友，是俄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希望，一起对资本主义进行决战，成为世界革命的风暴策源地。与此同时，东方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1920 年列宁调整了苏俄的国际战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翼的战略格局。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苏俄为中心，所谓两翼是欧美无产阶级斗争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两翼的斗争围绕着中心，互相支持形成紧密联盟，向资本主义制度决战。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③] 因此共产国际要求落后民族的共产党在宣传苏俄革命的同时，也要宣传欧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进一步阐述了列宁的思想。他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革命潮流，“一股是很快、很猛烈和很强大的潮流，它就是俄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工人无产者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潮流，这股潮流正在向四处扩展”。[④] 另一股潮流就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继而他提出了建立反

① 胡炎：《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共产党》创刊号。

② 同上。

③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4 页。

④ 季诺维也夫：《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 年 9 月 1 日，《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1 页。

对帝国主义的两个联盟的战略思想，一个是欧洲无产阶级与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结成“紧密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般的友好联盟”。[①]这两个联盟紧密团结是劳动阶级对帝国主义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的保证。华盛顿会议表明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角逐的重心已经移向亚洲，因此“亚洲已成为政治的中心”。[②]

《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以上的精神，专设了“世界消息”栏目，介绍欧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远东民族解放的斗争。第一号上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共产劳动党、美国社会党、葡萄牙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情况。第二号介绍了多达十几个国家的党和革命运动情况，并全文刊发了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其党纲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的制定。第三号“世界消息”达32条，不仅介绍了一些欧洲国家党组织加入共产国际、工人运动等情况，还介绍了远东国家的劳工和学生运动情况。相关报道指出，欧战以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一天一天的激烈”，日本社会主义者“都觉得有增加战斗力，组织新团体的必要”。[③]于是1919年12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便应运而生了。在1920年5月1日，同盟集会发表宣言，称自同盟成立以来，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俄国劳农政府巩固了自己的基础，“终究能够使那些周围资本阶级的各国，不得已来和他们俄国妥协通商。”欧美各国的社会运动都越发倾向于左派。在亚洲，无产阶级增大了势力，印度朝鲜的独立运动，“渐渐的而变成了社会运动了”；“中国广东政府面目一新，加了赤色的浓度”；日本“更要一新阵容，振起浑身的勇气和力量，攻击资本制度的城堡，进行更猛烈的战斗”。照这样的世界大势，无产阶级运动，“已是明明进到伟大的革命时期了”。[④]

《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⑤]揭露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第二国际的领导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径，成为无产阶级的“逆贼”，

① 季诺维也夫：《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9月1日，《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② 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2年2月22日，《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③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共产党》第6号，1921年7月7日。

④ 同上。

⑤ 《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世界资产阶级的"忠仆"的过程。欧战的"每个枪声，每个炮声，都是第二国际的死葬钟声！"就在欧战当中，法国、德国、英国的工人就思考，"为什么地狱日子无穷无尽呢？""他们想到：必须要生出一个新的，真诚的，万国工人的手足团体来，——就是第三国际。"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时，就有24个团体、组织加入，不到9个月，又有意大利社会党、挪威社会民主劳动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20多个党加入。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战争，共产国际联合起来的各国无产阶级，"就是令被压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陈独秀1922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把《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卡尔·李卜克内西》等列入政治宣传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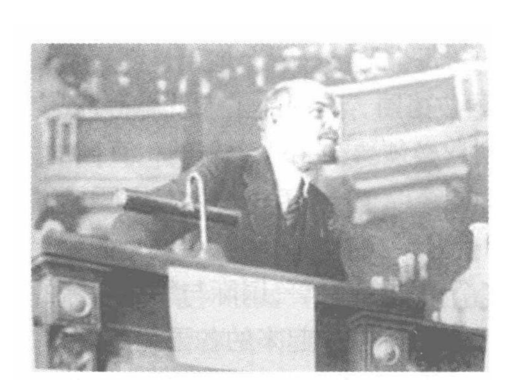
魏金斯基来华后第一篇文章《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就讲到了英国、意大利、美国劳工对俄国革命的支持。文章说："天下各国的真正劳工农民没有不表同情于劳农议会俄国的，他们不但表同情，并且尽力协助年幼的劳农议会的俄国，请看英国矿工、运输工、铁路工（当英政府要出兵于俄国时）曾极力要求其政府停止出兵于俄国去干涉。意国劳工更是卫护劳农议会国，爱尔兰的劳动者已有多数赴俄工厂作工，以助劳农议会新俄。美国劳动者已经组织了最大的共产党，以作新俄的后援。"[①] 马林来华后更是把自己过去在爪哇的革命经验用到了中国："我提出这些意见时（引者注：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②] 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别于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欧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欧美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启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窗口，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眼光更具开放的国际视野。

四、东方革命理论的传入

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创新，是东方落后民族与被压迫国家革命的纲领，开

①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页。

②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作报告

拓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这个理论对中国革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它指导下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列宁东方革命理论以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标志是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以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1922年11—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以文件的形式，进一步强调与东方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及其意义。至此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的纲领。

在研究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时，笔者认为必须将1921年春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考虑进去，因为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思考，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其中一些新思考成为东方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

关于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简言之：1.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一国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是“间接过渡”。2. 世界划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必须将其区别开来。3. 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其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范畴。4.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必须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5. 现代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6.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现代经济落后的国家需要通过“中间环节”，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商业和市场的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长期以来我国党史界流行着中共“接受”这个理论的时间是1922年年

初，即中国共产党通过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渠道接受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进而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这个流行的说法在逻辑与事实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共产国际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集中、效率特高的组织。它制定的战略、政策、策略等往往会迅速传达给每个支部（即各国共产党组织），[①] 并很快得以贯彻执行。特别是 1921 年 6—7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更是强调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必须"严厉实行"。[②] 因此中共在诞生后两年才"接受" 1920 年夏季共产国际通过的东方革命理论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共产国际二大会议结束，共产国际特使魏金斯基便获悉信息。1920 年 8 月 17 日，他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 [③] 就要求俄共（布）中央建立定期转寄报刊和文件的制度，并特意要求寄共产国际二大的材料。尽管这封信没有送到目的地，但有资料显示共产国际将共产国际二大文件传到了中国。正如历史是复杂的一样，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我国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目前虽然对这个过程的细节无法厘清，但通过对已有史料进行的梳理，大致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以 1922 年年初《先驱》创刊画线，1920 年下半年到 1922 年年初为传入的第一阶段，1922 年《先驱》创刊到中共二大为第二阶段。关于第二阶段请见第六章。第一阶段传入有多种渠道，传入的内容也不是一步到位，有一个过程。

以上判断的第一个依据是陈独秀 1920 年 9 月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该文刊登在《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上。文章虽然是陈独秀个人署名，但却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第一次对时局"宣言"，这一点在文章开首就交代得很清楚，文章是因"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 [④] 询问而对时局发表了四条意见，文章中有三处出现"吾党" [⑤] 对时局的主张，说明陈独秀发表的这些意见是"吾党"的意见。所谓"吾党"，当指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只不过当时称"社会党"而非"共产党"而已。将这篇文章与东方革命理论联

---

① 中共虽然在二大才正式参加共产国际，但众所周知 1920 年春魏金斯基来华，共产国际就与中共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② 《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记者按"，《先驱》，1922 年 1 月 15 日。

③ 《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 页。

④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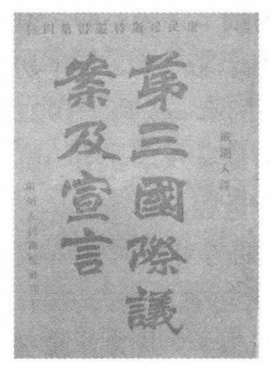
⑤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9 页。

系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最后一条意见，即社会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封建主义作斗争，待取得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陈独秀的这个思想绝非他个人的思想，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联盟的思想是东方革命理论的很重要一个策略。很显然，陈独秀接受了这个策略思想。



▲ 1921年7月7日《共产党》第6号发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

以上判断的第二个依据是《共产党》月刊刊登两份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一是1921年4月《共产党》第3号，刊登了《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翻译者“P生”作了交代“条件”译自美国“Nation”杂志。译者附识说得很清楚：“这22条是1920年即去年7月，第三国际共产党在俄国莫斯科开大会底第二次会议时所规定的”。这22条“正是救济中国人沉痾的无上的妙药”，“他的主要精神：一是大胆的宣传实行共产的革命；二是断然与黄色的改良派和平主义断绝关系”。三是同年7月《共产党》第6号发表了署名“朗生”翻译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①] 它的副标题表明“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同年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登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布告《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以下简称《议案》)即将出版。《议案》载入了共产国际二大宣言，与《共产党》月刊上的共产国际二大宣言一模一样。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封面，1922年4月出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以上情况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二大的主要文件在1921年4月以前已经传入我国。二是《议案》翻译者“成则人”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的翻译者“朗生”为同一个人。我们已经知道“成则人”是中共早期组织重要成员沈泽民的笔名，由此获知沈泽民还有一个笔名“朗

① 该文《共产党》月刊只发表了一部分，剩下部分因《共产党》停刊而未刊出。

生”。三是“P生”是沈雁冰的笔名，有趣的是他们兄弟两个是共产国际二大文件最早中文翻译者，但译文却并非来自同一个母本。沈雁冰的母本是美国的“Nation”杂志，与《议案》的中文翻译得不同，说明沈泽民的母本是另外的，极有可能是莫斯科将共产国际二大文件翻译成了英文，提供给中共的。

以上判断的第三个依据是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马林的使命。1921年6月马林来华，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学习、宣传与贯彻。马林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并在列宁的推荐下，担任大会“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他在第4次会议上发言，根据在爪哇的革命经验，阐释了列宁提纲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关于东方革命的具体建议。马林的讲话，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的重视，就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1920年8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便任命马林为出使中国的正式代表。来华的使命他自己交代得很清楚：“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我动身去中国，“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①]因此他抵达上海后，《共产党》月刊便发表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宣言；2个月后，《新青年》刊登了《议案》即将出版的广告，就绝非偶然。

以上判断的第四个依据是建党初期一些共产党人的资料。张太雷于1921年3月抵达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并担任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特别委员。这次大会强化了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张氏于1921年8月回国。因此他回国后，不传达共产国际三大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是不可思议的。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的信，[②]就专门介绍了共产国际二大会议的情况，特别记录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极严”条件。林伯渠曾回忆“约在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互相交谈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大会的几个决议文件。”[③]李达在《中国共

①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②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③ 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年11月），《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①]称："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

在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的第一阶段，从我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陈独秀著，1920年9月）、《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李达著，1921年6月2日）、《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施存统著，1921年6月7日）、《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李大钊著，1921年7月3日）、《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施存统著，1921年8月27日）、《今日中国社会究竟怎样的改造？》（许新凯著，1921年12月13日）等文章与《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田诚著，1921年6月）小册子中，不难发现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正在悄然改变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某些看法，新的认识正在萌芽。

在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哪些思想之前需要了解《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的核心文件《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该文件约8页，共12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译文与今天的译文有很多的不同，这直接影响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理解与贯彻，本书特将早期译文与后期译文摘录于此，从中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

一是中产阶级民主政治总把抽象的或形式的态度对付一般的殖民地问题，而对于民族平等问题则取分别办理的态度。（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特点，就其本性来说，是抽象地或形式上地提出关于平等的问题〔其中包括民族平等问题〕）[②]

二是共产党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不取抽象的与形式的态度：（一）必须分析历史的与经济的情形，而以经济尤为重要；（二）必须把被压迫阶级被掠夺的利害和民族的一般利害分别清楚；（三）必须照样的把被人压制的民族的利害和压制人的民族的利害分别清楚，因为在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时代，常常有许多弱小民族的中产阶级受强民族的资本家的压制与掠夺。（共

① 《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② 正文为旧译文，见《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第100—108页，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刮号内的为新译文，见《丛书》第2卷，第138—144页。新译文多于旧译文，此处只摘录了与旧译文对应的部分。

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也应该首先提出非抽象的、也非形式上的原则，而应做到：第一，正确分析具体的历史形势，首先是经济形势；第二，把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被剥削者的利益，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非独立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区分开来，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性。）

三是 1914 年的帝国战争，已经把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诈伪极明白暴露出来给一切民族看，给世界的一切被压制阶级看了。被压制的民族看见战后的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愈觉得这方针（用革命手段推翻有产阶级以求真正民族自由）的不错，愈使得工业发达的国家里的革命风云愈逼愈紧了，愈使得殖民地以及被压制的小国的劳工都趋向革命，不再相信中产阶级所说的力谋世界和平的危言巧语了。（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虚伪性。……所谓国家联盟，只不过是此次战争的战胜国借以互相保证其战利品的保险合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和打倒资产阶级，才能达到真正的国家自由和统一。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并且到处加强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所有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从而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和一律平等的市侩民族幻想更快破产。）

四是国际共产党对民族与殖民地的问题的政策必须先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劳工连合成一大团体，共谋革命，以颠灭资本主义。（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点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

五是现在世界政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切世界的政治作用显然都集中于一点，就是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连合了来反抗俄罗斯劳农会共和国；俄国的四周有一切国、一切殖民地、一切民族、一切受压制民族的劳工的劳农会运动，他们都在此次得了痛苦的教训，知道若非连合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以劳农会权力战胜帝国主义，则他们永不得自由。（世界政治形势已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

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苏俄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与革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它们别无生路。）

六是我们必须决定一个怎样使一切民族的自由运动和劳农会俄罗斯关系一天密切一天的政策与形式。（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俄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

七是俄罗斯联盟是向一切民族的劳工会连合的一个过渡办法。（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人民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

八是国际共产党有责任不但要推广，而且要考察从劳农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联邦制）是一个过渡办法，那就要更加紧密这个联盟。（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研究以及用经验来检查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追求更加紧密的联邦制同盟。）

九是国际共产党必须：（一）说明只有劳农会政治能给各民族以真正的平等。（二）援助被压制民族或殖民地人民所起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必须做到：第一，经常解释，苏维埃制度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者、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第二，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国或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

十是小中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实在是民族主义和调和主义，必须首先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要求：（一）无产阶级作战时，应以国际利害为前提，以一民族的利害为次要。（二）凡已战胜其本国的中产阶级底民族应时时准备实行最大的民族牺牲以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性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性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越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越来越提到首要地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又保留（且不说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认）民族利

己主义，使之不受侵犯，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十一是那些后进国或民族而有众多的农民做社会底层的（国家和民族），必须记好下面的办法：（一）一切共产党必须给予革命运动以实在的活动的助力，并由驻在该地的共产党相度实在情形而决定帮助应以何种形式出之。（二）必须反对和攻击那些富有反动思想的牧师，基督的传道，以及其他同类的事。（三）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与贵族、大地主的势力。（四）这些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帮助农民运动，以反抗剥削农民的大地主等。要把农民与被掠夺的人编进劳农会，这样就把西欧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农民运动更连合得密切些了。（五）国际共产党的责任在帮助各殖民地与后进国的革命运动，教它们在自己的特别国情内想法去反抗的中产阶级的渐归民主主义化。国际共产党必须和殖民地或后进国的革命运动暂时有关系，或者去和他们连合，但却不要和他们合并，保持它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六）继续在后进国的一般苦役者中间宣传，揭破帝国主义的假面具，揭破他们承受别的强国的主意来组织政府的掠夺平民的阴谋。在现今的国际情形下，唯一免除受卖的危险，就是与劳农共和国联络。（对待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特别应注意以下几点：1. 各国共产党应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帮助的形式应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2. 必须同僧侣、基督教教会和其他类似分子的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影响作斗争；3. 必须同大伊斯兰主义、泛亚细亚运动和类似的派别进行斗争；4. 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在可能的地方把农民和一切被剥削者联合到农会里，从而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5. 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

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6. 必须坚持不懈地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实行的骗局，……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之外，附属国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十二是殖民地和被奴辱的一般人民不仅对帝国主义有一种憎恨，就是对强国的无产阶级也有不信任的意思。因此强国的无产阶级可以表示必要的让步和好意，以冀被压制民族的人民消除这种不信任与偏见。如果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完全一致，互相信任，关系密切，便不能完全克胜资本主义而达到最后的目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长期的压迫，不仅引起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对一般压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该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而且还引起不信任的心理。……因此，各国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地对待受压迫最久的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的残余。同时，为了迅速消除上述不信任感和偏见，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没有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追求联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番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语言具有时代性，《议案》的译文并不精确，但基本意思出来了。迄今研究传播史的学人基本上还没有注意到翻译上的时代差异（即所谓语境），这种差别可以使我们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诠释我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的特点与局限。这也正是本文将两个版本的译文抄录在此的用意。我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对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不是按照今天的译文，而是将《议案》的内容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

首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制定革命战略的客观依据。中共一大之所以制定了中国革命是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战略，其根本原因就是误判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就在1921年夏季，有人提出了中国是“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的新概念，这显然取自列宁的“半殖民地”的概念。[①] 这个看法虽然当时还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且也缺乏科学的论证，

① 据说列宁1915年第一次提出“半殖民地”的概念，赵德馨：《列宁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说》，《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但无疑为后来中共断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社会提供了最初元素。

中国革命的对象决定革命的性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十分明确地指出，落后民族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残余（笔者注：即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鲜明地指出中国的乱源是世界的资本主义（笔者注：即帝国主义）要争夺中国市场。帝国主义与军阀、封建地主相勾结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出发点。第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工人、农民是世界的创造者，必须要取得政权，作社会的主人。对资产阶级，如前所述，陈独秀在1920年就提出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中共一大上却通过了相反的策略。

其次，列宁的"间接过渡"思想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思考。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拿现在底经济基础来行共产主义，当然是做不到的"。[①] 这个认识是全党的共识，那么中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呢？中国共产党人从列宁的"过渡思想"中吸取理论支持。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正是因为存在着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缺点"，比别国实行社会主义要加倍困难，必须要加倍努力。[②] 也认识到实行共产主义不是一步到位的，要有一个"过渡期"。它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期"。[③] 在这个过渡期无产阶级不仅要在政治上"独裁"，而且必须在产业上"独裁"。"前者用于反对（剥削统治）阶级，是从阶级斗争上来主张的；后者用于无产阶级自身，是从生产技术上来主张的。两者合起来说，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组织。"[④] 他们提出只有夺取政权，兴办实业，发展现代经济、教育文化、民主等问题才能真正获得解决。无产阶级握得政权以后，还必须仗着"政治的优越权来大干特干"，[⑤] 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得多的经济基础，来实行共产主义。这显然是受到列宁的俄国可以先夺取

---

① C.T（施存统）:《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② 同上。
③ 光亮（施存统）:《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8日。
④ C.T :《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1日。
⑤ C.T :《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

政权，再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条件的思想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思想的启示。

最后，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实际，特别要与落后国家与民族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方法论，对我国第一代共产党人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他们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中，反驳张东荪等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配提倡，才能实行的观点，“这实在是大错特错，被死书蒙蔽住了”，[①] 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革命，必须“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②] 他们响亮地宣告：“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底努力了！”[③] 这些思想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责任。

以上认识显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列宁新战略、策略的某些启发，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改造国家爆发出的一些认识火花，但还无法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特质，所以在中共一大上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④] 中共一大上之所以制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认识也有密切的关系，包括马林在内的共产国际代表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最初他们判断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作出了中国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错误定性。这个失误也与他们对《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第四条的理解有关，上面写道：“国际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必须先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劳工连合为一大团体，共谋革命，以颠覆资本主义，否则民族平等不能实现，民族被压迫制度永无废止之日。”[⑤]

五、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传播特点与影响

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传播与前一阶段的传播有明显的不同，具有鲜明的时

① C.T：《我们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

②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1日。

③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④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⑤ 成则人（沈泽民）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第102页。此译文与文件原意有差距，原文见《丛书》第2卷，第139页。

代特点。首先，苏俄渠道成了传播的主渠道，这是一种有领导、有计划的自觉行为，至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主渠道由苏俄渠道取代了日本渠道。其次，传播的形式多样化，除了书籍、报刊等通常形式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与先进分子座谈、演讲、书信，以及共产国际会议、文件、学校培训等形式。又次，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共产国际战略、政策相结合。理论传播与实践活动同步进行，对工人运动的指导、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反帝反封运动的支持等等，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有序开展起来。再次，传播以列宁主义（以东方革命理论为核心）、苏俄革命的经验、苏俄建设的情况为主要内容。最后，中国革命被纳入苏俄、共产国际的全球战略，传播也围绕着反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这一中心而展开。[①] 苏俄、共产国际的介入，给中国初期传播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特别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的传入，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产生了跨世纪的深远影响。

第一，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一国胜利”、东方革命理论、“中间过渡”等思想对东方革命具有极大的启蒙作用，更接近东方各国的实际情况，直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最基本问题。这些理论传入中国，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了由从西向东推进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格局由西方单级变成了东西方二级，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重大发展，更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在具有4亿人口的中国落根，无疑开启了中国革命通过民主革命阶段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点。同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

第三，中国政治文化的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仅仅

①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只是一个新的政治理论传入中国这么简单，也不仅仅只是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政治文化，并注入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之中。这种注入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解构与重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无论是政治思想、政治意识、政治心理还是政治情感方面都有了与过去不同的东西。传统的救国理念被彻底改造，救国的主体力量由士大夫阶层转向人民大众，爱国主义升华到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文化的重构，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

所谓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要解决俄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虽然共产国际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东方各国的革命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必须寻求适合本民族的形式，但它的战略基点是以苏俄为中心，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消极面。

首先，共产国际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总战略，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必须为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第十条中有明确的规定："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①] 这里所说的"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服从苏俄革命的利益。本着这个原则，共产国际 1920 年 9 月 1 日给东亚书记处的指示，第一条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②] 这样的战略就必然会在许多情况下造成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当苏俄利益与被压迫民族利益一致时，这个战略执行得顺利；如果矛盾不可克服时，就造成了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分裂，受损害的必然是被压迫民族的国家利益。这一政策后来对国共第一次合作，以致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作用。

其次，总体上讲，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总危机与世界革命总爆发的估计过于乐观；共产国际规定落后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第一步是推翻帝国

---

①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同上书，第 142 页。

②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 年 9 月 1 日，《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 页。

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又强调它们“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①]这样就容易在实际工作中产生急“过渡”的思想与策略。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民主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急“过渡”往往衍生出“左”倾盲动。

再次，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第七条，又将联邦制的模式公式化、固定化，并规定这种组织形式是“各民族劳动人民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②]直接成为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中国采取联邦制的法理依据。

最后，共产国际规定各国共产党与它的关系是垂直领导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对落后民族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建立共产党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实践已经证明，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国情非常特殊，革命形势十分复杂，由一个远离民主革命斗争中心的总机关来决定一切，包办一切，是非常不恰当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了这种组织机制对各国革命运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

①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② 《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第五章

国民党人士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登上历史舞台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也日益加深。在危机四伏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使革命党人进一步看到自己一度崇尚的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充满种种矛盾与罪恶，决心寻找一条如何“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①]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于是辛亥—五四时期他们热议社会主义。

革命党人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1897年孙中山的欧洲之行。孙氏曾回忆：“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英文对应词就是“socialism”。在中国同盟会的纲领中，他吸收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制定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平均地权”政策。革命党人宣传社会主义有过三次高潮，一次是《民报》时代；一次是民国初，孙中山四处演讲社会主义；一次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越来越强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曾提过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民党在先。”[①]

本章需作四点说明：一是为了行文上的便利，本章将参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的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组织的成员，一律称为“国民党人士”。二是国民党人士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宣传内容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其他社会主义，多数情况很难将它们严格区别开来，因此本章是从整体上进行描述。三是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早在晚清便已开始，本章对此略作记录，主要描述他们在五四时期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轨迹。四是他们当中有人，如沈玄庐、邵力子等也是中共早期党员，具有双重身份。一般情况下，本书将他们放在国民党人士中透视。

第一节　主要传播者与传播媒体

国民党人士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值得很好研究的现象，也是国民党人在辛亥—五四时期的一次集体记忆，涉及的人士不在少数，孙中山、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马君武、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蔡元培、林云陔、徐苏中、沈仲九、陈炯明、冯自由、谢婴白等均是革命党的重要成员。通过对其代表人士传播轨迹的爬梳，读者将更为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情况。

一、主要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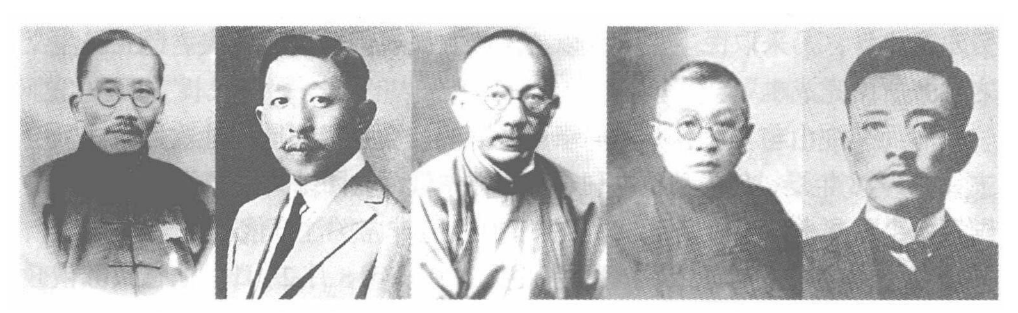


▲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在早期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方面，孙氏是一位特别值得关注的人物。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他从不避讳，公开表示“余实为完全社会主义家也”。[②]早在1897—1898年旅欧期间，他对社会主义各种派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曾阅读了《资本论》1887年英文版本。在欧美的经历也让他切身感受到资本主义的罪恶，他曾指出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孙中山：《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蔡元培（1868—1940），廖仲恺（1877—1925），马君武（1881—1940），邵力子（1882—1967），宋教仁（1882—1913）

到19世纪下半期盛行起来，就是因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而造成的。1905年春他去日本前，曾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要求第二国际接纳他为正式成员。民国初年，他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到各地进行了数十场演讲，反复宣扬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有许多派别，如共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等等，综合起来就是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两个派别。“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①]在孙氏那里，这二派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集产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下乘。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由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国民素质均与上乘之社会主义相抵触，因此集产社会主义更适合我国国情，“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②]经过一段建设，再实现共产主义。

孙氏将社会主义纳入了自己的三民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从欧洲输入中国时，他是将“socialism”译为“民生主义”的，在其著作中，“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经常是同义互用。民国肇始，共和政体已成，他认为民族、民权之二大纲领已达到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③]他的民生主义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述的，所要解决的是贫富不均，“予欲为一

①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8页。

② 同上书，第509页。

③ 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8页。

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

然而孙中山与“议会派”、“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不同，他欢迎俄式社会主义。1918年夏，他主动致电列宁希望“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②]他是中国第一个歌颂十月革命道路的政治家。他一直非常关注苏俄革命与建设情况，并通过不同的渠道与苏俄政府保持联系。1921年8月28日，他在致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热情地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像莫斯科一样，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底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底基础。”[③]晚年他顺应时代的潮流，制定的国际战略实现了从师法欧美向师法苏俄的转变。

何以发生这个转变呢？首先，与他的政治思想变化有关。如前所述，他早期思想中就有社会主义的元素，成为日后转向“联俄”的思想基础。其次在国际战略中，孙氏最初对美日等国抱有幻想，但处处碰壁，而苏俄适时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他欢迎这个援助。又次，与列宁的东方革命战略有密切关系。列宁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围剿，制定了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全球战略，中国是其关键部分。苏俄、共产国际经过较为复杂的过程，最终确定孙中山作为实施东方战略的主要政治伙伴，不断派使者与之联系。再次，1921年苏俄取消了过左的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务实的新经济政策，给孙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新经济政策是学他的民生主义。最后，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直接促使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完成。

但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他早在1912年就热情称赞马克思“苦心孤旨，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④]他极力赞扬列宁，并表示要以苏俄为榜样，但他不认同共产组织与苏维埃制度，

---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② 孙中山：《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1918年夏，《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页。

③ 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3页。

④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在著名的“孙越联合宣言”第一条就表明了他的立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俄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①] 他虽然主张社会革命，但他的所谓社会革命实质是改良主义，尤其在经济上反对苏俄用暴力剥夺土地和资产阶级的资产，主张用国家力量与经济手段建立公有制度。他多次表示，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②]

孙氏的社会主义是独特的“集合全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③] 其体系思想来源很庞杂，有第二国际晚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国家社会主义，亦吸收了他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某些元素，同时也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道。他将这个独特的思想体系定名为三民主义，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就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④] 他正是企图用这个思想体系来作为改造中国，达到国强民富理想社会的指导思想。孙中山这个独特的思想体系影响着他的忠实追随者，左右了他的同志们的社会主义意识，统一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17岁时组织“群智社”，探求新思潮，散发进步书刊。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其间结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便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1905—1907年间，革命党人与改良派之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朱执信以《民报》为阵地，撰写长篇政论文章，捍卫和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革命党人中



▲朱执信（1885—1920）

①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1页。

③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5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一位杰出的理论家。1906年1月他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作“小传”，第3号作“列传”。以下简称《列传》）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文章，也使朱执信成为革命党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明星。1906年朱执信回国后，不减革命热情，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并承担《民国日报》、《建设》杂志的编撰任务，积极开展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向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称颂列宁的伟大业绩，赞扬‘布尔什维克精神’是为‘社会牺牲的精神’，认为必需有这种革命精神，‘才可以做成一个革命事业’。他十分重视俄国革命的经验，翻译了列宁颁布的苏俄《劳动军法规》，把既是‘防卫主义的武力’又是‘共同经济建设的先锋’的‘赤卫军’，看做可资效法的楷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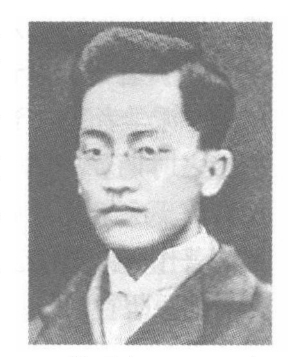
朱执信一生虽然短暂，但著述颇丰，1979年出版的《朱执信集》就搜集了文章132篇（含信件），加上译文和文艺作品有60多万字。他的理论文章不仅篇幅长，而且涉及面广，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体涉及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税制、币制、语言、宗教、心理学、逻辑学、外交史、军队建设、铁道建设等方面；也有古诗、新诗和小说；重点在世界近代史、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其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寻找理论借鉴，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格外注意。他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及世人对马氏的评价进行了一般性介绍：“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② 从他后来的著述中，不难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者说他的一些论点或多或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他对马克思阶级斗争观的认同；他对“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等词汇运用自如；③ 他称赞列宁是一个承担起了“一般人的义务”和“改革者的义务”，“吃苦辞甘的好人物”；④ 他对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赤卫军——“有

① 《前言》，《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页。
②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6年1月。
③ 朱执信:《复一心社函》，《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④ 朱执信:《改革者的两重义务》，《闽星》半周刊，1920年4月23日。

主义的兵”大加赞赏，他参酌欧洲和日本的征兵制和苏维埃俄国的劳动法典，构建了一支理想军队的模式，并将1920年1月15日列宁签发的苏俄劳动军法典译出来附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军队”的蓝图之后。[①] 他称赞《新青年》1920年5月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是“好杂志”。他甚至相信共产主义有实行之日。[②]

朱执信去世后，视其为“最亲近最佩服的朋友”的戴季陶，给予他高度赞扬：“每一想着他，就觉着自己在德行上少了一个导师。同时，我又替一切世界上的人可惜。我相信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机。”[③] “他说，‘自待应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待人应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这真正是执信最可爱最可敬的地方，更是他特性过人的地方。他读尼采的书，读成了朱执信；他读马克斯的书，也读成了朱执信。”[④]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弘文学院和法政大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长。《民报》创刊后任编辑。他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到河内、新加坡、香港等地策动起义和主持党务。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二次革命中，都是孙中山的得力臂膀。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同时主编《民国》杂志。后随孙中山回国，1919年成为《建设》杂志的五员大将之一。



▲胡汉民（1879—1936）

胡汉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这方面他下了很大工夫，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该文把马恩的《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雇佣劳动与资本》、

① 朱执信:《兵的改造及其心理》,《建设》第3卷第1号，1920年8月。
② 朱执信:《复一心社函》,《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③ 季陶:《怀朱执信先生》,《建设》第3卷第1号，1920年12月1日。
④ 同上。

《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八部著作中有关唯物史观的内容集中起来进行详细分析介绍，对唯物史观作了简明通俗的诠释：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唯物史观“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化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唯物史观“实在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这个学说的问世，是人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社会主义的绝大改革，划一个新纪元。①

有学者认为胡汉民对唯物史观在学理上的阐述更为准确，比李大钊深入，② 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对马克思相关重要著作作了精练的归纳。胡氏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没有专书，但包含在代表性的著作里，“《〈经济学批评〉序》（今译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斯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斯自称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指导线，信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神圣家族》著于1845年，其时马克斯急于反驳黑智儿（引者注：今译黑格尔）一派学者，对于理想的社会主义，尚未攻击，然已是转入于唯物史观新思想之时期。《哲学的贫困》著于1847年，马克斯自称深究经济史，而更加自信。次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直应用唯物史观之原则，为马克斯生平重要之著作。德国社会党领袖李普克尼希（引者注：今译李卜克内西）以为无产者的思想行动，得了方针，于主义政略，又得了根本的原则，都是这宣言书不朽的功绩。《赁银劳动及资本》（引者注：今译名《雇佣劳动与资本》）著于1849年，说明由奴隶制度变为农奴制度，由农奴制度变为赁银制度的理由，亦应用唯物史观（社会一切关系依于生产方法之变化而左右）的原则。《法兰西政变论》（引者注：今译名《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1852年登纽约杂志，马克斯关于社会心理的意见，到此文才详细吐露。《资本论》是最有名的著作，成书亦最后，固然是由唯物史观产生的，但关于理论的引申，即只有第一卷的附注。第三卷《资本论》的一段，有补足经济学

①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② 王守常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批评序文的要点。”[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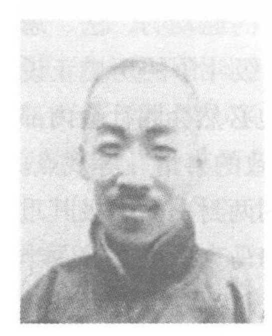
此外他对非难唯物史观的种种观点一一加以驳斥，这是该文最精彩之处。文章对欧美学者有代表性的7个非难唯物史观的观点：德国法学大家士探拉用法律的概念代替经济的概念而非难唯物史观，巴拉奴威巴士奇以历史的进化而不承认经济有最强决定之势力而非难唯物史观，否认经济宿命论而非难唯物史观，以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说”矛盾而非难唯物史观，罗里亚不承认生产工具之变化为社会变动之基础而非难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不承认伦理价值而非难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过于单纯而不能说明复杂的历史的观点而非难唯物史观等论调逐一加以驳斥。胡氏认同物质第一性，经济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原动力，法、思想、精神、科学等上层建筑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阶级斗争的历史正说明社会组织随着生产变动而变动的法则，资产阶级社会也必然会因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崩坏，社会革命为社会改造“自然必致的事情”等观点。难能可贵的是，他引用了恩格斯1890年有关唯物史观的两封书简中极其重要的两段话：“世上青年往往有过重经济方面之弊，我和马克思也要分一半责任。我们所说唯物史观的原则，世人多不承认，故我们为驳反对者的攻击，有极端主张之必要。经济以外，有各种要素，相互之间各受影响。我们早就承认，但为忙着驳击反对论的话，所以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论及。”（今译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予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唯物史观说历史最后之条件，是直接生命之生产及复生。……马克斯和我未尝主张过此以上的事。若把来曲解，当作仅是一个经济的原质产生历史，就把这个原则变成无意义的、抽象的、不道理的话。”[②]（今译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

①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② 同上。

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591 页）这两段话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是“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论者，注意到了除经济之外的包括伦理在内的各种因素的作用。

胡汉民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用这一历史观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伦理现象，《孟子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阶级和道德学说》等为其代表作。不过“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与李大钊不同的”，他“强调这一理论的民族主义的涵意，而李追随的是阶级斗争，这个因素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分裂。”[①]



▲戴季陶（1891—1949）

戴季陶（1891—1949）原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等，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14 岁赴日留学，其间参加中国同盟会并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氏的忠实信徒。1909 夏回国后，担任江苏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讲授宪法学和法学等课程。从 1910 年至 1920 年，分别做过上海《中外日报》、《天铎报》、《光华日报》、《民权报》、《民国》、《星期评论》、《建设》等报纸和杂志的编辑或主编。从他早期的文章中，可看出其性格中鲜明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使他在五四运动后，走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队伍中。

首先，戴季陶眼界开阔。从日本归来，他的眼光是面向世界的。回国后他发现“现在中国一般社会上的人，十个中便有九个不晓得世界是什么东西，就是学界的人也还有许多全然不明白的。”[②] 他要让中国人通过媒体了解世界。所以他强调报刊的“性质和作用，是要把世界各处的情形，社会各方面的状态，说把社会上的人晓得，再就当兴当革的事提倡鼓吹起来，使社会上的人发出觉悟心，好好的去干自己的事业，那么方能够于社会有点利益。”“既然要使一般的人，不出门一步便晓得世界的情形，社会的状态，那么外国的一切大发明、大事业、紧要事件，以及各种有趣的资料，通同要

---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1 页。

② 散红（戴季陶）：《本报阅者诸公请看》，《中外日报》1910 年 8 月 13 日。

集起来，使看报的人，大家知道的。”[1]所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要闻都是他关注的对象。1910年8月在《中外日报》上他就向国人介绍了“近世欧洲各国国民活动之趋势”，其中就包括“现在主义”、“个人主义”、“国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12月，他又专门写了《社会主义论》，为国民陈说“社会主义为何物”。十月革命后，俄国革命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世界时代精神”，正是由于有这个开阔的国际视野，使他比其他国民党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得更远。

其次，戴季陶悲天悯人。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看看他回国后不久的文章，真可谓“字字泣血涕泪”，随处可闻“呜呼”、“嗟呼”、“天仇无言”的悲叹。他曾为民“九哭”，[2]叹民不聊生；为国哭，恨国之柔弱；更为“横暴不仁极矣”的世界而哭。南丁格尔的死，让他“为世界人类挥泪吊之”，托尔斯泰的逝去，更使他为“世界人士痛哭之不置也”。所以有人说：“季陶君的文，大半都是眼泪砌成的。”[3]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使他不停地寻求救国的道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种为受压迫者争权利的主义被戴季陶纳入视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其三，戴季陶疾恶如仇。他之所以“哭”，可以说是因为他的“恨”。他的很多文章短小而犀利，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投向“恶劣的政府、腐败的官吏、专横的武人、迂腐的学究形成的反革命的势力”。[4]在极度悲愤时，他甚至发出了“杀、杀、杀”的喊声，[5]将“血性男儿”的一面挥洒得淋漓尽致。他恨官之不如狗，恨民之愚，恨国之将亡，恨世界之不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揭露和控诉引起他的共鸣，也在情理之中。

其四，戴季陶勇于探究。他涉猎广泛，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内容他都有所探究。他始终关注国外的新潮流，对名目繁多的各种新主义都有所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理论，成为他谈论的一个论题应该不足为奇。

---

① 散红（戴季陶）:《本报阅者诸公请看》,《中外日报》, 1910年8月13日。

② 散红（戴季陶）:《九哭》,《中外日报》, 1910年8月22日。

③ 秀水致季陶（1920年3月17日）,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1920年3月19日。

④ 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39号, 1920年2月29日。

⑤ 天仇（戴季陶）:《杀》,《民权报》, 1912年5月20日。

其五，戴季陶胸怀大志。虽说他悲天悯人，满纸“天仇之泪”，时常“中心寸折”，但不掩其勃勃雄心，万丈豪情。“拼得一条命，舍得一腔血”，[①]“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豪言均出自戴氏之口。他要唤醒国民！他要改造国家！他甚至要做“世界国民”！他还希图每个人都从世界的角度去构建责任、幸福、道德观。他也曾为全人类构建了一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的伦理观。他呼吁国民“联合世界上一切被掠夺的人，为世界全体人类，建设一个全人类自由劳作、自由管理、自由享用的互助世界！”[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要解放全人类”的理念与他的这些思想有某些契合之处，这也是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

其六，戴季陶把自己放在“无产阶级”中。1919年10—11月，他在《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一文中，自称是“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里的人”。1920年5月在谈到中国的国耻日时，他又说：“我们无产阶级的人，应该在资本侵略主义罪恶的意义上，纪念这”个日子。正因为他自称“无产阶级”，所以他说马克思“是指导我们道路的人，他所指导的道路，实在是最确实最安全的道路”。[③]

从某种意义上讲，苏俄革命与国际主义的张扬促使他热衷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公布了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声明），9月14日《星期评论》第15号及时转载了日本《每日新闻》的相关报导，并发表了戴季陶撰写的《俄国两政府对华政策》。同年11月30日，他在《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中指出：“中国的人，一般都是胡里胡涂，一点也不去研究俄国的劳农政治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只是瞎排斥，瞎害怕。看见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就当作是危险的人，听见讲这个问题的话，就当作危险的话。”俄国革命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动，我总是希望中国人大家“鼓起一个人道的同情心来，平心静气去研究俄国的问题，讨论对俄国的政策，决定对俄国的方针。我们两国都是农

① 天仇：《痛言》，上海《天铎报》，1910年11月3日。

② 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③ 季陶：《“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5月4日。

业国，在近代文化史上努力的时代，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的。”[①]1920年4月，《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文本正式发表后，他欢呼：“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思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我们在悲哀惨酷境遇里面的中国国民，对于这一个通告应该十分感激，应该要为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感谢，更应该要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②]

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多方面的，除了极力赞扬苏俄革命外，还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命题，主张劳工运动，“有知识的心力劳动者应与知识缺乏的体力劳动者联合一致，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以最善的努力谋全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③]在宣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面也颇有建树。1919年11月，他与人合作以日本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所译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bren Von Karl Kautsky)为底本，编译成《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在《建设》月刊上连载，1927年集结成书。《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的翻译也是他组织的。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戴季陶与沈玄庐、邵力子是国民党同志中走得最近的，曾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魏金斯基来华后，与戴季陶、沈玄庐等国民党人士交谈筹组中共早期组织。戴季陶不仅积极参加，还起草了中共党纲，后来他以信奉三民主义为由没有正式参加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主要原因不是思想上的分歧，而是因孙中山的阻挠。

沈玄庐(1883—1928)原名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光复会与中国同盟会。1916年回国后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1919年6月与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积极投入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夏参加中共上海早期组织。1923年8月，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军事。次年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

▲沈玄庐(1883—1928)

①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见《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② 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③ 戴季陶:《民国九年的工作》,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1日。

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28日在浙江衙前遇刺身亡。

沈玄庐在五四时期是传播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健将，据统计，1919—1922年他在《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三家报刊上就发表作品217篇，篇数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二。[①]

宣传劳工运动是沈氏传播的一个亮点。他对劳动大众充满了同情，1919年9月7日，在《牺牲与鱼肉》[②]中指出：“现在的形势，中国一部分的人民和土地，已经成为俎上的鱼肉。日本三阀（军、财、党）操了刀以中国三阀为俎，山东的土地和人民，已经尝着刀俎的滋味了。其他大部分的土地[和]人民，等于笼里鸡、网里鱼、圈里牛羊，不过还没有拉出来动手开剥罢了。”他运用剩余价值的理论，通俗易懂地在农工大众中宣传什么叫剥削，资本家、地主是如何剥削穷苦大众的。工农大众“为自身打算，为人类打算，不但应该负担现在的责任，并且应该负担将来的责任。”这就是“一、打破一切旧制度。二、建设新的社会”。打破旧制度就是打破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制度；建设新社会，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③]他还写了反映劳工生活、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新诗歌。

沈玄庐不仅用文字宣传劳工运动，还具体组织农运。1921年9月他回到家乡，发动贫困农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浙江衙前农民协会。有文章称他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号召农民起来与地主精英斗争的政治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农民运动的第一人，比彭湃在广东海陆丰组织农民运动早一年。并且为这次农民运动起草了完整的，比较好的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④]

此外，沈玄庐还是第一个为中文本《共产党宣言》做广告者。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出版后，许多青年写信给上海《民国日报》询问在何处购买，他便在报上作答，请读者到新青年社（上海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联系。“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

① 参见本书第一章表1—1。数目不一致的原因，是表1—1没有将他的文学作品统计进去。

② 《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

③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④ 陈玲玲等：《沈玄庐研究综述》，《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8期。

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①]这份看似答读者问的短文，却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宣传《共产党宣言》，广大读者通过这个信息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已经面世了。

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健华，因反对康有为改名自由。广东南海人，生于日本。1895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为年龄最小的会员。1900年入早稻田大学。次年创办《国民报》，后担任《中国日报》、《大同日报》记者，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初曾担任孙中山秘书。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冯自由当是国民党中第一个用社会主义对民生主义作详细解读的人。1906年《民报》甫出世一月，他在香港《中国日报》上撰写了《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长文，主张民族、政治、社会革命并行，进行政治革命之时，就应该“把社会主义的施设，如土地国有、交通事业国有（铁路、轮船、电灯、煤气、电车、水道等）、矿产国有、工场国有等事一一实行起来，使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作世界的模范”。[②]继而在《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渊源》中便将民生主义作社会主义（socialism）解。1920年元旦他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在香港《晨报》上开始刊登，1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同年4月社会主义研究所发行单行本，8月再版。



▲冯自由（1882—1958）与《社会主义与中国》封面

《社会主义与中国》是国民党人在五四时期唯一一本专门论述“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专著，全书66页，约5万字，共三章：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之过去及将来，第二章 从社会主义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之宣传方法。该书开卷就对社会主义作出解释，“什么叫做社会主义

① 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30日。
②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8月版，第5页。

Socialism？这就是要拿世界上万般的事事物物，不平的使之平，不公的使之公的意思。譬如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便有贫富贵贱、主人奴隶、贵族平民、资本家劳动者等等阶级，都是很不平的。社会主义就要铲除这些不平的阶级使之平。又如世上生产机关（今译为生产资料，土地、矿产、机械、工厂等类）生产品物生产利益的种种私有事业都是很不公的。社会主义就要使之一切归诸公有。”①

冯自由回顾了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早期流传的情况，对无政府主义、江亢虎的社会党一一点评，指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最老的社会党，最先提倡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别名，因此中国政治团体中首先拿社会主义做党纲的是中国同盟会。②欧战结束后，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③因为：首先，日本受欧战的影响，劳动界受资本家的压制日甚一日，知识界主张社会主义者日见其多，宣传社会主义书籍已是不少，“我国主张社会主义者得许多日本文译本为生力军，便也发刊各种书报，尽力宣传这种主义。知识界的人藉得知世界最近的新文化，渐渐有了多少的觉悟，赞成者日日加多。这是我国人近来趋向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因。”④其次，俄国革命成功，德奥匈等国革命受其影响而起，造成布尔什维克影响日大。再次，欧战后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进步，真是一日千里。“这种新潮流乘了战胜中欧大帝国的气势，横冲直撞，无坚不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点的知识分子极力主张，新潮流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⑤最后，五四运动后，国民跟着大学生走，对社会主义信仰与昔日相比“真是天渊相隔了”。⑥

中国的出路何在？冯氏答道：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彰显的是人道正义。中国要进步就只有走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有人说，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讲社会主义的必要。冯氏解释道：“本来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到像欧美各国资本专制的田地，为什么我们偏要在资本主义未发生以前实行

①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8月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④ 同上书，第11—12页。
⑤ 同上书，第14页。
⑥ 同上书，第15页。

社会主义呢？这就是未雨绸缪的意思。因为我们鉴于近时欧美各国劳动界所受资本专制的痛苦，及政府对付富豪跋扈和工人无告的困难，真有积重难返的苦处，所以不能不先替我国人打算，预先设法把未来的大灾害除了，以免生出像欧美同样的大资本主义。”①有人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阶段，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的第二级（平民与贵族争），怎能超越而跳到第三级（劳动者与资本家争）呢？冯氏用马克思发布《共产党宣言》时，德国资本主义制度还很幼稚，但德国社会党还是战胜了德皇；俄国的资本制度至今还是很幼稚，俄国 1905 年革命还是平民与贵族斗争，最后俄国还是被布尔什维克所征服作例子，说明中国也是可以跳跃到第三级的。他对俄国革命持欢迎的立场，欢呼俄国是最先创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遂有光芒万丈的色彩”。②

冯自由与孙中山取同一立场，将社会主义主要分为集产主义（Collectivism）和共产主义（Communism），集产派是主张阶级斗争为改造社会主要手段的马克思派；共产派是强调个人自由互助为共同生活基础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派，“一个是经济理想，一个是道德理想”。③这两大派的主张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手段不同，“我们应该拿着两种理由合一炉而共冶，才能够适于然［世］界的趋势。不但是中国将来必然要经过这两层的阶级［段］，就是世界各国也是势所必世，理所必至。”④同时，他对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深以为然。⑤


▲陈炯明（1878—1933）
（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提供）

陈炯明（1878—1933）原名捷，字竞存，别号陆安。广东海丰县人。1909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历任广东代理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广州军政府陆军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他是当时督军中，以及国民党内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感兴趣的军人，

①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 1920 年 8 月版，第 16 页。
② 同上书，第 16 页。
③ 同上书，第 49 页。
④ 同上书，第 26 页。
⑤ 同上书，第 24 页。

因而显得十分亮眼。

1919 年底至次年初他创办《闽星》半周刊和日刊。何以要办这两个报刊呢？这在他撰写的《闽星》发刊词中表述得很清楚，世界要进化（进步），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改造起。因此“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①]《闽星》曾以较大的篇幅热情地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陈氏要建设的新生活、新社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主张要“建立一个崭新之社会主义中国”。[②]1920 年 5 月 8 日，他致电列宁，热情称颂俄国革命：“现在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用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来消灭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建立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础上的新的俄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时代。”“我更相信，布尔什维克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③]

陈炯明还将他的“社会主义”在家乡实施，一时有媒体称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④]俄共（布）远东局东方部主任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更是称赞漳州是“中国革命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圣地”。[⑤]

陈炯明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的混合物，其中无政府主义倾向十分突出，他希冀建立一个博爱、自由、平等、互助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这也是他日后向右转，与苏俄、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思想基础。

二、主要传播媒体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政党，几乎所有与该党有关的媒体都或多或少宣传过社会主义，他们的宣传又全是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来诠

---

① 陈炯明:《发刊词》,《闽星》第 1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② 段云章等编:《陈炯明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0 页。

③ 同上书，第 457 页。

④ 《游漳见闻记》,《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 14 号。

⑤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28 页。

释社会主义的。

《民报》1905年11月创刊，第26号（1910年2月）停刊，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以宣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宗旨。在孙中山的眼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他的这个思想主导下，《民报》成为革命党人最早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民报》




發刊詞
孫文



▲《民报》封面

刊登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小）传》，对德国社会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拉萨尔的生平及主要理论著作或理论观点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介绍。在该文中，朱执信对《共产党宣言》的摘译，被认为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最早译文。5月，《民报》第4号刊载“巡耕”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一文，也专门谈到马克思学说。6月第5号上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在批驳一些妄议社会主义之人的“凶秽之词”时，告诉世人，马克思主义“世称科学社会主义”。同一号上刊载的“犟斋”（笔者注：即宋教仁）编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对马克思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在述论中，《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被译为“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今译文：“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卷第66页）“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文章在介绍第二国际的一些重要代表大会时，多次提到马克思及其主张。文章最后，编者说“万国社会主义进行之势方兴未已”。8月第七号上载有渊实（笔者注：即廖仲恺）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文中

对基督教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进行了区分。叶夏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十项纲领进行了介绍。这些文章为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基本常识。

革命党人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与主张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派进行论战，其中要不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成为争论之一，针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主张君主立宪的论调，革命党人进行了批驳。

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在日本人那里便是将"socialism"翻译成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欧美社会党的主张，在近世社会主义之"狂涛更骎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东亚大陆"。[①] 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是"以纠正贫富不均而图最大多数之幸福"的学说。[②]

第二，革命党人指出，社会主义不仅是世界之潮流，而且在中国已经具有数千年之历史，标志就是井田制度，实行公田。在他们看来，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革命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立宪主张保护土地私有，就是维护封建贵族、富豪地主辈之专制，违背了中国多数人之幸福。他们承认中国现代经济还在幼稚时代，现在紧迫的任务是实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共和的政治革命，但西方共和政治无形被托辣斯（垄断）毒害了大多数人民之幸福，为中国避免蹈复欧美共和政治的覆辙，预防中国人民"更受资本家之残害"之良法，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③]

第三，革命党人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救济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他们指出民生主义的内容十分丰富，最根本的就是主张影响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归国有。其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人类居住所必需，关于人类之生存殆无有重于土地者"。[④]"土地问题决为社会问题之源，而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即为不能知欧美社会受病之源"，[⑤] 因此欲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先解决土地问题，此是所谓预防中国避免蹈复欧美今日之"穷境"[⑥] 之良策。"土地国

①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99页。
② 同上，第100页。
③ 同上，第107页。
④ 同上，第111页。
⑤ 天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1907年3月第12号。
⑥ 同上。

有，即平均地权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森林、矿山及交通机关等应为国有”。[1] 土地国有并不是强占，牺牲少数人之私利而化为大多数人之公益，不是“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2] 而是用单税法收买私人土地，这是尽善尽美之税法，“调合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也，维持财产之增殖力也”。[3]

中国同盟会主张的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发展到五四时期，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只是加上了对苏俄革命的欢迎态度。他们社会革命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核对地价的方式收买私人土地，实现“富者愈富，贫者亦富”[4] 的均富，“无有不平之阶级”的社会。这个愿望虽然是美好的，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5]

《建设》1919年8月创办，月刊。初为中华革命党的理论刊物，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后，即为国民党的刊物。总编辑胡汉民，编辑及撰稿人朱执信、戴季陶、汪精卫、廖仲恺、林云陔等，设有论说、纪事、杂录、通讯等栏目。1920年12月停刊，共出3卷13号。孙中山特意在创刊号上写了《发刊词》，表达了革命党发行此刊的目的：中华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6]



▲《建设》创刊号，1919年8月

①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14页。

②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1906年2月第75号。

③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第119页。

④ 天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

⑤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⑥ 孙中山：《发刊词》，《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建设》的主旨是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量的篇幅刊登的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

孙氏的建设思想，不仅是实业，还包括思潮，所谓建设思潮包括社会主义，特别是十月革命后，他和他的同志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因而《建设》成了五四时期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据笔者粗略统计，《建设》刊载各类文章 110 多篇，其中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 33 篇，约占文章总数的 30%。详情请见表 5—1—1。

表5—1—1　《建设》刊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篇目表

作　者	题　　目	卷　号	时　间
胡汉民	孟子与社会主义	1：1	1919 年 8 月
戴季陶	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	1：2	1919 年 9 月
胡汉民	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	1：3．4	1919 年 10 月 11 日
戴传贤	革命！何故？为何？	1：3	1919 年 10 月
戴传贤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考茨基著）	1：4、5、6，2：1、2、3、5，3：1	1919 年 8 月—1920 年 12 月
胡汉民	致杨肇彝 1919 年 9 月 25 日	1：4	1919 年 11 月
胡汉民	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1：5	1919 年 12 月
李人杰	改造要全部改造	1：6	1920 年 1 月
胡汉民	阶级与道德学说	1：6	1920 年 1 月
林云陔	社会主义国家之建设概略	2：1	1920 年 2 月
廖仲恺 *	致胡适之 1919 年 12 月 19 日	2：1	同上
胡汉民 *	致胡适之 1920 年 1 月 14 日	2：1	同上
戴季陶	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 1920 年 1 月 13 日	2：1	同上
戴季陶	世界战争与中国	2：1	同上
林云陔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之现形	2：2	1920 年 3 月

（续表）

作　者	题　　目	卷　号	时　间
朱执信 *	致胡适之 1920 年 2 月 1 日	2：2	同上
季　陶	劳动者解放运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交点	2：2	同上
执　信	他山之石　匈俄苏域政府的兵	2：2	同上
森户辰男著 树德译	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潮之研究	2：3	1920 年 4 月
林云陔	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潮	2：3	同上
林云陔	近代社会主义进行之动机	2：4	1920 年 5 月
李大钊	“五一” May Day 运动史	2：4	同上
胡汉民	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	2：4	同上
罗利亚著 汉俊译	道德底经济的基础（上、下）	2：4、5	1920 年 5 月、6 月
林云陔	劳力与资本制之关系	2：5	1920 年 6 月
朱执信	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上、下）	2：5、6，3：1	1920 年 7 月、8 月、12 月
林云陔	阶级斗争之研究	2：6	1920 年 8 月
胡汉民	考茨基底伦理观察与罗利亚底伦理观	2：6	同上
河上肇著 苏中译	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	2：6	同上
季　陶	到湖州后的感想	2：6	同上
季　陶	几德氏政治经济学的批评	3：1	1920 年 12 月
徐苏中译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3：1	同上
云　陔	俄国劳动法规	3：1	同上

* 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致胡适的信是用唯物史观与胡氏讨论古代井田制。



▲《闽星》创刊号，1919年12月

《闽星》 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办的半周刊。1919年12月1日创刊，3个月后停刊。杂志社在1920年1月1日又创办《闽星日刊》，总发行所在福建漳州新闽学书局，负责人梁冰弦、刘石心等。两刊的宗旨基本相同，均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文字纯用白话，注重批评的精神。《闽星日刊》"内容多载世界要闻、地方要闻。至于时局问题、地方政俗，当以诚恳态度悉心批评，期尽指导人群默化社会之责。而《闽星》半周刊……凡讨论学理、介绍学说之长文属之。以与日刊相辅而行。"[①]《闽星》半周刊题材随文分类，每月一册，计12万字。《建设》第1卷第6号刊登广告称该刊"是福建的明星！""是社会的福音！"《星期评论》称赞《闽星》"不用说是旗帜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机关了"。"这种旗帜鲜明，意志坚定的主张，和我们《星期评论》的主张，是一个样子。"希望《闽星》的同志，"全体一致的为这个工作努力，使这一颗很光亮的明星，越照越光明，越照越远大"。[②]

《闽星》宣传新文化运动，刊登了陈秋霖的宣传新文学的文章《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的价值》，翻译了日文《日本之中国新文化运动观》等文章。《闽星》对苏俄革命与建设抱以极大的热情，分十次连载《现代俄罗斯的研究》，分5次刊登了《俄罗斯宪法评释》，正面介绍了苏俄情况。赞扬十月革命的"红革命是世界的改造，所以灼灼的红光照耀着全个地球，汩汩的红潮分奔向五洲各处"。[③]布尔什维克党不是过激党，不是"暴民党"，不是"无政府党"，它是马克思学说传来的革命党，唯一的信条是"惟工主义"。"什么是'惟工主义'呢？简单说来就是：惟有亲身工作之人得享生存幸福。……凡不是亲身工作，安坐以消耗他人劳力而得之生产物那一辈人，应剥夺其权利。""惟工主义一旦实施，则世界里头没一个不从事工作，没一个不享受相当的生存幸福，再没有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劳力而掠夺于人之人蠹。方今人类不平，旧社会之不公道不正当，全因为不能真正平等真正

① 《闽星报社启事》，《闽星》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22日。
② 《欢迎〈闽星〉》，《星期评论》第28期，1919年12月14日。
③ 两极：《红潮滚过大西洋了》，《闽星》第2卷第8号，1920年1月26日。

自由，也正因为不是尽人为工，于是有富贵贫贱的区别，惟工主义就是救正偏弊的神物。”[①]《闽星》还用7期刊登了考茨基宣传唯物史观的《伦理与唯物的历史观》以及国际劳工运动方面的文章。

《闽星》宣传的社会主义是庞杂的，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等，正如戴季陶批评《闽星》主要笔杆子陈秋霖那样，“他好像是把苦鲁泡特金、脱尔斯泰、马克斯、拉斯金的书，笼笼统统的所说的读过一些，唯物唯心兼收并蓄的。”[②]

《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节　主要内容介绍

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比中国共产党人早，其内容与早期共产党人的传播有重叠之处，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们的宣传在客观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汇合，造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声势，使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新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强势文化。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介绍

国民党人士很早就开始介绍国际共运领袖的生平，从而使中国人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朱执信1906年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世背景、主要革命经历与理论贡献。“马尔克者，名卡尔（Karl），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Trier）。父为辩护士，竺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后从事日报之业，为主笔，“始读社会主义之书而悦之。其所为文，奇肆酣畅，风云一时，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后因“触政治忌”而被迫到了巴黎。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Friedrich Engels）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

① 两极：《世界最新之两大组织》，《闽星》第1卷第3号、第4号，1919年12月8日、11日。
② 《戴季陶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1920年1月13日，《建设》第2卷第1号，1920年2月。

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今译比利时）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今译共产主义者同盟）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今译《共产党宣言》)。"《列传》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先进国家"都可以采取的十大措施之后，写道：《共产党宣言》在法国二月革命之前14日出版，"既颁布，家户诵之，而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时际法国革命"，所以马克思去法国巴黎而受到礼遇。德国民众起来革命后，马克思"寻归柏林，创报名《新来因日报》，声振一时，且斥普王之无道而赞议会之租税拒否，益逢政府之怒。一八四九年五月，复禁其发刊而放其主笔。其明年，复大索社会党，悉放囚之。马尔克既放，乃适英，卜居焉。与嫣及尔偕，终其身不复归柏林。""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马尔克卒于伦敦。后数年，嫣及尔亦卒。"[①] 此前我国虽然已有对马恩的简介，但《列传》却是最早、最详细的马克思、恩格斯小传。

朱执信在列传里，还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称颂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突出唯物史观，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计划生产和对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等内容概括为《共产党宣言》的"大要"。[②] 朱执信将《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并着重指出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地位："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③]

朱执信还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作了区别。他说："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未可得蕲至也。是亦社会革命家自为计未审之

①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6年1月。
② 同上。
③ 同上。

过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①] 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行，如何区别成了革命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朱执信作出区别，指出学派有异同，学说有变迁沿革，“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②] 他还称赞日本人室伏高信的《社会主义批判》“于明了各派之纲领异同一点，确为有益之书”。[③] 这本书详细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产业管理主义、工会社会主义、劳动组合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七种主义之异同。[④]

1920 年 1 月，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斯传》是国民党人士继《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后的另一份重要马克思传记，其影响远远大于列传。首先，刊发《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的《民报》是在日本发行的刊物，读者面有限。《马克斯传》刊登在国内发行量很大的《星期评论》1920 年新年号上，又被《马克思纪念册》收入，读者面广。其次，《马克斯传》的作者是马克思的战友、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马克斯传》不仅史料翔实，而且将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作了精确的评述，其内容比《列传》要丰富得多。再次，《马克斯传》用白话文，稍有文化者便能阅读，比文言文撰写的《列传》更方便于读者。最后，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渐进高潮之际，《马克斯传》很自然地吸引了许多激进青年的眼球。

戴季陶的译文万余字，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还作了 7 处约 1400 余字的详细注释，向读者提供了传记中相关事件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同期《星期评论》还刊有《马克斯逸话一节》，开篇即说：“十九世纪后半的大思想家大革命主义者马克斯的生平事迹，我们从季陶君所译的里布列希所著《马克斯传》里，可以认识一个大体。”[⑤] 接着写了读后感：“我们读马克斯传所感触到的，第一就是他那‘献身的精神’……我以为我们从马克斯可以学得的，决不仅是他那精密的‘价值说’，透彻的‘剩余价值说’，也不仅是能够学得他那独创的‘唯物史观’，和惊世骇俗的‘阶级斗争说’。我们

①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 2 号，1906 年 1 月。

② 县解：《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 5 号，1906 年 6 月。

③ 同上。

④ 《寄赠书籍》，《建设》第 2 卷第 2 号，1920 年 4 月 1 日。

⑤ TTS：《马克思逸话一节》，《星期评论》1920 年新年号第二张。

最应该学、最容易学、而又最难得学到的，就是他那‘由献身的精神显出的伟大人格’。”[①]《逸话》与《马克思传》相得益彰，将它们同时发表，体现出《星期评论》编者的独具匠心。戴氏翻译的《马克斯传》后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收入中国共产党编辑的《纪念马克思册》中，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1922年5月5日）散发了2万本。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报告中特意将其作为党的一项工作加以报告。

二、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特别受到国民党人的青睐，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多次公开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如戴季陶在致陈炯明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说："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②]胡汉民说唯物史观是个"精深伟大的思想"，"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③]国民党人士传播唯物史观有其自身的政治考量，角度亦与我国第一代共产党人有所不同。就内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含义及基本内容。什么是唯物史观？胡汉民解释说："唯物史观的意义，简单说，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此立经济一元论的历史观。所以，创设这个学说的名誉，究竟归于马克斯和他友人因格斯。"[④]为了"要探得马克斯唯物史观的要领"，[⑤]胡汉民花了很大的工夫阅读了马恩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主要段落，以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整、周密地表述唯物史观原理的几段话后，指出："以上所译述，最重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斯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斯自称是他多年

---

① TTS:《马克思逸话一节》，《星期评论》1920年新年号第二张。
② 《戴季陶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1920年1月13日，《建设》第2卷第1号，1920年2月。
③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④ 同上。
⑤ 同上。

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指导线。信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①]

戴季陶有相同的认识：世界“‘并不是以精神决定社会生活，是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个综括的概念，是经济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所教训我们的。”[②] 国民党人对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较为简练的概括。唯物史观如何描述社会历史现象？胡汉民在《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③] 中进行了具体的论述：“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的物质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么它与唯物史观是什么关系呢？这方面国民党人通过译文《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④] 作了回答。该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底理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三章综合而成。这两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清楚地阐释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唯物史观的那个做出发点底命题，是些什么物事？就是生产及生产物底交换，为一切社会秩序底基础那号事。此外又有在历史上表现的各社会，是什么东西，怎么样生产，生产了的东西，又怎么样交换，生产品底分配，与那社会相应，那排向阶级或分限底社会的序列（Soziale gliederung），也与此相应而定那号事。从这样看来，一切历史的变动及政治的变革底最后原因，不要向人底脑袋里，详细的说，就是不要在对于永久真理及正义的人间底递增的慧眼里边去来，不如向生产及交换方法底变动里边去来；那个东西，不是哲学里边可求得到的，是应该在时代底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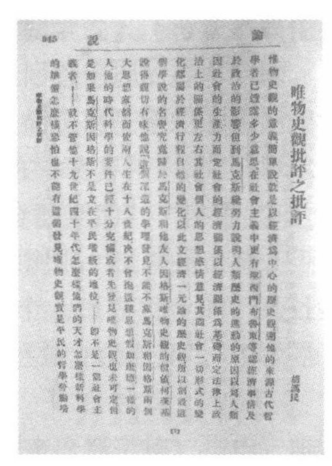
①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 1 卷第 5 号，1919 年 12 月。
② 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建设》第 2 卷第 6 号，1920 年 7 月。
③ 《建设》第 1 卷第 3 号，1919 年 10 月。
④ 《建设》第 3 卷第 1 号，1920 年 12 月。

济里边才求得到的。”（今译文：“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84页）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无产者的革命，解决矛盾，无产者团握取公权，便由这个权力把脱离了有产者团的，社会的生产手段，完全移归公有的所有权。”“成就这解放世界底事业，是近代无产者团底历史的使命。探究解放世界事业底历史的条件，及他底性质本身，又使那被召来打仗，今天还被人压着的阶级，十分觉悟他们自家打仗底条件和性质，那是无产者运动所表现于理论的那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底职分。”（今分别译为：“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6—567页）此前尽管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引用过其中的观点，但像这样直接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三部分，在我国尚属首次，[①] 为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材料。

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唯物史观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难，国民党人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方式为之进行辩驳。如前所述，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就是一篇专门批驳当时非难唯物史观的文章。虽然胡汉

①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1920年1月5日至8日刊登了衡石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即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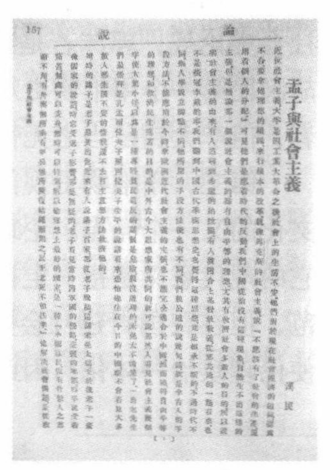
民所批驳的对象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在国内并不具有针对性，但他所表明的赞同唯物史观的态度却是十分清楚和坚定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加详细，并弥补了它的不足，故有学者指出“胡汉民的文章，有破有立，旁征博引，反映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确有较深入的了解，代表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①


論說

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

▲ 1919 年 12 月《建设》第 1 卷第 5 号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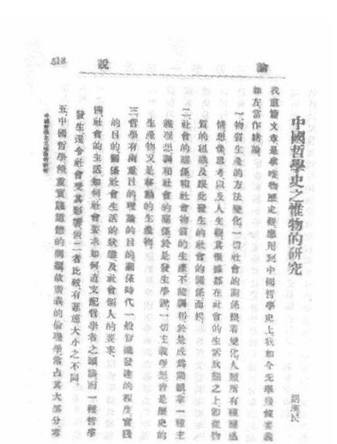
第二，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这是国民党人士宣传唯物史观的目的之一，也是最亮丽的地方。可以说胡汉民是五四时期用唯物史观解剖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人。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 10 号上发表的《随便谈》披露了这点。1919 年 8 月 15 日，胡汉民对戴季陶说自己打算做个“胆大的工作”，戴季陶问是什么工作呢？胡汉民答：“我以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什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你看中国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变迁，岂不是要算井田制的破坏吗？因为这一土地均享的制度破坏，于是一切社会组织国家组织的根底完全动摇。结果遂发生出一个全体的生活根本大动摇来，所以就有周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发生，后来一切思想的萌芽差不多在这个时代。当时种种政治上的专横、社会上的压迫，都是由经济组织的根本变易而生的。所以我想大胆的把从古代到现在中国经济组织的变迁和思想的变迁，合在一起来研究。现在先把大要的历史观写了出来，你说怎么样？”戴季陶说：“我听见这个话，欢喜得了不得，很希望这个‘中国史之唯物的研究’能够得一般学问家的注意和协作，便


論說

孟子與社會主義

▲ 1919 年 8 月《建设》第 1 卷第 1 号发表《孟子与社会主义》

① 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7 页。


論 說

中國哲學史之惟物的研究

胡漢民

▲ 1919 年 10 月《建设》第 1 卷第 3 号发表《中国哲学之唯物的研究》

是思想大解放了。”①

1919 年 8 月，胡汉民在《建设》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就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他用唯物史观来剖析周朝的社会，对孔子、孟子、井田制等作了全新的解释。10 月他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② 开头就说“我这篇文章，是唯物历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他强调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随着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他用这个主线来解释我国的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 年 2 月）持完全不同的研究视野，所得出的论点亦不相同。2 个月后，李大钊相继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与《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唯物史观分析我国古代社会、道德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等。所以有学者提出胡汉民的《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笔者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开端）是有一定道理的。③ 由此看来，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郭沫若是我国无产阶级史学拓荒者的传统定位需要重新审视。胡汉民第一个用唯物史观剖析古代社会，还不能说他是无产阶级史学的拓荒者，但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史学开拓者。

第三，用唯物史观剖析伦理，是国民党人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分析中国文化的又一个亮点。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伦理按照它的现代意义是指一定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但在我国封建社会则将完善的人格品质与“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使伦理政治一体化，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也叫伦理政治型社会。戴季陶、胡汉

① 季陶：《随便谈》，《星期评论》第 11 号，1919 年 8 月 17 日。

② 《建设》第 1 卷第 3 号，1919 年 10 月。

③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5 页；冯天瑜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认为胡汉民的《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为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哲学之生存与发展的开篇之作”。

民写了《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阶级与道德学说》、《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等文章，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回答伦理的基本问题。

首先，给道德以科学定位。道德的定义是什么，胡汉民从道德的原始起源出发来探索，“人类的道德，许多要素，都是从人在动物界带来的”。原始人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生存时，就很自然的产生了“合群互助”、“协力共动”的社会习惯，渐渐这个习惯就成了先民们共同遵守的规则，也就是道德。因此“道德这个本身不是天生的，是人为的；不是由个人孤立发生的，是社会关系发生的”，所以将道德说成是“天生神授，超然独立的东西”，说成是“个人道德心先社会而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①]

胡汉民直接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诠释道德，指出：唯物史观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②]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与宗教、思想等均是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凡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的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的关系，随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人类社会的生活倒可以决定人的意识”，[③]因此作为社会本能的道德，到阶级社会就成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它和宗教、思想、舆论等一样，成为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武器。作为社会产物的道德因社会的重大变化而发生重大之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行为规范。旧道德一旦被统治者所控制，道德就“不是社会进步底要素，却化为保守底要素，为进步底障碍。”[④]道德体现了统治者的利益，不仅带有强制性，而且还被统治者利用政权的力量来维持它。

其次，深刻揭露旧道德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武器。“一时代底支配思想，常只是支配阶级底思想”。[⑤]（引者注：此句来自《共产党宣言》，今译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国民党人

---

① 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

② 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③ 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号。

④ 胡汉民：《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⑤ 同上。

士看到了道德的反作用，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是指向人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维持政治秩序的工具。统治者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动用了各种“强制力”，包括“优秀的武力及经济力，用优秀的组织力，更用优秀的智力。”① 这里所说的智力，就是上层建筑，包括思想、舆论、宗教、道德等，因此智力是有阶级性的，一阶级底智力不能对于别一阶级发生效力，他们是统治者压制被治者的“武器”。②

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些思想家的思想被统治者利用，如“罗马旧教把亚理士多德的学说采为正宗哲学，便一成不变了”。又如中国封建社会将孔子创立的“儒家的祖述”2000多年相继到今。③ 胡汉民指出罗马旧教是本着哲学为神学之奴婢的宗旨，注重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贤人的理想同神的道德，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是永恒存在、伦理是人类社会的，不是超自然的神授等思想则与旧教截然不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们学说本身也有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价值，“要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没有希腊贵族式的政治论，自然不会给旧教会利用；儒教若不是以天尊地卑的思想，演［绎］那家长制度的伦理，也不会被汉以后专制君主利用。”④ 在五四时期整个社会充满了反孔绝对化的气氛下，这个看法显然受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启示，体现出理性的光辉。

统治阶级利用道德也是随着统治需要在不断变化，“孔子的学说，自汉以来，加上宗教的色彩，历代的专制君主，都赋予他以莫大的教权，既有祭典尊号的仪式，又有博士科举的诱劝”。“宋明的程朱陆王，其哲学思想，参杂佛老，无可讳言，但必定争着认为孔教的嫡派”。“朱子的学说，自洪武初奉旨立在学宫，制艺取士并依他为正宗以后，便隐然有第二孔子的势力。可知儒教二千年相续的缘故，却是这种势力，都不是学说本身得来的，是强有力者阶级给过他的。”⑤

以“孝慈”为核心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因此随着农业自给经济

① 胡汉民：《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② 同上。
③ 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
④ 同上。
⑤ 同上。

制度的动摇，封建道德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在封建时代，宗教是强制道德的机关，到资本主义时代，表面上看，劳动者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宗教势力减少了，但资产阶级却继续将宗教、教会当成维护资本私有制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制度将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本能给掩没了，道德也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胡汉民指出：道德还有调和统治者与被治者的矛盾，组成和谐社会和约束统治者行为的功能，但这一切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剥削者的长久统治。

最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德。国民党人士认识到造成道德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因此他们在主张破坏旧道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同时，提出了建设新道德的要求。劳动阶级在用强力[①]颠覆旧制度时，道德成为强力进化的“接生者”[②]（今译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1页）。建设新道德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新社会制度和新的经济关系。“被压制被掠夺底阶级渐有取旧日支配阶级而代之底时候，便也是新道德理想要战胜旧道德底时候。一切精神生活底世界，不外乎现实世界底反射，更见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决定人类底意识’底话，精确不错。”[③]

那么新道德的内容是什么呢？戴季陶提出了“仁爱”，包括共作：分工的协作；共养：老幼；共济：废疾死亡；共爱：性的自由；共乐：美术及运动；共治：全生产的分配。所谓“老全社会的老”，就是合全社会的力量养全社会的父母。“幼全社会的幼”，就是要友爱全社会的弟兄。“我们不要束缚性能，要破除性的阶级和人格独占。我们不是要侵夺他人或被他人侵夺，是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们不是要在天惠的地面海洋空间，设定人为的障壁，是要撤废一切在自然的区域上的人为障壁。”[④]

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它与国民党人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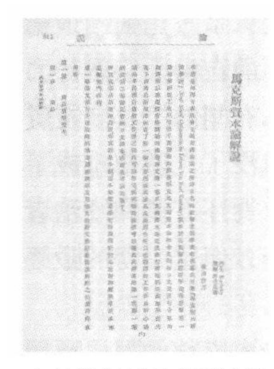
---

① 在翻译马克思相关著作时，对照现在的译文，“强力”译成暴力。“进化”一词在五四时期用的概率很高，意思要视语境不同而不同，分别含有“进步”、“发展”、“革命”等意思。

② 胡汉民：《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③ 同上。

④ 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


馬克斯資本論解說

▲ 1919 年 12 月《建设》第 1 卷第 5 号开始发表戴季陶等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

时所关注的社会经济生活（民生）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所以他们积极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最显著的成果是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李汉俊等人翻译考茨基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笔者注：原名《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戴氏的译本底本是高畠素之的同名日译本)，《建设》用 6 期刊登，并于 1927 年由民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共 308 页。戴氏还写了很多文章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第一，比较详细地介绍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这一理论的创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以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为起点、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介绍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的。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对《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重点介绍："马尔克以为：资本家，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①] 自机械产生之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成倍增加，但他们所得的"庸钱"(引者注：即工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每天工作 12 小时，6 小时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作为"庸钱"，另外 6 小时创造的价值则被资本家"干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引者注：即股东)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②] 当今之"资本家益恣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巨万。为细析其资本之所由来，恐自贮蓄者乃无纤毫也。而其岁入则大半为赢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③] 这是革命党人对剩余价值的最初认识，到五四时期，戴季陶等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以下简称《解说》)，就非常详尽、通俗地解释了剩余价值理论。《解说》对商品、价格、货币等基本经济现象一一分析，重点讲解剩余价值。一切资本的运动，是从货币的形式为起点的，《解说》运用货（币额）- 商（品）-（货 + [货]）公式，说明工人除创造劳动力的价值外，还创造出剩余劳动价值。所谓利润、利息、地租等"都是这剩余价值

①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 2 号，1906 年 1 月。
② 同上。
③ 同上。

的显现态”(引者注：今解释为“利润、利息、地租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不可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显现态混为一物”。① 剩余价值不会在物物交换中产生，只能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体现，也就是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那么剩余价值的源泉究竟在那里呢?剩余价值不能够从买和卖中产生出来，商品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根源与尺度，但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分解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产生了劳动价值的总量，资本家掠夺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资本家是贪婪的，它想方设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如果将必要劳动由6小时缩短到4小时，剩余价值率便增加了一倍，从100%增到200%。资本家又通过生产工具的革命，减少工资等手段，使剩余价值更大化，疯狂地掠夺劳动者。劳动者渐渐明白了资本家剥削他们的秘密，就会觉醒，于是劳动运动便出现，劳动者与资本家制度作斗争，“作全球与自然力的支配者”。② 林云陔在《建设》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劳力与资本制之关系》，还驳斥了资本来自节俭的观点。

第二，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存在的根源，还向人们提供了革除这些弊端的思想武器。国民党人虽然认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但他们并不想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给社会进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而是力图找到一种既可以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的现代生产发达，又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其理论的缜密和深邃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朱执信就这样说过，“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 ③ 戴季陶在他的经济讲演提纲《经济之历史的发展》中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关于推求经济进化的原理，说明各时代一切社会现象的因果，分析进化过程的内容，指示社会改革的途径，最精微的还是要算加尔·马克斯(Karl Marx)。他关于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几个问题的学说，实在是近代

① 考茨基著，戴季陶等译:《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二),《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② 同上。
③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6年1月。

经济学上的极大功绩。”[①]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戴季陶恐怕是这方面最早的人士之一，[②]他在《现代社会上的自由》（1919年11月30日）、《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1920年2月1日）等文章中，就运用剩余价值计算法，剖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他搜集了1914年、1917年上海棉纱红利的数据，揭露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额一定是有加无减的，他们无限膨胀的利益是因为“货价销路增加而工银不增加，一般的生产费比例缩小而工作时间不缩小”而获得的，所以资本家的纯利润“就可以蒸蒸日上”。[③]他在《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④]中阐释了资本、资本家的区别，指出“我们中国现在确是缺乏资本，但是我们中国所缺乏的，却并不是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虽然资本额很小，但他们和世界的资本家一样为社会制造罪恶。

“剩余价值”一词在戴氏的论述中使用频率较高，在讲到资本家的“职能”时提到了剩余价值：“资本家是要管理劳动者、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⑤]“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来做什么？来养资本家”。[⑥]在讲到资本家生产制是最浪费的制度时提到了剩余价值。他说，浪费的根源，为主的就是在自由竞争这一点。他举了广告的浪费情况，说很重要的生产能力浪费到无价值的地方去了。而资本家一面剥削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填补他们的浪费，一面又把他们的浪费转嫁于消费者。在分析湖州的生产力水平时，他指出：“近代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剩余价值，在湖州是没有的。就工场组织看，湖州的工场还是十七八世纪欧洲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生产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完全不同。”[⑦]朱执信在《野心家与劳动阶级》一文中说：“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是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笔者注：

---

① 季陶：《经济之历史的发展》，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1日。

② 李汉俊在《星期评论》1920年劳动纪念号上发表的《强盗阶级底成立》亦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剖析中国社会。

③ 季陶：《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星期评论》第35号，1920年2月1日。

④ 《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

⑤ 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⑥ 同上。

⑦ 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7月1日。

朱文中用的是这个词）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现在中国虽然没有雄厚的资本家，这小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的手段，要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①] 所以他明确表态不做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假使吾为工场主，吾必不能效马克斯所谓余剩价值掠夺之行为，至少须学德国赛斯工场之组织，以绝资本主义之形迹。”[②]

戴季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态进行了描述：“在现代资本家的经济组织下面，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是一种人，做生产的工作的人又另外是一种人。”“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官公吏学校教师兵士等一切月薪生活者与雇佣者皆在同样式的生活里面——都是以一个自由人相对立。所不同的只是一方面是有资本的自由人，一方面是无产的自由人。”[③] 什么是“自由人”？他说“近来我读考茨基的《马克斯经济学说》，看见他上面有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了解现代自由的意义。”[④] 他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自由”状态的描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劳动者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他们所有的就是只有拥有自由劳动力的自由。“离开了生产机关的劳动者——不能占有土地和一切工具、原料品建筑物，而专赖工银为生活的农工业劳动者——在这个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工银制度为基础的‘商业的世界经济组织’下面，一方面是完成了‘经济的自由人’的地位，同时就沉沦到最低的社会阶级里面去了。”[⑤] “他有什么？他只有制造工具，和应用工具制造物品的两只手，和潜伏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劳动力’！”“这真是自由的极致了”。[⑥] 正因为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很高的评价，所以他们的文章里会明显地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认同。

四、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部分国民党人涉及较多的方面。他们着力介绍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观

① 朱执信：《野心家与劳动阶级》，《建设》第2卷第2号，1920年3月。
② 执信：《复一心社函》，《建设》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
③ 季陶：《旧伦理的崩坏与新伦理的建设》（二），《星期评论》第25号，1919年11月23日。
④ 季陶：《现代社会上的自由》，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30日。
⑤ 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1920年5月1日。
⑥ 同上。

点，承认阶级的客观存在，批驳一些人对阶级斗争学说的非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

第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李大钊曾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马克思主义由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国民党人一样看到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朱执信早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就明确告诉人们，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同于其他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并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专门摘取出来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①]

林云陔指出：阶级斗争“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谓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称谓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此之原理，即近代社会主义之最要原理，亦最有研究之价值者也。”[②]他还翻译了恩格斯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德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不论何时代，社会机关无不依其时之经济状况与经济变迁而成立。自经过原始社会之后，历史中无不有役人者与被役者、治人者与被治者之互相斗争。此阶级斗争之历史，已成为一种进化之程序。今之时期，一般普通工人对于受中流社会之压迫，无不思乘时而解其束缚，故不免有阶级之斗争。”[③]（今译文：“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



▲林云陔（1883—1948）

①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6年1月。
② 林云陔：《阶级争斗之研究》，《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③ 同上。

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第二，解读阶级斗争基本原理。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呢？国民党人依据唯物史观作了这样的分析：“人类社会由分业的差异和生活物资的余剩，渐渐于一个社会内发生不平等的现象。其初区别甚微，日久便成有阶级的趋势。”①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朱执信解释：“阶级斗争，不是可以专由煽动而起的。”“阶级斗争，成不成问题，是看资本家取得余剩价值多少，和劳动者生活工作条件如何。”②戴季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一种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从何处生出来呢？不用说，就是近代产业革命后所发生的资本家生产制的结果。”③

但有的人认为之所以存在阶级斗争，是因为有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得本来可以互助的两大阶级，成了生死冤家，许多调和的方法都归于无用。朱执信、戴季陶、林云陔等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论述才有了阶级斗争，相反，是马克思发现，而不是他创造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一客观现象，他只是将阶级斗争的事实与规律揭示了出来。

朱执信在《新文化的危机》一文中指出：“讲奋斗主义的人，却去反对阶级斗争，这自然因为他的奋斗只向着自然奋斗，不向着人类奋斗，所以不愿意拿阶级来做斗争的对象了。但是除了阶级斗争以外，现在有向自然奋斗么？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手段。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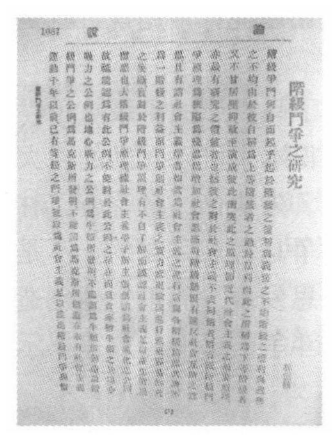
① 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号，1920年1月。

② 朱执信：《野心家与劳动阶级》，《建设》第2卷第2号，1920年3月。

③ 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

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有阶级存在，就要做奋斗的障碍，如果反对阶级斗争，还有什么办法呢？”炸弹手枪、聚众要挟、杀人放火是阶级斗争。用小册子、演说台也是阶级斗争。罢工、罢市、怠业也是阶级斗争。[①]他批驳了阶级斗争是煽动的谬论，“阶级斗争是什么事情，岂有野心家可以无因煽动的道理！”[②]他得出结论说：“社会的运动，以阶级斗争为本据。”[③]

胡适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企图用互助来调和阶级斗争，戴季陶反驳道：“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这更不能倒果为因，说是因为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④]


1037　論　說

階級鬥爭之研究

▲ 1920年8月《建设》第2卷第6号发表《阶级斗争之研究》

五四时期阐述阶级斗争的文章不少，但像林云陔的《阶级斗争之研究》这样的专文却不多见，文章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较全面地诠释了阶级斗争理论，“阶级争斗者起于私有财产之存在，终于私有财产之破灭。当社会主义之进行，人人皆能自食其力，或受社会之供养，无蓄私产之必要，阶级斗争自消灭于无形”。[⑤]他还进一步论析了信仰、思想、感情、精神、伦理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些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随着经济、政治环境所转移，有着阶级性。如在近代工业时代，所谓伦理的标准，雇主认为剥削是正当的，工人则视为极端无理。凡是工人彼此之间表同情，统治

① 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朱执信集》（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0页。
② 朱执信：《野心家与劳动阶级》，《建设》第2卷第2号，1920年3月。
③ 蛰伸（朱执信）：《英国新总选举劳动党之进步》，《民报》第3号，1906年4月。
④ 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
⑤ 林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者必多仇视；资本家多表同情资本家，因为他们有共同利益。工人多表同情工人，“亦以其同等利益也”。[①] 工业与财富之集中，愈趋愈极，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毫无立锥，遂显然划分两个不能相容的阶级。“阶级制度非为社会党制定，乃为经济状况所演成；阶级觉悟，非为社会主义所鼓动，乃为社会主义之先导。”“近代社会主义，即因劳动者之觉悟，而加以知识之诱导”，就可以团结起来，与资本家相抗。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急激的进化。就是比起自然放任的进化过程来，在时间上进行特别快，在空间上范围特别广。”[②] 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劳动者团结组织起来，进而实行运动，夺取政治、经济的“管理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就“无所谓攘夺与被剥二者之事实出见，如此阶级斗争自消灭于无形矣。”[③] 戴季陶的语言则更富有革命性：“阶级斗争，是阶级的社会组织下面不可免的运命”，“要想免去阶级斗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的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④] “现在中国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自然的，无意识的 Evolution，是人为的，有意识的 Revolution。因为中国人今天在世界上如果不图‘急激的进化’，‘在世界文化生活’当中，将要失了存在的地位。”[⑤] 国民党人提出了“大破坏”的思想，不仅大破坏旧的经济体系，还“必须先对于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旧学说，为一度的大破坏，才有建设可言。什么国家、法律、政府、宗教、家族、婚姻等等，都是形成掠夺阶级的要素，非一切破坏从新组织不可的。”[⑥] 他们还用世界眼光指出“全世界各地人民、各种社会，都是互有关系，如果只谋一部分一地方的改造，不谋全世界全人类的改造，就是一部分一地方的改造，也是不能根本解决的。所以我们从事改造运动，要注意在全人类全世界上面。”改造不是局部的改造，而是彻底的改造。[⑦]

---

① 林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建设》第 2 卷第 6 号，1920 年 8 月。
② 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 39 号，1920 年 2 月 29 日。
③ 林云陔：《阶级斗争之研究》，《建设》第 2 卷第 6 号，1920 年 8 月。
④ 季陶：《短评》，《星期评论》第 47 号，1920 年 4 月 25 日。
⑤ 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 39 号，1920 年 2 月 29 日。
⑥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 46 号，1920 年 4 月 18 日。
⑦ 同上。

国民党人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是明确针对有人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而进行的。这种有针对性的阐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国民党人赞同阶级斗争学说。

孙中山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评价比较特别，在宣讲三民主义时，他说："照马克思的观察，阶级战争不是实业革命之后所独有的，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战争史。古时有主人和奴〈隶〉的战争，有地主和农奴的战争，有贵族和平民的战争。简而言之，有种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战争。到了社会革命完全成功，这两个互相战争的阶级才可以一齐消灭。由此便可知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①] 而"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为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可见"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②] 由此，孙氏的结论："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③]

五、鼓吹劳工运动

这是国民党人传播的又一个亮点，主要集中在《星期评论》上。《星期评论》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家公开宣布将劳工运动作为自己办刊主旨的杂志，这点在《〈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一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我们发起《星期评论》是在（1919年）5月中旬，《星期评论》的发刊是6月8日，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6页。
② 同上书，第369页。
③ 同上书，第371页。

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之一，也可以说是六五运动的产物之一。所以说《星期评论》的主旨，就是在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五四、六五两大运动而起的人类运动。"[①]在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刊物刊发启事，说明关于"劳动问题"，"尤其是本志用力的地方。现在同人的研究和批判，望着这一方面，猛力前进。"刊物希望读者踊跃投劳工方面的稿件，为此开出了20条问题供投稿者参考：工业方面：工人与工头的关系，及工头与雇主的关系，工人生活状况及生活费，各工场的资本额，历年的利润额，工人"就业"及"失业"的状况等；农业方面：地主所有地的最大限及最小限，佃夫租地的最大限及最小限，押租额及每亩每年纳租额，熟年荒年收租纳租的情况，每亩生产费额及总收入额、雇工关系及其工银、租田契约内容及换佃情形等。[②]《星期评论》一年时间就发表有关劳动问题的政论、短评等96篇，约占《星期评论》政论、短评的40%。

第一，用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剖析劳动阶级受压迫的原因。上文已经说到戴季陶等用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生产状况，揭开资本家用剩余价值剥削工人，从中牟取掠夺式的利润，"就象劳动者自己斲成了很大很重的石捣臼，戴在自己底头上，舂米给不做工的人吃，享受文明底幸福是一起人，〈资本家〉负担文明底工作又是一起人，〈劳动者〉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那里还有过于此的！"[③]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工银制度三者为基础的"强盗社会。[④]在这个社会里，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资本家付给他们的工银价值。所谓工银制度（特别是个数工银制）是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最刻毒的方法"。[⑤]

资本家与无产阶级都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中国的资本家与外国的资本家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都是强盗阶级。"中国是东方一个很大的市场，是欧美、日本等强国所分割占领了的"，[⑥]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世界的万恶之源，它们侵略、"垄断"，使包括中国在内

① 《〈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星期评论》第26号，1919年11月30日。
② 《本社启事》，《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
③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④ 季陶：《"萨波达举"的研究》，《星期评论》第34号，1920年1月25日。
⑤ 季陶：《上海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⑥ 同上。

的被奴役国家的人民陷入“世界的工奴”、“世界的农奴”的悲惨境地。[①]

第二，探寻劳工阶级的解放之路。国民党人士认为，世界的发展说到底，是经济发生根本作用，劳动者创造了世界的财富，所以“世界是人的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②]

劳工阶级首先应该觉悟，无产阶级是不分国界、种界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被掠夺阶级，私有制的工银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过着悲惨生活的原因，资产阶级是强盗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只有“打破这万恶的资本制度”，才能获得解放。作为劳工阶级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同阶级的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成健全的工会，“然后各产业的劳动者，方才能够协同一致”，“构成一个阶级的势力，以多数的力量去压伏那些资本家”。[③]《星期评论》通过对欧美国家工人运动的描述，介绍了同业工会、产业工会、同盟工会、联合工会、劳动者同盟等工会组织。介绍了 Sabotage（笔者注：“萨波达举”，即同盟怠业）、罢工、同盟罢工等斗争手段。特别是同盟罢工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是劳动阶级对资产阶级最通用的一种斗争武器。同盟罢工的目的是“联合同利害休戚，从事于生产事业的工人，对于资本家，表示反抗，且加以打击，使其改良待遇工人的条件。或联合同阶级的人，反抗占领生产机关的非劳动者，使其放弃占领和享用收益管理的权利，由劳动者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④]通过同盟罢工等手段，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改良种种待遇，如提高工人的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人工作条件，获得教育权等，但“不能认作劳动者底胜利。因为劳动者依旧是卖他的寿命，资本家依旧是吃着劳动者底寿命”。劳动者如果想要真正的解放，非打倒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社会不可。[⑤]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早期共产党人一样，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来思考，认为中国的改造，如果不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联系在一起，其改造不会有很大的结果。“我们中国的学生和农人、工人等，都是全世界人类的

---

① 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星期评论》第 41 号。
②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 46 号，1920 年 4 月 18 日。
③ 季陶：《上海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 48 号（劳动纪念号），1920 年 5 月 1 日。
④ 同上。
⑤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 46 号，1920 年 4 月 18 日。

一分子，当然应该顺应世界改造运动的趋势和各国人民，同负改造的责任的。”[①] 有人注意到阶级与人的区别，提出改造资产阶级与改造资本家是不同的。无产阶级要打破资产阶级，但资本家用不着恐怖，“因为所破坏的是旧制度，并不是资本家中间底那个人。”资本家就等于是得了发狂病，已经妨碍了群众，“我们拿药给他吃了，不是药死他底人，是要去掉他底病”。[②] 他的病就是剥削劳动者，使劳动者千辛万苦创造的世界，却落得一个悲愤痛苦的结果。因此劳动者应该从资本家手中将自己用劳动创造的世界夺回来。“今后的运动，就是被掠夺的阶级，要推翻强盗阶级，使全世界人民，都变成劳动者”。[③]

第三，第一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历史任务。这个提法早在1919年11月30日《星期评论》同人发表的《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中已见端倪，他们指出本刊的主旨，就是在发挥学生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与工人的爱国运动（六五运动）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世界新的人类运动。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六五运动中，提出了政治斗争的口号，是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但他们阶级觉悟的色彩依然不够“很鲜明”。[④] 因此需要将社会主义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使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星期评论》自觉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任，它提醒广大的读者，“五四”、“六五”运动是世界新潮流律动的结果，劳动问题现在是“中国的唯一重大问题”。[⑤]



▲ 1920年5月《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发表《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

六五运动是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它打破知识分子狭小的圈子，与劳动运动发生了关系。“由五四运动举起来的烽火，照得遍地都红。

①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② 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③ 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和将来》，《星期评论》第46号，1920年4月18日。
④ 季陶：《上海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⑤ 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许多年来被囚在金和铁炼成的囚笼里面的中国工人，也由这五四运动的呼声惊醒了起来，发出一个极大的光辉。这一个光辉，反映到文化运动上面去，才使那原形质的文化运动，现在 [出] 明确的意义。在‘文化运动’一个名词上面，加了一个说明语，就是——‘社会的文化运动’。”[①] 文化说到底，也是经济的反映，文化如同生产、生产形式、宗教、道德等一样，必然是随着社会之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无产阶级创造了物质世界，但却不能享受文化利益，根本的原因是资本家的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今天的文化运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才能完成文化运动的意义。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是有同一意义的东西。离开劳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②] “从事文化运动的人，大家要认清楚‘文化’的意义，认清楚‘社会’的意义，从‘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面解放出来，切切实实的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尽力，中国地方的平民，才受得到文化运动的好处。”[③]

戴季陶在宣传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中，还有两点思想非常明确，一是强调思想的时代性。一个时代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革命运动的“前驱”。[④] 社会的文化运动，可以促进社会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运动，又是实现社会革命文化的途径。二是指出劳动者被资本家、地主剥夺了享受文化的自由，阶级觉悟无法实现，需要革命知识分子的指导。1919 年 6 月 15 日他就指出无产阶级的觉悟需要革命知识分子用科学的理论灌输，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黑暗中的明灯”，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劳动运动。[⑤] 不久（10 月 26 日）《星期评论》第 21 号，有文章写道：知识分子“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功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⑥]1920 年元旦，戴氏在《民国九年的工作》中更明确提出革命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组织无产阶级的大同盟，以最善的努力谋

---

① 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 48 号（劳动纪念号），1920 年 5 月 1 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 39 号。1920 年 2 月 29 日。
⑤ 季陶：《国际同盟和劳动问题》，《星期评论》第 2 号，1919 年 6 月 15 日。
⑥ 先进：《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短评），《星期评论》第 21 号，1919 年 10 月 26 日。

全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①] 那么用什么思想向缺乏知识的劳动者灌输呢？戴氏鲜明地说明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向劳动者宣传，使他们明白过着悲惨生活的根本原因，启发劳动者觉悟，起来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成为政治、经济握有支配权的主人。

以上言论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普通的常识，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它们提出的时间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这些言论发表在 1919 年 6 月到 1920 年 1 月之间，此时，极少人说同样的话，因此这些言论成为“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表述之一。

六、宣传俄国革命与苏俄劳农政府

十月革命与苏俄新生劳农政府，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成功的实践成果，因此对十月革命和苏俄新政府的宣传，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取得的胜利。国民党人密切关注俄国革命和俄国劳农政府的成就。

第一，探究俄国革命真相，避免盲目反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并不了解苏俄革命的真相，来自苏俄的消息几乎被西方媒体所垄断，“俄国的事，报纸上的记载，各持一说，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形，几乎使我们看报的人堕在五里雾中。”[②] 直到 1919 年 11 月末，戴季陶还在说：“俄国的情形，因为消息阻隔，掌握交通机关的人，又颇有隐蔽或压抑这方面消息的情态，所以我们一直很难得其真象”。[③] 再加上各国对俄国所采取的态度不一，使得俄国的真相“更是不容易了解”。但国民党人想方设法了解苏俄的情况，因为他们很敏感地认识到，俄国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时代，中俄两国边境线最长，“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动，姑无论其是非利害如何，那里可以不研究呢？”[④] 所以他们广泛搜集资料，很费了一番工夫进行独立研究，撰写了一些文章报道、评论俄国的情况，消除各种“浮说”。[⑤]1920 年 1 月 29 日，《大陆报》发表文章指出：“从前世界各国，不明白布尔什维克的真相，外间所传多颠倒黑白，以为布尔什维克没

① 戴季陶：《民国九年的工作》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 年 1 月 1 日。
② 季陶：《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评论），《星期评论》第 15 号，1919 年 9 月 14 日。
③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 26 号，1919 年 11 月 30 日。
④ 同上。
⑤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 39 号，1920 年 2 月 29 日。

有组织，没有纪律；现在才晓得布尔什维克是很有纪律，很有秩序”。第二天邵力子就将此文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并发表短评：“我们国内许多人跟着别人叫布尔什维克是过激党的，并且提起过激党，就觉得真同洪水猛兽一般，现在请他们睁开眼，读一读《大陆报》这篇文章”。短评特别提醒读者一定要关心俄国问题，“要晓得对俄态度，也是眼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格外注意呀！”[①] 国民党人从如下几个方面引导人们搞清楚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真相。

首先，解释“过激党”。戴季陶在《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一文中，对人们恐惧的所谓“过激党”进行解释：“‘过激党’、‘过激主义’这两个名词，中国的官吏、政客、商人、教育家、绅士差不多没有一个听见不怕的”，“‘过激派’这个名词本来是日本那些因为怕布尔色维克（引者注，今译布尔什维克），便生了‘胆怯病’的人，制造出来的。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也有害‘胆怯病’的人，也跟了用‘过激’两个字”。“1903年，俄国社会党在英国伦敦地方开了一次大会，列宁的一派，和布列哈诺夫（引者注：今译普列汉诺夫）的一派，因为政策不同，彼此争论起来。结果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于是大家就叫列宁派做‘布尔色维克’。叫布列哈诺夫一派做‘免色维克’（Mensheviki）（引者注：今译孟什维克）。‘布尔色’是多数的意思。‘免色’就是少数的意思。”[②] 文章明确告诉读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③]

其次，分析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提出避免在中国发生类似事情的方法。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呢？戴季陶说，“‘布尔色维克’的风潮，不是空空洞洞、忽然生出来的。他是由社会上政治上种种不平等不自然的恶制度恶习惯激动出来的”。[④]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发生的原因是工人对资本家、农夫对地主的不平。在中国工业不发达，地主与农民的冲突也不如俄国尖锐，不可能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戴氏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他指出人们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不安到了极点就有可能发生革命，只有“除去政治

① 力子：《布尔什维克的真相》，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30日“随感录”。
② 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③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④ 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

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是［的］压力、不合理的组织，使中华民国成一个真正‘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使中国的人，人人都有很安全很正当很自由的生活，人人都能够得到极巩固的生活保障”，才能避免在中国发生像俄国革命那样的事情。[①]

最后，剖析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反对苏俄新政权的原因。1. 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各国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传布到世界各国”，[②] 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2. 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国债，这是对俄握有债权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是万不能甘心的；3. 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侵略政策，表明反对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这三条都危及到了列强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要置俄国于死地。这种清晰明了的分析有助于让中国人辨别苏俄的政策与真相。

第二，驳斥主流媒体对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攻击，热情称赞苏俄革命事业，思考改造中国之道路。针对西方媒体及国内主流媒体对苏俄进行无端攻击，《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一文指出：“劳农政府的政策从俄国国内的政治上讲，姑无论好不好。他已经宣布抛弃从前的罗马诺夫王朝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密约，我们应该认识他在这一点已经是可以和中国相容的”。“劳农派是否是毒蛇猛兽一样的东西，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单就他‘不侵略’的这一点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宽容他，认为他是无恶意的”。[③] “但是，现在也还有许多无识的蠢才，并不去考察实际的真象如何，以为俄国行的无政府主义，以为俄国是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真是奇怪极了。”[④] 基于这种看法，作者阐明对待俄国的正确态度：“我总是希望中国人大家想一想俄国这样可怜的悲惨状态，大家鼓起一个人道的同情心来，平心静气去研究俄国的问题，讨论对俄国的政策，决定对俄国的方针。”[⑤] “对于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平民所致力的革命事业，皆具有共同利害，所以皆具有社会的同情。俄国平民的努力最为伟大，其对于中国平民的利害

---

① 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 3 号，1919 年 6 月 22 日。
②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 39 号，1920 年 2 月 29 日。
③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 26 号，1919 年 11 月 30 日。
④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 39 号，1920 年 2 月 29 日。
⑤ 季陶：《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星期评论》第 26 号。

关系，也最深切，与俄国平民提携的必要，也最深切。”[①]

沈仲九也在《星期评论》上撰文称赞苏俄政府主动废除沙俄与被侵略国家签订的一切密约，执行各国平等友好的政策，是他们发挥他们宪法精神的结果，“他们宪法的精神，是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是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是人道正义的精神，就是要谋人类全体幸福的精神”。[②]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在去除各种“浮说”之后，国民党人对俄国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1. 俄国物质缺乏是资本主义各国封锁政策和援助反革命势力的结果，今后物质上的困苦一定可以解决。2. 劳农政府里面充实的社会民主精神的确是真实的，不是空口说白话。“他们政府的领袖能够实实在在的和兵士工人受平等的物质分配，已经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要算是空前的”。3. 他们尊重教育事业和优待受教育的学生，这是他们促进文化的理想表现。“这一个最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绩，我想一定蒸蒸日上”。[③]“至于俄国波尔色维克的建设，在政治组织上和经济组织上，是很切实的模范”。[④]而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被朱执信称为承担了一般人的和改革者的两重义务的“改革者”和“吃苦辞甘的好人物”。[⑤]

国民党人士赞扬俄国革命与苏俄建设的目的非常清楚，中俄两国有着一万余里的国界线接壤，国情相似，都是农业国；近代经济、文化也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俄国的问题，不单单是俄国的问题，而是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代表了世界时代精神，即反对私有制，主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新潮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须迎着这个新潮赶上去。

第三，称颂苏维埃政府的对华政策。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种种侵略政策，给中国人民以极大震撼，社会各界纷纷表态，高度评价苏俄的对华新政策。上海《民国日报》称此为“世界有史以来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⑥]《星期评论》第45号以“俄罗斯劳农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

---

① 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② 仲九：《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③ 季陶：《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④ 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⑤ 朱执信：《改革者的两重义务》，《闽星》半周刊，1920年4月23日。
⑥ 《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第1集），上海《民国日报》评论，1920年4月14日。

为题，全文刊发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不仅配发了编者按，还发表了戴季陶的《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沈仲九的《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等文章，积极肯定苏俄政府的正义之举。戴氏深有感触地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①]"俄国人民的政府，这次对我们人民的通告，在这一个意义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中国人民应该从这件事情中觉悟，"要从几千年弱肉强食的历史遗传性上觉悟转来，做一个为世界被掠夺者的自由而战的自由人民！"[②]陈炯明在致列宁的电文里说："劳农政府致中国人民的宣言已传至中国。全中国人民充满感激之情"。"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③]



▲ 1920年4月11日《星期评论》第45号刊登《俄罗斯劳农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

七、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各国无产阶级所开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情况。马克思主义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可以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关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介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通俗形式。

---

① 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1日。

② 同上。

③《陈炯明致列宁书》，1920年5月，《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国民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予了极大关注。早在1906年5月，《民报》第4号上就刊载了犟斋（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的译文，从“万国社会党”的起源谈起：“欲知万国社会党之起原，则万国劳动者同盟其嚆矢矣。万国劳动者同盟实由于马尔克之指导而成，而亦为经济的情势必然之结果也。其始也当1866年在瑞士国之瑞内湖畔催开大会”。这里所说的“万国社会党”指的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文章通过对第一国际一些重要代表大会的介绍，向世人展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波澜起伏的历程，不仅包括会议所倡导的主题思想，也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分歧和斗争。文中称马克思主义为“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文章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在“编者识”中，表达了国民党人士继续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万国社会主义进行之势方兴未已，故记事亦不得即视此为杀青之期，如近日法国社会党两派已经复合，别生出‘社会主义与爱国心’之一问题。将来次期万国大会必为剧烈之争点，吾人暂搁笔以拭目俟之焉可也。”8月第7号刊载了“渊实”（廖仲恺的笔名）译的《社会主义史大纲》，编者要求“我国学界读者”将此内容与“万国社会党大会小史对照”起来看。

《星期评论》51号、52号、53号刊登《劳动者与“国际运动”》，详细地介绍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斗争发展的历史。该刊还重点详细评论了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人民对欧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发展有所了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德国是十分有影响的国家。一是它是马克思的故乡。二是俄国革命之前，它曾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始终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激烈斗争，反映了第二国际“正统派”与“修正派”的斗争。这一切都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关注。

首先，介绍德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国民党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就是从介绍德国革命运动领袖开始的。朱氏在文章开篇即说：“社会主义学者于德国独昌，于政治上有大势力，而他政党乃却顾失势仰其佽援焉”。同时认为“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拉萨尔、必卑尔等尸之”。文章虽为“列传”，实际上主要介绍马克思、拉萨尔，此外提到了恩格斯、倍倍

尔。拉萨尔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鼓动者和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后来戴季陶翻译了《马克斯传》，刊登在《星期评论》新年号第二张上，对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

戴季陶在《德国革命的因果》最后一节专门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战斗生平，称赞他俩是“德国社会革命的健将”、“社会革命的先驱”。他俩虽然于1919年1月15日[①]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但德国的社会革命又起来了，德国斯巴达克斯团又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在报纸上！“又引起我们对于这男女两志士的纪念来了！”[②]

其次，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是国民党人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特殊的一点。早在1912年4月，戴季陶就在《民权报》上发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纲评》的文章，“节译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纲之大要，并附以论评，以供政党诸公之参考，而知政纲之形式，及拟定方法。”文章首先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而实行社会共产。虽因此限制个人之行动，然保护平民生活，限制富人专制，实为维护人类天赋自由之要，绝非妨碍自由也，即所谓共产主义是也。”接下来介绍了爱森纳赫派1869年发表的政纲概要，共6点。戴季陶评介说：“须知政党之组织要件，乃先标准一确定主义，定明允正大之政纲”，而所谓党员，就是对政纲表赞同并“担负实行之义务者”。他指出我国政党的缺点就是没有明确的政纲，而政党党员之义务权利“乃仅止于佩带徽章，缴纳会费”。1919年8月，戴季陶又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笔者注：以下简称“德国党”）1891年爱尔福特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翻译出来，刊登在《星期评论》第10号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党内在党的纲领上存在严重分歧，而戴季陶两次所译的纲领，都是“正统派”观点，爱尔福特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起草人就是续成马克司《资本论》的那位极有名的因格尔。”[③]他有选择地翻译了恩格斯起草的纲领，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极具价值的。

---

① 李卜克纳西与卢森堡遇难的日期，当时报刊记载有些混乱，戴氏文章记载是1919年1月10日。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报告中给人印象是农历正月15日。

② 季陶:《德国革命的因果》,《星期评论》第43号，1920年3月28日。

③ 季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星期评论》第10号，1919年8月10日。

最后，评析德国党内的斗争，以区别“修正派”和“正统派”。马恩在世时，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影响重大，而德国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十分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和德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斗争。搞清楚德国党内的分歧，实际上就能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差别。所以介绍德国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就是在告诉人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国民党人在介绍德国革命情况时，一开始就涉及了德国党内的分歧。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所介绍的两个人物：马克思和拉萨尔实际上就反映出德国党内的分歧。拉萨尔虽为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但后来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代表人物。朱氏在文中分别介绍了马克思和拉萨尔的生平和主要理论观点，也介绍了拉萨尔的主张给德国党带来的影响。他说：“拉萨尔之倡说及运动，皆限于一国家中。承其流者，变本加厉，遂不肯与外国劳动者合。累居全德意志劳动同盟会长位者，又短于才，遂久不得发达。其后李卜尼希（引者注：今译李卜克内西）及必卑尔（引者注：今译倍倍尔）等，自其党中别出为一派，颇宗马尔克，倡世界主义。至千八百七十五年，乃联合而大进步，是为今之社会民主党。”他的结论是：“拉萨尔之言社会革命，不如马尔克言之之完也”。[①] 宋教仁译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中，在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纷争时也谈到了德国党内的分歧。戴季陶的《‘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一文，谈到了德国党后来的分歧：“马克斯的社会主义，由学理的发明与实务的努力，两相配合，经过许多困难，打破许多偶像，在德国里面，竟自得了政治上社会上的优胜旗。社会民主党的发达，一日千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的总选举，得票数便加到二百十万票。那晓得这马克斯主义政治上的胜利，就是马克斯主义信奉者中破裂的机会。胜利的结果，便产生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派。但是一方面更使马克斯正统派的结束，格外巩固，格外激烈，变成今天斯巴达加斯团的运动。”[②] 从这种分歧中戴氏甚至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

1919 年欧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相继爆发罢工潮。英国无产

---

①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民报》第 3 号，1906 年 4 月。

② 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 17 号，1919 年 9 月 28 日。

阶级力量在欧美各国中最强，1919年9月，英国铁路工人为了增加工资举行了大罢工，弄得英国全国大恐慌，轰动了世界。英国铁路工人约40万，煤矿工人有80万，运输工人约30万，这三个产业的工人形成了“三角同盟”。而铁路、煤矿和运输是英国工业的中枢，是国家产业的大动脉，如果三角同盟举行大罢工，英国的“大动脉停了，社会上一切机关，那里还可以活动呢？”[①]那么，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如何，它对我国劳动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此戴季陶对英国近代工人运动作了描述。英国工会是欧美国家中最发达的，据1916年统计，英国工会会员有440余万人，差不多占了全英国总人口的1/10。工会组织在英国有三种形式，即“熟练工人组合”、“产业工人的组合”与“属于前两者中间的组合”。在此基础上成立矿工组合同盟（特定产业地方为基础）、印刷组合联合会（全国同业组合）、造机工人组合协会（以技术为标准）。英国是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输入最早的国家，“而且刺激马克斯的思想，供给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材料，英国产业界的进步实况，也是很有力的。但是马克斯派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总不能占一个有力的指导地位”。[②]这是因为英国“是一个习惯万能的国家”，基尔特社会主义却应运而生。基尔特（Guild）是借中世纪“同业组织”的意思而来，其要点是：1. 生产者自己管理它的生产事业，完全实现产业的民主主义。2. 关于社会全体的问题，由各基尔特共同管理，以免除为生产者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危险。[③]当时的上海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其组织形式还处在萌芽状况，戴氏对英国工会组织的介绍，对上海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团体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也是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德国知名经济学者宗巴特教授有一个理论，就是美国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此他写了一本《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认为“美国的工人都是信奉事业（Business）万能的。在这一点，美国工人的性质，是和美国的资本家一样。所以他们的希望，只是在资本劳动的调和，图劳动者地位的向上。决不愿意去破坏

① 戴季陶：《英国的劳动运动与三角同盟》，《星期评论》第18号，1919年10月5日。
② 戴季陶：《英国的劳动组合》，《星期评论》“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
③ 同上。

Business 的现存社会”。[1] 但 1919 年美国与英国一样都掀起了罢工风暴。从 1 月到 9 月，罢工 2000 多起，工人损失了 2500 万美金，资本家损失了 1 亿美金。“九月以来，产业界的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大小同盟罢工事件，同时有千余件之多。钢铁业的同盟罢工，还没有解决，40 万煤矿工人的大同盟罢工又将发现于来月一日”。工人斗争的新形势，不但将宗巴特教授的名言完全推翻，而且前途的暗礁恐怕比起英法德等国来还要多呢！[2] 原因很多，其中指挥同盟罢工的意见不是原来的美国“劳动组合同盟”了，而是美国特有的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 I. W. W。为此《星期评论》专门组织了介绍美国 I. W. W 的文章。

1919 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是欧美“赤色化”的时代。与英国、美国工人大罢工同时，奥地利又发生了“布尔色维主义化的趋势”。[3] 11 月，意大利社会党在国内大选中获得 150 名以上的议员席位，成为议会中唯一的大政党。社会党决定承认苏俄劳农政府，“与俄国劳农共和政府取完全的一致行动”。[4] 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撰文指出，意大利的革命与意大利社会党的纲领密切有关，但这个纲领是极消极、极让步的政纲，比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要“逊色得多”，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这种“玫瑰色的政纲”[5] 的前途，还需要观察。

日本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戴季陶对它最熟悉，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最有警惕性。“日本的问题，是我们所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日本的革命，更是我们不能不以十分的兴趣和热力去研究的问题！”[6] 他劝国人“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7] 他从两个方面来关注日本，一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特别提醒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等国在太平洋、东亚进行新的军备扩张，以及“日本对中国种种新发生的压迫”，“和美国立法部

---

① 戴季陶：《美国产业界的大恐慌——美国究竟有社会主义的存在没有》，《星期评论》第 21 号，1919 年 10 月 26 日。

② 同上。

③ 戴季陶：《意大利的“赤色化”与其反动》，《星期评论》第 28 号，1919 年 12 月 14 日。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戴季陶：《日本会发生革命吗》，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 年 3 月 19 日。

⑦ 戴季陶：《我的日本观》，《建设》第 1 卷第 1 号，1919 年 8 月。

的行动及军事的行动”，这意味着在“太平洋及东亚大陆间将要发生大战的预告”。[①] 这一预告后来被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所证明，说明戴氏敏锐的国际洞察力。一是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他意味深长地提出中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社会的革命，是要以世界平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中国平民受日本国家和资本家的掠夺害毒最深，所以感觉日本社会革命的必要最切，同时与日本‘革命的平民’提携的必要也最切。”[②]

1920年6月起，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旅东随感录”、“特载”、“专载”、“评论”等栏目中，刊载署名“晋青”写的大量有关日本与社会主义关系方面的文章，如《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会底创立》、《日本全国主要的劳动团体》、《日本老社会主义家归国》、《日本社会欢迎革命名词》、《日本社会运动家的最近倾向》、《日本社会主义者最近情形》、《日本劳动总同盟》、《今年日本的五一纪念》等，使国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国民党人与其他进步人士的上述文章，涵盖了世界上发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国家，使中国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从中获得斗争的力量与前进的方向。

第三节　对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五四时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不应因意识形态而否定或忽视。但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的传播有本质上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宣传的力度则因人而异，并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一个人的思想而言也不是一以贯之，而呈现出阶段性。

一、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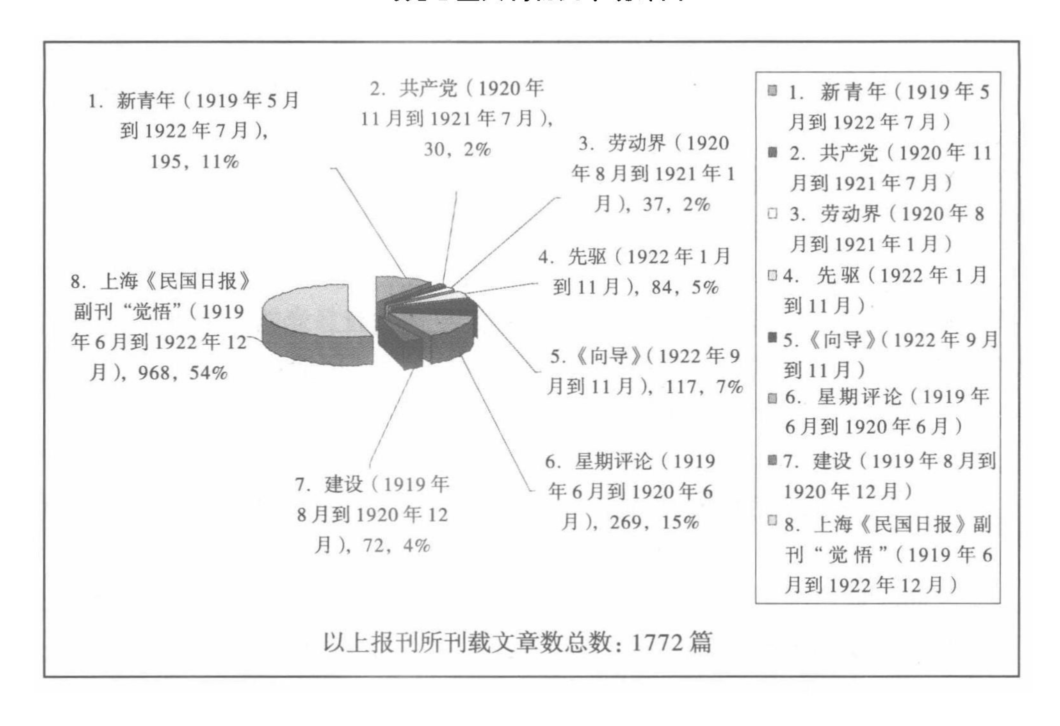
第一，国民党人士与共产党人在宣传战线上“合作”，主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文化。首先，国民党人士主办的《星期评论》、《建设》、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与共产党人主办的《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先驱》、《向导》

① 戴季陶:《东亚永久和平策》,《星期评论》第27号，1919年12月7日。

② 戴季陶:《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这 8 家媒体从 1919 年 5 月至 1922 年 12 月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情况见图 5—3—1：

图5—3—1 《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先驱》、《向导》、《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报刊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刊物文章统计图



说明：

1. 统计对象为以上八种刊物在 1919 年 5 月到 1922 年 12 月这一时段的文章，其中新青年（1919 年 5 月到 1922 年 7 月）195 篇；共产党（1920 年 11 月到 1921 年 7 月）30 篇；劳动界（1920 年 8 月到 1921 年 1 月）37 篇；先驱（1922 年 1 月到 11 月）84 篇；《向导》(1922 年 9 月到 11 月）117 篇；星期评论（1919 年 6 月到 1920 年 6 月）269 篇；建设（1919 年 8 月到 1920 年 12 月）72 篇；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 年 6 月到 1922 年 12 月）968 篇，总数 1772 篇。

2. 这些数字只能是个约数，原因有四：一是统计有疏漏；二是当时他们的思想均处在嬗变之中，按照他们的话说是在急剧的进化之中，有的文章很难确定为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夹杂其他社会主义与新思潮；三是以上统计对象，并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是以上刊物的政论、随感录、通讯、译文等；四是统计有重复，转载的文章再次统计。以上

情况给统计带来相当的困难，但一般来讲，以上数字大致上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宣传倾向，反映了国共两方在五四时期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情况。

上图彰显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五四时期后期我国舆论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文化，正是共产党人士、国民党人士与其他进步人士合力的结果。国民党人士及其刊物在传播中无论在数量上（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宣传文章占总数七成以上），还是宣传质量上（将在下面论述）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国共两党办的媒体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宣传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与《星期评论》、《建设》、上海《民国日报》等互登广告，或发表评论，或转载文章互相呼应。1920年8月《建设》月刊面世，《新青年》在第6卷第5号（笔者注：1919年5月出刊，因印刷厂的缘故到9月出版）上预发了《建设》第一号的要目，以后不断刊登《建设》各期要目。《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刊物后，刊登了著名国民党人士蔡元培的《社会主义史序》。《星期评论》邀请共产党人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等或担任编辑，或为撰稿人。《建设》第1卷第3号“介绍出版物”中，介绍了《新青年》等进步月刊。《新青年》五卷合装本再版时，《建设》特意刊登一页广告[①]，称颂该刊是力求进步的杂志，是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要研究以后的思想会如何变迁去，就不可不知道现在的思想是如何变迁来的！《新青年》开首就注重（通信）一栏，因为通信可以随便发表意见。所以那通信栏里真有许多好材料现在也还是不能不看的。”《建设》杂志还刊登了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第一代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章。《新青年》刊登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②]宣称该报“发扬民治，要唤起国民奋斗的精神”，“设有‘觉悟’一栏，提倡世界新思潮”。对于《新青年》的好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及时转载，特别是“觉悟”副刊，几乎所有早期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李

① 《建设》第2卷第6号，1920年8月。
② 《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汉俊、李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均在上面发表文章。“觉悟”还推出了一批政治新人，如张太雷、蔡和森、张闻天、瞿秋白、恽代英、杨贤江、柯庆施（怪君）等。

1920 年 4 月 11 日，《星期评论》刊登了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通告）全文，并发表了戴季陶的《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沈）仲九的《为什么要赞同俄国劳农政府通告？》，高度赞扬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俄自动废除俄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5 月 1 日），马上对以上三篇文章全文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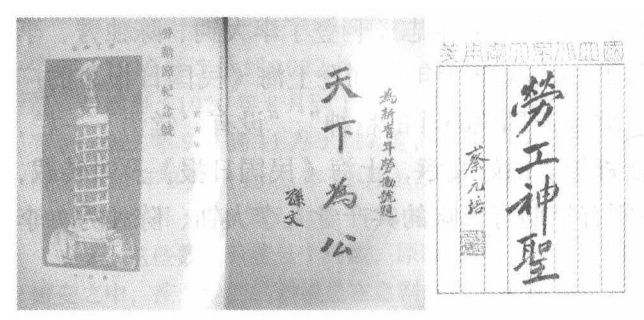




星期評論

▲ 1920 年 5 月《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

1920 年 5 月 1 日，迎来了国际劳动节 36 周年，《星期评论》与《新青年》采取统一行动开展纪念活动。5 月 1 日《星期评论》第 48 号和《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同时刊发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号。《星期评论》专号的名称为“劳动纪念号”，《新青年》专号的名称为“劳动节纪念号”。《星期评论》专号出版 10 大张，发表了《文化运动与劳动》、《强盗阶级底成立》、《上海的同盟罢工》等文章。《新青年》专号刊发了李大钊的《“五一” May Day 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一九一九巴黎“五一”运动》等 28 篇文章，计 400 页。杂志特意邀请孙中山题写了“天下为公”，蔡元培题写了“劳工神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两刊的首篇同为李大钊的《“五一” May Day 运动史》。这个现象



▲左图 1920 年 5 月《新青年》与《星期评论》相呼应，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右图孙中山与蔡元培应《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题词

绝非偶然。《建设》月刊在第2卷第5号上专门介绍《新青年》"劳动纪念号"，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份"好杂志"。

1920年8月，中共早期组织第一份劳动群众的刊物《劳动界》诞生后，"觉悟"副刊立即转载了陈独秀发表在该刊上的《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第1册)，以后又转载了《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个公开机关刊物《向导》创刊，第三天（9月15日）"觉悟"副刊就刊登了《向导》的出版宣言，此时《向导》还没有出现在市面上。

1920年11月6日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第二天（1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便组织陈望道的《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和"江春"（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发表。第三天（8日），主编邵力子披挂上阵，发表了《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①]对张东荪展开批评，指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也是主张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他们与主张资本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如何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道路上。张东荪主张用资本主义来开发实业，"真太迷信'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了"。针对张氏区别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以都会做标准，邵氏驳斥道："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在是罪恶的渊薮。吸收乡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展开规模较大的批判。"觉悟"副刊相继刊登了李汉俊、施存统、（许）新凯的批评文章，投入论战。

最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人士与共产党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时期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彼此没有区别党派，而是协同战斗在宣传战线上。

星期评论杂志社里有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等早期共产党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邀请了陈望道、施存统担任编辑、作者。施存统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到戴季陶的影响，他到日本与日本社会

---

① 《邵力子文集》(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8页。

主义者发生关系也是通过戴氏联系的。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沈仲九还参加了中共早期组织的筹备工作，后来戴季陶退出的原因，也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对孙中山的忠诚。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论战时，陈独秀在答复张东荪先生时，摘引了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一段言论作为批判的武器。陈氏写道：针对张氏中国发展实业非发展资本主义不可的言论，戴氏驳斥道："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①]

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瞿秋白曾评论："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②]正是因为《星期评论》在宣称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出色表现，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到上海，才首先找《新青年》、《星期评论》的媒体人联系，筹建中国共产党。

国共人士在思想战线上"合作"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共同编纂"社会经济丛书"和《新时代丛书》。1920年6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同时刊出"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预告"，声称："经济组织底改造，是社会改造底基础。自去岁以来，中国思想界，应着全世界改造底潮流，激动起来，由空泛的文化运动，向着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这是中国人觉醒的好现象。"他们致力于翻译和著述，对今后的思想界作更大的贡献。第一期出版《共产党宣言》、《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伦理学》(考茨基著)、《资本论解说》、《社会主义运动史》、《布尔色维克底俄国》等20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① 陈独秀先生复张东荪先生底信，《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青年社1922年版，第66页。
②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国近代哲学资料选编》第4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的书籍，丛书成员李汉俊、陈望道、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林云陔等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国民党人。1921年6月24日，“新时代丛书社”在“觉悟”副刊上刊登编辑缘起，编辑主要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士与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等国民党人士组成。这两种丛书的负责人都是李汉俊，他们彼此称“同人”，说明他们在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第二，国民党人士运用马克思主义初步分析中国社会，企图解决国民党主导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国民党人士与共产党人的宣传各有重点、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研究历史一定要精细，要注意时间顺序，要注意某种思想与提法出现的社会背景，甚至传播者个人的特殊语境，尤其在研究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时不能忽视这些，因为只有综合性的考证，才能探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纵深。

首先，国民党人士将唯物史观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李大钊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了简略的介绍，他在传播时强调了要与国情相结合，并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作了最初的结合，从时间点上考察，他在深度上不如胡汉民、戴季陶。如前所述，胡氏于1919年8月、10月相继在《建设》月刊上发表了《孟子与社会主义》、《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用唯物史观诠释我国古代哲学史。

接着戴季陶发表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1卷第2号，1919年9月)，从经济、文化层面剖析中国当代社会。该文提出应该从经济角度入手分析中国的乱源，戴氏通过分析海关贸易等资料，说明中国进口大于出口，原因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现代生产品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品。“欧美工业革命的果实，借着交通发达的力量，输入到中国来。他们是用机器的力量来生产，中国是用手工来生产。一个人操纵机器的生产力，和一个人用旧式家具的生产力比较，相差几十倍或者几百倍。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输出入的货币价格，去比较两者价值的内容，就是两种商品当中所含的工作分量，相差就远极了。这一种莫大的生活压迫，加到中国多数小民的头上来，怎么样当得起。”这种生活的压迫并不只是由经济上的方法表现出来，有一部分却是由政治上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因此一般人很容易看到政治上的表现而忽视了经济上的问题。政治问

题从根本上讲，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中国的乱源不是政治压迫，政治压迫只是结果。“战争这件事，是一桩极重大的‘社会现象’，造成战争的原故，一定有很大的‘社会的生活问题’横在他的根底上。”循着这个思路，他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乱事”，得出结论：“历史上许多次大小革命的事实，都是一种‘阶级的生活争斗’”，“是社会上种种经济的反常状态的证明，是阶级的生活压迫的结果。”戴氏将中国与欧美相比较，指出，中国的乱源与欧美等国不同，欧美的社会问题，是本国资本家造成的私有制，中国则是“由欧美日本的压迫所诱发出来的”。中国的乱源外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武力的资本侵略；内是军阀、官僚、政客贪鄙暴戾造成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

戴氏运用马克思所谓观察法加上达尔文生物进化法来剖析国际形势和中国问题的劲头一发而不可收，随后写了《“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1日）《革命！何故？为何？》（《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1日）等文章。

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党人士进而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中说：“马克斯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这一点是人人都看到，马克斯的活动，也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更是人人都知道。所以信奉马克斯主义的人遍布全世界。”[①]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有不同的表现，一国之内也有不同的派别。戴季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马克斯主义的分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化现象呢？“不用说，这就是各民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不同的结果了”。“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只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各的历史的精神，各有各的现在境遇，于是便各有各所理想的世界。这各民族特殊的质性，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照下面，都各自自由发展起来，去迎合这世界的时代精神。所取的趋向虽是在世界的协同进化，所用的方法就是——进行的途径——却是都现出一种差别的形体。”[②]英国、法国、德国各自走自己的路，中国该何去何从？“国民啊！你看不要把眼望花了。也不要自己怨自己的无能，叹自己的

① 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
② 同上。

孤寂了。你们且回头望一望自己的弟兄是怎么样的？自己的田庐是怎样的？自己的村落自己的社会是怎样的？他们各国人所走的路，都是由他们自由选择的力量开辟出来的。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开得一步才走得一步，自己开辟的，才是自己的正路。”[①] 他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方向，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模式，提出各国要达到这个共同的方向，必须从自己国家、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具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应该指出，1919 年下半年胡、戴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不是偶然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最新发展。与此同时，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也发表了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剖析中国社会。1919 年 8 月 17 日，《星期评论》第 11 号上发表了李汉俊的《怎么样进化？》，可视为我国第一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文章，具有启蒙性。10 月李达的《女子解放论》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了妇女的解放。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中，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了世界、中国社会。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写于 1919 年）科学分析了东西方文明，深刻认识到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原因是农业经济组织，封建大家族制度。共产党人以上探索，尽管不成熟，甚至还有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杂质，但他们与胡、戴两氏的研究互为补充，成为我国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与当代社会的开山之作。

其次，着力传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 1919 年 11 月开始，考茨基著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被重译，以《马克斯资本论解说》为名，在《建设》上分七期连载。这是国共人士又一次思想“合作”的产物，主译是戴季陶，参加者有李汉俊、朱执信、胡汉民等。[②] 如前介绍的那样，戴季陶还运用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状况。

最后，如前所述，国民党人士还提出了革命知识分子要到劳动大众中去，作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明灯，与劳动阶级相结合；用唯物史观透视道

① 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 17 号，1919 年 9 月 28 日。

② 见《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序，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1 年版。

德，指出道德产生的根源，道德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与无产阶级新文化等。

总之，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显眼的，他们与共产党人士的传播虽然在本质上并非一致，但在五四时期却形成了文化战线上的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的春潮正是在共产党人士、国民党人士与其他进步知识分子共同推动下，才形成了澎湃汹涌之势。

第三，在三次论争中，多数国民党人士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争，但他们十分关注这三场思想交锋，并从侧面声援共产党人的论争。在主义与问题论争时，国民党人士强调了主义、思想的作用，他们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常常以思想革命为前驱。“一个大革命出现之先，一定有一个新旧思想战的时代”。[①] 主义是世界的，政府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等均看成“过激主义”，加以禁止。我们不管政府禁止不禁止，只要看主义是否合于真理，是否满足生活向上，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凡是政府禁止，差不多就是革命的预兆。禁止愈严，革命的时机愈迫，革命潜势力愈增。[②] 国民党人士非常强调主义的作用。孙中山指出：“什么叫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③]

1920年5月，张东荪在报刊上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积极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5月16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第50号上发表了长篇批评文章《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继而与张东荪在报上展开笔仗。国民党人士首先站出来表示对李汉俊的支持。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提供版面，给李汉俊答辩。戴季陶在5月20日的“觉悟”副刊上撰《自由研究与批评》，公开表示：“我是一直就注意汉俊君与东荪君双方底议论，而且同意汉俊君意见的一人”。

张东荪、梁启超宣称中国没有资本家，用不着讲社会主义，国民党人士对此论并不陌生，孙中山斥之为：“太不得要领。以如此底人讲社会主义，

① 戴季陶：《学潮与革命》，《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② 仲九：《主义的研究与禁止》，《星期评论》第40号，1920年3月7日。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页。

难怪他看着社会主义，前路茫茫，正不知从那里下手。且社会主义底真义，不是专靠几十本书，或者几百本、几千本可以看得出来的。要有机敏底心，确实底心得。我常说中国人读书，越读越糊涂，大约就是这种人。”[①] 戴季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中国现在确是缺乏资本，但是我们中国所缺乏的，却并不是资本家。”[②] 他与共产党人看法一样，指出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中国的资本家虽然资本所有额很小，与欧美先进国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但中国的资本家不会因其少而掠夺本性也少，“要晓得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在发展中国的产业。发展产业所需要的是一切生产机关的改良和进步，并不是在资本家数量的加多。”[③]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反对政治组织，国民党人士强调在阶级的社会中，人们是决不能离开政治生活的，官僚政客的政治与一般政治是两码事，不能混同。他们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军阀、地主的专制，建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主共和。即使废除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的理想社会，“那个时候，依旧是有组织的生活，而且更是有极严密的组织的生活。我们可以打破阶级支配阶级压迫的现代式的政治，不能离开了合群的互助的自治组织。社会进化，只是使一时代的政治形体和政治意义改变。并不是使一切政治的形体和政治意义绝灭；只是变更或消灭现存体制下的组织和区分——就是制度——并不是消灭一切的组织和区分。”[④]

第四，国民党人士研究、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之一，是借以丰富三民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士在五四时期一度集中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国民党自身思想演变的脉络，更是他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十月革命后，他们都认识到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他们欢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赞美苏俄革命与建设。作为对新时代在思想上的反映，孙中山等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元素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正是这个时候，孙中山在上海潜心撰写了三民

---

①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7页。

② 戴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星期评论》第41号，1920年3月14日。

③ 同上。

④ 戴季陶：《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星期评论》第24号，1919年11月16日。

主义，并在论述中大量议论马克思主义，论述苏俄革命的意义等。国民党人士不排斥阶级斗争学说，这与他们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打倒军阀专制政府是有一致性的。他们应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是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主张寻找理论依据，来证明民生主义是古代中国（井田制）早已有之，是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弊端的最佳途径。他们运用剩余价值理论，主张废除私有制，是他们建立“平均地权”公有制的出发点。他们批判资本主义，主张社会革命，是欲论证革命党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有所资”（朱执信语）。因此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从来不隐瞒，他坚持说社会主义就是他的民生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迄今学术界在论评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政治战略大转变时，几乎忽略了国民党人士在五四时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个重要因素。国民党人士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过程，如果没有视苏俄革命和建设为其榜样，那么孙中山 1924 年“联俄联共”政策的制定就缺乏历史的脉络，失去了思想基础。仅仅从时局的压迫（陈炯明事件）和策略（获得苏俄的援助）方面来考量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显然缺乏历史与逻辑的连贯性与思想深度。

二、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在研究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定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孙中山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家。冯自由则坚称中国率先提倡社会主义的是孙中山，第一个将社会主义写进纲领的政党是中国同盟会。晚年宋庆龄也说，孙中山如果现在还活着，他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将孙中山简单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利于对孙中山研究与三民主义研究，同样不利于本问题的探索。对此笔者在本章开篇已有所说明。孙中山的理论绝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而是近代中西政治思想的多元融合体，社会主义的元素非常明显。但他与欧洲社会党的“修正派”、“正统派”不同，他欢迎苏俄革命，践行武装夺取政权。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了他后来的联俄、师俄的转变与实践。

第一，从思想体系上讲，国民党人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从中吸收某些思想改造三民主义。前面已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

的学说与三民主义都有契合点，所以受到国民党人士的欢迎和应用。例如唯物史观强调经济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思想，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路相吻合。在孙中山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经济，即生产资料国有，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他制定了通过平均地权，达到土地国有这样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如果唯物史观是他制定平均地权的理论支撑的话，那么中国古代井田制则是他的历史支撑。所以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等均用唯物史观考证井田制是公有制，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说明“平均地权”是井田制的“遗意”。[①]

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如果说在晚清、民国初年孙中山宣传的社会主义还是广泛意义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十月革命之后，国民党人的社会主义更倾向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他们以赞扬的态度欢迎苏俄革命和建设，并从中获得改造中国的一些灵感。冯自由在诠释了各种社会主义之后指出：“究竟我们中国的应该采用那种主张呢？现在依据和提倡的人已经不少，只有孙中山主张土地国有，是近马克斯派的。”[②] 国民党人士看到苏俄革命成功，开辟了人类的新潮流，认为中国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非常关注列宁的事业，尤其注意苏维埃制度、军队建设和教育等方面，从中吸取政治智慧。

第三，与苏俄对国民党的支援有密切关系。列宁的东方战略的实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们将孙中山作为这个战略的伙伴，长期与之保持联系。列宁很早就关注中国，关注孙中山。1912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列宁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孙中山的“伟大民主纲领”进行评论，赞扬“孙中山的纲领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他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③]

苏俄政府、第三国际非常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五四运动前后，派出使者来华，将国民党作为主要同盟者，与孙中山联系密切，把他看成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把国民党视为中国唯一真正从事国民革命的集团。[④] 苏俄代表多次

---

① 考证井田制是《建设》杂志的一个重要内容，胡汉民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对井田制进行了考察后，从《建设》杂志第2卷第1号开始，用3期进行了专门讨论，见《井田制有无之研究》。

②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第2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页。

④ 《面向孙逸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175页。

与孙会谈，建立起“中英文密码联系”，并将苏俄宪法、土地法等英文文件送其阅读。[①]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将星期评论社作为建党的细胞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共产国际鉴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要求中共中央局从上海迁到广州。[②]共产国际还强制性地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而且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给孙中山以援助。

这些都是促使孙中山于1920年11月重返南方后，开始实现联俄外交大战略转变的重要因素。他明确表示，外国列强破坏，阻挠中国的统一，俄国是帮助中国统一的“朋友”。[③]

三、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

孙中山的理论体系虽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但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国民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兼容并包、杂然并陈的思想体系。首先，国民党宣扬的社会主义是混合型社会主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虽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元素，但也有其他社会主义的内容，如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等。他曾将各种社会主义区分为共产主义、集产主义二派。“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斯主义。马克斯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引者注：今译巴枯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④]对此冯自由的诠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集产主义是马克思派（笔者注：孙中山的见解略有不同，认为集产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共产主义是克鲁泡特金派，前者是经济理想，后者是道德理想。这不能相容的两派在冯氏那里，却是社会革命必经的阶段，“合一炉而共冶，才能适於世界的趋势”。[⑤]最能体现国民党的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即主张土地国有，但它实现土地国有的手段是改良的。列宁一针见

①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②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③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页。

⑤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第27页。

血地指出，这样通过地租转交给国家的改造社会的道路只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①] 孙氏的社会主义具有空想性、主观性。

至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民党人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读，认为俄国革命是斯拉夫民族中的先知先觉的人的觉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起来革命，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和平的新政策，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主持公道，主张民族自决，“所以世界上从此便生出一个很大的变动。因为这个大变动，此后世界上的潮流也随之改变”。[②]

即便如此，国民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亦有保留，亦有批评。朱执信曾评论道：“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他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在一个时期应为同一人，蓄积并不一开始就来自掠夺，“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只是到了工业发达之“近今”，“资本家益恣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钜万”。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说资本家是盗贼“非为过也”，马克思说资本基于掠夺，“真无毫发之不当也”。[③] 胡汉民强调“马克思一派的人，有时说得过分，看成人类心理的变化，完全听命于他的环境，什么人都止有被动的适应，没有自动的适应。又且看重了物质的生活，就不大理精神的生活。”[④] 孙中山在阐述民生主义时，用较大的篇幅评论了马克思主义。他赞扬马克思主义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⑤] 如中国崇拜孔子为圣人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

---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5 页。笔者附言：列宁这个评价写于 1912 年，当时孙中山的思想并没有定型，以后又有很大的发展。当代有学者对列宁的这些看法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在剖析孙中山思想体系时，列宁的分析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91 页。

③ 蛰伸（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 2 号 1906 年 1 月。

④ 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建设》第 1 卷第 1 期，1919 年 8 月。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62 页。

的圣人”。[①] 对剩余价值说，他多有批评：“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②] 他指出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③] 孙氏坚持认为马克思正确地回答了以前社会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将来社会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实行民生主义，即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为重心。他批评马克思认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认为民生问题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为此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

其次，国民党的社会主义因袭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真髓不外是人道主义，即博爱、平等、自由。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还是人道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引者注：即黄帝、老子［聃］，道家之祖）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引者注：早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④] 所谓博爱，也是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均有博爱，与社会主义的博爱不同在于狭与广之别，社会主义是谋人类幸福，为广义博爱。[⑤]

最后，国民党的理论体系规抚于西方思潮各种政治理论，并非都是社会主义。其中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影响是显然易见的。这方面最能体现的是民权主义。孙中山承认国民党的政治制度“是由欧美传进来的”，[⑥] 其基本架构是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笔者注：在他那里增加到五权），体现的是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页。
② 同上书，第369—370页。
③ 同上书，第369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页。
⑤ 黄彦编注：《论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⑥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1页。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但他又批评西方政治制度存在弊端，克服弊端的有效办法是权能分开，即将人民的政权与政府的管理权分开，而五权宪法中的监督、考核权是对封建管理制度的传承。

总之，国民党的理论无论是因袭传统的固有之思想，还是规抚西方各种流派，都围绕的是三民主义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轴。

第二，从思想意涵上讲，国民党人士强调的是民族主义。何谓民族主义，孙中山非常简明地解释："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①] 孙氏对此曾反复阐述。他强调民族与国家并不等同，有一定的界限。民族是天然力造成的，是王道；国家是武力造成的，是霸道。民族是自然力造成的，所以不是用武力可以征服的。要救中国，就必须"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②]

国民党人士不乏国际大视野，他们尖锐地指出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③] 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世界性，但他们理论的落脚点是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是狭隘的，突出的是农业文明的传承，他们经常用古代传统的思想比附社会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先要恢复固有的旧道德，强调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孙中山曾彰显他的革命思想的基础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的道统。对所谓共产主义，国民党人则经常将其与我国的大同平均社会挂上钩，孙中山指出："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今日惟俄国新创设之政府，则与此相似"。[④] 在另外一次演讲中，他更是直接表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⑤]

然而，民族主义历来是把双刃剑。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民族主义，但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民党人后来正是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戴季陶最典型。他在《"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民族需要的思想，原本可以引导他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189页。

③ 同上书，第231页。

④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页。

⑤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4页。

化的“正路”，但狭隘的民族主义却驱使他走上相反之路，成为国民党中反共最早，反共最彻底的人。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氏站在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立场上，反对共产主义，史称“戴季陶主义”。他强化了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认为“所谓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德，民生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仁爱和平的道德”。[①] 孙氏的道德主张，正是继承“仁爱”正统的伦理思想；孙氏主张发扬光大东方文化（即儒家思想），才可以强种保国。很显然，戴氏正是利用传统文化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以往学界对此评价，多指责戴氏曲解孙中山的思想来作为反对国共合作的理论依据，却忽略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本身的消极内容。戴氏正是利用了这些消极内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第三，从思想基础上讲，尽管国民党人士赞扬唯物史观，也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社会，但他们的世界观不是唯物史观，而是民生史观。民生史观虽然不是孙中山自己的总结，而是后人对孙氏历史观的概括，但大体上体现了孙中山的思想。何谓民生史观，后人依据孙中山的思想，将民生涵义归纳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孙氏强调民生是历史的原动力，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是社会的原动力。“从社会属性看，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处于进步方向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理论上看，孙中山研究社会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唯物主义的。”[②]

在国民党人士那里，唯物史观不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刚好倒过来，唯物史观只是为了证明三民主义的“坚确性”（胡汉民语）。国民党人士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古代社会、井田制等，是以古证今。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在我国古已有之；用“经济关系是社会一切关系的基础”考察中国历史发展，是为了说明民生主义的正确性；探索井田制，是为了证明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国民党那里，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是合二为一，没有差别。为什么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

---

①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② 蒋大椿：《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义呢？他作出解释：社会主义就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的生活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用民生主义而不用社会主义是“正本清源”。[①]这是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最基本认识，所以它主张用和平、改良的手段，使主要生产资料国有。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主要道路，是用暴力推翻旧有的国家机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国民党人非常鲜明地反对。他们认为推翻了封建王朝，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民生问题。而所谓“平均地权”，即通过单一税来实现土地国有，用改良手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样就使他们的社会革命烙上了改良、主观、空想的印记，而与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

民生史观有进步作用，但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它在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时，忽略了社会环境的作用。而所谓的人，又有明显的英雄史观，认为“先知先觉”的精英是历史创造者，而后知后觉的普通人只是实行者。国民党人士运用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目的，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诠释自己的民生主义。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往往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他们主张阶级斗争，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大谈社会革命，却抽掉了革命的精神，强调和平、经济的社会改良；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制，但反对苏俄用政权的力量剥夺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财产；他们关注苏维埃制度建设，但明确表示这个制度不适合中国；他们虽然赞扬马克思的学问，但认为中国“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②]

民生史观在如何避免资本主义而达到大同理想社会的途径上，提出“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劳永逸之计。这是一种善良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这是纯主观的想头，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个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③]

①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② 同上书，第362页。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页。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影响国民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对苏俄政府态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东方革命战略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本书第四章介绍了东方战略的出发点是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落后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为了苏俄革命的利益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给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落后民族出了一道难题，涉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①] 当初国民党人士之所以欢迎苏俄新政权，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俄政府主动宣布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将这个行动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相比较，称之为“空前的美举！”孙中山在致列宁的信中，肯定苏俄政府这种十分友善的行动“曾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希望并促使他们把俄国看作是能保证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而获得民族解放的朋友”。[②] 但苏俄政府代表与孙中山具体谈判时，却坚持要获得沙俄政府在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益。孙中山为了统一中国，当时指望从苏俄政府获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援助，特别是希望苏俄政府在新疆、外蒙古帮助组建一支精良的革命军队，因此作为妥协，他在坚持苏俄政府承认外蒙古、东北主权的前提下，同意“在北京出现改组后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之前，苏联军队应留在外蒙古；”[③] 同意苏俄政府在中东路的管理权。但是外蒙古主权归属、中东路问题一直困扰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外交，苏联政府所坚持的竟是沙皇政府对外蒙古、东北的侵略行为，这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强烈反弹与不满，成为他们日后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④]

---

① 孙中山称之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见《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孙逸仙给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③ 《孙逸仙给列宁的信》，1922年8月27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④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以中国政府对苏俄政府1919年到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未做出相应反应为理由，在同中国谈判时，对以上两个宣言不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从外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必须保证苏俄政府的一些特权。所有这些必须“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特别是对第一条的决定，遭到越飞的激烈批评：苏俄政府如果这样将宣言说成一纸空文，“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历史性跨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有的放矢，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以各国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出现。这个过程在中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这个角度透视，本书描述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阶段，此阶段大致可以 1922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至少取得了三项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启蒙）、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确定共产主义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但由于对中国特殊社会性质没有正确把握，中共提出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战略。很显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角度来探索中国革命的，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因此传播还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舞台的台口，帷幕尚待开启。

进入第二阶段（1922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徐徐打开，其标志是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初步认识到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在中共二大上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任务，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和与民主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也就是说中共二

① 列宁：《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0 页。

大纲领是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最初杰出成果。[①] 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所评价的那样："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初步地认识了实际上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这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指明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②] 中共二大初步制定了适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战略、策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初期传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第一节　中共二大前夕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规律的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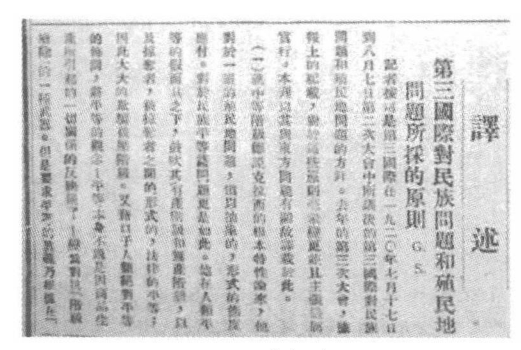
正如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如果说中共一大确定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略，表明幼年的共产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话，那么，1922 年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就有了明显的进步，为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制定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中共两步走的革命纲领是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但是本书为什么没有按照传统说法将列宁这个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定格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呢？因为：首先，这样的定格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此本书已作考证，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其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刊物《先驱》，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署名"G.S"的译文《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

① 这也是本书将 1922 年初作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第二阶段的主要原因。第一阶段该理论断断续续地传入，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解体现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第二阶段该理论完整地传入我国，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遂产生了中共二大革命纲领。东方革命理论也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来源。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0—81 页。

地问题所采的原则》，这是我国报纸第一次公开宣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先驱》创刊时间是 1922 年 1 月 15 日，而此时远东会议还没有举行。远东会议是 1922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如果说列宁的东方革命战略是这次会议代表们带回来的话，那么，这个论点就与《先驱》最先发表东方革命理论在时间点上有矛盾。最后，这样的划分将把 1922 年在远东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人应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新成果与后面的探索割裂开来。


譯述

第三國際對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所採的原則　G. S.

▲ 1922 年 1 月 15 日《先驱》第 1 期发表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文件

如前所述，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我国有一个历史过程，本书将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东方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但这些探索是局部的，还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第二阶段运用东方革命理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在中共二大上正确判断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如果说中共二大的革命纲领是东方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绽放的第一朵鲜花的话，那么 1922 年元旦中国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与《先驱》的问世则是新枝吐蕾。

一、《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与《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的发表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基本规律有突破性进展的最初成果比较集中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 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以下简称《归宿》）与《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以下简称《终止》）两篇文章中。文章作者李汉俊原计划还要写《如何使中国赶快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上去！》，目前不清楚这篇文章没有见报的原因。《归宿》与《终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李汉俊的个人行为，有理由相信它是刚刚诞生的中共中央文宣工作的重要一环。首先，作者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理论家，时在中共中央工作，反映中共中央的声音应该是题中之义。其次，中共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 1922 年 1 月 1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



▲ 1922 年 1 月 1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

个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 由此可以确定，这两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最新看法。鉴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新青年》已停刊，这天中共中央其他领导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国焘等均没有发表文章，所以《归宿》与《终止》便带有中共元旦献词的性质。最后，陈独秀将这两篇文章收入《社会主义讨论集》。综合分析，可以确定文章不仅获得陈氏的肯定，而且是党的重要文献。

《归宿》与《终止》的重要性主要是由它的内容所决定的。第一，运用唯物史观初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归宿》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国虽然开化最早，但向来与世界隔绝，独居东亚一隅发展，渐渐处于孤立地位。欧洲由于进行产业革命得到急速的进化（发展），中国与先进国家相比，“差不多要距退三四百年，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在大体上只能当中世纪家庭手工业时代的欧洲”。[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在先进生产工具、新式生产技术以及各种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崩坏。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1. 中国采取小农经济，闭关锁国隔绝世界；2. 中国在外力经济的冲击下，政治、经济产生的不平衡性；3. 世界进化程度与中国悬殊差距；4. 世界资本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市场展开的斗争，愈使国内的“纷乱无止境，内容也愈加复杂”。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8 页。

② 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 年 1 月 1 日。

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必然“步世界底后尘，发生了资本主义。在人类进化途上，以资本主义发生的结果，自然要在政治上要求第三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因为要求第三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资本阶级自然要与封建贵族争斗，以期推翻封建制度”。[①] 这些因素又促进中国社会发生急速的进化，“那机械工业正在征服手工业，新式交通机关正在征服旧式交通机关，君主立宪主义曾征服了笼统的保皇主义，第三阶级民主主义曾征服君主立宪主义，民主派曾征服了洪宪和复辟，第三阶级曾征服了贵族阶级，新文学正在征服旧文学，爱国主义正在征服卖国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征服资本主义”。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体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我们“丝毫没有悲观绝望的必要”。[②]

以上分析，表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国情与欧美国家不同，与传统农业社会亦不同，发生了新变化。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概念，但这些新认识无疑是列宁东方革命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的新成果，为中共日后正确判断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性质提供了最初思想元素。

第二，重新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列宁关于落后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无产阶级革命同盟者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太雷在 1921 年 6 月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归宿》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指出中国本应该随着世界的进化，发生资本主义，但由于多国帝国主义要掠夺中国的市场，又彼此矛盾竞争，“如果有哪几国底资本阶级去援助中国底封建贵族，要独占中国的市场，就必有别几国底资本阶级去援助中国底资本阶级，以期合占中国底市场”，[③] 使中国“更陷入混沌而且激烈”。[④] 中国的根本乱源是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市场，中国封建阶级本来应该倒台，但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似倒而不倒”；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应该获得政权，但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贵族的压迫下，“似得而终

① 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 年 1 月 1 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不得，终陷于不死不活的状态，纷争终不得解决"。[①]

以往共产党人将本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均看成是强盗阶级，"资本家是虎，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②]显而易见，《归宿》的分析已经与这个认识不同，虽然《归宿》还没有将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其分析也不够科学，与后来中共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战略同盟者的思想存在距离，但能区别中外资产阶级，表明第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同盟者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提出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完全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针对有人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为理由，责难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现在中国底产业还没有进化到资本主义确立的阶段，而你却要建设那产业比中国发达不知多少倍的先进各国所没有的国〔制〕度，并且还要在这制度下促进生产力，这不是与马克斯底唯物史观相违背么？"[③]《终止》加以驳斥：首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能作机械地解释。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理论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然而人类社会还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与法律、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有相对的独立性，生产力变化，一般来讲社会组织应该随着变化，但也不一定非要变化，因为生产力是物质的，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与生产力之间不能直接发生关系，需要中间媒介，人的意志就是这个媒介。这人类的意志在阶级社会里，表现出就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因此，我们离开了人类的意志来观察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就变成不可思议；我们离开了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论。李氏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指向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文章指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由意志来支配的，在无产阶级意志作用下，无产阶级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俄国发生社会革命，只不过是这种潮流的一种表现，即便"不在俄国先发，

① 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③ 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迟早也是要由别国人在别国发动的，因为全世界人都要推翻资本主义”。[①]这些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用辩证法的思想来分析中国革命。

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现代工业作为物质条件，如何实现现代工业呢？是先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工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直接握得政权将大产业收为国有，实现现代工业呢？共产党人主张后一条道路，认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产业发达的物质条件“不必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才能完备，在这新制度之下一样也能完备；并且还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完备得快，因为凡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所必然发生而为产业健全发展之障碍的种种产业上及社会上障碍，在这新制度之下都可以完全铲除的缘故。所以要使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不必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②]

最后，提出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概念。《终止》在阐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时，非常清晰地表示，中国产业很落后，现在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说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并不是说要在24小时以内就把中国变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奋斗的方向。由于时代的限制，文章无法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作出区别，但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提出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要进行的不是“完全社会主义”，而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一切农业都还在小农状态，手工业占全产业底大部分，小资本经营占机械产业底大部分的国家，除了把一切地主过剩的土地，大资本家所有的工场机械，一切房东所有的过剩房屋，收为公有之外，自作农所有的土地，手工业者及小资本家底生产工具，自己居住的房屋，我们无法收为公有，自然还须承认渠们私有。既然还容许部分的私有，相当条件下的私人贸易自然也不能不容许。又若生产上必需的技术人才，因为还没有了解社会主义，非报酬比一般劳动者高，不肯服务的时候，相当期间的相当差别待遇，自然也不能免。”[③]“完全社会主义”的状态与制度，自然是要待物质条件完备，才能实现，像中国这样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可以经过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大力发

① 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② 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同上。
③ 同上。

展现代经济，使“完全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备”。[①]不完全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在还没有清楚认识中国应该先进行民主革命的概念下产生的，事实上就是指向后来提炼出的新民主主义，李氏的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在内容上是相通的。

以上的认识，从思想来源上看，明显受到了列宁关于落后民族（国家）容易发生革命（见1919年4月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通过苏维埃制度等复杂艰难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见1920年7月26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与“完全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启发。[②]


▲张闻天（1900—1976）

《归宿》与《终止》引起了反响，被陈独秀收入《社会主义讨论集》。5天后，张闻天在同一份副刊上发表了《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他认同文章的主要观点：“我对于李汉俊先生明晰的眼光所看到的明晰的见解，我表示无限的佩服，并且他对马克斯唯物史观的解释，尤得我底同意，不像那批自以为马克斯专家的学者把他解释得死板而且不通。”[③]在此基础上，他对文章的有些用语提出看法。

第一，对“进化”的正确解释。“进化”一词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在当时使用率相当高。张闻天精通英文，他从英文的原意对该词的用法提出了质疑，指出“进化”英文为“Evolution”，不过是一个“过程”（Process），在自然科学上的进化为“自然的过程”（Natural Process），在社会科学上为“社会的过程”（Social Process），因此它与“进步”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进步”英文为“Progress”，包含有后者优于前者的意思，“所以社会的进化是在说，现在的社会是怎样来的，而社会的进步是在说，社会应该怎样去的，这其间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加以区别，

① 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② 列宁在1915年8月《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据此提出发达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后又引申出“完全社会主义”的概念。

③ 本小节张闻天与李汉俊有关“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的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来自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5日、6日。

有一些结论就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如李文认为中国过去的混乱是中国社会急速进化的表现，中国将来的希望就悬在这点上，丝毫没有悲观绝望的必要。李文的意思是清楚的，但得出纷乱一定产生进化的结论不严谨。这个结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进化”用得不准确，应该用“进步”；一是纷乱有两个结果，可以产生进步，也可以产生灭亡。“我们受过科学洗礼的人，一定要看透：怎样的纷乱会产生灭亡；怎样的纷乱会产生进步”。此外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说明“进化”与革命不能等同。生产力犹如流水一般，富有流动性，生产关系像这流水的横断面，具有固定性；当这两者和谐时，就只有进化；如果这两者发生冲突不能消除时，就发生革命。

无独有偶，正当张李讨论“进化”与“进步”时，《先驱》发表了《革命与进化》，[1] 鲜明地指出“进化是一点一点的渐进的改革，革命是猛烈的，全的，彻底的变动。一个新时代在旧时代的母孕中化育完成的时际，必要有一次迅遽的，全体的，彻底的新发展。这种新发展，如果没有旧势力、旧秩序的束缚拘牵。这新生于没有什么痛苦的中间，便可以诞育出来。我们也未尝不愿取一种平和的手段，只是新生是必要发生的，旧秩序的束缚妨阻是必不能免的，于是乎革命乃为诞育新生必经的途程，乃为打破旧制度、旧秩序必须的手段。”

第二，对“调和”作正确的解释。李文中与“进化”连用的还有“调和”一词，《归宿》的结论是“中国底乱源，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底各局部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激烈的调和作用；一是因为中国在全体上与世界底进化程度悬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调和作用；一是世界底资本阶级与中国底资本阶级在中国这个市场上的争夺战”。[2] 由于调和作用是在进化方向上，所以“中国底乱源不是只能产生灭亡的混乱，乃是产生进化之可能的混乱，并又进而断定这混乱要中国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才能终止”。张闻天认为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中的“调和”有妥协的意思，中国人的“根本精神是自为调和意欲”。正是这种妥协，“在今日的中国如其再主张什么新旧调和，南北调和等这种臭调子，正是灭亡之征兆”。

---

① 《先驱》第3号，1922年2月15日。

② 汉俊：《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1月1日。

第三，提出解决中国乱源的具体办法。李汉俊提出解决乱源的根本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张闻天则提出了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办法。第一就是“从旧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觉醒转来并且有同样改造目的的（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个人团结成死党。”所谓“死党”当指无产阶级政党。

对此李汉俊写了《读了张闻天〈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①]作答，张闻天又复信继续讨论。在讨论中李汉俊接受了张闻天的批评，认为用“进步”更准确，同意张闻天所说的妥协的调和是绝不能产生进步的看法。张闻天关于“死党”的提法，李汉俊十分赞同，并就建立“死党”的必要性与组织原则，提出具体的看法。这些看法与蔡和森同毛泽东讨论的建党思想，构成了中共党建理论的最初内容。特别珍贵的是，他们在讨论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张闻天认为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死的东西，它“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余地的”。李汉俊表示同意，但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经济理论、社会民主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是“浑然的有机完体”，对这个“有机完体”（引者注：即理论体系）不能自由“伸缩”，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别的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各个国家必然要和各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产生适合他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要成为什么呢？现在还不晓得，这就要靠中国人底努力了。我们努力底结果，或者能够造出什么来。张闻天先生！我们大家来努力罢！”[②]

李汉俊与张闻天的讨论很有意义，首先，这场讨论是对《归宿》与《终止》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补充。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主要通过日文和英文翻译成中文，他们俩人的讨论是从翻译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篇章。张闻天认为翻译有“意译”、“音译”，[③]必要的时候可以创造新字这样三种译法，但不管哪种译法，都必须搞清楚词的原意。在运用外来语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汉文，应该注意译文的语境等。这些意见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对一些外来语滥用的情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最初传播的主渠道是日本，先进的中国人是从日文中学习马

---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2—6日。

② 汉俊：《读了张闻天〈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6日。

③ 传播初期，不少译文是节译，但多半不加说明。

克思主义的。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问题：一是带有日本“味”的概念，如“进化”、“调和”等是否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境？一是日本社会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缺陷，是否也直接影响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讨论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后，李汉俊关于要中国人努力，产生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要结合国情、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底努力了”[①]与张申府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希望东方”等表述相似，展示出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触及到了今天谓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话语的脉动。


覺悟

民國日報

▲ 1922年2月6日李汉俊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二、《先驱》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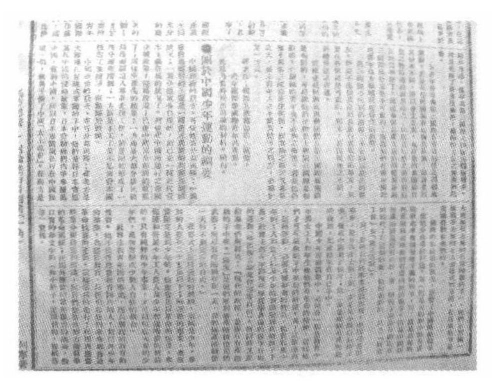
《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刊物，1922年1月15日创刊，四版八开，设置“评论”、“言论”、“研究”和“译述”等栏目。原定半月刊，但因种种困难，常常不能按期出版。自创刊号至第3号由北京地区青年团组织主办，刘仁静、邓中夏任主编。从第4号


先驅

▲《先驱》创刊号与《先驱》主编之一刘仁静（1902—1987）

① 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起迁至上海，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主办，施存统任主编。从第 8 号开始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正式成为团中央的机关报，蔡和森、高君宇担任主编。1923 年 8 月 15 日停刊，共出 25 号。由于 1921 年年底《新青年》出版到第 9 卷 5 号后，一度休刊，直到 1922 年 7 月才出版第 9 卷第 6 号，而此前《共产党》月刊已停刊，也就是说有半年以上时间，中共中央没有机关刊物。在这一“真空”阶段，《先驱》实际上起着中共中央宣传窗口的作用。下面从四个方面论述《先驱》在传播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方面的重要贡献。



▲ 1922 年 4 月 1 日《先驱》第 5 号发表《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

第一，以列宁东方革命理论作指导，剖析中国特殊的近代社会，为制定中国革命战略提供思想材料。《先驱》在《发刊词》上讲得十分清楚：“‘先驱’要告诉读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就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①]

要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必须用先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指南。《先驱》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指导原理，尽管中国现代经济很落后，但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与其他资本主义成熟的国家有同样的急迫”。[②]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更是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南针，故此《先驱》在创刊号上专门发表了署名“G.S”的译文《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这是国内继《共产党》月刊发表共产国际二大的宣言之后首次发表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该译文为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前 1/3 的内容，即第 1 至第 5 部分的内容。译文虽短，约 1400 字，有的地方翻译得也不十分准确、通顺，但它让中国人初步了解到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一些基本内容。

① 《先驱》创刊号，1922 年 1 月 15 日。

② 《马克思诞生百年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先驱》第 17 号，1923 年 5 月 10 日。

比如，它强调指出："国际共产党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大政方针是：联合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有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一起，同力从事于革命的争斗以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不如此，民族平等和民族受压制是不能消除的。"怎么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呢？译文强调只有联合苏维埃势力，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否则"是万万不能的了"。[①]

《先驱》为什么要刊载这篇译文？"记者按"作了说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方针，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更"主张严厉实行"。因此，"本刊以其与东方问题有关故译载于此"。这就是说，《先驱》执行共产国际三大的精神，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方针原则作为观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命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思想武器，作为《先驱》必须要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名实相副。按照《先驱》的计划，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译文将陆续发表，但《先驱》第 2 号（1922 年 2 月 5 日）没有连载，原因不详，可能与同年 4 月（即《先驱》创刊 3 个月后）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有关，《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全文刊登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随后，《先驱》"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4 月）、"五一纪念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5 月）特刊，以及第 10 号转载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传播了列宁东方战略的基本思想。不久，即 1922 年 11 月，《向导》第 9—11 期连续发表了萨发洛夫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等，其内容都是依据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解读远东各民族的实际革命。总之，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通过《先驱》与《向导》、《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等载体，以及参加远东会议回国代表们的传达等多种途径，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将列宁东方革命理论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结合，直接促成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原则。

《先驱》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道路作进一步探索，其代表性的文章有《发刊词》、《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今后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的运动》和《中国青年应有的觉

① 《先驱》创刊号，1922 年 1 月 15 日。

悟》等。表面上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探索，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认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新思考，为中共二大政治纲领的制定作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

首先，剖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大上制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基本原因是没有科学地判断近代中国“两个半”的特殊社会，而是按照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将我国定位为现代经济很落后的资本主义。《归宿》与《终止》虽然对中国特殊社会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但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里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先驱》则有了完全不同的表述，在《发刊词》上明确写道：近代中国，“与外人通商的结果，旧的农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已次第为新的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组织所撼动所代替了”。《〈共产党宣言〉的后序》[①]中，虽然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但明显否定了我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中，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中国经济状况“可依性质分为两种：一为在内地乡村的，还是一种旧式农业的和家长制的状况；一为在边境各口岸的，则已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了”。[②]列强在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首先是经济侵略，用武力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完全经济的“奴服”，其结果是大部分农民“被倾覆而驱迫入都市去找工作，于是开始形成了一部分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手工业不足与资本国机器工业竞争，渐渐归于毁灭”。[③]因此中国与其他东方民族一样，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猎场”。[④]经济支配政治，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除支持封建势力作为维护他们的统治的社会基础外，还“时而援助这一个军阀，时而援助那一个军阀，以阴图中国的利益，所以才把中国闹到这样纷乱的状态。”[⑤]

以上表述虽然没有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专用名词，但在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里还存在“旧式农业的和家长制”，实际指向

---

① 《先驱》第3号，1922年2月15日。

② 《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③ 同上。

④ 《在国际青年共产革命运动之下，我们中国青年应有的觉悟》，《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⑤ 《今后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的运动？》，《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半封建社会”；在封建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边境各口岸的则已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实际指向“半殖民地社会”。

其次，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路。《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①]指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斗争，使它分成两段程途。“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与此两个阶段的程途相对应，便是“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在自己的手中”。这表明党已开始意识到在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首先联合“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去“完全倾覆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执掌政权。

《先驱》两步走的提法，比《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中的“两步走”有很大的进步。《阶级》两步走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涉及中国的特殊社会。《先驱》的第一步就是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是当前的目标；第二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方向。这样就将现实斗争与理想结合了起来。《先驱》两步走的提法与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相比，尽管不够严谨，也不够科学，但基本思路是清晰的，成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雏形。

最后，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初步分析，揭示中国革命的对象、主力军、同盟者，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对此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早有感性认识。《先驱》引人注目的是，直接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初步分析帝国主义垄断、金融寡头等特征，指出它们为了“寻觅新商场和采买原料之必需而起的殖民政策，与国别资本家成群结党的竞争，自然而然地引起帝国主义战争”。[②]统治中国的军阀、财阀都是帝国主义孕育出来的“走狗”，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先驱》响亮地号召：“可敬爱的兄弟姐妹啊！打倒国内军阀，财阀和打倒国际

---

① 《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此文是1922年1月参加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议定的大纲。

② 《国际青年共产党党纲》，《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主义侵略”。[①]

《先驱》指出工农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虽然它没有用“主力军”这个关键词，但这里的“生力军”与“主力军”实际是一个意思。《先驱》指出世界的财富都是劳动者用两只手创造出来的，劳动阶级是革命的生力军，“大半在都市里工厂劳动者，小半为乡间里田野间的农夫”。[②]劳动者是将来社会的主人翁，是最有势力的阶级，其中坚是产业工人。所谓产业工人，“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③]无产阶级的解放全靠自己，“不要怕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势力，只要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的反抗力觉醒起来，我们的势力就比他们的大得多，不但可以抵抗他们，而且可以推翻他们。如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在这几年中，把皇帝、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一律推翻，建设工人、兵士、农人的共和国，就是明证”。[④]

“小资产阶级”是《先驱》常议论的概念，但没有统一准确的界定，大致上指小商人、农民、小生产者，[⑤]亦有扩大到工厂主（笔者注：即民族资产阶级）的。[⑥]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⑦]《先驱》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剖析：首先，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纯依阶级划分”。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地位虽是贵族，但思想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又如一部分工人，如美国的劳动组合（AFL）等，“他的位置虽是无产阶级，（但）他的思想却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⑧]其次，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征是

① 《在国际青年共产革命运动之下，我们中国青年应有的觉悟》，《先驱》第5号。

② 马达：《民间宣传及知识阶级专政》，《先驱》第2号，1922年2月5日。

③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④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一纪念节”敬告工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⑤ 剑（刘仁静）：《答六幾和东荪》《先驱》第6号，1922年4月15日。

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⑦ 同上。

⑧ 剑：《答六幾和东荪》，《先驱》第6号，1922年4月15日。

"常摇动的，常徘徊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思想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他有变成资本阶级的可能，所以他有时是极强而有力的资本主义拥护者。""但有时他又被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压迫，使他的境遇愈沦于悲惨了，于是发生走于极端的革命主义而不能固定他们的思想，坚实他们的组织和训练。"[①]

《先驱》对知识分子比《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有了进一步的剖析。首先，对知识分子具体划定了对象，指的是学生、教员、学者、政客，及一切读过书本的人。其次，将知识分子分成两部分，即一般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被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的"劣根性"是好说空话，"他们只坐在安乐椅上高谈革命，议论风生，一讲到实行，就要〔移〕逃遁了"。他们好闹意见，"凡论事不凭简单的直觉，即凭拘迂的学理"。他们好做领袖，"他们高兴时把这革命的担子担起，怒〔恐〕怖时又可把这革命的担子卸下了"。[②] 革命知识分子必定"附属于无产阶级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上面的，那就真有不朽之价值"。只有这种附属才能克服知识分子之个人主义的心理，[③] 成为"有知识的劳动者，及真实革命的共产主义者"。[④] 最后，阐述革命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革命必须要有科学的思想指导，而劳动阶级因没有文化，不能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这需要知识分子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向劳动者灌输，使劳动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先驱》记者曾主张在"知识阶级"前面加上"无产者知识阶级专政"[⑤] 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专用名词。《先驱》要求革命的青年"现在所必须作的就是'宣传'。我们无论在文字上，口头上，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共产主义尽力地去宣传，以求主义的普遍"。[⑥] 这体现了共产国际二大要求进行民主革命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加紧宣传共产主义的精神。

1922 年年初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认识发生质变转型期的开始，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无疑打上了转型期的烙印。初期的《先驱》一方面还是将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掠夺，另一方面又将国际资本主义

① 剑：《答六幾和东荪》，《先驱》第 6 号，1922 年 4 月 15 日。
② 马达：《民间宣传及知识阶级专政》，《先驱》第 2 号，1922 年 2 月 5 日。
③ 《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党学生第一次大会书》，《先驱》第 5 号，1922 年 4 月 1 日。
④ 马达：《民间宣传及知识阶级专政》，《先驱》第 2 号，1922 年 2 月 5 日。
⑤ 同上。
⑥ 《今后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的运动？》，《先驱》第 5 号，1922 年 4 月 1 日。

和国内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一方面看到国内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一方面又认识到了国内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先驱》与李汉俊文章的观点相同，认为国内的资产阶级“绝无具足社会革命条件的能力”，它们领导的民主革命“至今还在流产之中”，[①] 其原因是该阶级“既没有设立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和技能，尤没有政治的奋斗和觉悟，其政党的“基本的党员还没有第三阶级的意识，故对于其党魁的政见和计划，至今还不能了解奉行，加以国际资产阶级，常常乐于援助反动势力以延长内乱，故第三阶级的政治革命早已没大希望了”。[②]《先驱》虽然还无法将新旧民主革命区分开来，但这里的第三阶级革命指的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意思则是清楚的。

《先驱》以上的认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初期探索的最新进展。将这些探索与《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中共一大前后的探索联系起来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启发下，对中国革命最初认识的轨迹就清晰地展现出来，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正是这些探索的继续和阶段性的杰出成果。

第二，积极参加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1922 年 1 月《先驱》创刊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已接近尾声。尽管如此，《先驱》仍然积极投入战斗，从第 1 号到 23 号，共发表约 10 篇文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进行批驳，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

《先驱》创刊号首先刊发“仁任”（笔者注：即刘仁静）的《革命与社会主义》、“重远”（笔者注：即邓中夏）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署名“剑”的《杂感》等三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里，刘仁静先是引用了《时事新报》发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幾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靶子，然后逐条驳斥。徐六幾的文章说：“朋友们！社会主义正着急呢，正啜泣呢，他还是一个无主的孤魂”，“你们把他的灵魂骗了去，在那里放革命的空炮”。对此，刘仁静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正是社会主义的灵魂。他们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灵魂抛弃，空呈露着一社会主义的死躯壳”，这样一来，社

① 《〈共产党宣言〉的后序》，《先驱》第 3 号，1922 年 2 月 15 日。
② 同上。

会主义还真的“啜泣和着急了”。接着，刘氏进一步论证了革命不是放空炮，而是“以武力推翻敌人”。同时，革命“连带的训练了无产阶级”，“铸成了他们的新哲学、新伦理学、新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活动，刘氏认为，在“共产主义者当劳动者尚未觉悟的时候，他于组织劳动组合之外，当然要借文字的帮助来鼓吹他们革命的哲学，讨论革命的方法。他只要不是以鼓吹为终极的目的，怎样见得他是放空炮？”最后，刘氏反唇相讥，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做些令人不懂的文章，宣传些生吞活剥的概念”，“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灵魂丢开了，只抱着无生无气的社会主义的躯壳”，如此一来，“他们如何不糟蹋社会主义呢！”

徐六幾在《改造》杂志第 3 卷第 11 号发表的批评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文章里，引用英文时将原意翻译错了。“剑”在《杂感》一文中：“忠告六幾君说，请再去补习两年英文罢！”特别告诫：补习英文以准确解读和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地把握西方经典著作的要旨，不要断章取义。针对徐六幾所说的“马克斯对于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团失败以后，已经完全抛去了”的观点，“剑”以动态的眼光考察了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到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再到 1874 年马克思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意见等历史过程，认为马克思不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教训，修改和完善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成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晚年马克思修改和完善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很显然的代表马克斯思想的进化”，而“现在六幾君要马克斯自老而少的活转去，以少年的思想去否认老年的思想呢！”马克思根据变化了的革命实践，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开放与发展的理论体系。

对于徐六幾研读斯巴戈的《布尔扎维克主义》一书而标榜自己“学有渊源”，“剑”指出：“六幾君反对俄国而以斯巴戈为根据，未免太可怜些”。退一步讲，如果真的想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剑”建议徐六幾“在英文学好了之后很可读一读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因为“考茨基至少还没有如此的错误”。但即便如此，“他已被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汉奸考次基》（今译名《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托罗次基

（引者注：今译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恐怖主义，反对考次基》二书骂得狗血淋头，至今张口不得了”。

最后，“剑”强调指出，徐六幾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并举出了小资产阶级若干前后矛盾、左右摇摆的言行，他们的“思想同天气一样变得快”，他们“徘徊于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使然。

除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众多社会主义中有影响的一派。李达指出：“近来各派社会主义发生，范围复杂，遂有所谓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的名称”。① 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全国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有 70 多种。② 它最初传入中国时，除其强烈的反抗性，对当时的专制统治及社会思想体系形成了较猛烈的冲击，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外，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无政府主义也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与马克思主义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两者毕竟有着根本性质的差异，当它们的宣传日趋深入时，这一点也就表现得日益明显，所以，两者的交锋论争不可避免。

《先驱》创刊号发表了“重远”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这篇文章本来是邓中夏给朋友写的一封信，但是，编辑部认为“他们讨论的问题颇为重要，故发表于此”。文章对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者的联系、区别进行了剖析，有利于人们从理论上划清它们的界线。作者多次引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展开论述，得出结论：“总之，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开他视为掌上珠、图案画、绣花衣的最美妙的理想目的以外，却空空毫无所有了”。 此论真是一语中的。《先驱》创刊号除了刊发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号外，共刊发了 6 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论争的文章占了一半，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虽然后来《先驱》将重点转向了宣传中共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但

---

① 李达：《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新青年》第 9 卷第 2 号，1921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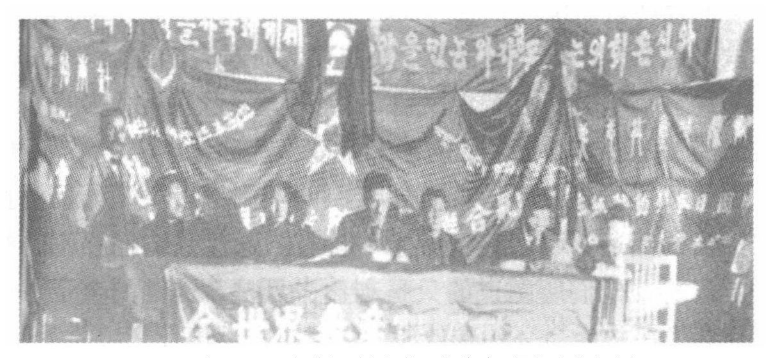
② 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4 页。

还是安排了几篇文章参与社会主义论争，如第 3 号刊发了“旋”的《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励冰”的《〈共产党宣言〉的后序》。前者指出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具有四个特点：非革命的，不主张国家经营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指出：“马克斯主义的精髓在综言进化说和革命说，故其要点就是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三种原理，一贯相承……实现消灭国家政权的共产主义社会。”[1] 这种观点虽然不十分全面、准确，但反映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自主选择和自我诠释的认知水平。

《先驱》参加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与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使之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在论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国情，阐释中国民主革命的一般规律，体现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新认识。

三、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对东方革命理论的进一步传播

共产国际于 1922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2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这次会议，除派张太雷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外，还与中国国民党等革命组织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具有广泛代表性，共 44 人，团长张国焘，其中 39 人为正式代表。按党派分：中共代表 14 人，国民党代表 1 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代表 11 人，无党派人士 13 人；按职业性质分：工人代表 10 人，记者代表 10 人，教师代表 3 人，学生代表 3 人，其他各类代表 13 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次派遣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也是国共两党代表首次携手共登国际舞台。大会的具体情况请见第四章第二节。



▲ 1922 年 1—2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会场

① 励冰：《〈共产党宣言〉的后序》，《先驱》第 3 号，1922 年 2 月 15 日。

在远东会议期间，1 月 30 日至 2 月 2 日，莫斯科还召开了“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与远东劳动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抗华盛顿会议、宣传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经过这两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而使他们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有了更全面、具体的了解。两次大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会议精神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中共二大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纲领的制定，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一，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首先从整体上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属性。反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始终是绵延不断的，但是长期以来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非一致，甚至还存在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者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国家或者某一侵略事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多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在反对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如五四运动，并没有上升到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层面，没有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五四运动虽然是一大觉醒，但主要矛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宣言直接告诉远东人民，“困扼”远东人民的是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摧残与劫掠”，“遍朝鲜全境，都被日本侵略屠残的血淋湿了。日美英法的强盗们正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来造成他们生活的甜适（引者注：疑为“食”）。这些强盗们并不将被压伏的民族当人类看待。他们所图谋的只是利益，只是黄铛铛的金子；为了诛求这些，几百兆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的眼里！真不值什么。”[①] 最近这些强盗们集会在华盛顿，“图谋成功一个结合更有力的来侵略远东各民族。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他们已结成了他们吸血者的同盟。”“英美日法在太平洋上因势力冲突而即将现在目前的战争是暂时延期了。但是他们只是将他延期了，并不曾将放弃。他们所以将这个战争延期，完全是要并力来苟延他们抢劫的残喘。”[②] 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治外法权，在中国“把重要的海港，重要的内地交通，重

---

①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先驱》第 10 号，1922 年 8 月 10 日。
② 同上。

要的政治中心都握在手里，他的权力已经遍处皆是"。[①] 中国军阀是被帝国主义"搬弄"的民族"渣滓"，"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卖国，一点一点的卖给外国强盗；他们的第二件事，是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把自己卖给外国强盗"。[②] 他们是中国内乱、破坏民国的祸害。因此中国人民首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

第二，正确定位中国特殊的双重社会性质。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在远东大会上作的《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指出，把远东工业后进国的"社会和阶级发展的步趋弄个明白"，是远东各国共产主义者、革命家的"责任"。[③] 报告根据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对中国社会等问题进行阐述，明确地指出中国与印度、朝鲜那样的殖民地国家不同，"表面上像是自由的国家，但在事实上却完全受到列强的支配，特别是受到日本和美国的支配。"[④] 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取一种军阀官僚组织的形式，这种组织，统治一种家长式的小农经济制度"。[⑤] 这个认识清楚地说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路上不过才走最初步"，[⑥] 而带有封建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国与远东各国一样，工业先进国的资本主义利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与势力，"去剥削他们的天然富源，多量劳力和原料，以为肥润他们自己的用处"。[⑦]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决定中国革命进行的是"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也就是进行反对督军和主要反对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为中国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获得真正独立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⑧] 因此，"现在中国劳动群众和群众中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

---

① 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② 同上书，第280页。

③ 同上书，第277页。

④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致中国、日本、朝鲜、蒙古青年书》,《先驱》第11号，1922年9月3日。

⑤ 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⑥ 同上书，第276页。

⑦ 同上书，第276—277页。

⑧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节录）》，同上书，第291页。

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①]用“民主共和国”替代“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提法，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中国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主革命，从而帮助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前途等主要问题的认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党的民主革命分两步走纲领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土地收归国有”又超出了民主革命的范围，这个方针后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

第三，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共一大上讨论过同盟者的问题，但做出的决议是对同盟者持排斥的立场。列宁东方革命理论传入中国后，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那么革命的同盟者有哪些呢？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有明确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是民主革命，但领导者是劳动群众中的先进组织共产党，工人与农民是革命的基本群众。农民群众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是中国革命的柱子，若不唤起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假如不唤醒农民群众，不告诉他替代这些毁坏国家的并为未来中国人民掘着坟墓的苟［苛］政重税而设立一种一律的税则并且设立被人民选出和为平民负责任的政府，单是几个劳动小团体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急进分子是成不得什么事的。”[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知道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是不能靠美英日等资本主义扶助来发展的，无限度地掠夺是这些强国的利益所在。因此，将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消除内乱，不但是共产党人的责任，也是有良心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因此，无产阶级可以联合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作战。“同时我们必须明明白白的说：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的劳动者必须踏稳他们自己的脚步，不可和任何民主党或资产阶级分子混合。”[③]在会议上，列宁还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形式提出了建议。

体现以上精神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萨发洛夫的《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

① 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节录）》先后在《先驱》与《向导》上刊发，不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普及教育，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认识。

第二节　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制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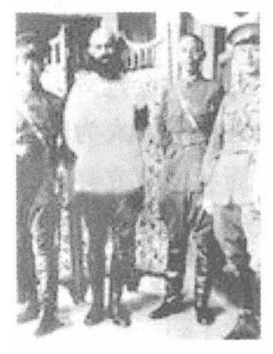
远东劳动代表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而且针对时代的变化与远东各国国情，使之更加具体化。远东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东方革命理论付诸于革命实践，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规律作了进一步探索，最初的成果除了有关文章外，还通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彰显出来，为中共二大作准备。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旧址（今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路西路230号）

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1922年5月1—6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共173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①]会议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10项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早在4月底，中共中央局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由青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达林出席会议并报告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与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情况，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党对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达林在广州

① 倪兴祥：《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劳动大会由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持。劳动大会的主要成果：首先，明确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①]没有将本国资产阶级列入战斗口号中，表明党对当前的革命目标的改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其次，通过大会破天荒地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其三，提升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声望。有文章指出，以产业为主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中坚”，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这个中坚，便没有了“战斗的能力”。[③]其四，提出了工会的斗争方式、组织原则等。最后，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探索，明确提出中国现在是“在半封建的武人统治之下”的社会。[④]

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广州东园）

1922年5月5—10日在广州东园隆重举行。此时全国已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17个地方建立了团的组织，团员约5000余人。出席大会的有全国15个地方团组织，共有代表25人。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出席指导。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等4个文件，并作出了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决定。大会选举方国昌（笔者注：即施存统）、张太雷、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等5人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方国昌为书记。大会正式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大会通过的文件表明中共党团在中国民主革命基本规律上的认识又前进

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93页。

② 同上。

③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④ 和森：《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了一步。首先，以国际视野解剖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以下简称《纲领》)[①]指出，现在的世界“完全为欧美资本帝国主义所威胁。这可惊可怕的欧美资本主义大企业日益扩张，其出产品的大部分并不销售在欧美自己的国内，而输出于欧美以外的国家。”为了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列强就不断地用武装侵略弱小民族。中国和朝鲜特别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对朝鲜、英国对印度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不同，“另取一种形势”，即各帝国主义“都以中国有广大的肥美土地，多量的贱价原料和多数的消费人口是一块肥美之肉，各想夺取比较他国更优越的权利，遂至互相争夺，而造成中国现今在国际上的特殊状况。”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独占中国，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于是“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于是列强更借为口实而谋瓜分中国或共管中国”，所以中国特殊的状况正是帝国主义势力造成的。欧美资本的侵入，在“大都市又产生了欧化的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也采用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形式用资本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但他们“虽有相当的势力仍未得着充分发展的机会”。中国广大的农民与无产阶级之失业和贫困“日甚一日”。

其次，提出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最后，给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基本思想注入新的内容。1922年1月莫斯科东方少年革命党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见《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纲领》则明确第一步的革命是民主革命。《纲领》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的“民主革命”，从行文来看还是旧民主革命范畴。造成这个不足的原因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须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在《纲领》看来，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只是参加者，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

① 《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第二步就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

这个提法与青年团一大会议主席张太雷的思想密切相关。张太雷在1921年6月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就有类似的表述，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时，“要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统治者，然后再设法使资产阶级遭到同样的命运”。[①] 张太雷的这份报告是他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共同起草的，[②] 也就是说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个截然不同阶段，前一阶段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说法极有可能也是舒米亚茨基的看法。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说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个截然不同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无产阶级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后，再来革资产阶级的命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主要内容的话，[③] 那么张太雷与舒米亚茨基起草的这份书面报告，已经有无产阶级“帮助”、“援助”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其实这个思想来自列宁。他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④] 中至少有四处提到，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援助”落后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后称“民族革命运动”）。但列宁与共产国际其他领导同时又强调民族革命运动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使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不应该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⑤] 可见“两阶段论”的思想与共产国际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要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来领导的思想相抵触。但令人费解的

---

① 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② 《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联席会议记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称，这份报告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起草的。转引自《张太雷研究史料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③ “二次革命论”长期以来是作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主张之一而遭到批判，有关这方面的综述请见肖芳林、罗玉明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④ 《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7页。

⑤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同上书，第147页。

是，“两阶段论”的提法却在中共文献里一再出现，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的提法是“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①]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只是去“帮助”、“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②]以上引文尽管在用语上有差别，但实质是一样的。共产国际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宣传有严格的纪律，中共一些提法，特别是一再出现的提法没有得到它的批准（有的就是它的提法）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肯定的是“两阶段论”绝不是张太雷的灵机一动，笔者认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提法（或者是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的看法）。由于文献的缺失，这个提法如何通过张太雷这个中介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与发展论、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斯大林的“革命三阶段论”，以及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有什么内在联系，需要研究。

值得注意的还有，《纲领》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广泛，将“农人、小商人和小工厂主或工厂以及知识者”均划为小资产阶级。这是五四时期对小资产阶级泛用的又一个例证。当时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既不科学也不统一，大多数是与资产阶级相对应，以资产的规模作为界定的标准，即对资产规模比资产阶级小一些的有产阶级的统称。有时文件中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这种对小资产阶级的泛用在大革命时经常困扰着共产国际、中共，以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主要领导将汪精卫集团视为小资产阶级，因而产生了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的“左”倾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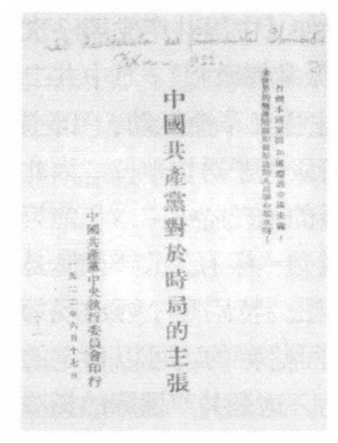
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签发《主张》的时间是1922年6月15日，

①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上书，第77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6页。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 年 6 月 17 日印行

印成小册子是二天（17 日），见之于报刊是 6 月 20 日。[①] 发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动荡的时局。1922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打败奉系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公开鼓吹“武力统一”。孙中山则采取联奉的策略，企图恢复民国正统。南方各省军阀及其政客提出“联省自治”相对抗。一时所谓社会贤达、政客提出的“好人政府”、“制宪救国”等各种解决时局的主张纷纷出笼。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对纷乱的时局，阐明自己的立场，向全国人民指出解决中国时局的正确之道。

第一，指出造成中国乱局的根本原因。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一直到 19 世纪的鸦片战争，才使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军阀对内压迫是造成中国内忧外患，人民不能脱离痛苦的根源。而在帝国主义与军阀之中，帝国主义又据主导地位，“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

第二，对“旧式的反抗”最高峰辛亥革命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中共文件首次对辛亥革命的公开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不是如后来主流观点那样称辛亥革命是失败，而认为辛亥革命是由改良运动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在中国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其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前者是反对封建专制，开创中国民主政治；后者“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所以辛亥革命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2 年 6 月 17 日印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单行本 5000 本散发，《先驱》第 9 号（1922 年 6 月 20 日）、《共进》（1922 年第 17 期作了转载。

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所谓“旧式”革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民国以后，领导革命的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造成封建军阀掌握政权，使中国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①]《主张》排列民国建元以来发生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诸役、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七件重大事件，说明中国的纷乱是由军阀战争造成的，因此中国要建设民主政治，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打倒军阀。

第三，批评了各种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针对直系军阀为欺骗国人提出所谓“总统复位恢复国会以维法统”的论调，《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解决时局之中心问题，“其实是大谬不然。由根本上说起来，封建式的北洋军阀不消灭，他们自袁世凯以至今日天天怀着牢不可破的‘北洋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有何总统国会能够行使职权？”所谓维持“约法”，“除了把万世一系的天皇换了由国会选举的总统以外，都是抄袭日本宪法。约法里虽然也载了几条人民之权利，同时又轻轻用‘得依法律限制之’七个字打消了，这种法统不但我们不满意，就是最近的广东政府也不建设在护法上面了”，何况现在鼓吹“恢复法统”的人，正是以前破坏法统讨伐南方护法政府的北洋军阀。

《宣言》揭露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是假民主政治。对一般意义上的自治，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反对，《宣言》指出，在中国封建专权的政治下，主张地方分权，“虽然不是政治纠纷之根本问题，自然也算是民国史上政治纠纷之一种，国民党就是始终坚持地方分权，在政党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加以非难。”具有民主政治的联省自治，应该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专制的军阀政府，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但现在的联省自治却是联合“几个封建式的军阀”来冒称“联省自治”，“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

---

① 施存统（CT）于1921年5月16日撰写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就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后，出现的袁世凯专制是中国封建制度造成的，断不能归咎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尤其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我们革命党总万不应该有”。“我们所不满意于辛亥革命的，乃因为彼是不能彻底的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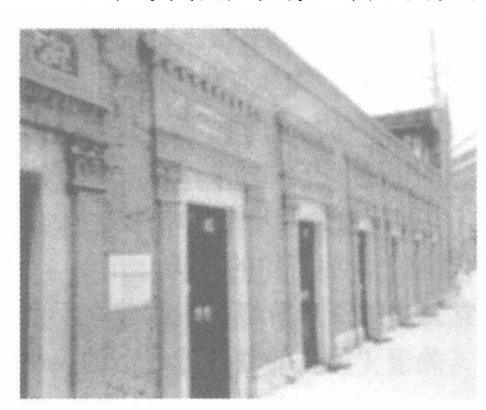
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刊》第2号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政治改革的方案，并列出“好人政府”应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三条原则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六个主张是：早日召开南北和平会议，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等。《主张》指出，主张“好人政府”的诸君，一方面发出向恶势力与反动军阀专制作战的呼声，一方面又阻止孙中山的北伐，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想在军阀势力之下实现政治理想（好人政府），非但不可能，反而正在蹈民国初年统一党与袁世凯妥协，进步党与段祺瑞妥协的覆辙！对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国民党本来应该“始终为民主主义而战，宁可战而失败，不可与北洋军阀妥协而失败”，但民国以来，国民党却多次与北洋军阀妥协，致使民主革命失败。《主张》诚恳地希望国民党诸君不再为北洋派代表人物的“欺人的好听的空话所误！”

第四，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并提出了11项具体的准则。

《主张》的发表，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进步，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考察。就形式而言，《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社会上亮出自己的政见。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作为媒体和大众而言，是通过《主张》才首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尽管此前有《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局的通告（1921年11月）等文件，但都是党内文件，而且直到1957年后才渐为人知。尽管在《主张》发表前后，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发表了不少文章探索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但那毕竟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尽管此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公开文献，《共产党》月刊亦刊发了“短言”、时评等，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但这些文献不仅发行量有限，而且其地位毕竟不能与中共中央正式签发的文件相提并论。

就内容而言，《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宣布自己的政见，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制宪救国”、“废督裁军”、“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改良主义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当务之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并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等11项具有可操作性的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应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解剖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最新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策略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表明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条件已经成熟。

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上海南城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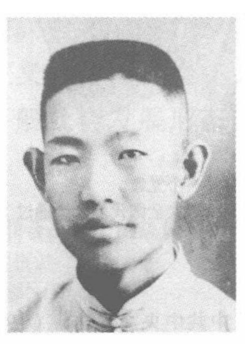
1922年7月16—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项英等12人，代表全党195名党员出席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震瀛（1896—1937）



▲谭平山（1886—1956）



▲王尽美（1898—1925）



▲许白昊（1899—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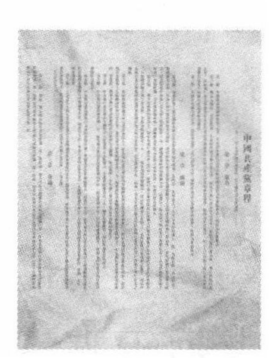


▲项英（1898—1941）

的经过、精神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通过了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负责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讨论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与《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举了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担任委员长。

中共二大具有里程碑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战略与策略两个方面。战略上正确地考察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①]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战略的确立，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策略上正确地制定了与以中国国民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



▲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78页。

的。”[①] 因为封建军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同敌人，两派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共同敌人，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议决案》在倡导与民主派组建联合战线时，并没有忘记自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是提醒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它主张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③] 这个《议决案》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关于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领导革命斗争在策略上的灵活性特点。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对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两年的时间，[④] 就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是件很了不起的事。首先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的巨大影响；其次要归功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懈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探索。

对中国社会的正确定位是制定革命战略的出发点，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判断是确定革命任务的首要依据。近代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与一般社会发展程式有别。所谓一般社会发展程式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以马克思对一般社会发展形态作为判断近代中国社会的航标，也就是

---

①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本书以1920年6月上海党组织成立的时间算起。

说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之处只是现代产业刚刚起步，资本主义还十分幼稚。据此中共一大确定的中国革命道路便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错误，才导致了党在革命战略方针上的失误。纠正失误的起点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传入，最初成果就是共产党人在中共二大前后开始的对中国特殊社会性质的探知。

迄今几乎所有的党史著作都是把正确地“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作为中共二大的主要贡献之一，[①] 这给人的印象是中共在二大上已经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概念连用了。事实并非如此。中共二大，以及稍后一段时间，中共都没有这样连用，更谈不上对此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它的理论来源固然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但最终形成完整科学的理论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独立探索的结果，凝聚着中共领袖、理论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对“两个半”社会的正确认识与理论总结是一个历史过程，[②]1922 年初到中共二大是起始站，到延安时代才使之成为完整、科学的概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两个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最初是作为两个概念分别出现的。“半殖民地”是相对完全殖民地而言的，意含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这个概念有学者考证是列宁 1915 年首先提出的。[③]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将被压迫民族划为三类，一类像印度、朝鲜等处于直接的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一类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三类是被帝国主义大国打败，由于签订了合约而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 页。

②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历史考证不在本书研究范围，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阅读马恩列全集以及近代中国主要思想家的著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学术争鸣，其中李洪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是目前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形成过程最周详的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3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8 页。

深深地陷入依附于该国的地位的国家。[①]这里列宁再次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但没有进一步阐释。

“半封建”概念据说是恩格斯在《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一文里提出的，其对象是指德国的“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②]列宁1912年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时首次使用了“半封建”一词。所谓“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意含形式上虽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壮大。列宁对“半封建”社会进行了论述。所谓半封建国家与封建国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有了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主义的残余”、“中世纪的封建残余”是同一意思，指的是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封建的“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占优势”等。[③]“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不仅“受商业资本剥削而且也受封建主和封建国家”的剥削。[④]

列宁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某些特征，是在阐述落后民族与殖民地的革命战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对“两个半”只是原则性论断，并没有将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固定的词汇。以后列宁与其他共产国际领导进一步阐述了“两个半”社会革命的模式，其基本观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阶段，民主革命如果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只是“空想”；[⑤]这个革命最初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但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⑥]在运动者中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这个革命的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第二步是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越过资本主义阶段，最终过渡到

---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② 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③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丛书》第2卷，第125页。

④ 同上书，第123页。

⑤ 列宁的“两个半”思想后来在苏共内部引发的大争论中，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斯基等作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在争论中，斯大林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联系起来。苏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直接影响了中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正确把握。参见李洪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

⑥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丛书》第2卷，第147页。

共产主义。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同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必须保持独立性，等等。

以上思想虽然是对民族革命运动提出的一般革命原则，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启蒙价值，它绘制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路线图。只要将1920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与文件仔细整理比较，这个路线图初稿就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其实“两个半”社会的实际状况，对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在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时，他们已经认识到我国资本主义还十分幼稚，封建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列宁“两个半”新概念一传入国内，他们顿开茅塞，自觉地运用新概念解剖中国社会，作为探索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逻辑起点。

就目前看到的文献，中国共产党人著述中第一次出现“公共半殖民地”是在1921年6月在汉口印行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简称《阶级》)一书里。同月，张太雷在莫斯科起草致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亦出现了“半殖民地”的名词。这恐怕不是巧合。

有学者指出最早使用“半封建”这个概念的是蔡和森1922年9月发表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①]笔者所看到的材料要稍早一点。同年5月蔡和森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②]就有“在中国现在的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一句。这里的“半封建”与《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里的涵义都是就政治而言的。同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的提法，[③]与蔡和森以上两篇文章中的“半封建”概念是一个意思。应该指出，“半封建”一词虽然正式出现在1922年春夏之交，但对“半封建”社会事实上的描述则与“半殖民地”中文一词的出现同步。换言之，对“两个半”社会的一般概括在《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1921年6月)、《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1921年6月)、中共代表团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

---

① 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②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21年7月）等文献业已出现。

由于报刊、文献资料浩瀚，"半殖民地"与"半封建"两个概念究竟何时同时使用，需要深入探讨。有学人考证"半殖民地半封建"中文字样第一次出现是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上。[②] 笔者看到的资料更早些。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中共湖北地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布置，在武汉地区7家主流媒体上同时开辟了"五一特刊"。一个叫"华山"的共产党人发表的《五一纪念的感想》，[③] 将中国与欧美国家比较后写道："我们考察中国，发现很明显的两点，一就是半封建制度（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的时代），一就是半殖民地"。如果不死抠字眼儿的话，那么这里"两个半"的概念同时出现要比《国际评论》早4年。历史研究的魅力与艰辛也在此，有时根据自己花了很大工夫查到的史料而得出的结论，又被新史料轻而易举的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正是历史研究前进的动力。

其实在中共早期文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论中对"两个半"的基本体征则早有描述。以上资料可谓探索之初，《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强调中国仍然是封建经济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但传统的农业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冲击，"一方面是大部分农民被倾覆而驱迫入都市去找工作，于是开始形成了一部分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手工工业不足与资本国机器工业竞争，渐渐归于毁灭。"[④] 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打

---

① 中共代表团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看到书面报告的文本是俄文本，上面签名者张太雷和杨好德（即杨明斋）。根据《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联席会议记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称，这份报告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和张太雷起草的，"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词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书面报告中的"四，社会主义运动"、"七，中国的工人运动"、"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前一半，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中的基本内容是重叠的（除个别词句有差别外）。由此笔者认为书面报告是张太雷、舒米亚茨基和瞿秋白的集体成果。

② 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

③ 《大汉报》1922年5月2日。

④ 《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击下，“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作为“半封建”形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封建军阀（武人）统治国家。《先驱》发表署名文章里对“半殖民地”的附属性作了论述，指出这种附属性体现在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国内的军阀财阀哪一个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作人家底走狗，以成为人家侵略工具之一”。[①] 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所以封建式的军阀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在北方中国军阀是替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其在中国的侵略政策；在南方是美国资助南方的统治者。[②]

中共二大文件对此论述越加明确与集中。在《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中指出，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③]《宣言》列举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大量事实，概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列举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夺取口岸，占据矿山，开办工厂，控制关税、金融等主要的“经济生命神经”，划分势力范围等种种罪行；剖析了列强在中国争权夺利和力量彼消此长的原因，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系、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的督军后面，为的是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拉斯的经济侵略政策”。[④] 最近“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⑤]

对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文件指出中国社会现在还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下，“小农业、手工

---

① 丁燕：《在国际青年共产革命运动之下，我们中国青年应有的觉悟》，《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② 《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③ 《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⑤ 同上书，第70页。

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①]“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②]中共二大改变了以往将中国社会定位为资本主义的判断，强调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③]

以上叙述表明，中共二大虽然没有将这种“两个半”连用，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殊社会，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规律，并据此初步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对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共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组建联合战线，这是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与主张，对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勾勒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本思想的最初内容，正确地引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样党便在革命道路上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还处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始阶段，几乎所有的提法都是东方革命理论在中文语境下的诠释，对“两个半”社会的最初分析是粗线条的、肤浅的，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是表层的、直观的，多半是事实上的描述，缺乏经济层面，尤其是哲学层面的理性深度。但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开端，沿着这个正确方向继续进行艰难的探索。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

---

①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35页。

②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同上书，第3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上书，第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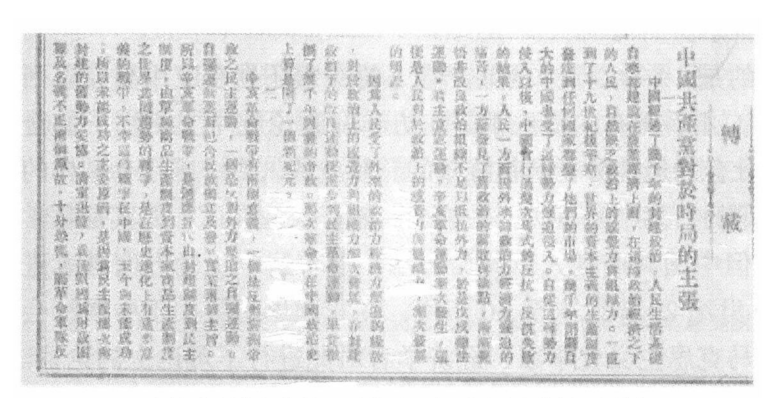
1938—1939年之间，毛泽东不仅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发，[1]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

第三节 中共二大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

中共二大后，全党将首要任务放在贯彻二大精神上，全力以赴执行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很快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个时期在宣传战线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执行紧密结合，宣传的主要途径是党团媒体。

一、《先驱》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时，中共中央直接将《主张》印成单行本，于6月17日在社会上散发。1922年6月20日《先驱》第9号率先将《主张》转载，同时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政变的宣言并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对《主张》回应的文献。文章以北洋军阀挟持下的政变为切入点，一连向民众提出三问：“你们梦想在军阀专政的局面之下，可以废督裁兵吗？”“你们梦想在军阀专政的局面之下，可以和平无事，安生乐业的吗？”“你们迷信吴佩孚统一中国的能力，会大过袁世凯、段祺瑞吗？”文章接着从分析辛亥革命十年来民主革


转载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

▲《先驱》是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第一家媒体

① 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

命的经验教训入手，尖锐指出："封建的武人政治，不但为小资产阶级商人和厂主的仇敌，而且也是我们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仇敌。"为了消灭共同的仇敌，无产阶级必须"努力起来援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以根本推翻武力政治"。文章最后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明确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是完全赞成的"，并以"诚诚恳恳的呼声"号召全国人民"应一律起来与共产党结成联合的战线，根本推翻武人政治呀！！！"可见，文章宣传的中心是进行民主革命，组建统一战线。

《先驱》接着组织了一批文章，对党制定的纲领进行密集宣传、阐释，多次在刊物上醒目的亮出党的战斗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上流行的"好人政府"等各种错误的政见，发表了《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在封建的武人政治下废督裁兵不可能的铁证》、《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时代》等文章，一一揭露它们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党最早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文件。有读者对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结成统一战线不理解，《先驱》第14号以"通信"的形式发表了施存统《讨论与国民党联络及社会主义者的生活问题》加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与国民党建立联盟，不是因对于"国民党的感情良好"，不是因为"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认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也不是因为认国民党"较其他政党好些"，更"不是要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使命，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使命，使命不同，组织自然不应混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的客观情形下，中国"不能发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发生一般国民反抗封建式的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敌人是共同的，即封建的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目前"我们行动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对于国民革命取旁观的态度，所以不能不与实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携手或竟加入里面去活动"。但是国民党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进行改进，克服诸如"不向群众中去活动，专联络几个有力军阀"、"至今尚无一个具体的党纲"和"没有严密的组织"等问题。

针对有青年团员认为共产党、青年团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变节"，

《先驱》发表文章指出这个指责是“很幼稚很天真的错误”。[①]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处处根据事实，处处不凭空想。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观察，“资本主义虽有许多缺陷和罪恶，然比农奴制度却进步得多了；民主政治虽然仍是少数人的支配，然比封建政治总是多数且自由的了”。现在的中国，一面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受本国封建军阀的压迫。“这两个魔鬼，是中国大多数国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共同仇敌。我们要求中国社会进化发展，非先将这两个魔鬼铲除不可。”“所以我们现在与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是在学理上有根据，在事实有必要的”。同时，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将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使大多数群众集中在我们的旗帜之下。在联合战线中，我们将得到群众的多数，“不然，我们将成了与群众分离人数很少的一个死团体”。[②]

《先驱》不仅积极宣传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而且积极宣传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关于劳动运动，《先驱》极力宣传劳工是社会的中坚，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工人是“最勇敢最觉悟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战斗势力的分子”。[③]1922 年 1 月 17 日，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先驱黄爱、庞人铨被军阀杀害，《先驱》第 3 号发表署名“雁汀”的《感黄庞二烈士底死》的悼念诗篇，其中有“死本不足奇”，“主义是盾牌，宣传是武器，我们何必畏惧，看看黄庞底足迹”等诗句。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黄爱、庞人铨的斗争事迹，《先驱》第 15 号发表了介绍两人生平的《黄爱和庞人铨》的短文以及施存统写的《四个死者，一个精神》的纪念文章，施氏将黄庞两人与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相提并论，从四人牺牲的事迹中概括出一种共性的精神：“我们要纪念的，是他们那种始终一贯百折不挠牺牲一切去为无产阶级底解放而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亦是我们生者所必需的精神”。

1923 年，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开始沉寂。为了鼓励士气，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相勾结，共同镇压工人运动的本质，《先驱》第 17 号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争回我

① 存统：《本团的问题》，《先驱》第 16 号，1923 年 2 月 1 日。
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先驱》第 17 号，1923 年 5 月 10 日。
③ 士畸：《什么是青年运动？》，《先驱》第 17 号，1923 年 5 月 10 日。

们的自由以继诸先烈未竟的伟业呵！”

关于青年运动，《先驱》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宣传报道的重点，每一期都有相关的文章，或宣言、议案，或评论、调查等，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对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方针等进行论述。首先，革命青年的时代使命是与无产阶级联合，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青年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投入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其次，知识分子青年要克服“坐而论道”、“空谈主义”等各种缺点，从学生运动的狭小圈子走出来，“到工业发达的地方，乡村和兵士中间去做青年运动”。[①] 最后，中国青年运动必须发挥学生运动的优势，动员学生到劳动群众中宣传社会主义，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宣传和组织广大青年，“向黑暗的势力进攻，促进社会的改造”，[②] 这样，整个中国的青年运动才会蓬勃开展起来，中国的革命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强企图利用教会学校来影响和控制中国的教育。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 1922 年 4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第 11 届大会，这次大会成为我国 1922—1927 年声势浩大“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党在上海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先驱》、《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在舆论界担任了运动的主力军。3 月 10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15 日，《先驱》第 4 号出版“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专号”，刊载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以及陈独秀、“赤光”、“绮园”等人写的 5 篇文章，以引导非基督教运动朝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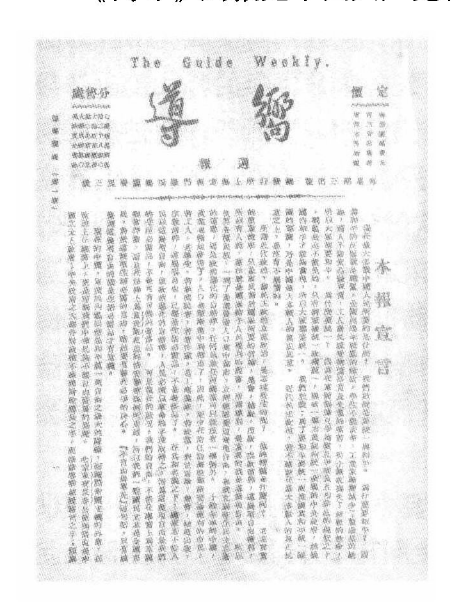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长河中，《先驱》尽管只存在短短 19 个月的时间，但它在新闻媒体上率先传播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引导青年走上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方面，发挥了其他报刊无法替代的先驱作用。

---

① 为人:《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先驱》第 20 号，1923 年 6 月 10 日。
② 同上。

二、《向导》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直接参与，并给予经费支持下于1922年9月13日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编辑出版。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和汇刊5册。首任主编蔡和森，约负责编辑116期，超过半数；继任彭述之、瞿秋白。《向导》设有评论、寸铁、什么话、读者之声等栏目，全国各地设有分售处，发行量最高达3万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持续时间最久的刊物，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报刊界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向导》系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阐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评述它对中国革命规律探索所作的贡献，有两点说明：一是全面评价《向导》不是本书的范围，这里主要描述1922—1923年相关的内容。二是《向导》对民主革命规律的探索是在此前党的探索基础上展开的，本处突出的是新认知，重复之处不提，或少提。


The Guide Weekly.

嚮導

週報

本報宣言

▲《向导》创刊号，1922年9月13日


▲《向导》主编之一彭述之（1894—1983）

第一，宣传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向导》创刊，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和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创刊号上的《本报宣言》就是一篇体现中共二大精神的政治宣言。该文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该文号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

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①] 同期还发表了陈独秀的《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蔡和森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等文章，以后陆续发表许多时评，主要阐释中共二大的精神。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二大的文件与宣言当时没有公开发表，[②] 对中共二大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向导》宣示的，因此，《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树起的第一面鼓动建立“民主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军阀民主革命的战斗旗帜。

《向导》还登有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宣传东方革命理论。在第9—11期上，刊登了萨发洛夫的《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第5期、第7期上刊登蒙古共产主义者登德布在远东劳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蒙古及其解放运动》等，使中国人民透过这些资料，直接了解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

第二，以“国民革命”的提法取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简称“民主革命”）的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常指的是欧洲新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时代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欧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从兴起到低落、亚洲、非洲等落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面对世界新格局，列宁对世界革命，尤其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新的战略思考。他很早就关注中国革命，1912年在对辛亥革命发表评论时，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中国民主派”、“中国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他将辛亥革命定位为“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并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欧洲的资产阶级进行比较，指出中国民主运动“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而“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中国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走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③] 很显然，列宁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将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① 《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② 中共二大后，中共印刷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在党员中散发，但直到中共1926年5月出版的宣传物《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战争主张》刊登该决议案，才广为人知。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中国革命的发展无疑是列宁形成东方革命理论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使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得以确立。文件中确定落后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属国）的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为了区别这些国家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特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提为“民族革命运动”，[①] 并指出这些附属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放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政治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和无知的农民和工人群众争取自己从一切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斗争”。[②] 共产国际应当反对第一种运动，促进第二种运动的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这些国家的革命第一步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革命，但主要的任务和必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③] 共产国际对附属国两种运动的提法为中共后来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成新旧两个阶段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共产国际对民族与殖民地国家革命性质的判断存在两个矛盾。一是它虽正确确定“民族革命运动”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又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主张“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④] 从而模糊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造成民族革命运动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急过渡。二是共产国际要求自身与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援助”附属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帮助”、“援助”显然不是做运动的“主人”，这样又与共产国际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指示发生了冲突。

以上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识。此前，中文里还没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专用名词，与之对应的是“民主主义”。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李大钊对民主主义的解释具有普遍性，他将英文 Democracy 翻译成民主主义，指出政治的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从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3 页。

②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从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6 页。

③ 同上

④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从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4 页。

Democracy 的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①] 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工神圣诸大精神”。[②]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早期民主主义大致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属性相同，但“互助”、“劳工神圣”则揉进了社会主义的元素，体现出时代特点。1920—1921 年之间，李大钊、陈独秀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确定救国之路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③] 也就是说第一代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企图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张太雷 1921 年 6 月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作出反应的文件。该报告将辛亥革命确定为“资产阶级革命”，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是“旧民族主义革命者”。[④] 但他又主张中国共产党救国的唯一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这和当时党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报告仍将中国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体地位，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的国家。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只是部分地领会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

当 1922 年东方革命理论完整传入中国后，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道路等基本问题便有了全新的认识，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首先应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了清楚认识，只是表述不统一，如在《先驱》和党团宣传品中出现了“反抗封建的民主革命战争”、“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第三阶级（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等称谓，但意思是一样的，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运动。中共强调“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⑤] 无

---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 7 卷第 2 号，1920 年 1 月 1 日。

② 李守常:《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晨报》1920 年 8 月 17 日。

③ 李大钊在 1921 年 3 月发表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论证中国已具备实行社会主义条件的理由。陈独秀在 1921 年 7 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一文，剖析了各种社会主义，坚定地确定俄国共产党走的社会主义，“那真是马格斯主义”。《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 1922 年版，第 96 页。

④ 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0 页。

⑤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7 页。

产阶级应该援助这个革命，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但无产阶级“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①] 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成功之后，资产阶级便会迅速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打倒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②]


The Guide Weekly

嚮導

造國論

▲《向导》刊发陈独秀的《造国论》

随着东方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深入，共产党人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识也日渐理性。中共二大刚结束，中共便用“国民革命”的概念取代二大提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亦称“民主革命”）概念。为什么提“国民革命”呢？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的《造国论》作了阐释。他认为，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就决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没有壮大到能独立领导这场革命的力量，这就决定“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③] 以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除此之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④]

共产党提“国民革命”的口号，有与国民党提法相统一的意思。孙中山在其遗嘱里，称“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也就是说他将自己从事的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孙中山1906年第一次用“国民革命”一词，从形式

①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38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同上书，第77页。

③ 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④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上看，第一个提出“国民革命”这个概念的是孙中山，但有学人指出孙氏最早提出的“国民革命”与中共提出的“国民革命”在革命性质、内容、对象、动力等方面均有本质的区别，属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旧式的民主革命完全是对内的革命，即反对封建阶级，而中共的“国民革命”不仅有对内的革命，还有对外的革命，即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②]孙中山在1924年重提的“国民革命”则采用了共产党的“国民革命”的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孙中山除了将自己以前对内的革命内涵扩大外，还注入了对外的革命的内容，这样他的“国民革命”便与共产党人的“国民革命”有了共同点，所以“国民革命”就成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目标。

共产党提“国民革命”的口号还有共产国际的背景。目前看到共产国际文件第一次出现“国民革命”一词是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全权代表利金的一份报告中称，在中国“必须争取使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袖”。[③]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西宁等签署的给马林的委任书中，[④]委任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共产国际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马林于1922年9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22期上发表了《中国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俄文)。陈独秀第一次用“国民革命”一词是在1922年9月20日《造国论》中，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文献出现的“国民革命”要早于陈独秀。共产国际是否接受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提法？中国共产党是否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采用“国民革命”的概念？或者中共提出在先，被共产国际所接受等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原始资料，不能作结论，需要挖掘史料深入研究。

此外，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通过东方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面前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们要力争最彻底地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

---

① 黄振位：《“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③《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④《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的独立；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①] 中共三大（1923年）通过的《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的第四项，复述了这个精神，但在用词上有了变化，指出共产国际要求我们“特别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由此可知，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里的“国民革命”与《东方问题提纲》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同义词，[②] 也就是说 1922 年 11 月在共产国际正式文件里还采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但到了 1923 年中共三大的文件已转换为“国民革命”了。

中共二大后，用“国民革命”取代“民主革命”不仅是用语上的变化，而且还有其特别的意义。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独创性的回应。如前所述，无论是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还是共产国际文件，在中共二大前均没有用“国民革命”这个政治概念。二大后，这个概念是共产国际与中共针对中国民主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来的，使“国民革命”成为适合国共合作需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这个概念虽然指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与中共以往指向的孙氏领导的民主革命（即旧式民主革命）内涵有质的不同。孙氏的“国民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中共的“国民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孙氏的“国民革命”包括辛亥革命等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共的“国民革命”有了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区别的新含义，指向后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孙氏的“国民革命”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共的“国民革命”是“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③] 孙氏的“国民革命”前途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共的“国民革命”是革命成功后，实行社会主义。[④] 总之，不管“国民革命”是谁最先提出，即便是共产

① 《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丛书》第 2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2 页。

② 《关于第三国际第第四次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4 页。

③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同上书，第 37 页。

④ “国民革命”革命的前途，陈独秀在《造国论》里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能免的境界”。

国际的指示，但对其具体的解释则是中共将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与中国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结果，赋予了明确的含义和生命力，彰显中国共产党对国情认识的深化，标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在中共二大纲领后取得的实质性新进展。其次，中共二大时，党员不到200人，还是一个力量很小、理论也不成熟，不能够“独立革命”的党，要打倒民主革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必须寻找同盟者。当时“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①] 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国民革命”就成了国共两党进行民主革命的共同战斗口号。最后，国共合作在这面通俗的旗帜下，推动了大革命蓬勃发展。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中都得到了迅速的壮大与发展，到大革命后期，中共成为有5万多党员的大党。

第三，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策略。中共二大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方针，接着在西湖会议上决定了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制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方针。为此《向导》竭力宣传，促进联合战线的成立、巩固与发展。

首先，论证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向导》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关文章指出，统一战线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组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当前世界革命有两种革命运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共同敌人都是帝国主义，两种革命运动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因此“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而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更向前进之唯一重要的先决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问题”。[①]二是组建国内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由上可知，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国际先决条件。中国国内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这是由民主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而革命力量不成熟的形势所决定的。革命力量范围广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图的有力分子”，[②]其中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两个阶级在中国都不成熟，因此要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只有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为什么要与之联系呢？《向导》从两方面解答：一从中国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产业十分落后，根本原因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与封建军阀的内乱，不仅是国家和平统一与自由的最大障碍，也是钳制实业发展的“恶魔”。[③]因此不铲除这个“恶魔”，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得到发展，帝国主义与军阀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被压迫的阶级。二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单从阶级地位而言，无产阶级确实没有与资产阶级“协作的可能，且没有这样个需要。但目前确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就是他自己还没发展到独立的政治奋斗的地位，而目前的压迫又非统一全国的革命力量，号召起全国被压迫人民一致不可抗侮的势力，不能迅速成功。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的需要。”[④]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就是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争取自由民权的各种势力，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一目标之下，联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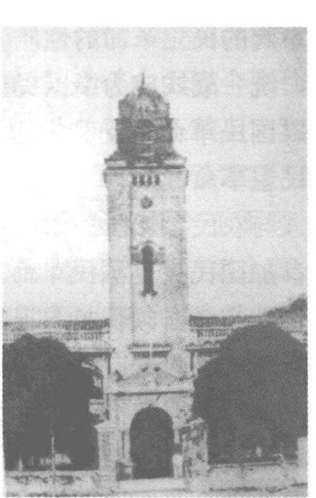
其次，阐述与国民党合作的理由。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战线的主要联合对象是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是国民党呢？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对国民党的党纲和组成人员的分析，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

---

① 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② 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③ 《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
④ 《君宇答思顺》，《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⑤ 独秀：《怎样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①] 国民革命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来做中坚，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国民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②]

但与国民党合作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起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多数人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其理由在陈独秀于 1922 年 4 月 6 日致魏金斯基的信中列举了 6 条。[③] 后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下，中共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配合、支持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制定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策。2 月 25 日发出中央通告 13 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四点具体步骤。《向导》从第 48 期起增开“国民党改组消息”专栏，大量刊发有关国民党改组的信息和精神，如《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第 48 期),《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之演说》(第 49 期),《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第 50 期) 等，从而有力地宣传了国共合作，使广大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改组的指导性文件内容有了一个较全面、较清楚的了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大会刚结束，《向导》第 53 和 54 合期上以“特载专栏”的醒目字样，全文登载了大会宣言，并撰写了《国民党大会宣言与国民》的评论短文，表达了对大会的肯定态度：“凡是中国的人民，对于国民党这次的宣言都是不能故意反对的，都是满意而欲实现的。”

① 只眼 (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

② 独秀:《怎样打倒军阀》,《向导》第 21 期。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 页。

《向导》要求国民关注国民党的改组和大会的宣言，“自动的思想，不宜再作麻木不仁”，[①] 积极投身国民革命的斗争潮流中去。

再次，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广泛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逻辑起点是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任务决定中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特殊的国情是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因此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手段。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以解除内外压迫”。[②] 国民革命虽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③] 引导工人与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是中共的中心工作。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之需要，是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组织形式，但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中共组织。[④] 对国民党的妥协与错误持批评的立场，在政治宣传上，保持中共不和任何帝国主义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⑤] 对以上原则，《向导》除直接刊登中共相关文献外，还在评论、读者之声、通信等栏目进行广泛宣传，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最后，善意批评国民党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各种言行。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虽然解决了，但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呼声相同，心理却不同，因为两个政党的党纲、阶级基础不同。国民党在联合战线中时常表现出来的行动与言论有悖国民革命的大方向，为此《向导》经常对国民党的错误

---

① 《国民党大会宣言与国民》，《向导》第 53 期，1924 年 2 月 20 日。

②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5 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0 页。

④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6 页。

⑤ 同上。

言行进行善意的批评，其主旨是修正国民党的错误，推动国民党前进。

国民党的革命方略就是单纯的军事活动，《向导》指出国民革命的发展，军事行动非常重要，但国民党人士“历来单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国民革命要靠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参加，单纯的军事活动，只是“用一种武力来革命”，“只是军官们相互合作的革命”，这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叛徒陈炯明“暂时依附革命旗下，但借此达到了个人目的”没有什么区别，实在算不得是真正革命的方略。[①]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孙中山联合张作霖、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博弈的传统手法。1922年10月中旬，汪精卫、程潜奉孙中山之命与张作霖联络后，在媒体上声称奉令赴奉是“为民意求援”。《向导》第6期上发表了两篇短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民意求援”于军阀，不“为民意求援”于民众，实在是错误的。张作霖是“野蛮反动的封建余孽，谁不知道是民治的大障碍物”，与他求援，无异就是“仰着旧势力去推翻支配阶级”，这样国民党的前途危险呵！[②]“我们要恳切的忠告民党朋友，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时时刻刻应当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不是危害民众的封建军阀利益”，不要使归依在三民主义旗下的革命群众失望。[③]工农乃是中国真正的主人翁，也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因此国民党的根本革命方略应该是发动、宣传、教育广大民众投身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

应该指出，《向导》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周刊，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也反映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少评论实际就是对共产国际指令的解读。其中将国民党视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的思想，[④]与共产国际“援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是一致的。将国民党看成四个革命阶级联盟，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在这个联盟中起领导作用，是斯大林的设计。这种政治设计，从理论上讲不失为个好主意。有趣的是，这个政治联盟的方案套用列宁在辛亥革命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是用“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建构起来的评语正合适。这个方案对国民党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国民党人员结构固然有无产阶级、农民、小

① 孙铎（马林）：《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1日。

② 和森：《批评汪精卫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

③ 君宇：《国民党人应当做胡帅的宣传员吗？》，《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

④ 《中国共产党第三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向导》28期，1923年6月20日。

资产阶级，但起主导作用的始终与这三个阶级无缘。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一锤定音不可取，但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起主导作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南方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征讨北洋军阀时，与共产党斗争方向一致，但要危害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土地）的根本利益时，便悍然与盟友共产党决裂，这是其一。其二，共产国际的所谓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也是“少女的天真”。[①] 领导权是以实力为后盾的，领导权的博弈如果离开实力除了说些大话、空话外毫无意义。在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的国度里，中共没有掌握一支军队，党员才 420 人（中共三大时），遑论争夺领导权只能是堂吉诃德式的天真与冲动。其三，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不成熟，后来被党史研究者指责为“二次革命论”。这是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案例。这方面不成熟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是共产国际东方理论内在的矛盾性，共产国际指挥失误，共产国际机构之间、领导人之间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之间的矛盾所致，也与幼年的中共无法把握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各种尖锐矛盾有关。其四，首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的理论探索对中共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策略原则为后来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面对异常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将统一战线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就有对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

第四，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面对军阀武装割据，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有了初步认识。《向导》创刊号上的《本报宣言》[②] 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中国的“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实现”。《向导》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是中共对武装斗争最初认识的一部分。在早期传播者中，谈武装斗争最具体的恐怕是施存统，他在 1921 年 5 月 16 日写的《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的第五小节，谈的就是“学生、无产阶级与兵士形成三角联盟在中国实行社会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对有人认为革命形式是工人总同盟罢工，他不以为然，指出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只有得着军队底援助，才能成功社会革命”。[③] 他主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② 《向导》第 1 期，1922 年 9 月。

③ C.T（施存统）:《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持的《前驱》刊登文章，强调革命必须采取铁的手腕，“要知道：惟有强权方能打破强权。惟有枪才能制服枪。我们解除资本家、军阀们——的武装，我们非自己武装起来不可”。[1]《向导》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

首先，阐述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统一、借债与国民党》通过对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分析比较，指出：辛亥革命过去了11年，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存在，“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而且“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失败了。十月革命则恰恰相反，首先它“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接着，它“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所以十月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通过这两次革命的比较，“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2]当时，军阀的长期混战和残暴统治，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但是，怎样打倒军阀呢？众说纷纭，有的幻想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打倒军阀；有的企图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一时各种政治方案充塞媒体，什么“好人政府”、“制定宪法”、“废督裁兵”、“地方分权”、“整理财政”、“澄清选举”等等，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3]要从根本上解决时局，就是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真正独立的民国。蔡和森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企图用和平的办法取代或限制军阀统治的错误主张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中国的一切问题，“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4]任何人企图“用和平方法去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5]

其次，主张建立一支新型的“国民军”。《向导》所主张的国民军有政治、军事两层含义。所谓政治上的“国民军”，是建立全国各被压迫的爱国者、各阶级组织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广泛革命的统一战线。军事斗争是建立

① 红彩：《今后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运动》，《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② 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③ 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④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⑤ 同上。

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革命武装，作为完成国民革命的工具和手段，单纯的军事行动非但不可取，而且有害。《向导》强调军事斗争必须以民众斗争为依托，发动广大民众组成政治上的国民军，才能真正铲除军阀政治。国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根本上忽视了对下层民众的宣传、动员，而过于看重“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①]《向导》以近年土耳其国民党在基玛尔将军领导下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为例，大声疾呼国民党“要学他们的好榜样：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联合，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呀！！！”[②]

革命武装的建立，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蔡和森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③]一文中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依靠“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组织革命军队，推翻军阀统治，建立统一的中国。他说：“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他不断阐释并强化了“武装工农”的思想，“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④]工农阶级在巩固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镇压商团事变、东征陈炯明等武装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热情肯定这些武装斗争的胜利，“完全因为国民革命的阵线里参加了工农阶级的新势力”。工农阶级参加武装斗争，“是开辟了一个革命军事行动的新纪元，使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今后得逐渐离开雇佣军阀的旧关系而确立于真正的革命武力之上。”[⑤]这里，蔡和森的思想非常明确：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军队，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武力。

所谓军事层面上的国民军，是指建立一支有革命党领导，为主义而战的新型军队。《向导》所说的革命党是指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它要求国民军与旧军阀的军队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具有爱国精神，为国家独立而战，当前就是为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而战；就在于它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党的领导下，

① 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② 蔡和森：《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向导》第3期，1922年9月27日。
③ 《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④ 和森：《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向导》第112期，1925年4月26日。
⑤ 和森：《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向导》第106期，1925年3月14日。

为主义而战；就在于它要有劳动群众的根基，要像苏俄红军那样有真正的革命精神。为了防止国民军变成军阀的军队，军官变成陈炯明辈的新军阀，就要将国民党的军制加以改变，“仿照苏俄红军，把军队的最高权力集中于革命党员与工兵群众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之手，使司令将官成为纯粹受命作战的机械”。[①]

这一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提出了很好的思想，但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国民革命中，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这个认识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才在思想、实践上得到解决。

三、《少年》

《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8月1日创刊于法国巴黎13区哥特伏化街17号，油印，红色封面，16开本。先为月刊，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②]出至第13号（1923年年底）后停刊。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目前可看到的是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的《少年》第2—11号和第12号的第28—47页的内容。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



▲《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

关于《少年》创刊的原因，总体上说是为适应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需要。具体的原因，据周恩来给团中央的报告，主要有三点：一是扫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障碍。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


▲赵世炎（1901—1927）


▲陈延年（1898—1927）


▲陈乔年（1902—1928）

① 和森：《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

② 关于《少年》创刊的时间，有的论著叙述有误，如方汉奇、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就认为是1923年8月，见该书第211页。另，1919年12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少年中国学会也出版了《少年》期刊。它们虽然同名，但不是一个刊物。

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足为我们宣传障碍”；二是宣传和解释共产国际和国内中共战略的需要；三是从文字上方便对外国书报阅读有困难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的阅读，从而更好地“传播共产主义学理”。[①] 从《少年》的内容来看，它基本上实现了这三个目标。下面扼要介绍一下《少年》的宣传内容及其贡献。

第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是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少年》在栏目设置方面与《先驱》、《少年中国》有所不同，它无明确固定的栏目，在全部期刊中，纯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并不多见，大约 5 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第 7 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第 8 号）、《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第 9 号）、《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第 10 号，节译自《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告少年》（第 1 号、第 2 号、第 3 号、第 4 号、第 6 号连载）。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这篇由“石人”节译的文章，约 2500 字。首先，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思想是由生存底条件决定”的，“意识不是先天的，他是由真实的时候的构造和人们一切受生存条件决定的”，主张“不让意象学迷惑了我们的观察力”。其次，文章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实际，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五个规律及其对革命的指导作用。第一个规律就是“毫不要以流行在社会关系上底观念与这些关系底实际相混，就是看社会的实际是怎样就是怎样”。承认这个规律，实质上就是承认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石，就是彻底的唯物论。第二个规律是“需要在实际底全部中研究实际”。它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面的观点，反对片面的观点，因为“实际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全体，他的部分是一个牵连着一个不可分离的”。联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规律要我们不仅注意到一国的情形”，而且要“注意到各国的情形”，以便“在全国中和全世界底大势中观察阶级争斗底的发展和事变”。第三个规律是“要全在运动中研究”，“应用心追随现象底转变，即由这一程次到那一程次的经过”，“应追究反面势力底争斗，并记着冲突绝不是出轨的，冲突正是实际底本身”。显然，这个规律就是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任何事物“底发生、发展、消灭”的规律，也就

---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02 页。

是对立统一规律；第四个规律是“不许理论与实际分离。我们不应只在认识环绕我们的环境，我们应改变环境”，反对“空想主义、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之最后的遗迹”。第五个规律是“没有抽象的真实，凡真实都是具体的”，因为“没有永不变的真实”，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追随着生活和明确的事实，而不抓住昨天的理论”。该文是继《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后又一篇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文章，由于国内读者无法读到，瞿秋白将其在《新青年》第 3 期（1924 年 8 月）刊发，说明此文的重要。

《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是“赤君”摘译自法国《人道报》以纪念马克思诞辰 105 周年的文章。文章扼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概述了马克思重大的理论贡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同时，特别指出，“马克思底真实继承者”是列宁，因为“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方面渡过到科学方面”，而“列宁把社会主义从科学方面渡过到行动方面”。

《告少年》是 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①] 因为讲话的报告较长，有 11000 多字，而一般来讲，《少年》是不刊载长文章的，但这次却用 5 期（号）连载，可见讲话的重要性。《告少年》今译名《青年团的任务》，是列宁的一次重要讲话，主要精神是指出国民青年担负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必须认真学习，首先是学习共产主义理论，认识人类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建立；必须将人类的优秀成果用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倘若他不承受一个融会贯通了的知识十足数目，共产主义将会减成像一个空洞的扁[匾]额，共产主义者也将要是个不按实际而说大话的人，这些知识你不仅必须融化，且更当将他放在你的批评之下，使他的脑筋中不致充满了杂乱而无用的东西，而使你的脑筋中增多了所有事实的科学。假若没有这些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还没有沐过文化的人。”（今译文：“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列宁专题文集》第

① 这篇讲话译文与《列宁专题文集》的译文虽然文字上有些出入，但内容基本相同。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青年若只记得共产主义的结论，成共产主义的几句话，“便可认为满足。要那个样子，我们将永不能达到共产主义，必须将所有人类蓄积的科学宝库用来丰富他的脑筋。”（今译文：“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专题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列宁的话教育了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

第二，批驳无政府主义思潮。与国内的《新青年》、《先驱》、《少年中国》等刊物一样，《少年》也踊跃参与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争。由于受蔡元培、李石曾和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更由于他们三人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加上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法国工团主义在法国的重要影响，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颇有市场。旅法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工余》月刊，并从1922年第7期开始，“即对共产主义及其党人加以猛烈之攻击和谩骂”。本来，《少年》因为《工余》“多非学理上之讨论”而“置而不答”，但由于《工余》“竟不宣传无政府主义，专门作反共产主义工作”，[1] 于是《少年》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少年》批驳无政府主义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大约有7篇，其中张申府的《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第2号）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认为“纪律是共产党之魂”。旅欧少共执行委员伍豪（笔者注：即周恩来）撰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第2号），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入手分析，认为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等均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石人”摘译的《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第7号），则针对法国工团主义的弊端，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少年》批驳无政府主义最出彩的地方还是它创设了一个新栏目——“对话”，刊载了《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第7号、第8号、第10号、第11号连载），然后又重拳出击，发表了《甚么是无政府党人底道德？》（第11号、第12号连

① 《甚么是无政府党人底道德？》，《少年》第11号，1923年8月15日。

载），从而给无政府主义以沉重打击。

依照《少年》编辑部的安排，为了从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辨别，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总支部执行委员尹宽[①]认真研究了《工余》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然后从理论方面论述了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少年》编辑部采用无政府党人与共产党人对话的形式，从而使得文章很有针对性，颇有吸引力。文章多次引用《工余》上的话，有的放矢，较全面深刻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厘清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论证了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以及无产阶级“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必须要做的十二项重要工作。[②]

旅欧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反映强烈，变本加厉地诽谤共产主义。旅欧少共执行委员、负责出版工作的任卓宣，[③]“感觉无政府党人底道德不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乃细加研究”，并以“T.S”之名撰写了《甚么是无政府党人底道德？》的长文。文章将无政府党人种种不道德表现一一列出，主要有：时髦。“最好时髦，对于自由看得十分新颖，随便甚么名词，只要是无政府主义的，都必冠上这两个字，以自标异”，于是，什么“自由契约”“自由组织”、“自由联合”、“自由加入”、“自由退出”、“自由生产”、“自由消费”和“自由共产主义”等时髦名词纷纷出现。他们“以谩骂为能事”，诅咒“国家是一片平浪无垠的义冢地”，苏维埃共和国是“野种”，旅欧少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走狗”。挑唆他们“要本着共产主义的见地来过问勤工俭学的事”的话，挑拨地说《少年》的观点“未免太蔑视了千余同学的人格了”。在《工余》看来，“共产主义只能办共产党的事，如何能办工学的事？这样的希望和敬意，恐怕同学不肯接受罢”。其他不道德的表现还有：粉饰、崇拜、谩骂、言行矛盾、扯诳、作伪和自私自利等。

实际上，在旅法勤工俭学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早已在工

---

① 尹宽（1896—1966）原名王竞博，化名硕夫。安徽桐城人。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旅欧青年团总支部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局秘书、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脱党，11月被开除党籍。

② 《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少年》第7号，1923年3月1日。

③ 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人。1922年6月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少共执行委员，负责出版宣传。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28年2月被捕叛变，改笔名叶青，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之一。

学世界社以及新民学会会员中展开。1920 年 8 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谈到了此事。他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①] 经过《少年》的斗争，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大为减小，《工余》杂志也于 1924 年停刊。陈延年、陈乔年等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进步青年，也在论争中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第三，及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政策，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少年》特别关注国内中共党团的工作，呼应国内的革命斗争，努力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

1922 年 6 月 20 日，《先驱》第 9 号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仅隔两个月，《少年》编辑部便在第 2 号发表"R"（笔者注：即张申府的笔名）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对于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表示"无量欢喜"，并"向大众呼吁：凡是有良心、有诚意、明白事理、舍私谋公，而不想过分出风头的共产主义者，都应立地聚集于彼，以厚共产革命的势力"。文章更强调指出，与国民党等组建革命联合战线是在当时"中国情势之下，不得不取的一种特殊手段"，告诫大家不要忘了共产革命的"终极目的"，在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保持住自己组织的独立"。在国共合作尚在酝酿之时，《少年》就已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这是颇有见地的。《少年》第 3 号还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大会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不仅注意研究一般中国青年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十分注意研究旅欧中国青年在改造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有效地指导了留法学生以及华工的思想转变和革命斗争。《少年》第 3 号发表《我们的职务》、《现在中国青年应有的觉悟》两篇文章，前者从中国迫切地需要一个共产革命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青年应该结成一团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其义不容辞的职务是："本着共产主义的见地，学到一切

---

①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 年 8 月 13 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1 页。

学与术，注意于共产主义道德的修养，结合成共产主义全运动的群众组织，努力向外宣传，援助无产阶级少年的解放活动。”文章特别强调，“说到我们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少年，除去上述的普遍职务外，我们实还有旅欧的特殊职务可言。”它主要包括：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考察并学习其活动的方法；谋求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共同利益，组织参加各种活动；消除分歧，搞好团结；努力反对炫惑人们思想的宗教和教育组织等。后者在批驳“好人政府”和以资本主义来开发中国实业等错误危险的观点基础上，大声疾呼：“凡现在中国的少年，都已见中国贫民呻吟于两种经济压迫之下的苦状，都应该鼓起热烈的同情心，极力设法团结一般大多数劳动者，与那般不劳而食的军阀、财阀，拥护现制度的学阀，总言之，劳动家的掠夺者，拼个死活。”

为了进一步明了旅法青年的职责，《少年》刊登了《旅法的中国青年应该觉醒了》（第 7 号，“列文”）、《留欧同学的共产运动与中国前途》（第 8 号，尹宽）、《勤工同学应当与工友作实际的亲善》（第 10 号，“记者”）等文章加以阐释。“列文”的文章重点分析了旅法学生界和华工中存在的投机、改良和革命的三种人生选择，指出必须“处处本共产主义的见地”，“过问勤工俭学本身的事务”，并且引用了赵世炎的观点——“我们青年革命主义者的奋斗，为人同时亦为自己”。同时针对旅法同学和华工中存在的宣传不普及、斗争不团结等诸种问题，突出强调大家应该迅速觉醒起来，所开展的行动“就是要随时随地把问题与事实打落到实际上面”。尹宽文章的起因是法国、比利时等国利用宗教在中国青年中组织青年会，出版了一份《星期报》，该报在第 24 号上登载了《留欧同学的共产运动与中国前途》一文，“反对在中国做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的运动”。尹宽写了与之同标题的文章加以驳斥，指出：《星期报》的文章“满篇文字尽是东扯西拉，句读都难令人看得清楚，肤浅的错误更不知有几多”。中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因此中国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也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联合所有革命分子，打倒军阀的同志，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成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

作为旅欧少共的机关报《少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理论贡献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这个极其

复杂的社会进行革命，组织发表了《现在中国青年应有的觉悟》(第3号)、《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怎样在中国应用？》(第7号)、《在中国底共产主义运动》(第9号)等文章，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些文章响应中国共产党二大政纲，着重剖析中国的社会，指出中国的统治权掌控在新旧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和陈炯明之手，而他们又都“结托一派帝国主义的国家为其后援”，[①] 因此当前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对进步党、交通系、安福系和国民党等十个党派进行了剖析，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各党派中是唯一有革命倾向的”[②] 党派，但是由于“他们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因此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努力组织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之革命分子为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主力军，再逼迫其余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加入此联合战线”，“建设统一的独立共和国”，“以推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附产物——本国军阀”。[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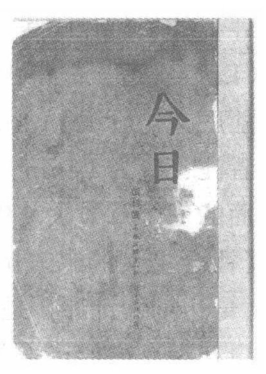
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与国民革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更不能不顾各国情况的不同，去“迫令”各国符合这个公式，共产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最后的理想。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面”。资本主义也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变成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殖民地的军阀与腐败官吏勾结起来，掠夺、压迫人民。因此殖民地被压迫国家的革命最初“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底党派应综合所有革命的势力，联络所有革命分子来做向无产阶级革命底第一步底工作：打倒当地的统治阶级，推翻国际帝国主义。”[④]

青年负有改造中国的重大使命，当前主要的使命：就是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去；就是参加无产阶级反帝的联合战线中去；第三就是到群众中去，从事教育、组织工农，指引他们革命的正

① 《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怎样在中国应用？》,《少年》第7号，1923年3月1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在中国底共产主义运动》,《少年》第9号，1923年7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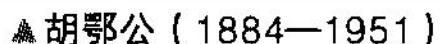
确方向。[①]

四、《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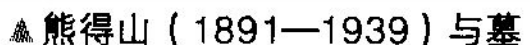


▲《今日》创刊号，1922年2月15日

1922年2月15日创刊于北京，社址北京慈慧殿5号，由北京新知书社[②]发行。创办人胡鄂公、熊得山[③]和邝摩汉[④]，主编熊得山。《今日》原计划为月刊，一年两卷，一卷六册，实际并未按月出版，现在所见到的有3卷共10号，最后一期第3卷第2号，1923年8月25日发行，该刊宣称是“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刊物。如前所述，五四时期许多进步刊物一度热衷于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共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先驱》、《劳动界》等更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但公开称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今日》恐怕是第一家，而且所言不虚，每期除了文学作品（笔者注：不少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外，“差不多每篇文章”[⑤]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粗略统计，



▲胡鄂公（1884—1951）




▲熊得山（1891—1939）与墓

① 《最近的国际青年运动》，《少年》第8号，1923年5月1号。

② 新知书社是北京大学与北京教育界同人所组织，1919年开业，主要营业：一是编印教科书及各种有价值之图书杂志；一是承印欧美、日本各种书籍；一是经售国内有价值之图书杂志，以及代售教育用品。地址北京东城弓弦胡同6号，在南池子大街设立分发行所、门市部。

③ 熊得山（1891—1939）原名熊学峻，亦名康年、字子奇。湖北江陵郝穴人。清末留学日本，肄业于明治大学。先后加入共进会和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在保定与胡鄂公响应武昌首义，曾任“北方革命总司令部”秘书长。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互济会。193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著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问题》，译有《唯物史观经济史》、《欧洲经济通史》及《西方美术东渐史》等。

④ 邝摩汉（1884—1932）江西寻乌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0年与谭平山、杜国庠等创办《社会问题》。曾在高等警官学校、武昌中山大学等校执教。译著有《最新经济思潮史》、《社会主义总论》、《石溪集》等。

⑤ 《卷头语》，《今日》第1卷第4号，“马克斯特号”，1922年5月15日。

《今日》发表明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73篇，约占总篇数的62%。

第一，直接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其中有《哥达纲领批评》（Karl Marx著，熊得山译。今译名《哥达纲领批判》）、《国家底起源》（Engels著，熊得山译）、《未开与文明》（Engels著，熊得山译）、《历史以前底文化阶级》（Engels著，熊得山译）、《俄国现时经济地位》（Leniu（引者注：应为Lenin）著，邝摩汉转译。笔者注：该文是列宁的《粮食税》前面的三个章节）、《俄苏维埃的新经济组织》（N. Bukhayin著，程天山译）、《社会主义的未来国》（Borchurdt著，河上肇译，熊得山转译）等。其中《哥达纲领批评》是当时《哥达纲领批判》最完整的中文译本，译者还根据恩格斯1891年写的序言，对其写作背景作了详细介绍，附有马克思1875年5月5日致威·白拉克的信与《哥达纲领》。在第2卷第1号（1922年7月15日）上，刊发的《马克斯著作史》，列出了1841—1911年出版的18种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并对著作的背景与主要内容作了介绍。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今日杂志社组织成立的“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其宣言鲜明宣布：“我们很相信马克斯主义，是我们应该确定的主义”。“马克斯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看他所采取的革命的方法，也确是有条理的。马克斯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变更经济的组织，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就是在我们承认马克斯主义的伟大的精神以后，仍然要深刻的、精细的研究”。该研究会的“宗旨在研究马氏主义，并阐扬其学说之真精神”。[1]



▲《今日》“马克斯特号”，1922年5月15日

第二，通过介绍无产阶级领袖战斗生平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15日，《今日》第1卷第4号出版了“马克斯特号”，刊登了胡南湖撰写的《马克斯传》（以下简称胡传）、李光华翻译的《马克斯夫人燕妮传》以及记者整理的《五月五日马克斯纪念记事》。胡氏的马克思传与《星期评论》翻译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著的《马克思传》的不同就在于，在叙述马克斯生平时，更侧重

① 《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宣言》附简章，《今日》第2卷第2号，1922年8月15日。

介绍马克思的思想。胡传首先评述了马克斯哲学思想的发展，马氏少年时代是一个热心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左派，是一个唯心论者，到了办《德法年鉴》时，他的热爱渐趋向唯物主义方面，完全与费尔巴哈持同一立场。到了撰写《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和《哲学的贫困》时，则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划清了界限，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基础。胡传翻译《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年）的一段话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我对于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不但和黑格儿派相异，且正立于相反的地位，即黑氏主张思索行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现实世界不过是思索外表的现象；反之我主张观念世界，不外在人的脑髓中已经变更和反映过来的物质世界"（今译文："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1847年，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撰写了《哲学的贫困》。该著作是马克思经典文献中发表最早的一个文本，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由此而奠定。胡传引了《哲学的贫困》中第二个说明的一段话阐释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人类本身随着新的生产力改变他们生产关系，又随着生产关系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

胡传介绍《共产党宣言》时特别突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介绍《赁银劳动与资本》（今译名《雇佣劳动与资本》）时，翻译了马克思的说明："本书内容分三部分：第一，赁银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即劳动者的奴隶状态和资本家的支配势力；第二，在现时制度之下，那中产阶级和所谓的庶民阶级（Burgerstand）不可避的衰微；第三，欧洲各国的有产阶级于商业上被那世界市场专制魔王的英国所征服所掠夺。"（今译文："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712 页）胡氏引了译文后，进一步说明“本文是一种最浅近最通俗的经济学说，他（引者注：指马克思）作此稿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时一般现状维持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劳动者，对于单纯的经济关系，毫无所知，因之文语和理旨，都极浅俗，务使下至劳动者，都能理解和领略，开首一篇问‘所谓赁银是什么？’就可见其一端”。1859 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今译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立了五个整个的公式，这五个公式是解释人类历史的一段注疏，即指示社会进化的一条径路。最要紧的是第一个公式，他的意思以为人类当生产他生活资料的时候，必然钻入与他意志无干的关系里头，这个关系，就是与其社会物质生产力发达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构造，由此经济构造上，又产生了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与此相适应的意识状态。所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能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般生活过程。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社会生活，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反能决定人类的意识。以下四个公式，是说明这个经济构造如何变化，他那个社会状态也就如何的变化。这个唯物的历史观思想是马克斯研究经济学一个结果，也就是马克斯学说一个根本思想”。《资本论》第 1 卷 1867 年出版，后 2 卷直至 1894 年“经恩格斯十余年的整理，才梓行与世。这三卷《资本论》是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缺点，并示因他的本身崩坏而不可不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剩余价值，无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不能成立，因之他的《资本论》，对于剩余价值，也有特地的发见和特地的说明。”没有证据说明胡传参考了列宁 1914 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但胡传的结构与叙事的手法却有《卡尔·马克思》的影子。

《马克斯夫人燕妮传》是国内媒体第一篇燕妮的小传。小传充满激情地描述了燕妮的一生，称赞燕妮为马克思“一生最亲爱的伴侣”，与马克思共 38 年，“放浪诸国，终老于辛酸困苦之中，以世家子女，作一贫如洗的儿妇，始终不变，并为马氏一生的供献，诚属难得”。《今日》在第 3 卷第 1 号（1923 年 2 月 15 日）还刊登了《悼李卜克内先生和卢森堡女士》。

第三，宣传唯物史观。《今日》组织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林可彝）、《马克斯的唯物哲学》（王中君）、《唯物的中国史观》（邝摩汉）等文章进行宣传。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与五四运动前后媒体宣传唯物史观是一致的，即

主要介绍《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的观点，认为“唯物史观”这个名，“纯粹是本着经济上的历程，如说明资本制度应与[予]崩坏……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①唯物史观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来探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私有制的考察，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从经济方面考察，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是无产阶级必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政治革命，即从有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二是经济革命，即无产者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达产业，如现在的苏俄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创造新组织的物质条件，达到社会主义的门口，“再进一步就是社会主义的堂奥”。②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革命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共产主义半熟期、共产主义完成期。完成期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都非常增加，全社会的财富都非常丰裕，国家消灭，“人民也就可在招牌上大书特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③

今日派在宣传唯物史观方面突出的贡献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来透视中国历史。邝摩汉撰写的《唯物的中国史观》根据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分成三个时期：“即（一）自黄帝至周末止，为发明工具，人类历史大开创时期；（二）自秦汉至清末五埠开商止，为无大发明，治乱相循，人类历史无进化时期；（三）自开港至现在止，为机械输入，产业革命，人类历史又趋于开创时期”。唯物史观认为工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唯物的中国史观》正是从生产工具的演变入手来探析中国历史。它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生产工具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第二个时期为什么没有进步？文章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所有生产要具，劳动技术，都没有什么发明，纵有朝代的区别，但农业的生产力，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没有实质的变化，因之历代的政治、法律、文学、思想等都是墨守成规，“不是尊孔孟，就是尚黄老；不是单行郡县，就是兼采封建”，“简直是因袭的历史”、“治乱相循的历史”。④鸦片战争以降，西洋人用先进的大炮打开国门，

---

① 彭守朴：《马克斯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今日》第1卷第2号，1922年3月15日。
② 邝摩汉：《A与B的问答》，《今日》第1卷第1号，1922年2月15日。
③ 胡南湖：《马克斯传》，《今日》第1卷第4号，1922年5月15日。
④ 邝摩汉：《唯物的中国史观》，《今日》第2卷第1号，1922年7月15日。

朝野上下都急于改革，引进新的生产工具（军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于是机械工业渐渐兴起。虽然产业组织、经济组织，在欧洲确已到了末运，但在中国仍如旭日东升。经济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的变化，于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也渐渐传来，并且在那暗地里，日兴月盛”。[①] 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生产方法必然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也就是我民族起死回生的一点”。[②]

《唯物的中国史观》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史学，虽有些粗糙，但与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胡汉民的《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等一起开了中国新史学的先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宣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今日派高度重视马克思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要研究马克斯科学的社会主义，都不可不研究马克斯的经济学说，因为经济学说，就是大家所谓的科学。所以不把他的经济学说十分了解，说是懂得马克斯科学的社会主义，简直是欺人的话”。[③] 正因为如此，《今日》集中发表了邝摩汉的《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马克斯经济学说》等文章，这些文章和《资本底本质是什么？》（周佛海）、《资本的利润》（彭守朴译）等对资本、价值、雇佣、剩余价值等经济基本概念一一诠释，充分论证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精髓和价值，对大众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普及教育。

第五，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今日》十分突出的贡献。如果说戴季陶首先提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概念，那么《今日》则是五四时期第一家较为集中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杂志。它发表了《革命的文学》（樊晓云）、《无产阶级与文学》、（胡南湖）、《艺术与民众的精神》（王中君）、《近代艺术的新气运》（王中君）、《无产阶级的文化训练》（王中君）、《历史以前底文化阶级》（Engels 著，熊得山译）等文章，阐释了无产阶级文化观。

首先，应用唯物史观给文学以正确的社会定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将道德伦理的觉悟视为最后的觉悟，改造国民性成为改造社会的最有效的手

① 邝摩汉：《唯物的中国史观》，《今日》第 2 卷第 1 号，1922 年 7 月 15 日。

② 同上。

③ 邝摩汉译：《马克斯经济学说》，《今日》第 2 卷第 2 号，1922 年 8 月 15 日。

段。《今日》反复宣传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结果，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改造社会的根本之途不是在精神世界而是在物质世界。要根本铲除封建专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动员劳动大众起来，进行社会革命，像苏俄那样建立劳农专政。以往的一切特权阶级都是力主精神来支配物质的，于是他们利用科学、法律、政治、文艺、宗教等上层建筑“来瞒蔽大多数人民，而自握其统治的权力，其唯一借口物，就是说：精神可以产出物质”。[①] 世界正好颠倒了过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的重要一部分。

《无产阶级与文学》指出：现在的社会是有产阶级独占的社会，他们不仅操有经济的要素，握有政权，而且“把全人类精神上共享的艺术和文学，都刮到他们的私囊中去，当做他消遣散忧的奢侈品”。[②] 无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且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力，“所以自生至死，并不知道文学的性质作用有什么兴味，那里去懂得文学的价值呢？”[③] 现在的第一步是把经济的问题解决。所谓经济问题就是铲除私有制，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机关归民众。第二步劳动民众有了政权，才能设立公共学校，使劳动民众有研究文学的机会，能够享受文学艺术所带来的美的精神。[④]

其次，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今日》高度重视文学艺术的反作用，认为革命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工具。革命文学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对旧社会的批判，现代文学家“唯一的职务，也就在以深刻的观察，锐利的笔锋，把人生的苦痛，社会的罪恶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使人读了惊心动目，引起无量的同情，流出真挚而悲悯的眼泪来”。[⑤] 正如屠格涅夫所言，俄国的农奴制度，是我的仇敌，我将集合我所有力量，决定与它奋斗到底！《今日》称赞道：“屠格涅夫这段话说的是何等痛快淋漓！真足以代表革命文学家的精神呵”。[⑥] 文学是以人生为背景的，因此革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启蒙人的思想，指导改造社会的责任。劳动大众是人类最大多数，革命

① 林可彝：《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今日》第1卷第4号，1922年5月15日。
② 胡南湖：《无产阶级与文学》，《今日》第1卷第3号，1922年4月15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樊晓云：《革命的文学》，《今日》第1卷第1号，1922年2月15日。
⑥ 樊晓云：《革命的文学》，《今日》第1卷第1号，1922年2月15日。

文学首先就是启蒙他们的思想，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起来与专制社会进行斗争，去改造社会。所以革命文学是供给革命事业的“滋养料”，在劳动大众中“播下革命种子”，“革命的文学，是冲决网罗的文学，是生命流动的文学，是真的文学，是活的文学”。[①]

所谓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读者的认同上，革命文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上面才有价值。[②]文学艺术所谓美的精神——滑稽美、天然美、壮美、想化美、优美等只有被平民所享受，才有价值。因此，革命文学家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使平民能够享受文学艺术这些天籁的美，援助他们进行社会运动。[③]

最后，介绍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文学。19世纪，俄罗斯诞生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赫尔岑、果戈里、冈察罗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一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与享誉世界的作家，形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这些具有强烈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正如列宁评价赫尔岑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播下了鼓吹平民解放，进行革命宣传的种子，相隔几十年后，终于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季节里获取了收获。[④]“黄金时代”的革命文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来源之一。《今日》称这些文学理论家与作家是“革命的文学家”，评述了俄国革命与黄金时代文学的关系，指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文学家们，是俄国革命的“开山祖师”。他们深刻的观察，犀利的笔锋，坚强的意志，“把俄国农奴制度，独裁政治，攻击得








▲从左到右：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赫尔岑（1812—1870），果戈里（1809—1852），屠格涅夫（1818—1883），托尔斯泰（1828—1910）

① 樊晓云：《革命的文学》，《今日》第1卷第1号，1922年2月15日。

② 胡南湖：《无产阶级与文学》，《今日》第1卷第3号，1922年4月15日。

③ 同上。

④ 见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专题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体无完肤'，使一般平民早已明白生活痛苦的原因，而萌了革命的动机，等到列宁登高一呼，他们自然的会响应起来了"。[①]他们"描写无产阶级苦况的作品"，是为着无产阶级申冤的文学，"所以读俄国近代文学，在世界上有种特别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所以俄国社会革命先成功，就是专靠着从前这些文学家的鼓吹。"[②]

第六，宣传苏俄的建设情况。《今日》发行期间，正是苏俄革命与建设的转型期，即从1921年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今日》翻译了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粮食税》前面的三个章节（有删减）。在第1卷第3号上，刊登了布哈林1921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俄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报告，阐述苏俄由国内战争进入建设时期，实行战略转变的原因，新经济的具体政策；阐释了列宁的经济上落后的无产阶级国家，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此外《今日》还发表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俄苏维埃的新经济组织》等文章加以补充说明。

《今日》在发行一年半的时间里，如此密集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宣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态度是真诚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还不为大多数劳动大众所了解的情况下，今日派的宣传在马克思主义普及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学几乎荒芜的中国，他们播下了革命文学的种粒。但《今日》却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从第2卷第4号开始，连续发表了《"名""实"的讨论》、《我对于陈仲甫派变更态度的批评》、《社会主义与民治主义并质陈独秀先生》、《再论陈独秀派加入国民党底问题并质〈向导〉记者》等文章谴责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前门打倒间接作敌底军阀，后门就欢迎了直接作敌底资本家"。这与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精神是背离的，与一年前共产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背离的，这是中共的"堕落"，是对无产阶级的"变节"。[③]

今日派为什么要反对国共第一次合作呢？首先，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

① 樊晓云:《革命的文学》,《今日》第1卷第1号，1922年2月15日。
② 胡南湖:《无产阶级与文学》,《今日》第1卷第3号，1922年4月15日。
③ 熊得山:《"名""实"的讨论》,《今日》第2卷第4号，1922年10月15日。

错误所致。今日派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认定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利害，绝不相容”，因此共产党为了推翻军阀，“与其唯一的敌人联合——与资产阶级联合，结果只是一个自杀”。[①] 其次，今日派机械地照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体系，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今日派照搬照抄《哥达纲领批判》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修正派区别的标志，那么现在中共居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再次，今日派错解共产国际党纲。[②] 共产国际党纲规定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总机关，它的奋斗目的是“推翻资本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今日派质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国际共产党的支部。如果是国际共产党的支部，那么，就应该遵守国际共产党的党纲”。[③] 总之，今日派在思想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科学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真理，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必须与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今日」派之所謂馬克思主義

田誠

▲ 1922年12月27日《向导》发表《〈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

对《今日》严厉的谴责与批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克制的反批评，只在《向导》上发表了田诚的《〈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一篇文章。田诚的文章阐释了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必要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劝告今日派去看看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指出：“《今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同志的话大半是无意识的”，他们当中“也许有些诚实的分子，也许有些真

① 初民：《我对于陈仲甫派变更态度的批评》，《今日》第2卷第4号，1922年10月15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正想做马克斯派学生的分子，不过懂得的还太少"，但他们的首领胡鄂公还说不上是患上了"左派幼稚病"，"不过是光怪陆离的东方式的投机官僚罢了"。[①]《向导》对胡鄂公的指责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看法相同。马林在一份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他对胡鄂公的看法：我认识胡鄂公，他既不反对共产主义又与曹锟保持良好关系。他"给我的印象是，跟这个人在一起什么事也干不成。现在他企图通过反对我们的同志与国民党联合的办法来发展他的组织。此公似乎属于左派。[②]这"似乎"一词说明马林也不太清楚胡鄂公的真实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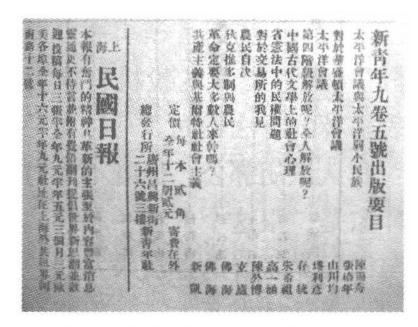
走笔至此，笔者仍觉得今日派猛烈攻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由弥漫着疑团。首先，《今日》第2卷第2号(1922年8月15日)发表的《革命运动与议会运动》一文，披露今日派知道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也就是说他们应该了解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其次，根据今日派比较详细地介绍共产国际的党纲、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说明他们对共产国际与苏俄的信息是畅通的，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并非不知道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所致。最后，有资料显示胡鄂公等今日派主要成员此时(1922年年底到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然加入了中共，怎么又如此起劲地反对中共执行共产国际指令与中国国民党结成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一战线呢？于是笔者突发奇想：会不会是今日派与中共为国共合作造势而演的一出双簧戏？正如《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恩格斯为了推动《资本论》的出版及其造势，应用"从资产阶级观点对书进行了抨击"[③]的作战方法；或钱玄同(虚构"王敬轩")与刘半农伪造读者来信，在《新青年》展开对孔学的批判与辩护的论辩，以激发公众舆论关注《新青年》那样的战术呢？《今日》的广告似乎暗示了这一点。《今日》第2卷第4号一面刊登猛烈批评中共联合国民党策略的文章，一面却刊有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第9卷第5号的要目。1923年8月出版的《今日》第3卷

---

① 田诚：《〈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向导》1922年第15期。

②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等》，1923年5月31日，《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③ 《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67年9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1页。


新青年九卷五號出版要目

太平洋會議與太平洋弱小民族

對於華盛頓太平洋會議

太平洋會議

第四階級解放呢？全人解放呢？

中國古代文學上的社會心理

省憲法中的民權問題

對於交易所的我見

農民自決

狄克推多制與農民

革命定要大多數人來幹嗎？

共產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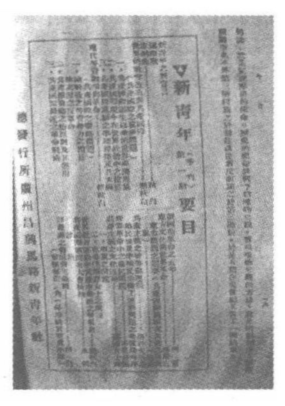
定價 每本貳角 全年十二册貳元 寄費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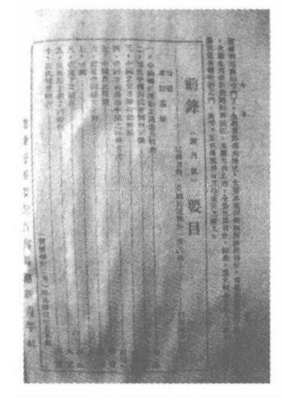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廣州昌興新街二十六號二樓 新青年社

上海 民國日報

▲《今日》第2卷第4号（1922年12月8日）刊登《新青年》的广告

第2号又刊登了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和《前锋》创刊号的要目。而《新青年》季刊上，恰恰重点登载的是有关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强调无产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社会各阶级联合成立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锋》创刊于1923年7月，《新青年》季刊创刊于6月，《今日》这样快地刊登出这两期要目，不能说是巧合。[①]说明他们与中共的联系渠道是畅通的，从而引发了笔者的这个奇想。





▲《今日》第3卷第2号（1923年8月25日）刊登《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前锋》创刊号的广告

最后特别介绍今日派的首领胡鄂公。胡鄂公(1884—1951)原名胡荣铭，字新三，号南湖，室名风雨楼，湖北江陵人。胡氏早年入江汉学堂、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11年参加了武昌首义。民国初年曾担任第一届国会议员、湖北省政务厅厅长、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1922年组织成立了“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笔者注：成立不晚于1922年6月前)，其成员经过李大钊介绍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胡氏成为中共秘密党员。[②]与此同时他与苏俄远东军事情报机关亦有关系，开始了他多面特工的传奇生涯。胡氏一生极富斑斓与神秘，恐怕不是用“投机政客”所能简单加以概括的。后来他曾是中共特科的成员。顾顺章叛变后，他与陈赓奉周

① 《新青年》季刊、《前锋》诞生地在上海，《今日》在北京，必须考虑信息传递的时间，因此《今日》这样快刊登这两份刊物的要目，没有内部渠道是不可能的。

② 《胡鄂公》，《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0页。另据《“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的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称1922年2月16日，《今日》撰稿人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引者注：该书作者可能没有看《今日》，应该是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组织了一个号称11007名成员的“中国共产主义协会”，后部分成员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恩来之命，组建“北京特科”。后又长期担任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寓居上海，代表国民党长期与日本军方进行秘密谈判。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1951 年 10 月 8 日病逝，结束了多面特工的传奇生涯。这里记载他的小传，为的是纪念这位在中共创建时期曾独树一帜热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在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作过鲜为人知贡献的前辈特工。①

① 胡鄂公史料稀少，其生平参见《鲜为人知的“北京特科”》，穆玉敏文，《档案春秋》2009 年第 1 期；《胡鄂公先生》，《湖北旅台人物志》第 1 集，台北市湖北同乡会 1988 年出版。

结 束 语

2011 年喜逢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终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书稿，心潮澎湃。

这跨世纪的 90 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新纪元，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并与苏联、东欧、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凯歌挺进。但是 20 世纪末，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当代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论调泛起，观点五花八门，歧义纷出。

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时，发现了一个有趣，又令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初期传播者探索、争论的主要问题竟然也是今天引人关注的问题。它们是：

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如何复兴，以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主要手段是革命，还是改良？

中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正道，还是歧途？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南针？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食古不化”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定参酌中国情形”，[①] 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这些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均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今天再现他们的探索，无疑对我们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有裨益。

当年共产党人几乎都是 19 世纪“80 后”、“90 后”的年轻人，面对满

---

① 施存统：《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 1922 年版，第 443 页。

目疮痍，国难当头的祖国，他们以“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的豪情壮志，奋身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他们在黑夜中探索光明之路，“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②]救国必须要有“主义”作指南，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推求，终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复兴民族的必由之途。“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③]“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④]这个革命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当代共产党人，面对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华山再高，顶有过路”[⑤]的大无畏气概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振兴伟业，在荆棘丛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天道。2009年又面对全球性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他们处变不惊，科学决策，率领着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风景这边独好，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中国取得了GDP年增长9.1%的骄人成就。2010年再创奇迹，经济增长率为10．3%，外汇储备突破3万亿美金。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世界顶级的论坛，各国政要、各界精英、各种肤色的人们都要倾听中国的声音。真是沧桑巨变！这样的盛世在9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饮水思源。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开辟的革命道路，就没有中国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这段辉煌的历史记忆绝不应被遗忘，她不仅记载在历史的年鉴里，而且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碑中！

---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② 《赵世炎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③ 毛泽东：《七律 到韶山》，1959年6月，《毛泽东诗词笺析》，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④ 董必武：《九十初度》，1975年3月5日，《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⑤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新华网2010年3月15日。

主要参考文献

报 刊

1.《新青年》，1918 年 7 月—1922 年。
2.《新潮》，1919 年 1—12 月。
3.《每周评论》，1918 年 12 月—1919 年 8 月。
4.《星期评论》，1920 年 6 月—1921 年 6 月。
5.《新社会》，1919 年 12 月。
6.《建设》，1919 年 8 月—1920 年 8 月。
7.《劳动界》，1920 年 8 月—1921 年 1 月。
8.《共产党》，1920 年 11 月—1921 年 7 月。
9.《少年中国》，1919 年 7 月—1923 年。
10.《解放与改造》，1919 年 9 月—1922 年 9 月。
11.《先驱》，1922 年 1 月—1923 年 8 月。
12.《向导》，1922 年 9 月 1923 年 12 月。
13.《少年》，1922 年 9 月—1923 年 7 月。
14.《今日》，1922 年 2 月—1923 年 8 月。
15.《武汉星期评论》，1922 年。
16.《民国日报》，1919 年 6 月—1923 年 12 月。
17.《晨报副刊》，1919 年 2 月—1920 年 12 月。
18.《时事新报“学灯”》，1919 年 1 月—1921 年 12 月。
19.《汉口新闻报》，1919 年 1 月—1922 年 12 月。
20.《大汉报》，1919 年 1 月—1922 年 12 月。

史　料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毛泽东选集》(4卷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 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2册、第3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社，1920年版。

10. 张冥飞:《劳农政府与中国》，新文化共进社，1920年版。

11. 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东瀛编译社，1920年版。

12.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

13. 克卡朴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新青年社，1920年版。

14. 塞利格曼，陈石孚译:《经济史观》，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15. 柯祖基，恽代英译:《阶级争斗》，新青年社，1921年版。

16. 马尔西，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1921年版。

17. 郭泰，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1921年版。

18. 田诚:《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汉口发行，1921年版。

19. 新青年社编辑部编辑:《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2年版。

20.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马克思纪念册》，1922年版。

21. 李特等编译:《李卜克内西纪念》，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

22. 成则人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

23. 山川均，张亮译:《列宁传》，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

24. 托洛兹基，周诠译:《俄国革命记实》，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

25. 安利科马赉特斯太，李少穆译:《两个工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

26. 希曼译:《俄国共产党党纲》，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

27. 列德莱，李季译:《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28. 布哈林，彭成译:《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社，1926年版。

29. 河上肇，李天培译:《近代经济思想史论》，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7年版。

30. 高希圣等编辑:《社会科学大辞典》，世界书局，1929年版。

31. 吴黎平编:《社会主义史》，南强书局，1930年版。

32. 陈振:《马列主义与中国》，胜利出版社总社，1931年版。

33. 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

34.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联书店，1979年版。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3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党的创立时期》(上、下)，1979年版。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2.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4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内部资料，1957年版。

45.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47.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8 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有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49 姜义华编选:《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0. 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52. 陈绍康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5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54.《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5. 张影辉、孔祥征编:《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6.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五四运动在重庆》，内部发行，1984年版。

57.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五四运动在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58.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五四前后的河南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60.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

62.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6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4.《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5.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选:《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6.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67. 张注洪、任武雄编选:《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8. 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69. 人民出版社编:《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0. 人民出版社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1. 武汉二七纪念馆、中共竹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施洋纪念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73.《陈望道文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4.《陈潭秋文集》编辑组:《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央文献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76.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版。

77. 黄钢等编:《黄负生纪念文集》，武汉出版社，2003 年版。

78.《赵世炎选集》编辑组编:《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79. 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杨匏安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 年版。

80. 张太雷纪念馆等编:《张太雷研究史料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8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1981—1986 年版。

82.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编:《朱执信集上下集》，中华书局，1984 年版。

83.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84. 段云章等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85. 李长林、张小曼:《张西曼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86.《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87. 陈公博、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88.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

89. 李季:《我的生平》，东亚图书馆，1932 年版。

90. 张西曼:《历史回忆》，东方书社发行，1949 年版。

91.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92.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 年版。

9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 2—3 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版。

94. 张国焘:《张国焘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8 年版。

95.《郑超麟回忆录》(上、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96. 王来棣采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

97.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著　作

1.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版。

2. 全国党校系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选编组中央党史组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3.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黄开源:《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 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叶再生:《马克思学说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国书籍传播史，1993年版。

7. 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修订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 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仲家栋主编:《重铸中国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王观泉:《"天火"在中国燃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 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李其驹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王守常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14. 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5. 邹振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

16. 奚洁人、余源培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7. 张静如、王朝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1. 黄修荣:《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2.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3. 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 倪兴祥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5. 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 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 10—2004. 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7.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9.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三联书店，1991年版。

30.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

31.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三联书店. 2002年版。

32.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5.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6.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7.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8.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9.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0辑》，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40. 任武雄:《党史研究文集》，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1. 陆米强编:《陈绍康中共党史研究文集》，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2. 徐善广、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44.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5. 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6. 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7. 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

48. 田子渝、曾成贵主编:《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50. 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1. 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长江出版社，2009年版。

52. 田子渝:《走进史林》，长江出版社，2009年版。

53. 李良明、孙泽学:《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4. 李会滨主编:《社会主义20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5. 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6. 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7. 余金成:《社会主义的东方实践》，三联书店，2005年版。

58. 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9.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0. 冷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史学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61. 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共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2.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

63.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二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64. 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8. 王继平等:《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9. 徐方平:《蔡和森与〈向导〉周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70. 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1. 李良明、钟德涛主编:《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2.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3.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4. 余玉花:《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75.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76. 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对毛泽东形成的重要贡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7. 李玉贞:《马林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78. 田子渝:《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汉俊》,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79. 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0. 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81. 左玉河:《张东荪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82. 左玉河:《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8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

84. 郭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上海时期》香港版,1974年版。

86. 王更生:《孝园尊者——戴传贤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版。

87. 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

88. 蔡国裕:《中共党史》(第1册)，国史馆印行，1988年版。

89.《袁同畴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

90.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

91.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汉生出版社，1992年版。

92. 胡健国编:《近代华人生卒简历表》，国史馆印行，2004年版。

93. 小野信尔:《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94.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5.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96. 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7.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版。

98.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99. 小野信尔著:《五四运动在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

100.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1.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附　件

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

题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社会主义平议	南海谭荔恒、香港刘铸伯合著，东兴毛澄宇、南海潘孔言同校	香港华商总会报社	1919年8月
欧战期间杂记——政治思潮纪	内务部编译处编译	北京编者刊	1919年
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	邵振青编著	商务印书馆	1920年4月
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第一卷	王星拱编	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0年4月
社会主义与中国	冯自由	社会主义研究所（香港）	1920年4月
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	兰姆塞，兼生译	北京晨报社	1920年4月
劳农政府与中国	张冥飞辑译	汉口新文化共进社	1920年6月
劳动问题概论	卖文社编，冯飞译述	北京华星印书社	1920年7月
贫乏论	河上肇，止止（李凤亭）译述	泰东图书局	1920年7月
共产党宣言	马格斯、安格尔斯，陈望道译	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年8月
科学的社会主义	恩格儿，郑次川编译，王岫庐校订	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	1920年8月
新俄国之研究	邵飘萍	日本东瀛编译社（大阪南区）	1920年8月

（续表）

题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一个兵的说话	李得胜述		1920年8月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①	不详	不详	1920年8月17日前
什么是共产党①	不详	不详	1920年8月17日前
共产主义ABC②	米宁	不详	1920年8月17日前
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②	不详	不详	1920年8月17日前
苏俄的教育②	不详	不详	1920年8月17日前
近世经济思想史论	河上肇，李培天译	泰东图书局	1920年9月
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马尔西，李汉俊译	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年9月
马克斯经济学说	柯祖基，陈溥贤译	商务印书馆	1920年9月
俄罗斯共产党党纲③	不详	不详	1920年9月1日前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③	不详	不详	1920年9月1日前
劳动法典③	不详	不详	1920年9月1日前
经济史观	塞利格曼，陈石孚译，陶孟和校	商务印书馆	1920年10月
社会主义史（上、下）	克卡扑，李季译	新青年社	1920年10月
社会主义总论	邝摩汉	北京又新日报社	1920年11月
失业者问题	飘萍、吉人合著	泰东图书局	1920年11月
救贫丛谈	河上肇，杨山木译	商务印书馆	1920年12月
社会问题概观（上、下）	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周佛海译	中华书局	1920年12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毛泽东编	长沙文化书社	1920年12月
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	原作者不详，李绰译	不详	1920年
政治主义谈	陈独秀	社会主义研究社	1920年

（续表）

题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毛泽东编	长沙文化书社	1920年冬
工团主义	J. H. 哈列，李季译	新青年社	1921年1月
阶级争斗	柯祖基，恽代英译	新青年社	1921年1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毛泽东编	长沙文化书社	1921年1月
过激党真相	孙范译述	泰东图书局	1921年3月
社会问题详解（共三卷）	高畠素之，盟西译	商务印书馆	1921年4月
社会问题总览（共三卷）	高畠素之，李达译	中华书局	1921年4月
布尔什维主义底心理	施罢戈，陈国榘译	商务印书馆	1921年5月
劳动总同盟（之）研究	山川均，邹敬芳（锦芳）译述	泰东图书局	1921年5月
欧洲劳佣问题之大势	桑田熊藏，刘景译，吴贯因校	北京内务部编译处	1921年5月
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	王尔德，袁振英译	受匡出版部（香港）	1921年5月
唯物史观解说	郭泰，李达译	中华书局	1921年5月
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	田诚	汉口新文化共进社	1921年6月
妇女之过去与将来	山川菊荣，李汉俊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21年7月
经济思潮史	小林丑三郎，高一涵译	北京大学新知书社	1921年7月
苏维埃研究	山川均，王文俊译	北京新知书社	1921年8月
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林本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21年9月
工钱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袁让译	人民出版社	1921年12月
共产党底计划	布哈林，太柳译	人民出版社	1921年12月
劳农会之建设	列宁，李立译	人民出版社	1921年12月
讨论进行计划书	列宁，成则人译	人民出版社	1921年12月
社会主义之意义	格雷西	商务印书馆	1921年
唯物论	歌列夫，瞿秋白译	新青年社	1921年
俄国革命记实	托洛次基，周诠译	人民出版社	1922年1月
俄国共产党党纲	俄国共产党，希曼译	人民出版社	1922年1月

（续表）

题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共产党礼拜六	列宁著，王静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季诺维也夫，墨耕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李卜克内西纪念”	李特等编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列宁传	山川均，张亮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1 月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派纳柯克，施存统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 月
女性中心说	堺利彦编述，李达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 月
社会经济丛刊	施存统编译	泰东图书局	1922 年 1 月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易家钺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1 月
最新经济思潮史	小林丑三郎，邝摩汉、徐冠译	北京舆论报社	1922 年 1 月
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列宁，墨耕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2 月
公有收入分配论（封面页题名分配论）	马沙，刘秉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3 月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	高畠素之，夏丏尊、李继桢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3 月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第三国际编，成则人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4 月
劳动运动史	施光亮编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2 年 4 月
马克斯学说概要	高畠素之，施存统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4 月
劳动节纪念号	加拿大华人工会	加拿大华人工会	1922 年 5 月
马克思纪念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	1922 年 5 月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	伊利，何飞雄译，陶孟和校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5 月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李漱石译	人民出版社	1922 年 6 月
妇女问题	堺利彦，康伯焜译	上海民智书局	1922 年 6 月
马克斯派社会主义	拉尔金，李凤亭译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6 月

（续表）

题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劳农俄国研究	山川均、山川菊荣著，李达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22年8月
社会主义讨论集	新青年社编辑部编辑	新青年社	1922年9月
新俄国游记	瞿秋白	商务印书馆	1922年9月
价值价格及利润	马克斯，李季译，陶孟和校	商务印书馆	1922年10月
平民读本（1—3册）	李六如编	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2年10月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柯祖基，郭梦良、徐六幾、黄卓共译	商务印书馆	1922年10月
国家与革命	列宁，蔡和森译	人民出版社	1922年
两个工人谈话	安利科马赍斯太，李少穆译	人民出版社	1922年
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	汗（李汉俊）	人民出版社	1922年
美国共产党宣言	待查		

注释：

①据《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1920—1925，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5月版，第10页。信中提到已经出版的书名有4本，除《共产党宣言》和这两本外，还有《士兵的话》，据书名推断，此书可能为1920年出版的李得胜述《一个兵的说话》，现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而这两本书至今尚未见到原本。

②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1920—1925年，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5月版，第30页。报告中还提到《论苏俄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兵士须知》。据书名判断，《论苏俄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兵士须知》应分别为8月报告中的《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和《一个兵的说话》。《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疑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现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③据《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关于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国外东亚民族中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1920—1925年，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5月版，第19页。根据报告，这三种出版物尚不知是否为中文。

参考资料：

1. 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物。

3. 复旦大学馆藏 1919—1923 年出版书目。

4. 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1920—1925，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

5.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

6.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社会科学卷，1995 年版；政治卷上下册（1996 年版）；哲学・心理学卷（1991 年版）；经济卷上下册，1993 年版；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卷上下册（1994 年版）。

7. 上海图书馆编印:《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1979 年版。

8.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9.《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0.《1919—1949 年革命和进步书刊出版史料索引》，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1963 年 7 月，油印本。

1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物简目”，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年表（修订稿）”、“列宁著作中译本年表（修订稿）”，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

13. 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14. 张允侯:《列宁著作中译文年表（1919 年 12 月—1960 年 3 月）》，《历史研究》1960 年 4 月第 4 期。

（张玉菡　整理）

人物简历

A

艾思奇（1910—1966） 原名生萱。云南腾冲人。当代现代著名哲学家。

安部矶雄（アベ イソオ Abe，Isoo 1865—1949）日本福冈县人。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活动家、政治家、早稻田大学教授。

阿嘎廖夫（Агарев，А. Ф. 1878—？） 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出国。1917年8月担任海参崴市市长。1919年5月到上海，参与出版俄文《上海生活报》。1920—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驻华代表团成员，1921—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驻华代表团团长。

奥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3—1886）俄国人。19世纪俄国著名剧作家。

B

巴兰诺夫斯基（Барановский，М. И. 1898—？） 卒年不详。《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编辑，曾任罗斯塔—达尔塔上海分社经理。1922年以后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巴古宁，今译巴枯宁。

巴拉奴威巴士奇（Baranovsky，Tugan 1865—1919） 生于乌克兰。经济学家。

巴枯宁（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л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人。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理论家。

包惠僧（1895—1979） 原名道亨，化名悔生、晦生等，号贵三。湖北黄冈人。记者，中共一大代表。

北泽新次郎（キタザワ　シンジロウ　Kitazawa，Shinjirou 1887—1980） 日本东京人。日本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

布龙斯泰因，M. H（？—1921） 俄国人。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席团副主席。

布尔特曼（Буртман，Н. Г. 1900—1921） 俄国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主席（1920）。

布列哈诺夫，今译普列汉诺夫。

布哈林（Бухарин，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88—1938） 俄国人。联共（布）主要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1926—1929）。

必卑尔，今译倍倍尔。

伯伯尔，今译倍倍尔。

伯恩斯坦（Bernstein，Eduard 1850— 1932） 德国人。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鼻祖。

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и，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俄国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

波波夫（Попов，М. Г. ？—1930） 俄国人。苏俄早期遣华人员。

波塔波夫（Потапов，А. С.） 生卒年不详。俄国人。苏俄早期来华人员。

柏格森（Bergson，Henri 1859—1941） 法国人。著名哲学家。

柏烈伟（Polevoy，C. A. ？—1950） 又译鲍立威、包立威等。俄国人。在北京、天津学校担任外籍教师、汉学家，北京革命局负责人之一。

俾斯麦（Bismarck，Otto Eürst von 1815—1898） 德国人。普鲁士宰相（1862—1872和1873—1890）兼外交大臣，德国近代政治家、外交家，被称为“铁血首相”。

倍倍尔（Bebel，August 1840—1913） 德国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

堺利彦（サカイ　トシヒコ　Sakai，Toshihiko 1871—1933） 号枯

川、别名貝塚涉六。日本福冈县人。日本社会主义者、思想家。日共第一任委员长，后退党。

薄一波（1908—2007） 原名书存。山西定襄县人。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

C

车尔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成则人，即沈泽民。

成舍我（1898—1991） 成平，笔名舍。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学生。《益世报》主笔。

村井知至（ムライ　トモヨシ　Mural，Tomoyoshi 1861—1944） 日本爱媛县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东京外语学校教授，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著有《社会主义》（1899）等。

村田孜郎（ムラタ　シロウ　Murata，Shirou ？—1945） 日本佐贺县人。记者，曾任大阪《每日新闻》上海支局局长。

陈为人（1899—1937） 原名蔚英，曾用陈洪涛、陈福涛，张惠生、张道立，张道惠、张明、张敏等名字。湖南江华县人。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劳动界》编辑。

陈公培（1901—1968） 原名善基，曾用名吴明、无名。湖南长沙人。中共早期组织成员（1920）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者之一。

陈公博（1890—1946） 广东乳源人，寄籍南海。中共一大代表。

陈永发（1944— ） 生于重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院士、研究员，著有《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等。

陈仲甫，即陈独秀。

陈乔年（1902—1928） 陈独秀次子。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中国旅欧支部成员之一。

陈延年（1898—1927） 又名遐延，陈独秀长子。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

陈伯根 生卒年籍贯不详。无政府主义者。

陈启修（1886—1960） 又名豹隐，字惺农、莘农。四川中江人。北京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

陈炯明（1878—1933） 原名捷，字竞存，别号陆安。广东海丰县人。曾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广州军政府陆军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创办《闽星》周刊和日刊。

陈独秀（1879—1942） 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笔名只眼、顽石、寸铁、T.S 等。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

陈秋霖（1893—1925） 广东归善（今惠阳）人。《闽星》总编辑，《广东群报》编辑。

陈望道（1891—1977） 原名参一，又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教师、《新青年》编辑、中共早期组织成员（1920）。

陈溥贤（1891—1957） 字博生。福建闽侯人。《晨报》总编。

陈潭秋（1896—1943） 原名澄，字云县，化名徐杰。湖北黄冈人。教师、中共一大代表。

查苏利奇（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49—1919） 俄国人。俄国国粹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

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军阀首领，直鲁豫巡阅使。

程演生（1888—1955） 谱名存材，字源铨，又字总持，别号天柱外吏、寂寞程生。安徽平山人。现代教育家、考古学家，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

程潜（1882—1968） 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广州非常大元帅府陆军部次长。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县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北京大学校长。

蔡和森（1895—1931） 原号和仙，名泽膺、字润寰，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人。中共旅欧早期组织筹组人之一，中共二大代表。

蔡国裕（1949— ） 台湾云林县人。淡江大学教授，著有《192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论战》等。

蔡林彬，即蔡和森。

蔡济民（1886—1919） 原名国桢。湖北黄陂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

D

丁守和（1926— 2008） 河北望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文化学会会长。

大悲 即詹大悲（1887—1927） 原名培瀚，又名瀚，字质存。湖北蕲春人。国民党左派。

邓小平（1904—1997） 原名先圣，学名希贤。四川广安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赤光》编辑。

邓中夏（1894—1933） 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员（1920），《劳动音》、《先驱》主编。

邓培（1883—1927） 字少山，又名配。广东三水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代表之一。

邓颖超（1904—1992） 女。河南光山人。天津觉悟社成员。中共早期党员（1925）。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

达尔文（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 英国人。著名自然科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

达林（Далин，С. А. 1902—1985） 俄国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远东执委会全权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苏俄政府裴克斯使华代表团（1921—1922 年）成员。

杜林（Dühring，Eugen 1833—1921） 德国人。哲学家、经济学家，柏林大学教师。

杜勃罗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 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 俄国人。俄国政论家、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文艺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杜威（Dewey，John 1859—1952） 美国人。著名教育家、哲学家。

段祺瑞（1865—1936） 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皖系首领。

登德布 生卒年不详。蒙古国民革命党领袖。

董必武（1886—1975） 名贤琮、用威，号璧伍、“必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共一大代表。

董亦湘（1896—1939） 江苏常州人。编辑。中共早期党员（1922）。

董锄平（1894—1969） 又名方城、楚屏。湖北京山人。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

德里克（Dirlik，Arif 1940— ） 美国人。俄勒冈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等。

戴季陶（1891—1949） 原名传贤，学名良弼，字选堂，笔名天仇等。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星期评论》主编、《建设》编辑。

戴传贤，即戴季陶。

E

恩格儿，今译恩格斯。

恩格斯（Engels，Friedrich 1820—1895） 德国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

F

方志敏（1899—1935） 原名正鹄。江西弋阳人。学生、《新江西》编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2）。

冯自由（1881—1958） 原名懋龙，字建华，因反对康有为改名自由。广东南海人，生于日本。中国国民党早期理论家。

非力特力嫣及尔，今译恩格斯。

范鸿钧（1897—1927） 湖北鄂城人。北京大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0）。

费尔巴哈（Feuerbach，Ludwig 1804— 1872） 德国人。近代唯物主

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

费觉天（1894—？） 原名振国，后改名秉铎。湖北黄梅人。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毕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独立评论》主编。

福井准造（フクイ ジュンゾウ Fukui，Junzou 1871—1937），日本神奈川县人。政治家、国会议员，著有《近世社会主义》。

福田德三（フクダ トクゾウ Fukuda，Tokuzou 1874—1930） 日本东京人。经济学家，日本近代经济学的开拓者。黎明会的创始人之一。

G

冈察罗夫 今译冈察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я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 俄国人。著名作家。

古尔曼（Гурман，М. Л.） 生卒年不详。《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编辑部成员，财务主管。

古德诺（Goodnow，Frank Johnson 1859—1939） 美国人。政治学家、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教授，曾担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1913）。

果戈里（Никола й, Васи льевич Го голь 1809—1852） 俄国人。著名作家。

宫崎龙介（ミヤザキ リュウスケ Miyazaki，Ryusuke 1892—1971）日本熊本县人。新闻记者，社会运动家，律师。宫崎滔天之子。

宫崎滔天（ミヤザキ トウテン Miyazaki，Touten 1871—1922）本名寅藏（或作虎藏），号白浪庵滔天，世以号称。日本熊本县人。"浪花節"作家。孙中山的日本好友。

宫崎梦柳（ミヤザキ ムリュウ Miyazaki，Muryu 1855—1889）本名宫崎富要（Miyazaki Tomiyasu）。日本高知县人。新闻记者，文学家。

格里高里耶夫 生卒年不详。俄国人。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

郭泰（Gorter，H.） 生卒年不详。荷兰人。著有《唯物史观解说》。

顾兆熊（1888—1973） 字孟余，又名梦渔。浙江省上虞县人。北京工

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

高一涵（1884—1968） 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北京大学教授，《努力周刊》代理主编，参与创办《每周评论》。

高君宇（1896—1925） 原名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员（1920），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先驱》主编。

高津正道（タカツ　マサミチ　Takatsu，Masamichi 1893—1974） 日本广岛县人。社会主义活动家、政治家。

高畠素之（タカバタキ　モトユキ　Takabatake，Motoyuki 1886—1928） 日本群马县人。日本社会活动家、思想家，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高濑清（タカセ　キヨシ　Takase，Kiyoshi 1901—1973） 日本岐阜县人。社会主义活动家，著有《日本共产党创立史话》。

葛健豪（1865—1943） 女。原名兰英。湖南湘乡（今双峰）人。蔡和森之母。

H

汉胄（1880—1932） 原名金庆棪，字伯贞，别号屋白笔，名汉胄，辛亥革命后，改名刘靖裔，字大白。浙江绍兴人。前清举人，五四时期新诗倡导者。

后藤延子（ゴトウ　ノブコ　Gotou，Nobuko 1946— ） 女。日本人。日本信州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李大钊思想研究》等。

亨利·乔治（George，Henry 1839— 1897） 美国人。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现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

何叔衡（1876—1935）原名启睿，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表。

何孟雄（1898—1931） 字正国，号坦如。湖南酃县人。北京大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创办《劳动音》、《工人周刊》、《政治生活》等。

何震（1876—1947） 字东樵，号寄圜。福建莆田人。

河上肇（カワカミ　ハジメ　Kawakami，Hajime 1879—1946）日本

山口县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研究》等。

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中国同盟会骨干，中国国民党人士，《建设》总编辑。

胡乔木（1912—1992）。本名鼎新，笔名“乔木”。江苏盐城人。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长期担任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

胡贻谷（1885—？） 江苏人。著名作家、译著家。

胡适（1891—1962） 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教授、编辑、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

胡绳（1918—2000） 笔名浦韧。江苏苏州人。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胡鄂公（1884—1951） 原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室名风雨楼。湖北江陵人。众议院议员、马克思主义今日派首领。

贺民范（1866—1950） 字洪畴，号寿乾。湖南宝庆（今邵东）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中共湖南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黄负生（1891—1922） 原名凤清。安徽休宁人。教师、编辑，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员（1921），《武汉星期评论》主编。

黄修荣（1943— ） 福建长汀人。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著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等。

黄凌霜（1896—1982） 原名天俊，又名文山。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无政府主义者，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主编。

黄爱（1897—1922） 字正品，号建中。湖南常德人。学生、编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0），湖南劳工会执委会书记部委员。1922 年 1 月 17 日与庞人铨被湖南军阀杀害。

黄壁魂（1875—1923） 女。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广东女界联合会执委，无政府主义者。

黑格尔（Hegel，Georg Wil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黑智儿，今译黑格尔。

赫尔岑（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гович 1812— 1870 ） 俄国人。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赫胥黎（Huxley，Thomas Henry 1825——1895） 英国人。著名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

赫格儿，今译黑格尔。

衡石 生卒、籍贯不详。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人。

霍多洛夫（Ходоров，A. E. 1886— 1949） 俄国人。1919—1922 年任罗斯塔—达尔塔驻北京分社的经理（社长）。

J

加拉罕（Карахан，Л. М. 1889—1937） 原姓加拉罕尼扬，化名米哈伊洛夫。俄国人。1918—1920 年任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1926 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江亢虎（1883—1954） 原名绍铨，别号康瓠。江西弋阳人。曾任中国社会党党首。

芥川龙之介（アクタガワ　リュウノスケ Akutagawa，Ryunosuke 1892—1927） 日本东京人。日本大正时期小说家，著有《罗生门》、《地狱变》、《桔子》等。—

近藤荣藏（コンドウ　エイゾウ　Kondou，Eizou 1883—1965） 日本东京人。别名伊井敬。社会活动家，第三国际远东委员会日本代表。著有《共产国际的密使》等。

季托夫 生卒年不详。魏金斯基使团成员。

季诺维也夫（Зиновьев，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1883—1936） 原姓拉多梅斯利斯基。俄国人。联共（布）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6）。

金万谦（김만겸 1886—1938）即谢列布里亚科夫。朝鲜人。1905 年在俄罗斯参加“韩族会”。魏金斯基使团成员。

金家凤（1903—1979） 笔名冠三。江苏吴县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中共早期党员（1920）。

姜义华（1939— ）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

晋青（？ —— 1923） 姓谢，又名晋卿。江苏徐州人。1920年留学日本，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许多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1921年回国，在徐州中学任教务，1923年2月7日病逝。翻译《西洋伦理学史》，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基玛尔（1881—1938） 又译凯末尔（Kemal Ataturk）土尔其共和国第一位总统（1923年）。

蒋介石（1887—1975） 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名中正，号介石。浙江奉化人。中国同盟会会员。

蒋百里（1882—1938） 名方震，号澹宁。浙江海宁人。《改造》编辑。著名军事家。

犟斋，宋教仁的笔名。

K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 1871—1919）德国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运动著名社会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左翼领袖之一。

邝摩汉（1884—1932） 江西寻乌人。今日派主要成员。

考夫曼（Кауфман，Л. Г.，1892—1953） 俄国人。《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秘书，代理主编。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工作人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工作人员（1922—1924）。

考次基，今译考茨基。

考茨基（Kautsky，Karl 1854—1938） 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主要理论家，著作颇丰。

克卡朴（Kirkup，T. 1844—1912） 英国人。著有《社会主义史》。

克伦斯基（Керенский，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1881—1970） 俄

国人。1917年7至10月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

克鲁泡特金（Кропоткин，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 俄国人。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公爵。

库西宁（O. B. 1881—1964） 生于芬兰。芬兰共产党组织者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1921—1939）。

库兹涅佐娃（Kuznetsova，M. V.） 女。生卒年不详。俄国人。魏金斯基夫人。魏金斯基使团成员、国际妇女书记处驻华代表。

苦鲁泡特金，今译克鲁泡特金。

柯卡普，今译克卡朴。

柯庆施（1902—1965） 原名尚惠，笔名怪君。安徽歙县人。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柯祖基，今译考茨基。

康德（Kant，Immanuel 1724—1804） 德国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

L

卢梭（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 法国人。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

卢森堡（Luxemburg，Rosa 1871— 1919）德国人。德国、波兰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翼领袖和理论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列 宁（Ле́нин,Владѝ 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 本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俄国人。联共（布）领袖，苏维埃俄国、共产国际缔造者。

列德莱（Laidler，Harry Wellington 1884—1970） 美国人。美国“各校社会主义社”秘书，著有《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

刘仁静（1902—1987） 湖北应城人。北京大学学生，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中共一大代表，《先驱》主编。

刘少奇（1898—1969） 湖南省宁乡县人。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共

早期党员（1921 年）。

刘石心（1895—？） 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刘师培胞弟。无政府主义者，《闽星》编辑。

刘师复（1884—1915） 原名绍彬，又名师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无政府主义先驱。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中国同盟会成员，中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

刘绍周（1892—1970） 又名泽荣。广东高要人。第一任留俄华工联合会执委会主席。

刘清扬（1894—1977） 女。天津人。天津觉悟社主要成员。中共早期党员（1921），中共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

刘谦（？—1920） 化名费德尔、费奥德罗夫。俄国共产华员局阿穆尔州中国部书记，曾被派遣来华工作。

吕芳上（1945— ） 台湾桃园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革命之再起》等。

李人杰，即李汉俊。

李卜尼希，今译卡尔．李卜克内西。

李大钊（1889—1927） 学名李耆年，原字寿昌，后改守常，笔名孤松、常、明明、冥冥、S. 等。河北乐亭县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

李中（1897—1951） 原名声澥。湖南湘乡人。工人，中共早期党员（1920），从事工人运动。

李丹阳（1953— ） 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现为英国卡迪大学博士研究生。

李宁，今译列宁。

李汉俊（1890—1927） 原名书诗，又名人杰，笔名汗、漱石、先进、均等。湖北潜江人。《星期评论》、《新青年》编辑。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中共一大代表。

李玉贞（1937— ） 女。山东青岛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李石曾（1881—1973） 原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中国同盟会成员，无

政府主义者，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主要发动者。

李仲武（？—1938） 又名李宗武。贵州人。《晨报》记者。曾在苏联参加中共，1924年后脱党。

李达（1890—1966） 又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江春、鹤、胡炎等。湖南零陵（今永州）人。《共产党》月刊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中共一大、二大代表。

李辛白（1875—1951） 原名修隆，字夒，号水破山人。安徽无为人。白话文的倡导者。曾任任安徽省警察厅长（1912）、教育部佥事、北京大学庶务主任、出版部主任等职。创办《新生活》周刊（1919）。

李启汉（1898—1927） 又名李森。湖南江华人。中共早期党员（1921），《劳动周刊》编辑。

李其驹（1930—2001）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

李季（1894—1967） 祖籍江西，生于湖南平江。北京大学毕业。翻译、教师，中共早期党员（1921）。

李忠杰（1952— ） 江苏丹阳人。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泽洛维奇（Lizerovitch，Jack）生卒年不详。俄国人。《上海俄文生活日报》代理。

李春蕃（1904—1985） 又名柯柏年，笔名马丽英、丽英、福英等。广东潮安人。

李普克尼希，今译卡尔．李卜克内西。

李新（1918—2004） 原名忠慎。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现属重庆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李震瀛（1896—1937） 又名宝森，化名震因。天津人。天津觉悟社成员，《劳动周刊》编辑，中共早期党员（1921），中共二大代表。

里林，今译列宁。

拉伯尔塔斯，今译伯恩斯坦。

拉萨尔（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人。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担任联合会主席（1863）。

拉塞尔，今译拉萨尔。

林云陔（1883—1948） 原名公竞，字毅为。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参加

中国同盟会。《建设》编辑。

林可彝（1893—1928年） 原名瑞鼎，字可彝．福建罗源县人。教师。1923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代昭（1938— ） 北京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

林伯渠（1886—1960） 原名祖涵。湖南醴陵人。中国同盟会成员，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中共早期党员（1921）。

林育南（1898—1931） 湖北黄冈人。学生。共存社成员，中共早期党员（1922）。

林修梅（1880—1921） 湖南临澧人。中国同盟会成员，孙中山总统府代参军长、陆军中将。

林琴南（1852—1924） 又名林纾，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国著名近代文学家，翻译家。——

罗亦农（1902—1928） 原名善扬，字慎斋，号振纲，又名觉。湖南湘潭人。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

罗里亚（Loria，Achille 1857—1943） 意大利人。著名社会学者、教授。

罗家伦（1897—1969） 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学生，新潮社创办人之一，《新潮》编辑。

罗素（Russell，Bertrand Arthur William 1872—1970）英国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

罗塞尔，今译罗素。

罗章龙（1896—1995） 原名敖阶，号文虎。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员（1920），中共二大代表。

罗马诺夫 今译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ы） 罗曼诺夫王朝是俄罗斯封建王朝（1613—1917）。此处指罗曼诺夫王朝最后的皇帝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1918）。

梁任公，即梁启超。

梁冰弦（？—1962） 广东南海人。无政府主义者，大同书局创办人之一，创办《闽星》。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

梁漱溟（1893—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於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蓝公武（1887—1957） 原名庆章，又名蓝知非，字志先，笔名知非等。江苏吴江人。北京《国民公报》社社长。

路克（Luk, M. 1931— ） 著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起源》。

廖仲恺（1877—1925） 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中国同盟会早期重要成员，《建设》编辑。

黎雷，今译列宁。

M

马马耶夫（Мамаев, И. К. 1894—1937） 俄国人。魏金斯基使团成员。

马尔西（Marcy, Marry E. 1877—1922） 社会党左翼领导人，曾担任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主编。1911 年出版《经济学漫谈》(《Shop Talks on Economics》)。

马尔克，今译马克思。

马克司，今译马克思。

马克思（Marx, Karl 1818—1883） 德国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 女。马克思的妻子和助手。

马克斯，今译马克思。

马君武（1881—1940） 原名道凝，又名同，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广西桂林人。中国同盟会成员。曾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部长、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

马林（Maring） 原名亨·斯内夫利特（Henricus Sneevliet 1883—1942），在中国曾用笔名马林、孙铎等。荷兰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马格斯，今译马克思。

马哲民（1899—1980） 字浚，号铁肩。湖北黄冈人。在日组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日支部，兼任两组织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部常委兼组织部长。

迈斯纳（Meisner，M. 1931— ） 美国人。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在美国弗吉尼亚等大学任教。著有《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等。

木下尚江（キノシタ ナオエ Kinoshita，Naoe 1869—1937） 日本长野县人。日本社会主义者、记者、律师。

毛泽东（1893—1976） 字润之，笔名二十八画生、泽东等。湖南湘潭人。《湘江评论》主编、中共一大代表。

麦喀士，今译马克思。

孟子（前372—前289） 姬姓，孟氏，名轲。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

孟寿椿 生卒年、籍贯不详。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

茅原华山（カヤハラ カザン Kayahara，Kazan，1870—1952） 本名茅原廉太郎（Kayahara，Rentarou）。日本东京人。评论家、新闻记者。曾担任过《第三帝国》、《日本评论》等编辑，著有《人间生活史》《动中观静》等。

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即墨子，名翟。鲁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耕，即李梅羹（1901—1934） 又名李兴炽，曾用名鼎和、梅羹、梅庚等。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员（1920）。《工人周刊》编委。

N

牛顿（Newton，Isaac 1642—1727） 英国人。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

尼采（Nietzsche，Friedrieh 1844—1900）德国人。19 世纪著名的哲学思想家。

尼柯尔斯基（Нейман，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1898—1938）原名涅伊曼·符拉基米罗维奇·阿勃起拉莫维奇，化名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俄国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华代表，远东共和国情报人员。

纳柯克 生卒年不详。

O

区声白（1892—？） 广东佛山人。知名无政府主义者，《民声》主编。

欧仁（Eugene，Dupont 1831—1881） 法国人。法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欧文（Owen，Robert Dale 1771—1858） 英国人。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P

辟司（Pease，Edward R 1857—1955） 英国人。费边派成员，曾任费边会秘书。英国工党党员。

片山潜（カタヤマ セン Katayama，Sen 1859—1933） 日本冈山人。马克思主义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2 年）。留有《片山潜著作集》。

平莠英 生卒年不详。女。天津师范学校学生，工读互助运动积极分子。

朴镇淳（박진순 1897—1938） 旅俄朝鲜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韩人社会党秘书长，高丽共产党（上海派）负责人。

庞人铨（1897—1922） 字寿纯。湖南湘潭人。学生，湖南劳工会出版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0）。

彭一湖（1887—1958） 名蠡，字忠恕。湖南岳阳人。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彭明（1924—2008） 河南夏邑人。当代著名中国现代史专家。

彭述之（1894—1983） 化名张次南、陶伯。湖南省邵阳（今隆回）人。北京大学学生，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

彭真（1902—1997） 山西曲沃人。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彭继红（1961— ） 湖南永顺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1899—1921 年）》等。

彭璜（1896—1921） 又名殷柏。湖南湘乡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会长，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干事，中共湖南早期组织创建人之一。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俄国人。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собраксhelp, Е. А. 1886—1937） 苏联20 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希腊神话中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名字的意思是“先见之明”。

蒲鲁东（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人。著名政论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潘国华（1938— ）江苏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

Q

契切林（Tchicherine 1872—1936） 俄国人。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

秦抱朴　生卒年不详。又名慧僧、涤青。江苏无锡人。上海外国语学社

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

瞿秋白（1899—1935） 原名霜，学名双。江苏常州人。记者、编辑，中共早期党员（1922），《向导》、《新青年》主编。

R

任卓宣（1896—1990） 四川南充人。1922年6月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少共执行委员，负责出版宣传。1928年叛变，用笔名叶青，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之一。

任弼时（1904—1950） 原名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2）。

阮啸仙（1897—1935） 原名熙朝，字瑞宗。广东河源人。中共早期党员（1921）。

若愚，即王光祈。

S

士探拉（Stammler，Rudolf 1856—1938） 德国人。著名法学家。

山川均（ヤマカワ ヒトシ Yamakawa，Hitoshi 1880—1958）日本冈山县人。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日共早期党员。

山川菊荣（ヤマカワ キクエ Yamakawa，Kikue 1890—1980）女。日本东京人。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之妻。

山崎今朝弥（ヤマザキ ケサヤ Yamazaki，Kesaya 1877—1954）日本长野县人。著名律师，日本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日本社会主义同盟”。

圣西门（Saint—Simon，Claude Henri de Rouvroy 1760—1825） 法国人。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石川祯浩（イシカワ ヨシヒロ Ishikawa，Yoshihiro 1963— ） 日本山形县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著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等。

孙中山（1866—1925） 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

市）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创始人。

孙逸仙，即孙中山。

孙铎，今译马林。

孙棣三 生卒年不详。中华革命党成员，《星期评论》创办人之一。

宋美龄（1897—2003） 女。广东文昌（今海南岛）人。蒋介石之妻。

宋教仁（1882—1913） 字遁初，号渔父，笔名犟斋等。湖南桃源人。民国初年著名政治活动家。

沈云龙（1909—1987） 字耘农。江苏东台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编辑。

沈玄庐（1883—1928） 原名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中共早期党员（1920），《星期评论》主编，《劳动界》编辑。

沈仲九（1887—1968） 又名中天、信爱。浙江绍兴人。《星期评论》编辑。

沈泽民（1900—1933） 原名德济，笔名成则人。浙江桐乡人。沈雁冰之弟。《少年世界》编辑，中共早期党员（1922）。

沈雁冰（1896—1981） 原名德鸿，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小说月报》主编，中共早期党员（1921）。

邵力子（1882—1967） 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中国国民党人士，著名报人，中共早期党员（1920）。

邵飘萍（1884—1926） 原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东阳人。《国民》发起者，《京报》记者，曾担任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顾问。

叔本华（Schopenhauer，Arthur 1788—1860）德国人。著名哲学家。

室伏高信（ムロブセ　コウシン　Murobuse，Koushin 1892—1970）日本神奈川县人。新闻记者，杂志编辑。著有《民主主义讲话》、《文明的没落》等。

施存统（1899—1970） 原名复亮，笔名光亮、亮、文亮、伏量、C.T等，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人。中共第一批党员（1920），中共二大代表。

施蒂纳（Stirner，Max 1806—1856）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德国人。著名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重要人物，无政府主义先驱。

萨发洛夫（Г·И·Сафаров［G. I. Safarov］1891—1942） 俄国人。共

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部长、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

斯大林（Сталин,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нович 1879—1953） 俄国人。长期担任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斯托杨诺维奇（Стоянович, К. А. 1886—1938） 俄国人。原名康斯特丁·阿列克谢耶维奇·米亚钦，化名米诺尔。俄共党员，曾任远东通讯社和俄斯塔通讯社驻广州分社记者、北京革命局领导人。

斯托帕尼（Stopany, Vadim A. 1893—1921） 旅俄意大利人。《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记者，上海新华世界语学校教师。

斯宾塞（H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英国人。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有"社会达尔文之父"之称。著有《社会学研究法》(中文本《群学肄言》，在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广泛影响)。

斯诺（Snow, Edgar 1905—1972）美国人。著名记者。

舒米亚茨基（Shumyatsky, B. 1886—1938） 化名切尔沃内。俄国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远东全权代表（1921）。

森户辰男（モリト タツオ Morito, Tatsuo 1888—1984） 日本广岛县人。日本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1920年因发表《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之研究》一文而离职东京帝大教员。后任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战后曾任广岛大学校长。

塞利格曼（Seligman, Edwin R. A. 1861—1939）美国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史）教授，著有《经济史观》(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等。

T

田诚 生卒年、籍贯不详。在《向导》发表了多篇文章。

讬罗次基 今译托洛茨基。

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нч 1828—1910） 俄国人。著名作家、思想家，伯爵。

托洛兹基 今译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Троцкий, 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1879—1940） 俄国人。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6），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唐宝林（1939—）江苏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专家。

陶乐勤 生卒年不详。江苏昆山人。传媒人。

陶履恭（1887—1960） 后名孟和。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学奠基者之一。

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俄国人。著名作家。

脱尔斯泰 今译托尔斯泰。

脱洛斯基 今译托洛斯基。

塔拉索夫 生卒年不详。俄国人。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

谭平山（1886—1956） 又名鸣谦、聘三。广东高要人。教师，中共广东早期组织创建人之一，中共二大代表。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

W

王光祈（1892—1936） 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

王守常（1948—） 北京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观泉（1932— ） 别名伊之美。上海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擅长中国现代文学史、美术史。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字灼斋，亦名烬梅、烬美。山东莒县（今诸城）人。中共一大、二大代表。

王宠惠（1881—1958） 字亮畴。广东东莞人，生于香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王俊（1877—1940） 河北宛平（今属北京市）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

工人党员，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负责人之一。

王星拱（1887—1949） 字抚五。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庆）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

王船山（1619—1692） 即王夫之，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

王揖唐（1878—1948） 名赓、志洋，字什公、一堂、逸堂、慎吾。曾为袁世凯秘书，安福系领袖。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稼啬。安徽泾县人。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

伍豪，即周恩来。

吴玉章（1878—1966） 原名永珊。四川荣县人。中国同盟会成员，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2年）。

吴廷康，即魏金斯基。

吴佩孚（1874—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两湖巡阅使（1921）。

吴稚晖（1865—1953） 江苏武进人。中国同盟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主要创始人。

吴黎平（1908—1986）又名吴亮平。浙江奉化人。当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

汪寿华（1901—1927） 原名何纪元，字介尘，又名何景亮、何寄元、何今亮、何松林、宋林、孔伯生。浙江诸暨人。中共早期党员（1923）。

汪精卫（1883—1944） 原名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江西婺源人。中国同盟会骨干，《民报》编辑。

武者小路实笃（ムシャノコジ　サネアツ　Mushanokouji，Saneatsu 1885—1976） 日本东京人。日本白桦派作家，日本新村运动的发起者。创办《新村》、《大调和》、《独立人》等杂志，著有《孔子》、《真理先生》等。

威廉·白拉克（Wilhelm，Bracke 1842—1880） 德国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言学家和政论家。

威廉·里布列希（Wilhelm，Liebknecht 1826—1900） 今译威廉·李

卜克内西。共产国际活动家。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 В. Д. 1882—1942） 俄国人。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1919年）、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1920）。

魏金斯基（Voitinsky, Gregori N. 1893—1953） 原名札尔欣，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等。俄国人。1922年4月，作为俄共（布）远东局全权代表来华。

X

小林丑三郎（コバヤシ ウシサブロウ Kobayashi Ushisaburou 1866—1930） 日本群马县人。日本近代经济学家。曾任大藏省法制局参事官、台湾总督府财务局长、众议院议员。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专修大学等学校讲授财政学。著有《财政学提要》、《经济思潮史》、《比较财政学》、《庶民金融论》等。

向警予（1895—1928） 女。原名俊贤，笔名振宇。湖南溆浦人。新民学会成员，中共早期党员（1922）。

希曼 即张西曼（1895—1949） 字百禄。湖南长沙人。中国同盟会成员。翻译家、北京大学教师。

西川光次郎（ニシカワ コウジロウ Nishikawa, Kojirou 1876—1940）即西川光二郎。日本兵库县人。日本社会主义者，日本社会民主党成员。

许白昊（1899—1928） 又名白天。湖北应城人。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2），中共二大代表。

许新凯 生卒年、籍贯不详。《共产党》月刊、《向导》的撰稿者，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健将。

幸德秋水（コウトク シュウスイ Kotoku, Shusui 1871—1911） 本名幸德传次郎。日本高知县人。日本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著

有《社会主义神髓》等。

项英（1898—1941） 原名德龙，又名德隆，号江钧。湖北武昌人。工人，中共早期党员（1922），中共二大代表。

徐苏中（1886—？） 江西人。国民党人士。

徐彦之（1897—1940） 字子俊，山东郓城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社成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

徐相文（서상문 Suh Sangmun 1959— ） 韓國浦項人。韓國中央大學講師。现任职于韓國國防部 軍事編纂研究所。著有《普罗米修斯的天火——革命俄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等。

萧旭东（1894—1976） 字子升，别名萧瑜。湖南湘乡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新民学会总干事，华法教育会秘书。

萧劲光（1903—1989） 湖南省长沙人。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

萧超然（1929— ） 湖南醴陵人。北京大学教授。当代历史学家。

谢列布里亚科夫（1905—？） 朝鲜人。魏金斯基使团成员。

谢米诺夫（Semenov, Grigoii Mikhailovich 1890—1946） 今译谢苗诺夫。俄国人。白卫军中将。十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中俄边境组建军队与政府与苏俄对抗，曾参与筹议蒙古独立。

谢麦斯科（Г·Ф·Семешко） 又名洪诺尔斯基，生卒年不详。《上海俄文生活日报》（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主编（社长）。

谢婴白（1890—1957）广 东博罗人。国民党人士，新村运动的鼓吹者。

新妻伊都子（ニイツマ イトコ Niitsuma, Itoko 1890—1963） 女。父姓铃木，本名伊都子。日本神奈川县人。日本大正、昭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妇女运动活动家。

熊得山（1891—1939） 原名学峻，亦名康年、字子奇。湖北江陵人。今日派主要成员，《今日》主编。

Y

于树德（1894—1982） 字永滋。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中国同

盟会成员。中共早期党员（1922），从事工人运动。

尹宽（1896—1966） 原名王竞博，化名硕夫。安徽桐城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旅欧青年团总支部执行委员。

叶再生（1925— ） 当代中国出版史专家，曾任科学出版社总编。著有《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等。

叶楚伧（1887—1946） 江苏吴县人。《民国日报》总编辑。

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 λη，Aristotélēs 前384—前322年） 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因格斯 今译恩格斯。

伊万诺夫（Иванов，A. 1885—1942） 曾用笔名伊文。俄国人。俄国临时政府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之一，后转变为苏联政府代表在中国活动，北京大学外籍教师。

有贺长雄（アルガ ナガオ Aruga，Nagao 1860—1921） 日本大阪市人。日本国际法学家。1913年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宪法学》、《战时国际法》、《文明战争法规》、《行政学讲义》、《日本古代法释义》、《日本早期社会史》等著作。

杨和德，即杨明斋。

杨昌济（1871—1920） 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师，毛泽东的岳父。

杨奎松（1953— ） 重庆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史专家，著有《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等。

杨明斋（1882—1938） 名好德，字明斋。山东平度人。翻译，俄共党员，魏金斯基使团成员，后转为中共党员，中共二大代表。

杨贤江（1895—1931） 又名庚甫，字英甫。浙江余姚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少年世界》、《学生杂志》编辑。中共早期党员（1922）。

杨匏安（1896—1931） 原名锦焘，笔名匏庵、匏厂、王纯一等。广东香山北山乡（今属中山市）人。编辑。中共早期党员（1921年）。

远藤无水（エンドウ ムスイ Endou，Musui 1881—1962） 本名遠藤又四郎（エンドウ ユウシロウ Endou，Yushirou），号无水。日本福岛县

人。早年为基督徒，后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著有《财产奉还论》等。

易家钺（1899—1972） 湖南汉寿人。无政府主义者。

俞秀松（1899—1939） 原名寿松，字柏青，又名寅初，俄文名那利曼诺夫。浙江诸暨人。学生，《浙江新潮》主编，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中共早期党员（1922）。

俞颂华（1893—1947） 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晨报》记者。

恽代英（1895—1931） 谱名遽轩，字子毅，笔名天逸、代英、英、子毅、但一、子怡、稚宜、FM 等。江苏武进人，生于武昌。教师，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中共早期党员（1922）。

烟山专太郎（ケムヤマ　センタロウ　Kemuyama, Sentarou 1876—1954） 日本岩手县人。历史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

殷叙彝（1925— ） 江苏丹阳人。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袁世凯（1859—1916） 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袁振英（1894—1979） 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无政府主义者。《新青年》、《共产党》编辑。

嫣及尔，今译燕妮。

渊实，即廖仲恺。

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 1883—1927） 俄国人。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特使（1922—1923 年）。

Z

左舜生（1893—1969） 原名学训，字舜山，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少年中国评议部负责人。中华书局编辑。

庄福龄（1929— ） 江苏镇江人。当代中国学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

朱执信（1885—1920） 名大符。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中国国民

党人士，《建设》编辑。

朱谦之（1899—1972） 字情牵。福建福州人。无政府主义者。《奋斗》编辑。

朱德（1886—1976） 原名代珍，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中共早期党员（1922）。

张太雷（1898—1927） 原名曾让，又名椿年、春木。江苏常州人。中共早期党员（1920），曾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

张东荪（1886—1973） 原名万田。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主编，教授。

张勋（1854—1923） 原名张和，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谥号忠武。江西省奉新县人。民国初年担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1917 年 7 月复辟帝制，旋失败。

张永奎（1893—1977） 辽宁辽阳人。1919 年 3 月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申府（1893—1986） 原名崧年，字申甫。张岱年之兄。河北献县人。中共《每周评论》、《新青年》编辑，《少年中国》编辑。北京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中共旅法早期负责人。

张希曼 见希曼。

张作霖（1875—1928） 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

张君劢（1887—1969） 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政治活动家、哲学家。

张国恩（1880—1940） 字眉先、梅先。湖北黄安人。中共湖北早期组织成员（1920）。律师。

张国焘（1897—1979） 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员，中共一、二大代表。

张秋白（？—1928） 安徽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国民党代表。

张闻天（1900—1976） 曾化名洛甫、洛夫，笔名哥特。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人。中华书局编辑。

张冥飞 生卒年不详。湖南湘乡人。编著《劳农政府与中国》。

张继（1882—1947） 字溥泉。河北沧县人。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士。

张静江（1877—1950） 浙江吴兴人。中国同盟会早期成员，无政府主义者。

张静庐（1898—1968） 原名张继良，民国五年起用笔名“静庐”，从此以“张静庐”名世。现代出版人，一生致力于出版事业，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较大贡献。

志津野又郎（シズノ　マタロウ Shizuno，Matarou 1876—1942） 日本福冈县人。翻译家。堺利彦的表弟。

周世钊（1898—1976） 字敦元。湖南宁乡人。教师、编辑、新民学会成员。

周佛海（1897—1948） 原名明繁，字子美，笔名佛海、无懈等。湖南沅陵人。中共一大代表。

周作人（1885—1968） 原名遐寿，字星杓，号起孟、启明、知堂等。浙江绍兴人。教师、作家、新村运动的倡导者。

周恩来（1898—1976） 字翔宇。浙江绍兴人。天津觉悟社发起人，旅欧中国早期组织成员，曾任旅欧少共执行委员。

周策纵（1916—2007） 湖南祁阳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知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

宗巴特（1863—1941） 德国人。著名经济学家。

郑太朴（1901—1949） 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市）。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无政府主义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佩刚（1890—1970） 广东香山（今属中山市）人。无政府主义者，又新印刷厂负责人。

郑贤宗 生卒年、籍贯不详。无政府主义者。

郑振铎（1898—1958） 原名木官，字警民，号西谛，笔名落雪、ct等。福建长乐人。《新社会》创办人之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1）。

赵世炎（1901—1927） 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四川酉阳（现属重庆市）人。《少年》主编，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1921），曾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

赵醒侬（1899—1926） 原名性和。江西南丰人。中共早期党员（1921）。

斋藤道彦（サイトウ ミチヒコ Saitou, Michihiko 1943— ） 日本人。历史学家，中央大学教授，著有《五四运动的虚像和实像》等。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四川隆昌人。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成员，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

（日文：梁艳萍；英文：王华、冯华整理）



后　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书稿酝酿于五四运动纪念60周年之际，那时我开始研究恽代英，后来又研究了董必武、李汉俊等。胡华教授曾对我研究李汉俊给予关注，表示："以前我们对他了解甚少，你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除了建议我写一本全面真实反映李汉俊的传记外，还希望我对创建史作深入研究。这样我就将创建史作为研究对象，渐渐对这段历史的资料丰满起来，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觉得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很有必要探讨。2004年我将"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喜获批准，于是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李良明、副教授蔡丽、湖北大学教授徐方平共同攻关，具体分工如下：

田子渝：提出指导思想、编写大纲，绪论、第一、二章、第三章第二节、结束语、后记。李良明：第三章第一、三、四节。蔡丽：第四、五章。徐方平：第六章。经过三个寒暑的努力，2007年完成初稿。

初稿完成后，由田子渝、蔡丽负责修改，最后由田子渝统稿、定稿。又经过三个寒暑的努力，书稿于2010年5月完成。同年9月，获国家社科规划办审核准予结项。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田子渝、蔡丽对书稿进行了修改。2011年9月书稿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我们备受鼓舞。根据专家的意见，田、蔡对书稿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与修改。

要从浩繁的史料中，探寻历史的真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将斑斓辉煌的历史清晰梳理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完成的难度真的不好用"写了多少次"、"改了多少遍"来形容，从动笔到定稿是整整七年！如果从搜集资料算起，那就有30多年！尽管如此，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仍有很多的不足，欢迎读者与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海内外一些学者无私的援助，有的提出宝贵意见，有的提供珍贵资料，有的作文字润色。在“人物简历”中，石川祯浩先生订正了日本人名并提供了许多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照片；李丹阳女士不仅提供了共产国际人名的资料，还校对了外国人物的英文名字。张玉菡整理了《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梁艳萍教授、王华、冯华博士生整理了“人物简历”。谢从高、沈贞伟、张安、杨偬劢、黄家猛、徐信华、刘之扬、曾银慧、唐兵、周淑芳、李竞、周瑶、田雨、唐晓玲等参加资料搜集、整理，文稿校对等工作。

此外提供帮助的还有吴应銧(美国)、伍国(美国)、夏海(以色列)、郑斗音(韩国)、张朋园、黄克武、罗久蓉、卓遵宏、陆米强、张小曼、陈金龙、蒋伯英、洪小夏、张秋实、冯铁金、贺祥林、郭圣福、杨琥、黄明彦、张玉涵，陈晓明、邢建榕、詹善钦。

正当本书杀青之际，从上海传来了陈绍康、张小红两位老朋友病逝的噩耗，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不由得回忆我们的友谊。我与绍康兄(1929—2011)是1980年经武雄兄介绍认识的。绍康兄是一个热情似火、快言快语的人，虽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仿佛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就是这一年我们开始李汉俊研究的合作，30多年一直保持友谊。他对我无私的帮助，令我感动。他退休前握着我的手十分郑重地向同事托付：“小田是我们的老朋友，你们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张小红(1961—2011)的勤奋、热情、开朗令人难以忘怀。她原来是研究上海左联历史的，2003年调到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后便立即进入了角色，作为馆长倪兴祥的副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很快熟悉了中共创建史，与同事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文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等一批质量高的著述。本书曾得到他俩的鼎力相助。

同当本书杀青之际，我爱人不幸身患绝症。在动手术，作化疗、放疗期间，她还关注、鼓励、支持我修改书稿。一年多来，书稿的统稿、定稿可以说与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感谢上苍给她力量，在与死神搏斗中初战告捷。

老干新枝。时代在不断进步，研究环境在不断改善。本书只是阶段性成果，我将继续努力，发挥余热，把传播史研究推向前进。同时热忱地希望年轻的后进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推向新的

高度。

在此之际，特别感谢湖北大学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资料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张太雷纪念馆、瞿秋白纪念馆、国史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北)。长期以来，它们为笔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没有以上朋友和单位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田子渝

2011 年 11 月 30 日于武昌沙湖寓所